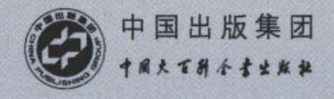


中美洲史

林恩·福斯特 著　张森根 陈会丽 译

A Brief 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A Brief 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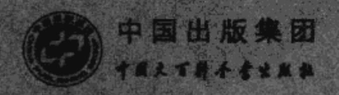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00-8524-9

9 787500 085249 >

定价：49.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中美洲史



图字:01 -2011 -0549

A Brief 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Second Edition by Lynn V. Fost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洲史/(美)福斯特著;张森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4

ISBN 978 -7 -5000 -8524 -9

(世界历史文库)

Ⅰ.①中… Ⅱ.①福… ②张… Ⅲ.①中美洲—历史 Ⅳ.①K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8568号

责任编辑 陆 源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388千字

印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美洲史

(A BRIEF 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第二版

谨以此书纪念苏珊·施奈德（Susan C. Schneider)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她一直陪伴着我

第二版前言

《中美洲史》第一版出版的时候，整个中美洲建立和平才不过几年。所幸的是，7 年过去了，和平得以持续，羽翼未丰的民主体制也幸存下来。选举政治取代军事政变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曾经被独裁者统治的地方，如今由民主的总统执政。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压迫之后，这些成就可谓非凡。

过去 7 年所发生的事情向我们展示：维持和平、建立更加透明和受信任的民主究竟有多困难。其实，中美洲的民主政治转型并不算十分成功，以死亡威胁作为政治手段仍屡见不鲜，不平等、贫穷、失业等社会现象也未见任何减少。由于经济机遇的匮乏，越来越多的人向富有国家移民。在伯利兹，常住国内的人口甚至低于国外。由移民寄回中美洲国家的汇款数额几乎与某些国家预算持平。

中美洲是连接南北美洲的地峡，它是毒品从南美到美国非法转运的必经之地。毒品和洗黑钱滋生了暴力，也为中美洲人民带来生财的机遇。只是，这使得军队和其他的官员腐败不堪，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尤为严重。为了以更加合法的方式刺激地区经济，政府采取资本主义改革、签署新的贸易协议，如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

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1]。然而，许多中美洲人民的期望值已被民主的承诺提高了，眼看生活未有改善，他们对这些举措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一样，中美洲人民也正奋力阻止全球化。也许，他们的呼声能够换来更多的像巴西和委内瑞拉那样的文官政府吧。本书的第二版就会为您讲述中美洲在和平与民主之路上所遇到的这些挑战。

---

① CAFTA－DR 即 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Dominican Republic。美国与中美洲5国（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在2005年10月20日签署了关于7国间开展全面贸易的协议。——译者注

鸣 谢

在本书两个版本的准备过程中能够得到众多朋友的热心帮助和建议，我感到非常幸运，尤其是插图让本书增色不少。没有彼得·塞尔维斯登（Peter Selverstone），就看不到这么多展示中美洲生活的图片；没有内奥米·史密斯（Naomi Smith），许多历史人物便只有名字而没有脸相。切拉·怀利（Cherra Wyllie）为修订版本创作了漂亮的插图。格里·安德森（Geri Anderson）、罗杰·库珀（Roger Cooper）和玛丽·艾利斯·雷蒙德（Mary Alice Raymond）翻遍自己的相册为本书找到了恰到好处的照片，谢谢他们。

本书的正文和图标中提及不少个人和机构，但是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的杰克·斯彭斯（Jack Spence）和佛罗里达大学的埃弗拉因·巴拉达斯（Efraín Barradas）。他们两位付出宝贵的时间与我分享专业知识：杰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内战、和平协定的实施及其后果等方面，埃弗拉因在中美洲文学领域为我提供了真知灼见。

劳伦斯·福斯特（Lawrence Foster）在研究上给予我不懈的支持。另外，我还有许多人想感谢：在危地马拉城波波尔·乌博物馆（Museo Popol Vuh）有奥斯瓦尔多·钦奇利亚（Oswaldo Chinchilla）帮忙；乔治·科尔曼（George Colman）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中美洲近代史

资料；萨尔瓦多驻纽约前总领事帕特里夏·马萨—皮茨福德（Patricia Maza－Pittsford）、危地马拉驻纽约前任商务专员罗伯托·罗森伯格（Roberto Rosenberg），以及 Presencia Panamena e Hispana News 的出版人罗伯托·摩根（Roberto Morgan）都为本书贡献了宝贵的图片。

图片说明

本书中多数插图和照片均为年代久远的历史图片。很多原图出自投影底片，有些原图已有损毁，因此重印质量往往达不到当代标准。尽管复制的质量略有欠缺，但是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对本书却是至关重要的。

绪　言

中美洲是极小的一个区域，它又进一步分为7个更小的国家。然而，每年有超过500万的北美居民来此度假旅游——去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参观玛雅文明遗址，去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雨林探险，去洪都拉斯潜水，又或者坐着游艇畅游巴拿马运河。考虑到巴拿马的税收优惠和尼加拉瓜低廉的生活成本，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退休后来这里定居。而每年，贫穷的中美洲人却争相去美国，甚至不惜成为非法移民。过去几十年间，在美国居住的中美洲人口数量累计达到近300万，其中1/3都来自中美洲最小的国家——萨尔瓦多。尽管如此，至今为止，人们对中美洲的认识仍然少之又少。它的历史就像谜一样鲜为人知。

从1823年门罗主义发表开始，中美洲地峡就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巴拿马运河作为连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通道，就美国利益来说，它的建成使中美洲更为至关重要。近年来，移民问题在美国的政治对决中得到重视，而且所谓的“查韦斯—卡斯特罗结盟”（Chávez – Castro alignment）也愈发引来美国政府的关注，我们更有理由来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

就面积而言，中美洲略大于西班牙。但是中美洲却拥有45个截然不同的土著种族，其中的玛雅人和库纳印第安人（Kuna Indians）一直

保留着独立的民族传统，使用着自己的语言。危地马拉这个国家与美国田纳西州面积相当，但是它拥有多达24种当地语言。在中美洲，各个民族间的交融产生了许多崭新的群体，比如非洲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加利夫那人（Garífunas）和米斯基托人（Miskitos）；最夸张的是形成了一批特殊的印欧混血人种——梅斯蒂索人（Mestizo），其真正的根源却为非洲人。西班牙对中美洲长达3个世纪的统治以及封建制度给这个地区留下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除伯利兹以外，中美洲国家全部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当时的北美受到英国更为民主和工业化的氛围影响，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弱小的中美洲面前，北美一直以“巨人”自居。两者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惨痛的误解。美国不仅干涉和侵犯了中美洲国家，甚至将其占为己有。美国雇佣军威廉姆·沃克（William Walker）就曾不知廉耻地接管过整个国家。这样的干预不仅在过去，近年仍有发生。美国在2006年尼加拉瓜总统大选上对左翼候选人的威胁言论就是一例。不出意料，中美洲人民纷纷打出“美国佬滚回去”这样的标语，他们的抵抗态度不言而喻。然而两地之间相互依存的现实同样无法抹去，有必要争取更深层的理解。

中美洲地峡分隔两大洋、连接两大陆，在30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既是屏障也是桥梁。其风景地貌、珍禽异兽、奇花异草、民族部落构成一幅美妙的组图，而中美洲的历史也如境内的火山一样充满爆发力。本书将呈现给读者一段简洁却全面的历史，从地峡构成和美洲人起源讲起，覆盖了中美洲3 000年的文明史，从早期的前哥伦布时期文化一直到最近中美洲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挑战都有涉及。

虽然侧重点会放在对中美洲发展有关键影响的重大事件和一些明显的文化模式上，但也充分体现出中美洲7个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别和各自的特点。这7个国家是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然而，想要为每个国家一一列举其总统，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非本《中美洲史》可及。

本书篇幅不长，但是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其中有几个特殊

的主题贯穿了全篇，比如，中美洲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和分立所为何因，火山喷发、地震、香蕉种植、生态旅游因素等对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其他的主题，比如自西班牙征服以来各个土著群体及其文化的命运何去何从等等，则充分体现了中美洲地区人文经验的多样性，也展示了各个国家间存在的差异。

过多政治、文化事件的描述往往会让一个社会给人以单调、缺乏人性的印象，因此本书在阐释特殊主题的同时，也会对某些历史个人、种族群体（如基切玛雅人，Quiche 或者 Kiche）及地区运动给予细察，以此来丰富或者反衬主要历史事件。例如，以西班牙人在 16 世纪建立一个叫贝拉帕斯（Verapaz）的乌托邦村庄这一事件，来对比西班牙征服的野蛮与残忍；比较英、西两大帝国对中美洲地区带来的不同影响；突出描写加利福纳人（Garífuna，即黑加勒比人）和巴拿马半自治的库纳印第安人族群。本书的插图将会呈现给读者中美洲地区种族和地理的复杂性及其独特的建筑；本书引用的文字能够把事实描述与圣文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诗篇则具有呐喊的魅力，在官方文件中可是绝对感受不到的。

当然，现在不存在一个叫中美洲的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这 5 个国家共享很长的一段历史。它们以危地马拉王国的名义共同接受西班牙的统治长达几个世纪。独立以后，它们成立了自己的联邦。虽然种种原因迫使它们又分为 5 个独立自治的国家，但是它们不断尝试以期统一为一个主权国家。从 1821 年到 1960 年间，共有 25 次这样的尝试，最近的一次就在 1997 年。本书的重点放在这 5 个国家上。巴拿马 20 世纪以前都被认为是南美洲国家，而伯利兹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20 年前才得以独立。现在普遍认为这两个国家属于中美洲，在本书相关事件和历史中也有介绍。

本书虽然简短，但我希望读者能够因此对中美洲有更清晰的认识，能理解中美洲人民克服艰难、创建美好家园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目录 Contents

地图和图片

表格

第一章　土地和第一批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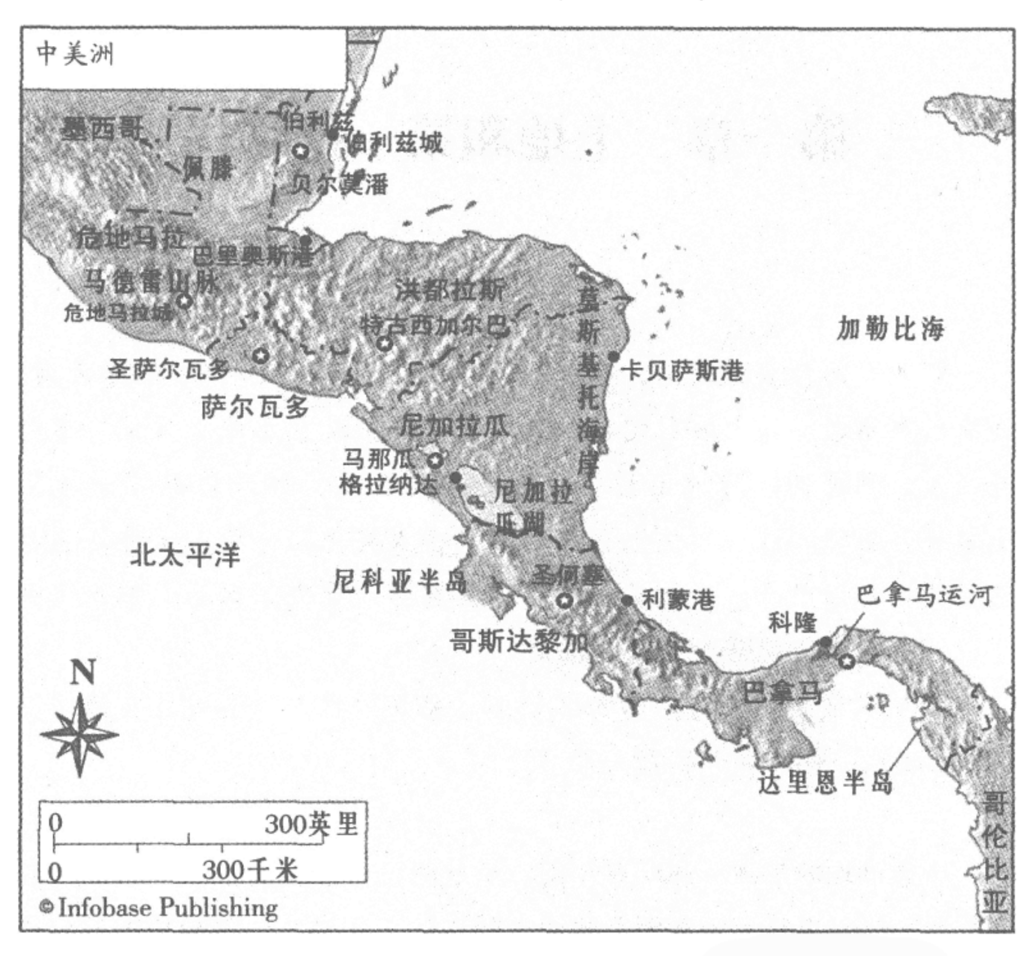
1 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夜光下只看得见几洼积水和平静的大海，还有水声潺潺。伟大的羽蛇神，我们的创造主就在水中。只见一道亮光闪过，刹那间，陆地出现了。这是神的旨意，他只消说“土地”，土地就会出现。这一切仿佛一阵烟雾来得太突然，你看，土地还在我们面前不停地展开。紧接着，还是那么突然，形成了大山，把水隔开了。一条条河流绕着大山蜿蜒流淌。

——《波波尔·乌》(*Popol Vuh*)，基切玛雅人的圣书［特德洛克(Tedlock)，1985年，第72—75页］

中美洲地峡形成于300万年前，从此将一片汪洋分隔成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也将北美和南美两块大陆连接了起来。大陆板块的猛烈撞击形成了高山，把海洋中分散的陆地推挤到了一起。原先独立的生态系统也因为地壳运动融合到一起，真正将南北美洲连成了一体。科学家把中美洲“地桥”的形成定为6 000万年来最重要的地质变化之一。

2 中美洲“地桥”跨越1 500英里海域。几百万年来，北美和南美大陆的动物和植被一直分开繁衍，由于地桥的作用，物种开始大规模迁徙，比如南美洲的猴和木棉树向北部转移，而北美的美洲豹和橡树渐渐适应了南方环境，这些迁徙给两块大陆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变化。目

前生活在南美洲的陆地哺乳动物超过半数源自北美，它们不但适应了新环境而且进一步繁衍。生物学家称之为“南北美洲生物大迁徙”（the Great American Biotic Interchange）。由于来自北部温带地区的动物植被和来自南部亚马逊盆地的热带物种在地桥聚集，中美洲变得无比富饶。栖息在这块小地峡上的鸟类比美国和加拿大的加起来还要多。



现代中美洲国家、首都及主要地形特征。中美洲是海岸之国：太平洋与加勒比海两侧的海岸线均达 1 500 英里。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边境为中美洲最宽的地界，但也只有 127 英里，而巴拿马地峡则更狭窄，只有 29 英里。（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附录地图，1999）

3　中美洲的面积只有美国得克萨斯州的3/4，但它所拥有的地貌景观却异常丰富，几乎与一个大陆相当。它夹在两大洋中间，海岸比陆地要

多，但是从热带大草原、雨林到高原松木和布满苔藓的云雾林，从太平洋沿岸只有仙人掌可以存活的贫瘠高原、干旱的落叶林到加勒比海一侧茂密繁盛的亚马逊植被，应有尽有。尼加拉瓜低地（Nicaraguan Depression）和巴拿马的达里恩（Darién）沼泽地地势低洼，几乎与海平面持平；而在危地马拉西部，塔胡穆尔科火山（Volcán Tajumulco）的半高峰就高耸云霄达 13 926 英尺。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全年恒温，分为干湿两季。但在南部的加勒比沿海地区则没有旱季，只有湿和更湿的区别。虽然中美洲季节之间没有温差，但是随海拔高度的变化，温度相差很大。低地炎热潮湿，适合蜘蛛猴、鹦鹉等生活；山上则气候温和，常年如春，长满橡树、杉树；而到了高峰，则冰雪覆盖，空气寒冷。不仅如此，中美洲两侧的大洋也截然不同：一边是广阔无边、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另一边的加勒比海不仅浅，海岸还受到世界第二大珊瑚礁的保护。在中美洲如此丰富多样的环境下，野生动植物繁衍旺盛：中美洲只占地球大陆面积的 0.5%，却拥有全世界 7% 的物种。

火环

那个火山恐怕是人们见过最可怕的东西了，它张开大口，吐出来的巨石跟房屋一样大，裹着熊熊火焰。巨石落下来，摔成无数碎片，给整个山都覆盖上了一层火。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1524 年［麦基（Mackie），1972 年，第 88 页］

中美洲地峡不仅诞生于剧烈的地质运动，如今依然遭受着地震和火山的肆虐。太平洋沿岸的火山山脉就是在地壳的移动、推挤和断层等活动中横空出世的。从危地马拉一直到巴拿马西部，共有 350 多个火山。南美洲到亚洲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俗称“火环”。全世界活火山的 75% 都位于此地震带内，而中美洲是火环上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其中海拔最高、也最活跃的富埃戈火山（Fuego）靠近安提瓜，位于危地马拉境内。它喷出的岩浆可将整个夜空覆盖。　4

塞伦（Cerén）：新世界的庞贝

说到我，我把整个天空都拉了下来，一下子创造了整片土地。

——《波波尔·乌》，基切玛雅人的圣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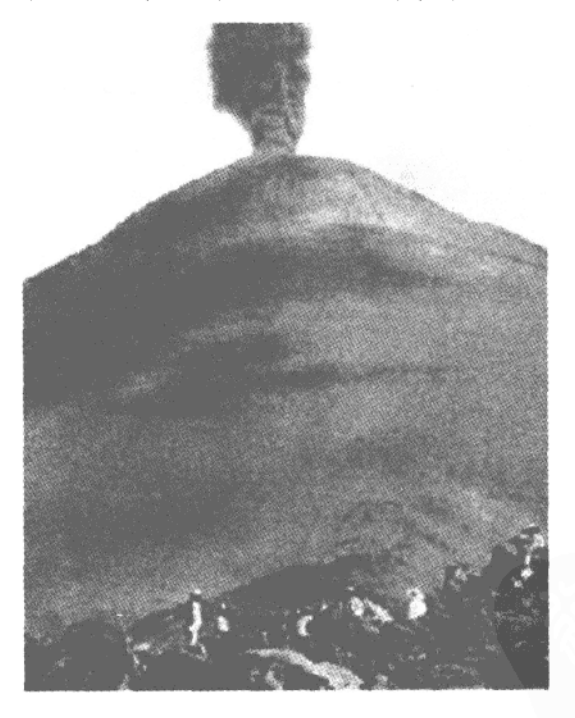
（特德洛克，1985 年，第 89 页）

火山喷发毁灭了前哥伦布时期的城市，其中不乏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1976 年，在萨尔瓦多中部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辆推土机无意之中挖掘出了塞伦的部分遗址。塞伦是前哥伦布时期玛雅人的一个定居点，被埋在了 17 英尺厚的火山灰下。虽然推土机毁坏了部分古代结构，考古学家还是能够看到一个完整家庭的痕迹。6 世纪末洛马卡尔德拉（Loma Caldera）火山喷发时，房子的主人从熔岩爆炸、火山灰奔涌而来的慌乱中逃生，现在屋内的物品还保持着当时被留下的位置。从放在灶台上的锅、散落四周的器具、卷起来的睡毯等迹象看，可以想象一家人在工作一天之后聚集在一起的场景，考古学家也因此推测火山喷发的时间应为傍晚。从被火山灰掩埋的花园和田地可以看出，水果和玉米都已经成熟。这告诉我们那场永远改变了他们命运的灾难应该发生在 8 月。那些容易变质腐烂的食物由于保存得特别好，考古学家们甚至能够还原 1 500 年前挂在厨房椽子上的一串辣椒、用一根细绳绑起来的玉米秆子。塞伦遗址得以保留非常意外，但是像它一样毁于火山喷发的前哥伦布时期古村落还有很多。位于萨尔瓦多的查尔丘阿帕（Chalchuapa）是太平洋斜坡地区最早出现玛雅文明的地区之一。它于 250 年左右因略波恩戈（Llopongo）火山喷发被埋。那次火山喷发毁灭性之大导致了该地区之后两百年都无人居住。再往南一些的巴拿马西部有巴鲁火山（Volcán Barú），它山脚下的奇里基酋邦（Chiriquí chiefdoms）在 600 年被迫移址。在前哥伦布时期的旧世界里，这些火山就算不爆发，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因为它们不仅被融进了创世神话当中成为了神圣的地方，而且还被指定为祖神的居所。

洪都拉斯靠太平洋一侧的火山渐渐向外挪动，几乎将萨尔瓦多逼进了大海。尼加拉瓜湖的岛屿上也巍然矗立着许多火山山峰。哥斯达黎加中部同样也是烟雾缭绕的火山群。该火山山脉其中一段是塔拉曼卡（Talamanca）花岗岩山脉，但是从巴拿马西部开始又变回清一色的火山。此处的巴鲁火山（Volcán Barú）是巴拿马境内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标。俯瞰中美洲地区，你会发现从危地马拉直到巴拿马的火山群是最主要的地貌景观。

其中活火山至少有20座，另外20座虽然目前未曾爆发，但也不能就此确认为死火山。哥斯达黎加的伊拉苏（Irazú）火山曾经就被宣布是死火山，但1963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伊拉苏火山向人口众多的中部高地喷出火山灰，导致73人死亡，该地区受严重污染也近10年之久。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中美洲地区还很年轻也很不稳定，因此一次又一次毁于地震和火山喷发。1835年，位于尼加拉瓜西北部的

5



伊萨尔科火山（Izalco）最后一次喷发在1966年。萨尔瓦多有100多个火山，伊萨尔科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地理杂志》照片，1922年2月）

科西圭纳（Cosiguina）火山猛烈爆发，导致山高从6 600英尺瞬间减为2 660英尺，不到原来的一半！危地马拉的富埃戈火山（Fuego）在中美洲地区最为活跃。自西班牙征服以来，它已经喷发了60多次。1971年那次，红色的熔岩和灰烬厚达66英尺，填满了富埃戈山脚下的峡谷。1989年，哥斯达黎加的波阿斯火山（Poás）爆发，喷向空中的火山灰超过半英里。同样位于哥斯达黎加的阿雷纳火山（Arenal）以喷发的形式迎来了21世纪。萨尔瓦多的伊拉玛特佩克火山（Ilamatepec，也叫圣安娜火山）于2005年带来了本世纪第一次火山爆发，成千上万个家庭被迫疏散。所有这些都是对中美洲火山隐患的警示。

6

无数的中美洲城市毁于地震，因此中美洲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建筑历史——圣萨尔瓦多自1528年以来重建了9次。位于危地马拉南部的安提瓜，作为西班牙帝国的地区首府，曾经辉煌一时。然而1773年的地震将安提瓜夷为平地，再也未能重建。之后，首府迁至危地马拉城，安提瓜则从此寂静潦倒，教堂的废墟永远带上了殖民地色彩。尼加拉瓜的莱昂市（León）最初毁于地震，后又连续遭到莫莫通博火山（Momotombo）喷发的掩埋，最终于1610年遭废弃。尼加拉瓜的旧都老莱昂城（León Viejo，也叫old León）如今只作为一个考古遗址存在。在如此巨大的毁灭背后是人类无尽的痛苦：1976年的地震造成危地马拉25 000人丧生，1/4的人口无家可归；2001年的一场地震摧毁了萨尔瓦多10万多间房屋。

然而，火山作用对中美洲来说也有积极的一面。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黑曜石（也叫火山玻璃）被人们用作刀具，火山灰则被用来烧制陶器。坍塌的火山口积成了阿蒂兰特湖（Lago Atitlán）等一些重要湖泊，高出海平面5 000英尺。火山脚下的峡谷土地肥沃，也是得益于火山灰和熔岩的不断注入。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这些峡谷一直是最繁荣，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哥斯达黎加的中央山谷长期以来因过度的咖啡种植和过多的人口，土地开始枯竭。最近几十年来，若不是微型火山喷发持续为土壤带来新的生命力，中央山谷的经济很可能已经崩盘。

第一批美洲人

我应该写一写先辈们的故事，写美洲大陆的第一批父亲、祖父。据说其中有一位叫加加维特斯（Gagavitz），是火山的意思，还有一位叫萨克特考（Zactecauh），意为雪山。写他们讲过的故事——我们从海的那边来到这个叫图兰（Tulán）的地方，在这里孕育、出生，一代又一代！

——《卡克奇克尔人史》（*The Annals of the Cakchiquels*），卡克奇克尔玛雅人之书［雷西诺斯和格茨（Recino and Goetz），1967 年，第 43 页］

美洲新大陆的第一批主人其实是移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1492 年航行至此，误以为到了东印度，所以把当地的人民叫成了印第安人。从那时起，人们对美洲人来源的问题就一直饶有兴趣。后来欧洲人发现，那儿根本不是印度，而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他们拼命猜想这一群亚当和夏娃的孩子会是谁呢。多少个世纪以来，对于“印第安人”究竟是谁的后代这一问题，有无数的猜测，从以色列失落的部落（Lost Tribes of Israel）到外星人，简直无奇不有。科学家们利用考古、牙齿形态、语言等方面的证据，以及最新的 DNA 技术大大地缩小了推测的范围：他们坚信第一批美洲人来自亚洲。至于这些亚洲人具体在什么时候、如何迁移到这片新天地的，仍在激烈的争论之中。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初到美洲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冰川期的后期，大约在公元前 40000 年到 10000 年之间，而且是穿越了西伯利亚来到北美大陆的。

7

中美洲地峡的形成本身对美洲人口的迁徙是关键一步。由于两个大洋之间的这一道屏障，出现了从赤道吹向极地的信风，最终在公元前 40000 年左右将地球带进了冰川后期，也就是常说的更新世（Pleistocene）。巨大的更新世冰川使得白令海峡的水面大大降低，创造了又一个地桥，将北美洲和亚洲北部连接到了一起。白令地桥虽然只有 55

英里长，但是在许多处地方都宽达 1 000 英里。如此一来，人类通过步行或者靠岸航行的方式进入北美洲，然后南下进入美洲腹地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尼加拉瓜湖附近，一次古代的熔岩流将这一时期的人类及其猎物北美野牛的脚印保存了下来。在中美洲又发现了带凹槽的石制抛掷式尖状物（Fluted stone projectile points）。这个工具和出土于新墨西哥州拥有 11 500 年历史的克洛维斯尖状物（Clovis points）非常相似，由此也可以推算出亚洲猎人抵达中美洲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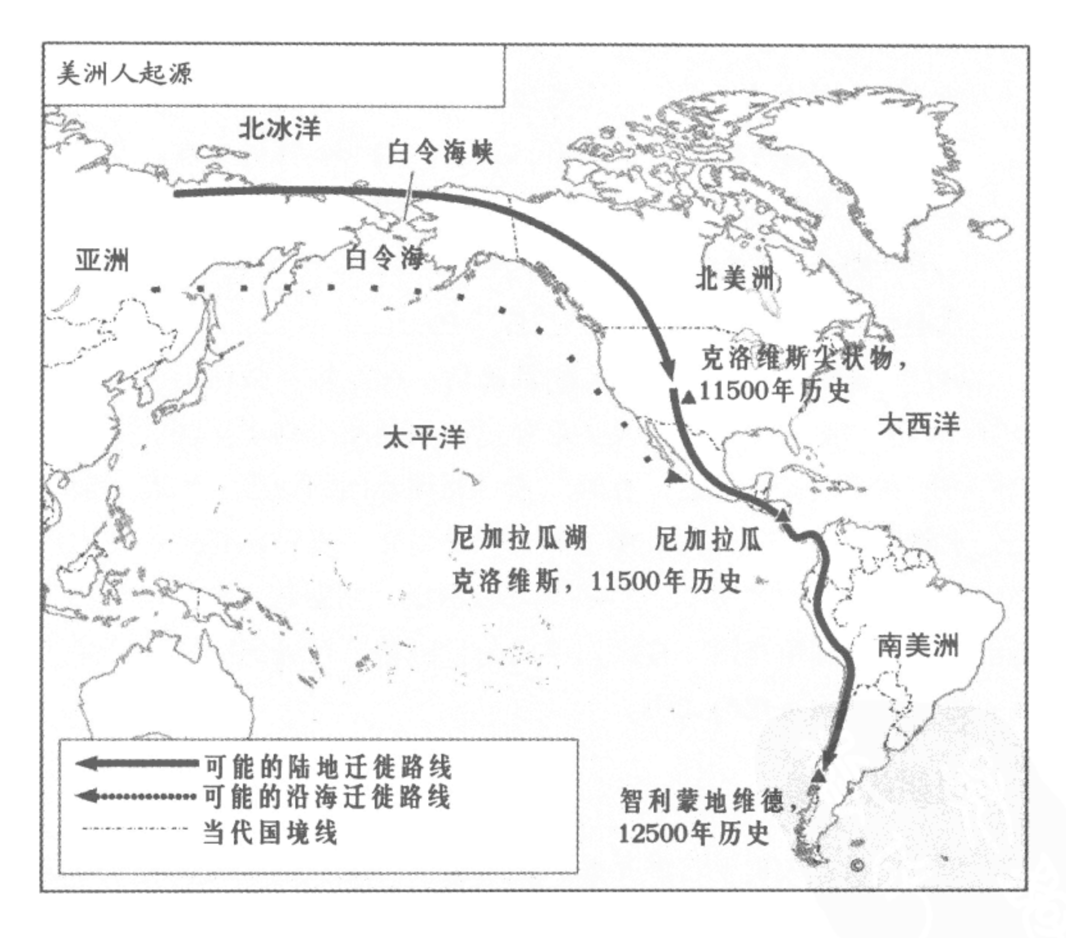
8

1997 年以前，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到达美洲大陆必定在克洛维斯时期之后，而且最可能是蒙古人。他们跟踪野牛、乳齿象和其他大型野兽，一路追捕至此。人类和猎物向美洲腹地迁移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没有冰雪覆盖的陆地通道，二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植被。而在克洛维斯时期之前，这两个条件根本不可能存在。虽然一些古生物学家一直反对这个观点，提出美洲人起源的时间应该早得多。可是支撑这个论点的有力证据非常难找：一方面是因为相关化石已遭到侵蚀，另一方面是因为更新世之后最有可能找到狩猎营地及人类尸骨的地方如今已沉入大海。另外，一些考古学家找到了可能比克洛维斯文化早数千年的人类遗迹，比如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洞穴内发现的指纹，在亚马逊盆地附近的一个洞穴内发现的石器等等。但是这与当时的主流论调格格不入，并没有受到广泛的认可。

1997 年，科学界掀起了不小的躁动，连最守旧的那批科学家也不得不接受人类到达美洲的时间比克洛维斯时期至少早 1 000 年这一不争的事实。主要是因为在智利的蒙地维德（Monte Verde）有了新的发现，可以证明至少在 12 500 年前人类就已经在美洲大陆定居。蒙地维德距离白令海峡超过 10 000 英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要实现向南迁移如此远的距离并适应一路上的新环境，唯一的解释就是人类早已抵达北美洲，而且很可能是在内陆通道出现之前。一部分科学家因此认为：第一批美洲人肯定是通过船只紧靠北美洲西海岸航行来实现迁移的，而那部分海岸现在已被淹没。而且，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除了打猎，也许还有捕鱼。考虑到当时的巨型冰川以及恶劣的气候条件，他

们的旅途必定艰险万分。大约 12 000 年前，出现了没有冰雪覆盖的内陆通道。科学家们推测：由那时起，早期美洲人及他们的猎物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沿着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从陆地行走了。

当然，这个新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论证。DNA 技术、亚洲语言与美洲土著语言的比较分析等证据也在不断挑战原先的后克洛维斯学说。一些科学家已经提出"人类于 20 000 年前抵达美洲"的论点，更有甚者，提出了"40 000 年前"这样一个更具争议的假说。一些科学家还宣称自己的研究足以证明人类在更新世期间分几批移民到美洲，而且他们来自亚洲的许多地方，不仅仅是蒙古。



第一批移民抵达美洲大陆时可能采用的陆地和航海线路

已知最早的美洲人

智利的蒙地维德（Monte Verde）是公认的美洲最早的人类遗址，保存了大量12 500年前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旧石器时代的遗迹早就应氧化而遭到毁坏，但是由于当地地表覆盖了一层潮湿的泥炭藓，阻止了氧化的发生。从遗迹的古老程度来看，蒙地维德人很可能在有种族区分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基因证据。虽然DNA测试已经证明在沼泽中发现的物质为乳齿象肉，但是在蒙地维德还发现，人们除了涉猎大型野兽以外，也收集莓、种子、土豆和蘑菇等，他们还会从30英里外的太平洋捕获贝壳类动物。大约20个人住在蒙地维德的一个小海湾附近，他们共同住在一个类似帐篷的地方，用动物的皮毛做顶。除此以外，他们已有研磨石、挖掘棒，还有其他一些石头和象牙器具。在蒙地维德没有找到人类遗骨，但是在一个火塘边发现了小孩脚印的化石。

9

尽管众说纷纭，但是科学家们都确信：在亚特兰蒂斯消失或者以色列部落失踪的几千年前，人类就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了美洲大陆。他们有可能在不同时间抵达，有可能来自亚洲不同的地方，也有可能以比走水路更快的方式进入了南美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大约公元前10000年的时候，气候骤变导致两极冰帽融化，白令地桥和其他沿岸港口全部被淹没。移民们就此与世隔绝，在美洲大陆上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文明。

最初的定居

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农作物，没有粮食。他们和动物一样，都靠水果和森林里找到的树根维生。然而他们不知道，其实世界上早就有了食物，只是被藏了起来……

——《莫潘玛雅神话》（*Mopan Mayan myth*）［比尔霍斯特（Bierhorst），1990年，第86页］

美洲人民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开始在永久性的村落里定居。第一批美洲人大都靠捕食猛犸象、乳齿象和巨型野牛维持生计，但在冰川期末期，过度涉猎加上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这些动物大批死亡，最终惨遭灭绝。后来，由于草地变成森林，半游牧的美洲人民开始涉猎鹿、野猪等小型兽禽，并且学会了收集一些季节性的种子和水果：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沿海，有凤梨和桃棕（pejibaye palm），而在太平洋的部分沿岸，则有椰子。住在沿海地区的美洲人开始食用虾和其他海洋软体动物。一小群中美洲人还发现加勒比海的食物尤其丰富，在浅礁和红树林周围龙虾、海螺、甲鱼和各种鱼类应有尽有。他们大多是洪都拉斯东部以及尼加拉瓜东北部半定居的米斯基托族印第安人（Miskito Indians），生活习俗与当代已无太大差别。 10

在中美洲，早期的采猎者渐渐学会耕种农作物来生产粮食，这才出现了永久性的村庄和其他更复杂的社会群体。而且，作为连接南北美洲两个大陆的地峡，中美洲也从邻居那里直接受益：不仅南美洲和北美洲人纷纷到来，还带来了各自培育好的食物。中美洲南部的大部分语言都起源于奇布查语（Chibchan），包括巴拿马圣布拉斯（San Blas）地区著名的库纳族语言和洪都拉斯的米斯基托族语言。而在南美洲北部也能够找到奇布查语。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来自南美的番薯、山药、甜木薯等块茎植物已经在中美洲广泛种植。之后，它们一直是中美洲人民食谱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南部。当然，块根作物并不能完全取代野生食物，只能作为一种补充。

公元前2000年左右，玉米从墨西哥传入中美洲北部地区。与薯类等块茎相比，玉米是更符合人类需求的一种食物。一开始考古学家推测，最先培植玉米的可能是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海地区、高地和墨西哥的恰帕斯（Chiapas），因为这一小片地区培植的玉米种类比整个美国还要多。虽然后来得到证实，墨西哥中部才是耕种玉米的发祥地，但是玉米的培植在中美洲深深扎根，几乎见证了前哥伦布时期整个玛雅文明的深度发展。

11　玉米因生长在石灰岩或者各种壳类之中，可以预防佝偻病。它与红番椒、豆类和果汁在营养成分上相互补充，搭配起来食用既简便又出奇的健康。从伯利兹和危地马拉的佩滕（Petén）低地到巴拿马的太平洋斜坡地区，这些从前荒无人烟的地方也因玉米的生产涌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定居潮。但是像加勒比沿海雨量最大的云雾林等地区，由于全年都太潮湿，不适合生产玉米。还有一些地方，比如佩滕雨林中的热带大草原，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很难将草除去，因此也不适合培植玉米。大约公元前1000年，玉米农业在中美洲南部地区达到了一个发展的绝佳期，于是在太平洋沿海土壤最肥沃的斜坡和峡谷地区出现了许多定居的小村落。虽然从11月份到次年5月份是中美洲漫长的旱季，但是大部分地区雨季的粮食产量足够维持整年的生活，因此村庄的长期发展不会受到影响。

可以说玉米的培植情况基本上奠定了中美洲文化区域的划分。北部地区农业相对发达，人们利用灌溉渠、高地农业以及其他蓄水技术对土地精耕细作，是墨西哥和玛雅地区辉煌的中部美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纯熟的农业技术不仅维持着城邦的发展，有时候甚至是整个王国的命脉。南部地区则盛行刀耕火种的原始耕种方法，因此沿着太平洋的斜坡形成了众多较为分散的小型酋邦。而位于加勒比沿岸的莫斯基蒂亚（Mosquitía，人称“蚊子海岸”），由于雨量大，农业未能发展，还是保留着觅食、捕鱼等传统方法，适宜半游牧性质的部落居住。当然，交易、文化互动等因素也间接影响了不同地区政治和社会的差异，但是玉米农业的发展程度仍然是核心。农业发达的地区，定居人口稠密，才能够进一步发展复杂的社会和文明。

前哥伦布时期文明的崛起

玛雅地区是中美洲最先发展起来一片区域。而在玛雅地区当中，危地马拉靠太平洋的平原和墨西哥的恰帕斯又最早发展。从索科努斯科山脉（Soconusco）一直向南到萨尔瓦多这一带土地尤其肥沃。几个世纪以后，这里盛产可可豆。后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和西班牙人把可可豆当货币使用，而且用可可豆制成的巧克力饮品泡沫丰富，

深受帝王喜爱。沿海地区的土壤几千年来受火山灰和熔岩的滋养，再加上季节性湖泊的作用，这一带地区每年可多培植一季玉米。粮食的储备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财富和闲暇时间，因此人口也越来越稠密。复杂的奥可斯（Ocós）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此后几百年，南部地区才渐渐开始有人定居，零星地出现规模不足 200 人的小村庄。到公元前 1700 年的时候，奥可斯文化生产出了中美洲和墨西哥地区最原始的陶器。而到公元前 1500 年，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发展起来，由首都统治其他小村落。首都的人口在 1 000 人左右。在首都村落里发现了贵族的墓穴，从他们的葬礼风格来看，完善的宗教仪式和社会阶层也已经在索科努斯科（Soconusco）地区出现。考古学家在尸骨上发现涂有红色的朱砂，而且有磨光的石镜作为陪葬品。石镜是萨满法师的标志物，在后期的玛雅文明中，更是统治者的象征。

玉米的民族

年轻的玉米神是玛雅文化中创世和世界重建的象征。传说中部美洲可怕的阴间神灵斩去了玉米神的头颅，在这个世界开始的那一刻，玉米神得以重生。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关于牺牲和重生的说法根深蒂固。

下图中的石磨盘来自塔拉曼卡山，是中部美洲用于碾磨玉米的一块巨型研磨石。有些明显用于仪式的磨盘几乎长达 7 英尺，重 200 磅。在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部分地区曾发现一批磨盘，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石雕有可能是帝王的座椅，但是在巴尔里莱斯（Barriles）遗址，发现石雕周围附有巨型石杵（证明这些石雕为磨盘而非王座）。其中一个石杵的两端还刻有被斩首的人像。马克·米勒·格拉汉姆（Mark Miller Graham，1996 年，第 247 页）等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现在认为，研磨石上的头颅和其他图案花纹暗示了它们在古代用于活人祭祀。活人祭祀的目的是企图以玉米神的牺牲换来人类的重生。

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的孩子们啊，当时造物主创造了人，给人穿上了泥土，喂以木材和树叶。但是人既不会讲话也不会走路，甚至没有血肉。最后，造物主终于发现了合适的材料——玉米。于是他从海里抓了貘和蛇，用它们的血把玉米揉成一团，用这个玉米团做成了人类的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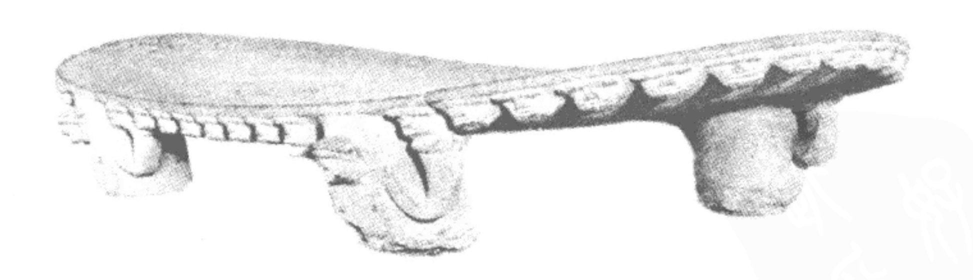
——《卡克奇克尔人史》，卡克奇克尔玛雅人之书（雷西诺斯和格茨，1953年，第46页）

玉米之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就如同大米之于亚洲、小麦之于欧洲，从前哥伦布时期至今一直如此。玉米不仅养活了第一批农民和帝国，还孕育了关于创世和人类起源最早期的信仰。据被称为基切玛雅人圣经的《波波尔·乌》记载，年轻的玉米神是太阳重生和创世最关键的因素。玉米神的母亲是“白昼的祖母，光明的祖母”。在玉米神以斩首（收割）的方式牺牲又重生（发芽）之后，她便将玉米碾碎，并加水做成了第一批人类。从古代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记载到20世纪居住在哥斯达黎加偏远的塔拉曼卡山区的布里布里族（Bribri）口头传说，我们得知，前哥伦布时期的人都坚信人类是由神圣的玉米粉捏成的。到了近代，每当耕种玉米田（他们叫米尔帕斯，milpas）的季节来临，印第安人甚至会因此开战来决定谁舍弃田地。今天，在最土著的地区，玉米薄饼和一种墨西哥式的粽子（tamales）仍然是人们的主食，玉米的培植也遵循着古代的方法。在前哥伦布时期，玛雅人必须在三块火塘石之上烹煮玉米，现在依然如此。此举是为了纪念有玉米神诞生的那块三角石。玉米田在耕种和编排时都伴有隆重的仪式，而且被精心编排成几何图形（cosmogram），意在与神圣的玉米世界相呼应。自美洲文明发展之初，玉米就被赋予了神圣而核心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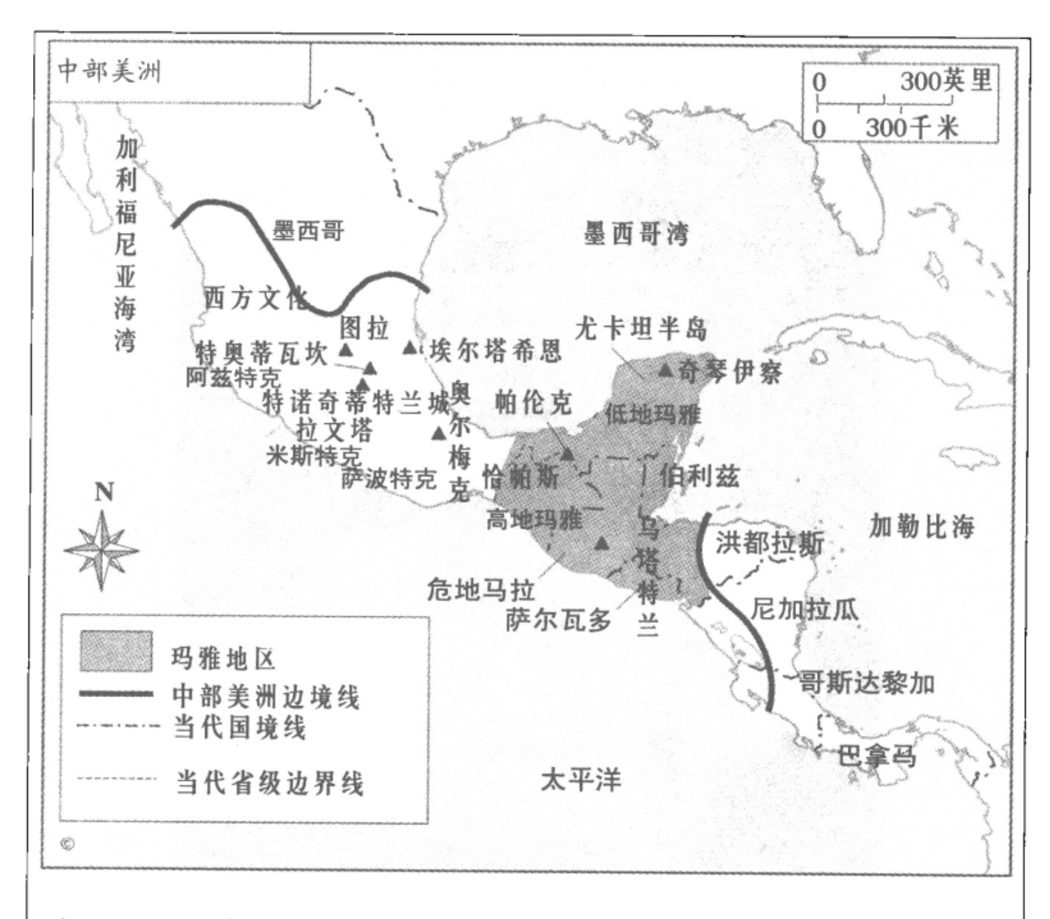
12
13



公元8世纪玛雅年轻玉米神的灰泥雕塑，来自前哥伦布时期洪都拉斯的科潘（照片提供：艾尔弗雷德·莫兹利，1889年）



来自巴尔里莱斯（400—600年）的一个巨型石磨盘，现存于巴拿马人类学博物馆（照片提供：托马斯·乔伊斯，1916年）



中美洲北部是考古学家定义的中部美洲文明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部美洲（Mesoamerica）与现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完全重合，它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包括墨西哥大部，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之全部，以及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部分地区。

14 15 奥可斯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整个墨西哥都是人口稠密、社会结构复杂的村庄，为前哥伦布时期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且，许多村庄之间不仅存在物物交换，更有思想的沟通，直到西班牙入侵才被迫打断。中美洲地势险峻：加勒比沿海的某些区域和巴拿马的达里恩（Darién）几乎无法穿越；无数的峡谷和高耸的山脉让中美洲绝大部分地区终世远离尘嚣。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早期的村庄之间能够克服距离的遥远相互联络着实让人吃惊。拿奥可斯文化来说，考古学家猜测其制陶技术就有可能传自南方的厄

瓜多尔或者巴拿马。据说厄瓜多尔的陶器始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而巴拿马的粗制陶器也可追溯至公元前2100年。但是对玛雅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奥可斯陶器与圣洛伦索（San Lorenzo）出土的奥尔梅克（Olmec）陶器之间的相似性。圣洛伦索是墨西哥港口城市贝拉克鲁斯（Veracruz）海湾附近的一个村庄，属于奥尔梅克文化，它的发展非常复杂，是中部美洲文化的基础。中美洲和墨西哥两地的玛雅文明就是在奥尔梅克文化与太平洋通道上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中渐渐崛起的。

奥尔梅克文化与中部美洲文明

虽然没有金属器具，没有驮畜，甚至没有任何带轮的车辆，但是在奥尔梅克临河又富饶的中心地区，一座座大城市纷纷建立了起来。圣洛伦索所在的位置原为天然的盐穹，人们将它改造成了一块长3 000英尺、宽2 000英尺的巨大平台。在此之后数个世纪，在另一座奥尔梅克城市拉文塔（La Venta）出现了美洲第一个金字塔，高约100英尺。人们从图斯特拉山（Tuxtla Mountains）运回火山岩，用于为萨满统治者雕刻巨型头像，每个竟重达20吨。图斯特拉山距离圣洛伦索30英里，距离拉文塔则有80英里。奥尔梅克的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中一部分用于为祭祀等提供贡品。当时大量的贡品被埋在广场和建筑物的地下。据说，其中有一份竟然是50吨抛光的绿色蛇纹石。

如此大型的工程势必产生巨大的耗资，奥尔梅克人通过贸易等收入来补贴开支。他们可能把贮存的玉米出口到别的地区，同时也出口可可或者咖啡豆，以及贵族们喜欢的美洲虎皮和鳄鱼皮。当然，奥尔梅克人也进口一部分物品，包括黑曜石和珍贵的异地材料，比如蛇纹石、玉等。他们将玉打磨然后刻成可随身携带的名贵艺术品。从后期广泛的分布来看，当时其他地区的人们对这些玉器可谓趋之若鹜。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如此巨大的财富和集中的权力可是第一次发生。

16

第一个球类比赛

印第安人的比赛设置非常巧妙，充满了智慧，而且已经相当完善。可是人们却将那么多异教、盲目崇拜的东西与它们混淆在一起，真的太可惜了！

——16 世纪的弗赖·迭戈·杜兰（*Fray Diego Duran*）[奥拉卡西塔斯和海登（Horacasitas and Heyden），1975 年，第 313 页]

世界上最古老的回力球发现于奥尔梅克地区，是用卡斯蒂利亚（Castilla）热带橡树的橡胶制成的。奥尔梅克人把这些球出口到了其他地区，同时很可能还传出去一种伴随球赛的宗教仪式，一般都会在特别建造的场地上进行。这个前哥伦布时期的球赛，也进入了后来的玛雅创世神话。其中提到，在为世界的开端和玉米神的重生做准备之时，一对打球的双胞胎英雄以智取胜击败了阴间的邪恶之神。球赛在中部美洲非常普遍，存在了几千年。在 16 世纪的阿兹特克人的创世神话中，太阳神在球场上扼杀了黑夜的势力。奥尔梅克人不仅出口橡胶球，他们肯定也有一套特定的球赛打法，甚至有可能是他们创造了这个比赛 。考古学家们在圣洛伦索发掘出了一个土球场和绘有球员的陶瓷。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奥尔梅克的一片沼泽地里挖出了浸满水的橡胶球。球赛很快就传到了中美洲：远在南部的萨尔瓦多发现了一个早期的球场；另外一个遗址在索科努斯科地区，比赛场地有 260 英尺长，旁边还有土墩和长凳。与现在的运动赛事所不同的是，前哥伦布时期的“比赛”事实上是一种仪式，会在城市中特别选定的神圣区域举行。比赛以输的一方斩首告终，其实就是一次再创造的机会，就像当时玉米神在阴间被斩首一样。西班牙征服期间，阿兹特克人每年向海湾地区索要上千个橡胶球作为进贡。比赛时球员只能用臀部和膝盖击球。西班牙人被他们的体育精神所吸引，带了一队球员回欧洲，把这个开创性的橡胶弹球带入了旧的世界。

奥尔梅克文明始于公元前1200年或者更早，于公元前400年离奇消失。一般都认为它是中部美洲的母文化。中部美洲是前哥伦布时期的定义，包括墨西哥大部分地区、现代中美洲太平洋沿岸的玛雅区域以及哥斯达黎加的部分地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中部美洲就是与奥尔梅克人有直接交易或思想交流的地理范围。虽然边界线在历史长河中略有伸缩，但这样的定义基本上是准确的。中部美洲人用黑曜石（也叫火山玻璃）制作出工艺精良的切割工具，奥尔梅克人则从中美洲人那里换得黑曜石，主要从危地马拉的高地和墨西哥的中部地区。墨西哥中部就是后来阿兹特克人建立“王国”的地方。奥尔梅克人从恰帕斯和瓦哈卡（Oaxaca）换得磁铁石，用于制作萨满的镜子。另外，奥尔梅克人还从多个玛雅地区进口大咬鹃羽毛和玉石。这两样都是中部美洲贵族们所钟爱的最珍贵的物品。在中部美洲特权阶级的墓穴中都能够找到由奥尔梅克人制作的玉器。从墨西哥中部到萨尔瓦多，一路都可以看到奥尔梅克风格的巨型雕塑。而且，奥尔梅克文化中的羽蛇（fire serpents）和半人半美洲虎（half human “were jaguars”）渐渐演化成了中部美洲的神灵。玛雅人会把玉圭贮藏起来，当成传家之宝代代相传，这种习俗在南部的哥斯达黎加也有发现。

在这种远距离交易的影响下，奥尔梅克以外的地区也渐渐出现了城市和阶级社会。在伯利兹和危地马拉的佩滕丛林地区，许多玛雅城市中都有大型建筑拔地而起。比如纳克贝（Nakbé），从前只是个简单的村庄，到了公元前750年，处处都已被60英尺高的建筑物所覆盖。洪都拉斯的科潘（Copán）和佩滕的塞巴尔（Seibal）都是著名的玛雅城市，在那儿发现的奥尔梅克玉器很好地体现了母文化对它们的影响。太平洋沿海地区从奥可斯时期开始就与奥尔梅克人保持着来往，所以这里高度发展的城市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些城市早在公元前600年就已经建立，比如，墨西哥的伊萨帕（Izapa）、危地马拉的拉布兰卡（La Blanca）、萨尔瓦多的查尔丘阿帕（Chalchuapa），以及危地马拉城现址附近高地上的卡米纳尔胡（Kaminaljuyú）。到公元前400年，在墨

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地区，在曾经属于奥尔梅克文化的贝拉克鲁斯和恰帕斯，以及属于玛雅文化的危地马拉都出现了象形文字。墨西哥中部的奎奎尔科（Cuicuilco）曾经建起了高 75 英尺的石头金字塔，可惜后来整个城市都毁于火山爆发。不到公元前 250 年，整个中部美洲的文明就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

中部美洲文明

他们的作品都很好，非常完美，简直无与伦比。他们的房子也很漂亮，铺面上镶嵌细工，很光滑，还是粉刷过的，真的很棒……他们非常聪明又善于思考，还创造计年、计日的准确历法。

——16 世纪的弗赖·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Fray Bernardino de Sahagún*）（1950—1982 年，第十册）

萨满教义与统治地位

你（指阿兹特克的一位国王）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对上帝说话，他是所有人的神，无论远近高低，而他就在你的身体里，通过你的嘴给我们指示。你就是他的嘴唇…

——16 世纪的弗赖·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Fray Bernandino de Sahagun*）（1950—1982 年，第十册）

首领像一只雄鹰般飞翔。他是个伟大的高贵的人，也是位了不起的巫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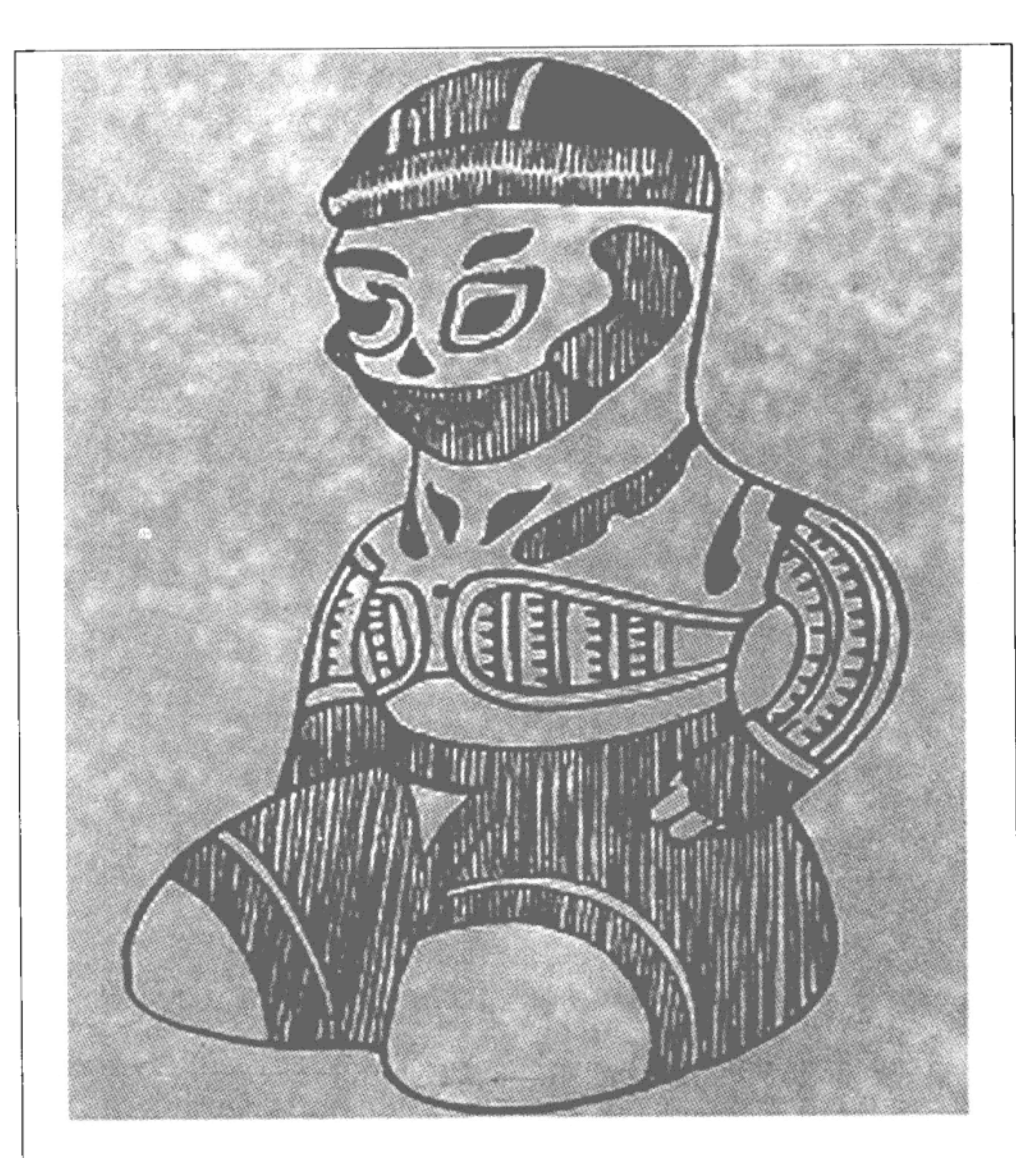
——16 世纪的基切族玛雅文书（*Quiche Mayan document*）

[布克哈特和加斯科（Burkhart and Gasco），1996 年，第 151 页]

基于对奥尔梅克艺术的研究，考古学家证实早期的中部美洲统治者取得权势不仅靠控制贸易和肥沃的农田，还包括宣称自己具有超自然的神力。人们对这些统治者深信不疑，认为他们就像全世界各地的萨满法师一样具有通灵的本领：

他们能够神奇地唤醒镜子里无名的力量，然后进入昏睡状态，这样就能够与神和祖先的灵魂沟通。人们相信萨满法师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进入附在动物身上的第二个自我，以此通往超自然的世界去为人类争取利益。这些方法有割伤自己以流血的仪式、舞蹈，甚至迷幻剂（纯烟草就是其中一种可能被美洲人使用过的迷幻剂植物）。中部美洲人民把萨满法师抬升到了神圣的统治者的地位：不仅能够与神灵通话，还成为神灵的后代。奥尔梅克的艺术品上就刻有半人半美洲豹的萨满统治者。美洲豹的特征后来被所有中部美洲的统治者当成自己的象征。在古典时期的玛雅雕刻画中，能够看到统治者与祖先神灵沟通的画面。阿兹特克时期，把这种场景称为神谕，而国王，或者他们叫特拉托阿尼（tlatoani，字面是发言人的意思）则被称为神的嘴唇。萨满政权在前哥伦布时期的南部中美洲似乎也十分普遍。在南部尼科亚（Nicoya）地区的精致墓葬中发现了做成女人形状的大型陶瓷容器，很多还具有美洲豹的特征。这些墓葬的规格堪比部落首领。这些陶瓷人很可能代表着美洲大路上已知最早的女性统治者，而且她们后继有人：500 年后在玛雅地区也确定了有女性统治者。在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前经典时期的墓穴中找到了萨满法师的凳子、吸管、磨光的石头和香炉。哥斯达黎加留存下来的少数几个布里布里族（Bribri）和卡贝卡雷斯族（Cabecares）为母系氏族，她们至今仍在使用这些物品。

18
19
20



最早的女性首领?

尼加拉瓜湖奥梅特佩（Ometepe）岛上发现的一个坐式、有纹身、催眠状态的女性陶瓷，属尼科亚风格（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尼科亚地区的墓穴内容特别丰富，已经挖掘出不少女萨满法师的陶瓷雕像。考古学家推测，这些在死后有珍贵玉器陪葬的史前女性，有可能就是部落首领。（此图由托马斯·乔伊斯于1916年出版）

奥尔梅克文明突然消亡的原因至今未解。但是中部美洲文明在奥尔梅克文明之后的2 000年里依然兴盛，直到1519年西班牙征服才终

止。中部美洲文明取得了很多可引以为豪的成就：伟大的城市、在镶嵌细工和石料方面的艺术、对天文和季节的深入了解，还有基于他们的神圣历法所得出的预言。几千年里，中部美洲城市之间不仅有贸易和沟通，也有战争，还有联盟和通婚。在交迭变更之中，有的城市成长为要塞，而有一些则悄悄陨落了。西班牙征服期间，阿兹特克人的文化依然兴盛如常。大概是因为这一点，阿兹特克族在中部美洲的文化中享有最高的名望，它也是中部美洲文明的舞台上最后落幕的角色（参见附录8：大事年表）。阿兹特克人和先辈一样，交易范围很广。阿兹特克“王国”的首都在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án），即现在的墨西哥城所在地。虽然首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纷纷进献贡品，但是阿兹特克人不曾统治过玛雅地区。阿兹特克文化和以前所有文化一样，交易范围超越了中部美洲的地理界限。比如，他们从现在的美国西南部进口绿松石，从现代中美洲地区进口金铜、可可和棉花。

诸多的文化

中部美洲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城市之间差别巨大。单在墨西哥，有大约1万个城市遗址得到确认。危地马拉还有1 400个。当然，这些城市并不是在同一时期存在。其中有些城市只延续了几百年，比如阿兹特克的首都；但是，也有城市发展了将近1 000年，比如危地马拉的玛雅城市蒂卡尔（Tikal）和墨西哥高地上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一些半干旱的高原盆地幅员辽阔，容易催生气势磅礴的大国，像阿兹特克王国就覆盖了中部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相对地，低地地区树木丛生，到处可见150英尺高的桃花心木，而且河流众多，自然地形成了边界。这样的地理环境不适合单个王国的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众多城邦的并存，其中不少是由玛雅人创建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玛雅城市中也存在大城市统治小城市的现象。有些城市建在山顶，拥有天然的防护；但有些城市则极易受到攻击。大城市的人口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有所不同，大约都在1万到25万之间。社会复杂性也有差异。最大的城市一般会有一个王室和若干贵族家庭，也有工匠、商人、农民，可能还有奴隶。西班牙征服时期，中部美洲人口超过3 000

万，是整个美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另一大差异就是文化。现代美洲人民讲 80 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艺术的多样性也同样惊人。北部墨西哥的高地城市偏好把神灵用几何的、震撼的方式进行表达，而玛雅文化中的艺术形式则更为现实和精致，更接近人类自身（参见原书第 12 页，图：玉米之神）。玛雅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用象形文字对自己的文化作了长篇记录，但是在墨西哥中部的主要艺术形式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文字。早期的玛雅建筑外墙都绘有巨大的神像，但是（墨西哥）瓦哈卡的米斯特克人（Mixtecs）则习惯于用成千上万个碎石块在建筑物铺上抽象的镶嵌花样。

同一个世界观

21 尽管中部美洲的各个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在美洲所有的本土文化之中，只有中美洲文化拥有编书的历史。他们用树皮纸折成书本，除玛雅人已创造了真正的文字书写系统以外，其余文化则多数以绘图的方式记录历史。而且，这些文化都从贵族中选出统治者，信奉权由神定。他们也都祭祀祖先。这一传统至今仍然以改良的方式存在，比如亡灵节（Day of the Dead）。中部美洲城市把庙宇建在金字塔底座上，从陡峭的台阶可以直达顶部。西班牙人入侵的时候也为这些辉煌的城市所折服，称比欧洲的大城市更令人叹为观止。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阿兹特克首都人口是伦敦的 5 倍。建筑风格上，不管是住所还是庙宇，房间通常都不大。但是他们喜欢把庙宇和宫殿建在庞大的露天广场四周。国家和宗教的各种仪式一般都在这样的广场上举行。建筑外墙上有时是裸露的巨石，有时会涂有灰泥。每个城邦的权势和地位通过统治者的雕像、战争场面和宗教仪式的壁画等一目了然。让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庞大的人类工程都是用石器时代的简单工具完成的，陆地上的运输也依靠人力搬运。中部美洲的人民还在许多方面有着同样的信仰，比如他们的创世神话、他们的神圣历法、记录日食月食和金星运转的天文表。而且，他们都相信，把活人作为祭品来告慰神灵是十分必要的。

活人祭祀

西班牙入侵以后，对以活人祭祀的习俗十分关注。在后来对中部美洲文明的考察和判定中，这一点同样也成为焦点。据西班牙人记载，当时仅阿兹特克主神的单个庙宇落成，就祭献了20 000个战争俘虏。后来，据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编纂的人种史文书记载，宗教活动中实际用于祭祀的人数比之前报道的要少。虽然更正之后的数据更能让人接受，但是在中部美洲以活人祭祀这个残忍的事实无法改变。而且，他们变换各种方式，比如祭献孩童、斩首、挖心，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形式。

石器时代的技术

中部美洲人民建造的石城足以容纳25万名居民。他们还建造大型的金字塔，其中不少堪比埃及的吉萨金字塔，在体积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中部美洲人民已经发明了巧妙的疏水系统和渠道。导水管能够将新鲜的水输入阿兹特克在岛上的首都。在佩滕地区通过人工填埋把沼泽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他们把这种填埋工程叫做奇纳姆帕斯（Chinampas）。他们还把堤道建高，铺有灰泥，其中一条长达62英里。他们砍伐树木，将原木挖空做成小舟；把玉等坚硬的石头雕刻抛光制成精细的工艺品。所有这些都是靠石器时代的技术完成的。火山玻璃十分锋利，20世纪的时候甚至将它用于外科手术，但是它的使用还是十分有限。一些人因此认为，从美洲大陆没有铜、钢铁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那儿的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掌握轮子的工作原理，但是没有认真开发。在大山里，没有拉重物的大型牲畜，其实带轮车辆其实是一种累赘。中部美洲人靠河流和海洋解决运输问题。不行的时候，就靠接力和人工搬运。中部美洲的这种人工搬运的方式叫特拉尔梅内（tlalmene）。西班牙人就依靠当地人民的这种方法长达一个多世纪。一到了崎岖的地方，他们就更觉得马匹根本无用。1524年，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在佩滕的雨林深处丢了马，当地玛雅人却告诉他，本来就不该用马而应该用小木舟。

22 从古代中国文明到古罗马角斗士文明，一直都有活人祭祀的做法，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这个被誉为西方文明典范的地方也存在这样的酷刑。据说，敌对的双方有时会拿敌人的头颅当足球来踢。在中部美洲，活人祭祀被披上了宗教宿命的外衣。他们相信，之前的人类就是由于没有适当地供奉创世主才遭到了毁灭。为了避免给他们的世界——玉米的世界带来灭顶之灾，创世主需要这样的祭祀。从死亡和祭祀中，太阳每天得以重生，世界才得以注入新的活力。而人类是最珍贵的祭品，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对神的敬意。就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中部美洲出现了活人祭祀，特别是把战争的俘虏当成祭品。他们有时还会以自残来表达敬意。比如阿兹特克的祭司们就因为总用刺扎自己的舌头，因而肿胀难忍，几乎不能讲话。

23 然而，中部美洲的诗歌却与这些残暴的风俗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他们人性中的另一面：

我的心终于懂了，
因为我听到一首歌。
我在花朵旁徘徊，
她永远也不会枯萎吧。

——15 世纪的特斯科科（Texcoco）国王内萨瓦尔科约特尔（Nezahualcóyotl）［摘自《莱翁—博尔蒂利亚》（León - Portilla），1969 年，第 88 页］

清晨的一切都那么愉悦。
就只让快乐与歌声，
进入我们的思想吧！

——《玛雅人的德西巴尔切之歌》（*Book of the Mayan Songs of Dzibalché*）（摘《自莱翁—博尔蒂利亚》，1969 年，第 92 页）

第二章　玛雅人及其邻居

24

自光明之始、永恒之初、生命与人类之源起，已有五次变化、换了五代人。他们建了许多房屋……甚至为神建造居所，建在堡垒最高处的中央。他们来到这里，就不曾离开。

——《波波尔·乌》，基切玛雅人的圣书（特德洛克，1985 年，第 208 页）

玛雅文明在古代中美洲的重要性，其余任何文化都无法企及。包括今天的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西部以及萨尔瓦多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中美洲北部曾经为玛雅城邦所占据，而与此相对的中美洲南部，则是无数分散的小型酋邦，构成了万花筒式的多样性文化。玛雅文明不仅在整个前哥伦布时期主导了当地的文化，在它衰落之后的 1 000 多年里依然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在繁密的热带雨林之中，玛雅古城一片废墟，而白色的庙宇仍巍然耸立。此情此景，让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统治者雕像与宫殿建筑上自然而柔和的曲线让玛雅艺术那么触手可及，那么令人景仰。玛雅人的绘画和书写传统更是得到艺术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居于世界级艺术之列。最近几十年，对玛雅象形文字的解读也引来不少关注，因为它揭开了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美洲历史，也让尘封已久的统治者们“重见天日”。从公元前 7 世纪至西班牙征服期间，玛雅人建造了几百个石城。尽管它们在历史长河中遭风侵日蚀，如今已裹满藤枝，但这

些遗址永远都是前哥伦布时期留给后世非凡的遗产。

25

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化（公元前1000年至今）

玛雅文明的定型期，也叫“古典”时期，发生在250—900年间。这段时期内，佩滕和尤卡坦（Yucatán）洼地地区的城邦迅速崛起，在书写、天文、建筑和艺术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但是，玛雅文明持续的时间远比古典时期要长。玛雅文明起源于奥尔梅克文明时期的太平洋沿岸和危地马拉高地（参见第一章）。到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在佩滕的中心地区和伯利兹已经有大型房屋建立。古典时期的玛雅世界神秘消失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其实玛雅人在此之后也一直存在，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古典时期的衰落仅仅造成一些城市被废弃，并不是玛雅人的消失。他们从来不曾消失！虽然9世纪，佩滕低地的大部分城市已人去楼空，但是尤卡坦北部和危地马拉高地上的城市一直兴盛不衰，直到西班牙征服。

不仅如此，几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1 000多万玛雅人在祖先们居住过的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着。整个美国也只有250万人可确定为土著美洲人，所以1 000万是非常个庞大的数字。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和墨西哥的恰帕斯、尤卡坦，虽然玛雅人讲着24种全然不同的玛雅族语言，比如尤卡坦语、基切语等等，但是他们共同继承着2 000多年前留传下来的传统。有些族群依然沿用古老的历法；有些则从象形文字的书籍中受到启发，将玛雅人的习俗口口相传；一些再现西班牙统治前创世神话的祭奠仪式虽然被披上了当代天主教的外衣，但是参与的人数依然多得让人吃惊。随着古老的象形文字逐渐被揭开神秘的面纱，玛雅人开始学习祖先的书写系统，这在西班牙征服之后还是第一次。

玛雅人经久不衰，而古老的玛雅文明也顽强地延续着。从坍塌的城市废墟中，从泥墙和石雕上被侵蚀了的象形文字中，从仅存的折叠树皮纸上模糊不清的绘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玛雅文明的痕迹。从这些零散的证据中，考古学家还原了玛雅人的城市面貌和社会习俗；艺术史学家和人种史学家确认了统治者和神灵的身份；碑铭研究家和书写专家破解了他们的象形文字，为我们揭开了玛雅城邦的正式历史，

也是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玛雅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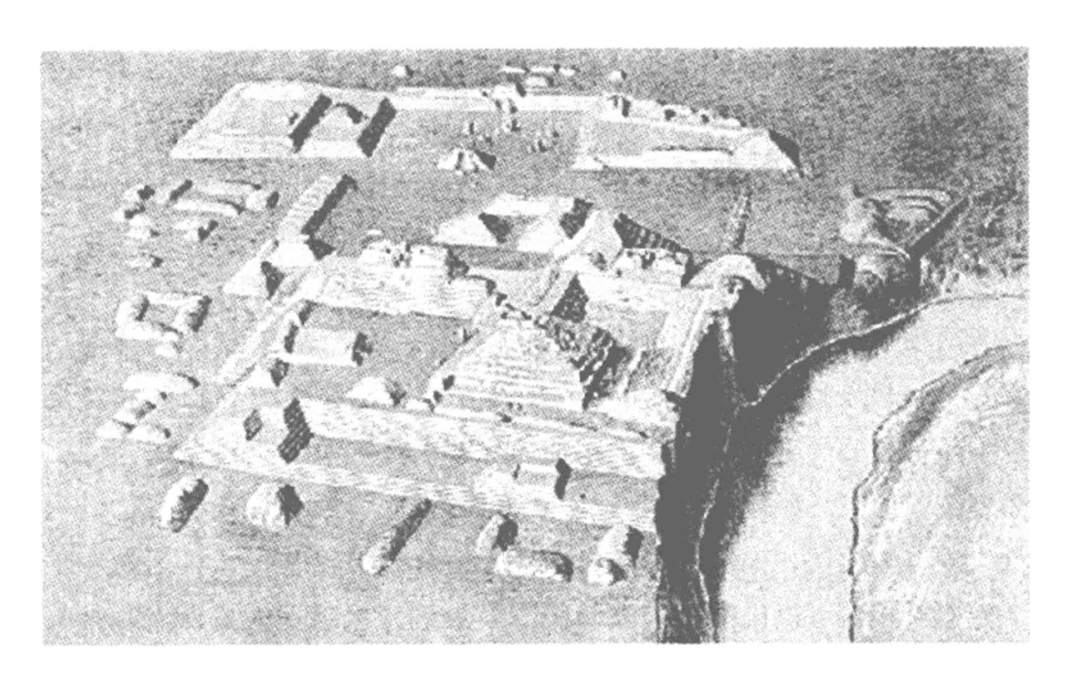
古典时期的玛雅建筑，以石灰岩构造最为常见（低地富有石灰岩），而且外墙涂有灰泥，比如蒂卡尔（Tikal）。红色被玛雅人视为东方、旭日和重生的象征。从墨西哥恰帕斯的帕伦克（Palenque）遗址依稀可见当时建筑物上最常用的颜色俱是红色，但是曾经满墙的图绘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腐蚀了。玛雅人发明了有托臂的石拱顶。这一技术不仅能增加房间的高度，能呈现复折式的屋顶，而且使得房子的整体外观尤其优美。在乌斯马尔（Uxmal）等城市，已经开始使用一种混凝土，这么一来，建筑师们就能够创造出更宽阔的室内空间。而在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流行有顶盖的柱廊，这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室内空间。玛雅人在城市规划方面也别具一格，他们习惯依据自然地形而建，而不像墨西哥那样总是方方正正。在主广场上往往竖有立石浮雕，称为斯特拉埃（stelae，即石碑的意思）。石碑上还刻有统治者的头像，旁边配以象形文字的碑文来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建筑物的外墙一般由灰泥雕塑做装饰，而内壁则常常覆盖有壁画。大部分玛雅城市都会在各自的典礼中心建有至少一个球场，而且也都能找到为天文观测而准备的特殊建筑结构。宗教仪式建筑、祖先的神庙、露天广场、蒸气浴等等非常普遍，从中心广场、抄写员和其他贵族成员居住的氏族大院，到平民百姓的茅草土屋，每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几乎都能找到。在私人果园和后院里，种有油梨、木瓜、石榴树、药材和染料植物、制绳用的龙舌兰，以及做调味料用的辣椒。各个居住区和市中心之间由铺好的堤坝相连接。再简陋一些的民居则分布在城市外围靠近农田的地方。那儿一般都有人工蓄水池，用于灌溉田地和饮用。渠道和蓄水池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为城市提供淡水鱼和其他软体动物。除城市本身以外，每个玛雅城市还管辖有城镇和农村。中间以森林相间隔，人们可以在那儿打猎。

中心广场一般都是以奉献于王室权威的名义而建，有一些可能也做交易市场之用。市中心也是一个城市的宗教心脏地带，其整体结构往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几何图形，意在映衬神秘的宇宙（cosmogram）。金字塔的建立是为了再现神圣的大山，庙宇象征着通往地下世界的洞穴入口，而球形广场则确保了重建玛雅世界成为可能。玛雅人的金字塔很陡峭，沿台阶而上一般有九层，代表着玛雅地下世界的层级。在这些被喻为“祖先大山”的金字塔地下室里挖掘出了许多皇家陵墓，装满了玉、彩绘陶器、黑曜石和贝壳等珍贵祭品。

26
27



1 号神庙与典礼广场，位于危地马拉前哥伦布时期的古城蒂卡尔（Tikal，公元前 200 年—公元 900 年）。蒂卡尔位于佩滕丛林地区，在 6 平方英里的面积上建有 3 000 多个建筑物。该城的中心即为这个典礼广场，其四周由两个卫城（皇族的住处就在其中之一）和两个高耸的庙宇（该城共有 5 个此种庙宇，每个高 145 英尺）所环绕。广场上立有刻着统治者头像的石碑。1 号神庙（727 年）有 9 层，是蒂卡尔第 27 任国王哈萨夫—昌—卡维尔（Jasaw – Chan – K'awil）的墓葬建筑。他的棺木已从金字塔底部挖掘出来。



洪都拉斯科潘古城的中心城区模型图（照片由艾尔弗雷德·莫兹利摄于1889年）

28

古典时期玛雅人的成就

尽管玛雅人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化，但仍然是中部美洲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们也积极地与中美洲南边的邻居保持贸易和文化往来。纵观玛雅人的历法计算、天文和书写系统，无不体现着他们独特的天赋，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玛雅人骨子里的中部美洲特性。玛雅人的文化比墨西哥中部高地的文化更加宽泛，继承了奥尔梅克文化在自然风格的艺术和雕像、刻玉等方面的传统。玛雅人与之前的奥尔梅克人一样，通过贸易把这些名贵的物品交换给南部地峡上的邻居。玛雅人以此收获了冶金技术，很可能还有多色彩绘陶器的制作工艺，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彩陶是玛雅文明的一大标志性成就。

天文

然后太阳被吃掉了；紧接着太阳被遮了起来，一片漆黑；最后太阳彻底熄灭了。后来如祭司所言，太阳又重新燃烧了起来，大家可是吓坏了……

——《丘马耶尔的奇拉·巴拉之书》[1] （*Book of Chilam Balam of Chumayel*）

一本关于尤卡坦玛雅人的书［罗伊斯（Roys），1967年，第76页］

玛雅人是出色的天文学家。他们计算出了金星500年的运行周期，只有两小时的误差。他们能够预测日月食，上文中传教士丘马耶尔（Chumayel）所描述的场景就是其中之一；还能够预测春秋分和冬夏至，昴宿星团的升起和降落，和别的许多天文现象。玛雅人的太阳历为整个中部美洲所使用，比当时的西班牙征服者的日历还要准确。玛雅人没有望远镜，他们利用窗户上精心摆放的横档和特殊排列的房子来观察天相，可以说把“肉眼天文”发展到了极致。大量令人称奇的天文知识被仔细记载入册，其中一些书本保存至今。

29 玛雅人对观星如此热忱，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村民建立一个农业年鉴或者适合播种的季节性历法。事实上，根据部分书的记载，玛雅人预测了培植玉米的良辰吉日、何时为久旱期等等。他们不仅把类似的知识记载了下来，在书中还经常能看到玛雅人企图与不可抗力相抗衡的种种努力。中部美洲的天文学家也是占星家，他们通过观察天空来预言整个王国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太阳和其他天体是神的象征，所以现世的创世神话（叫做“dawning”，是开端的意思）也与这些天体是分不开的。训练有素的祭司不仅能看到星体的运动，还可以观测到神本身的行动。最博学的祭司根据书上记载的天文知识来解释各种天体活动的含义，以此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祭司们所作的大部分诠释与建议已经无从查起，但据说当年西班牙征服者的船只迫近墨西哥之时，阿兹特克的国王蒙特苏马（Moctezuma）曾派他的宫廷天文学家去观测天空所示征兆，结果很不吉利。不仅如此，很多日常的王室决策也完全依赖宫廷占星家的意见来决定，比如指派

① *Book of Chilam Balam of Chumayel*，本书中统一译为《丘马耶尔的奇拉·巴拉之书》，另有译法《丘马耶尔的奇拉姆·巴拉姆》、《契伦·巴伦之书》等。——译者注

接班人的时辰，或者何时举行歃血献祭仪式以告慰神灵，等等。

历法与计算

他们通过计算来确定吉日、吉时……他们通过计算来观察吉祥星座的统治权力，和所有那些好的年辰。

——《丘马耶尔的奇拉·巴拉之书》［雷斯托（Restall），1998年，第137页］

玛雅人的天文学与数学是共同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家们不仅把观察记录下来，还针对行星和恒星的运动制成了周期表。加上他们在数学上的造诣，不但可以预测天体在遥远的未来有何种活动，还能够描述几千年前的神秘现象。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零”这一概念的民族之一。在古罗马人还在为自己笨拙的数字系统苦不堪言的时候，玛雅人已经发明了一套基于位数的数学，与我们的体系非常接近，只不过他们的是二十进位而不是十进位制的。

30

玛雅人的天文研究是出于超自然的考虑，他们的数字也是如此，并不只是抽象的符号。每个数字都有一个守护神，而且13、20等数字的组合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中部美洲曾共用一个古老的260天历法，其实就是13个20天循环往复，每天都有自己的名称。最早发现的美洲象形文字其实就是大约公元前400年的时候，玛雅人用来记录这些神圣的历法日期的。这个260天的循环大约等同于现在的9个月，所以很可能是根据妊娠期、热带农业季等自然周期发展起来的。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村民百姓都按照神圣历法的预言来规整自己的生活。该神圣历法不仅是前哥伦布时期世界秩序的绝对核心，今天仍不失权威：在危地马拉莫莫斯特南戈（Momostenango）这样的基切族玛雅城镇里，备受敬仰的“天师”（Daykeepers，意为日期保管者）仍然依照260天历法来探测未来、确定宗教节日。

玛雅人在研究星空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天体的运动是有周期的，特别是不同的周期还会重合。比如，260天历法经过46个循环之后恰巧与日月食周期重叠。这一发现让他们兴奋不已。然而，最最重要的一个周期重合还是下面这一个：每隔52年，260天历法与365天的太阳历便会

于同一天结束。这个52年周期被称为历法循环，相当于中部美洲的一个世纪。每当一个历法循环结束时，中部美洲人民就会害怕世界末日也随即到来。这种情绪与当代人在迎接千禧年（2000年）时，感到大祸临头的恐慌是一样的。他们深信不疑，神秘的过去世界就是被神毁灭的，所以很担心一旦供奉神灵的仪式进行不到位，神就会再一次将世界毁灭。因此，为了让世界继续运行，他们祭血以满足神的要求。哪怕统治者为了祭血也会自我伤害，比如用鱼脊刺破生殖器，用带刺的绳穿过舌头等等。他们对信念的虔诚可见一斑。活人（尤其是敌国的战俘）也被用于祭祀，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摘心和斩首十分恐怖。

52年这个周期用来测量时间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不能区别这个“世纪”和下个“世纪”。就像55这么一个日期不能区别1855与1955，是同一个道理。玛雅和其他一些低地文化在中部美洲这个“世纪”的基础上，发明了更加完善的一套历法系统，叫做长纪年（Long Count）的历法。起始日设定于13.0.0.0.0 4阿霍8孔姆库，这一天是历史上的一个零点，而且根据玛雅人的创世神话，也是玉米世界的开端。在我们日历中，这一天相当于公元前3114年8月12日。从这个起点开始计日，5000年内不会重复。与52年这个相对受限的历法循环相比，长纪年的历法是个非凡的进步。不仅古代玛雅人从此能够清晰地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考古学家们也因此受益：从292年到909年的古典玛雅文明时期按此历法计日已非常普遍，所以考古学家能够极其准确地还原古老的玛雅文明史。

象形文字

31 玛雅人还使用了特定的符号或者字母，用这些符号写下他们古老的事迹和他们的科学。通过这些……图案，他们不仅自己理解了很多事情，还教会了别人去理解。我们发现了很多用这种符号写成的书。因为这些书的内容不是迷信就是恶魔的谎言，所以被我们一把火烧尽了。玛雅人因此非常遗憾，也非常痛苦。

——16世纪的迭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主教［托泽（Tozzer），1941年，第169页］

玛雅人在文字上的造诣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奥尔梅克人和萨波特克人（Zapotecs）虽然也可能发明过书写，但是其程度远不及玛雅人。玛雅人在树皮纸上绘书，只可惜那些著作已经损毁殆尽。但幸运的是，除了树皮书，他们还在陶器上写字，在石碑、小玉块和其他珍贵的物品上刻字，当代历史学家也可以根据这些进行研究。洪都拉斯科潘的艺术家们硬是耐心地将 2 200 个象形文字块刻在了金字塔的台阶石上，以此记录下了一个王朝的历史。玛雅人的象形文字以音标系统为基础，已经可以代表一个"真正的文字体系"，而中部美洲大部分地区所发现的文字还只是图形符号。而且，负责誊写的玛雅人还会在多种字体间做选择，就好像一个书法家有可能选择大写字母而不是小写字母，或者选用哥特字体而不是罗马字体，很显然他们乐在其中。

虽然用于记录历法的象形文字在 20 世纪早期就被破译，但是其他内容的文字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破解。早期的玛雅文化研究者由于对玛雅文字的理解只限于数字，所以对这段古文化的解读也甚为偏颇和理想化。他们误以为玛雅人的社会由懂数学的巫师和祭司所统治，而且一直很和平。然而，随着更多象形文字被解密，才发现古代玛雅人具备了一切人性的特点。在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佩滕地区的城邦之间不仅没有和平可言，简直可以说战乱不断。而且，玛雅统治者们也绝非圣贤。他们为自己建造宏伟的宫殿、聚敛大量的财富。不仅如此，还宣称自己具有神赐的统治权力，甚至将个人神化。

32.

玛雅文字的不断破译为我们开启了解读古代玛雅世界的一扇意想不到的窗户。公共石碑上的文字记载揭示了统治者的姓名，比如金奇—哈纳布—帕卡尔（K'inch - Janab' - Pakal，意为伟大的太阳守护神）和他的母亲萨克—库克女王（Sak K'uk，意为白色的大咬鹃）。萨克—库克女王统治帕伦克城，后由帕卡尔继位，是玛雅政治历史上目前已知的几位女性统治者之一。统治者们惯以长篇幅来描述他们的王族，而且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创世主的后代，将自己的宗族历史追溯到 13. 0. 0. 0. 0 4 阿霍 8 孔姆库。现在我们从统治者自己的陈述中得知，他们命令宫廷建筑师去建造庙宇；为了促成政治联盟与其他城邦的贵

族通婚；宴请和拜访其他城市的统治者；还在下属城镇中委任管理人员。通常当他们发现金星呈现吉兆，就会发动战争擒拿敌方的贵族，可能的话，还有国王。他们以宗教的形式指导政治形态，比如球赛、跳舞、烧香、以树立石碑的方式纪念时间的轮回，以及用自己的血来祭祀神灵。献祭自己的血很痛苦，但是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进入萨满法师的视野，才能与神灵世界沟通。

但是有许多事情是统治者们没有提到的，比如王族的败落，比如飓风、干旱等自然灾害。统治者们的文字记载主要用于记录国王、王后生活中的大事，极少涉及整个社会结构。不过还是提到了抄写员和雕刻员、妻子和王子等等，否则，人民的生活状况就相当于被忽略了。历史把这些疑难杂症留给了考古学家，只能让他们依靠陶器、遗骨等的碎片来还原历史了。

前哥伦布时期留存下来的4本书中记录的不是王朝历史，而是天文图表和相关的一些占星预言。其中也有关于能够实现再创世的一些神秘事件和仪式的描述。究竟玛雅人是否只写过这一类书，还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现在还很难确定。很多书都已经丢失——有一些是被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所焚毁，其他的书由于年代久远而消失。在墓穴中发现过一些手稿，但也因时间和潮湿只剩下了浆状物。有一些书在西班牙征服之后仍然被使用，最后要么渐渐变成口头传说，要么以拉丁字母进行了重写。与象形文字的几百个符号相比，拉丁字母写起来容易得多。包括基切族玛雅人的《波波尔·乌》等在内的、得以流传下来的几本书，虽然历经数个世纪的文化变迁已经走样，但是在一些方面还是能够与历史和传说相符，包括他们的创世神话、政治缔造、在古典时期的象形文字和艺术品中所发现的神圣的时间周期和预言。西班牙征服之后，玛雅文化虽然瓦解了，但是玛雅人对文字的崇敬在许多地方、在几个世纪都没能认字的人民当中，依然存在。比如在今天的尤卡坦，一位村落中的长者把继承下来的智慧记录在了一本破烂不堪的活页笔记本上；比如在危地马拉的高地上，预言者们依旧解读着神圣的历法，那里面也有古老的文字。

这是一切古老文字的开始，

就在这儿，一个叫基切的地方。我们要在这儿刻下古老的文字，

那可是我们基切族一切的源泉，也是一切的可能。

——《波波尔·乌》，基切玛雅人的圣书（特德洛克，1985 年，第 71 页）

33
34



来自墨西哥恰帕斯亚斯奇兰（Yaxchilán）的 24 号门楣。相关的象形文字记载谈到亚斯奇兰的玛雅人统治者美洲豹庇护神（Lord Shield Jaguar）和他的夫人神妇索克（Lady Xoc）在 709 年 10 月 28 日这一天以自残的方式献祭。从图片所示的场景当中，可以看到只有神妇索克在为神灵祭血，她把一根穿有钉子的绳子拉过自己的舌头。［图片由查普伊斯（H. Chapuis）绘于 1883 年］



带有神秘鸟类图案的玛雅花瓶（700—800），现存放于危地马拉城弗郎西斯科·马罗金大学的波波尔·乌博物馆。玛雅圆柱形花瓶上的绘画风格多样，有时候绘有宫殿的场景，有时则是神秘的图案。负责陶器彩绘的艺师或抄写员有时候会用象形文字在花瓶顶部的一圈内署名。这些花瓶很受喜爱，因此人们在死后都会以此陪葬。最近，通过化学研究以及对边缘那一圈象形文字的破译，发现这些花瓶原来是用作喝水的容器，尤其是当成了泡巧克力的杯子。有时候巧克力是发酵的，还加了蜂蜜，又或者会和玉米粥混在一起喝。由于当时在中部美洲可可豆被当成货币使用，喝巧克力可以说是极度张扬的一种消费。据了解，阿兹特克人严格规定只有统治者和其他贵族成员才可以享用该饮料——蒙特苏马就很喜欢香草酒味的。在16世纪的尼加拉瓜，弗赖·费尔南德斯·德·奥耶多·伊·瓦尔德斯（Fray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就曾记录（伦慈—布德特 Reents - Budet，1994年，第77页）：“……只有大人物和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才会喝那玩意儿。”（照片提供：劳伦斯·福斯特）

古典时期的崩溃

35

从 810 年开始，玛雅城市一个接一个被废弃。909 年是已知最后一次在石碑上记刻王族事件。自那以后，本来以长计年历法在石碑上记录时间的做法也停止了。佩滕地区的城市相继陨落，前后持续了至少 100 年。为此，几乎整个 20 世纪的考古学家们都困惑不已。战争、自然灾害、人口过多等都纷纷被列为原由。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三个可能都是造成败落的原因。热带森林的生态环境其实非常脆弱，当时的玛雅城邦中大部分人口都超过 50 000 人，再加上树木被伐，必定使得本就贫瘠的土地和农业资源不堪重负。森林砍伐在古代玛雅社会非常严重：腾出空地种植农作物、制作烧饭用的木炭、挖空树干做成木舟、给陶器烧窑供火、焚烧石灰岩来为上千个建筑物涂抹灰泥——大约 20 棵树也只能生产出一小堆灰泥。在环境如此恶化的同时，又赶上严重的干旱。难怪在许多遗址发现的骨骼残骸都显示平民阶层营养不良。

如果要解释佩滕地区为何终遭废弃，土壤流失、人口过多与久旱等因素已经足够。但是考古学家也找到了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城池不但有护城河，还筑有城墙防御。最近对象形文字的进一步解读也向人们展示了一段悲惨的史实：当时最强大的一些城市都企图吞并对手来构建帝国，因此战乱不断。就这样，佩滕地区被送上了衰落的道路，人口骤减，雄伟的城池也一一废弃。1524 年，一位叫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的征服者在穿越佩滕地区的时候，把那里称为荒野。

后古典时期的玛雅（900—1524）

36

佩滕败落之后，权力与贸易便向其他地区转移。玛雅人在北部的尤卡坦和危地马拉高地的一些城市中比较兴盛。此外，在伯利兹和洪都拉斯的沿海地区也遍布他们的足迹。这一时期的玛雅人也有读写能力，但是在石头上刻下的文字却少了许多，因此可供考古学家挖掘的

材料不多。虽然后古典时期的早期出现过一些令人震撼的大城市，比如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但是总体来说，城市不再那么雄伟，建筑工艺也大不如从前。这一时期的政治形态，对王朝统治权的热衷有所减退，因此在艺术上，也不像古典时期那样如此关注统治者的个人画像了。玛雅风格虽然维持了下来，但也融入了中部美洲其他地区的特色。事实上，纵观这一时期的整个中部美洲，艺术风格越来越相互融合。这可能是佩滕败落之后出现的新贸易联盟的一个侧影。考古学家纷纷表示，正是这种贸易和政治的联盟将玛雅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商业化的时代。

玛雅人在前哥伦布时期的后期的确也写过书，但是保存下来的象形文字原文书只有4部。每一部书都证实了玛雅人对天文和历法孜孜不倦的研究。其他书也确有保存，但是在西班牙征服过程中逐渐被改写。虽然仍属玛雅族语言，但用的是拉丁字母而不是象形文字，而且被注入了天主教和其他一些被征服后事件的元素。《波波尔·乌》、《卡克奇克尔人史》、《奇拉·巴拉丛书》等为考古学家和民族史学者了解古代玛雅世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材料。

西班牙人到达的时候，在尤卡坦和危地马拉高地发现了许多城市，都以石头建成，而且人口比他们所知的欧洲城市还要密集。这些玛雅人与他们古典时期的兄弟一样，都是贸易行家。他们主导了中美洲的大部分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

中美洲的远距离贸易

37 玛雅人从奥尔梅克时代到西班牙征服期间，一直参与远距离贸易。他们作为商人是成功的，通过水路运输的贸易对此显然功不可没。考古学家已经在伯利兹的拉马奈（Lamanai）发现了一个公元前7世纪的人工河港。另外，在尤卡坦地区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砖石结构的港口，属于玛雅的内陆城市奇琴伊察。该港口的建成时间较拉马奈河港大约晚2 00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502年航行至“神秘”的尤卡坦地区时，停泊在洪都拉斯沿海的一艘玛雅人的贸易船只给他留下了极

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喋喋不休地说这艘船预示着本次航行定有丰富的收获。玛雅人不仅有内部贸易，与中部美洲的其他地区、中美洲南部的邻居们也有贸易往来。西班牙征服之后，玛雅人仍然按照旧的渠道进行贸易，直到 17 世纪西班牙经济充分发展，前哥伦布时期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些贸易体系也就被取代了。

几千年里，玛雅人从各个地方收集物品并交易出去，包括来自墨西哥等地云雾林里的大咬鹃羽毛，危地马拉西部的玉石，以及洼地雨林中的美洲豹皮毛。他们在尤卡坦半岛生产蜂蜜和上等食盐；在整个洼地地区种植棉花并编织成高档纺织品；在墨西哥湾、太平洋和加勒比海肥沃的沿海平原上，则培育可可。他们从危地马拉高地获得了黑曜石（火山玻璃），同时也拥有黑硅石（类似于燧石）。这两样都是制作工具和武器的必备材料。在西班牙征服期间，玛雅人还参与了奴隶贸易，一般都是来自中美洲其他地区的奴隶。

玛雅人生产出了中部美洲的一部分最好的商品，用于与墨西哥的大城市交易。不仅如此，他们还充分利用了中间地带这一战略位置，来控制中美洲南部与墨西哥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玛雅地区的南部边界位于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在那儿，人们种植可可和棉花，作为玛雅中心地区的补给。当地的上层人士以各种方式享有中部美洲文化，比如建造石头城市、雕刻统治者的石像（但是装饰图案常常不属于玛雅文化，而且没有配套的碑文），以及举行仪式性的球赛。

尼科亚半岛地处南下各个地区必经之路的交汇点上，对中部美洲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与南部地区的贸易当中，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酋邦很可能就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在尼加拉瓜的一些湖区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大量的进口黄金，而且在哥斯达黎加也出土了进口的刻玉。尼科亚海湾盛产珍珠，肥沃的沿岸地区适宜可可种植，这两点又为该地区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增添了筹码。与中美洲地峡北部相比，南部地区与中部美洲之间的关系更为疏离，但它拥有许多自己特有的高价值商品：黄金、玛瑙和猫眼石等半宝石吊坠，以及潜水员从加勒比海海底收集来的海菊蛤贝壳。

38

贸易路线

中美洲地峡的宝贵资源引得人们纷纷开辟贸易路线。顺着太平洋沿岸是最重要的路线之一，由奥尔梅克人开创。另外一条路线在古典时期的佩滕非常重要，它横穿洼地从林腹地直达玛雅王国的东部边境，即科潘城和基里瓜（Quiriguá）城所在地。此外还有一条海洋路线，在洪都拉斯湾的贸易港口，以使墨西哥湾与中美洲的加勒比沿海实现交接。还有其余众多路线将加勒比海与高地，与太平洋连通在一起，尤其是在洪都拉斯湾。

对中美洲商品的争夺肯定非常激烈。从考古学证据可以看出：来自墨西哥中部的商人，在不同的时期，经由这些路线来到了中美洲并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最频繁的就是沿太平洋路线。在卡米纳尔胡尤（Kaminaljuyú）这座危地马拉高地上的玛雅城市中，更是能够找到雄伟的墨西哥城市特奥蒂瓦坎的影子。另外，根据最早期西班牙方面的记述，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两国的太平洋地区很明显被讲中部墨西哥语言的人群所占据。部分考古学家认为，早至公元 9 世纪的时候，这群人可能就已经在这片地区了。中美洲南部人也是商人。他们可能曾经尝试着越过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中间人直接与北方贸易：西班牙征服期间，巴拿马的科克莱人（the Coclé）驾驶着装备齐全的帆船沿着太平洋一路往北，可能远至墨西哥，出口食盐、吊床、棉花、砂金以及奴隶。

地峡南部

从这些印第安人口中……我们得知：在偏远的地方有许多酋长，他们有大堆大堆的黄金；还有跟我们自己那样全副武装的民众。

——费迪南德·科隆（Ferdinand Colón），1503 年［莫里森（Morison），1963 年，第 344 页］

39



尼科亚美洲豹形状的容器（1000--1500）出土于哥斯达黎加。这一彩色容器显示了古代中美洲地峡陶器的高度发达。（图由切拉·怀利绘制）

40

虽然玛雅文明是中部美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美洲南部与北部地区的关系就没有那样密切了。中部美洲的边境线很难准确划分，但可以完全确定的是，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西部肯定是包括在内的，

属于玛雅地区。中部美洲的地理范围历史上有过伸缩：在奥尔梅克时代，向南扩张直逼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后来，在西班牙征服前的几个世纪里，随着墨西哥中部的民族移居尼科亚地区，又二度扩张至此。但是不管边境线划分有多么不确切，对于大部分考古学家来说，提起地峡南部文化，往往是和现在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地区连在一起的。他们把这块地区称为中间地带，因为它地处两大更加复杂的文明之间，即南美洲的安第斯文明和北部的中部美洲文明。中间地带没有石头城市，但是居住在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尼科亚地区的种族还是会建造一些土墩平台，用作庙宇和贵族房屋的基底。这些建筑一般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广场，这一特点不禁让人记起中部美洲的城市。另外，最早期的西班牙人还发现，在中间地带，人们也会为统治者绘制书籍和雕刻石像。这两点也是中部美洲的典型特征。

在巴拿马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塔拉曼卡地区，到处可见零散的村落。每一个村庄都不到 1 500 人，其中有一些还筑起栅栏防卫。在这些村庄里，看不到任何地峡北部城市的宏伟。中美洲南部的太平洋斜坡地区被各种自给自足的酋邦占领，没有复杂的城邦。可能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崎岖起伏导致没有空间扩张，这些自治的社会一直保持着小且分散的形式。这些酋邦从不需要复杂的行政体系或建筑物，但是装有隔板的墓穴和工艺精湛的陪葬品倒是非常常见。

由于缺乏震撼人心的大城市，也没有任何关于成就的书面记载，这些酋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像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大西洋上的分水岭等地区，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而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太平洋一侧，则因为黄金而被洗劫一空。就算是已经被挖掘的遗址，能提供的有用信息也非常有限，常常不能精确地定位其年份，或者不能清晰地判断它们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那儿曾经有许许多多独立且迥异的文化。

酋邦

41 尽管中美洲的各式文化数不胜数，但贸易把地峡连成一个整体。从 500—1100 年，在玉石、黄金等奢侈品交易以及精致彩陶交易的刺

激之下，玛雅文明高度发展，南部的酋邦在规模和财富上也有所增长。贸易都由酋长控制，其中自然也包括与哥伦比亚的贸易。哥伦比亚是很多冶金技术的发祥地。酋长们因此不但积累了财富，也很有权势。据早期西班牙开拓者所说，酋长在战场上也是将领（考古学家已经在他们的墓葬中发现武器作为陪葬品）。不仅如此，他们还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就好比中部美洲的萨满统治者。800 年之后，正当许多洼地玛雅城邦陨落之时，一些酋邦在复杂程度和财富两方面都达到了发展的巅峰。也是在这个时期，中美洲南部的黄金第一次大量出口至中部美洲。

宗教上的仪式和社会等级制度最能体现一位酋长的荣耀与地位，而这些仪式和制度往往能够恰当地反映南北方文明的惯例。一般来说，酋长都要求为自己雕刻石像。在尼加拉瓜，可以看到画像上的统治者头戴动物元素的装饰；在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的奇里基（Chiriqui）地区，又可以看到统治者们骑跨在一个赤裸的平民或奴隶的肩膀上。在哥斯达黎加的许多遗址，都能够看到巨大的花岗岩球体，最大的直径达到 7 英尺，重 15 000 吨。不但制作精细而且很可能是根据天文或宇宙的玄机来排列的，就像在中部美洲，建筑物的排列就是为了测量和纪念特定的天体活动。巨型的石磨盘，装饰有战利品性质的头颅，很明显是被用在玉米文化中的活人祭祀仪式中（参见第一章对玉米文化的详细介绍）。在巴拿马的科克莱和维拉瓜斯（Veraguas），最富有的墓穴中一般藏有陪葬的仆人、半宝石的饰物以及锤铸好的黄金首饰。在哥斯达黎加北部的利内阿维哈（Linea Vieja），墓葬除了能够显示财富，还呈现了各式各样的外国物品：不仅来自中美洲，还来自秘鲁、西印度群岛、中部美洲以及南美洲北部。哪怕是在塔拉曼卡山脉（属于奇里基文化）这些未有黄金挖掘的地方，雕塑上的统治者依然戴着黄金饰品。

文化交换

部分考古学家的观点是，中美洲南部的酋邦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来研究，不应该与它们南方或北方的任何文明混淆在一起。

地峡文化孕育了不少自给自足的社会，不仅稳固持久，而且还生产出了工艺精湛的黄金、半宝石、陶器等制品。尽管南部的酋邦分散各地而且文化相对独立，但它们与北方和南方的文明并不完全隔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冶金术就从这里传到了中部美洲，在墨西哥城北和尤卡坦半岛以南都发现了来自南部地峡的黄金。从玛雅城市奇琴伊察（800—1000）著名的圣井中挖掘出了令人称奇的黄金制品，其中绝大部分都产于中美洲南部。冶金技术在墨西哥的许多地方传开，进而诞生了墨西哥最精致的黄金制品：瓦哈卡脱蜡坠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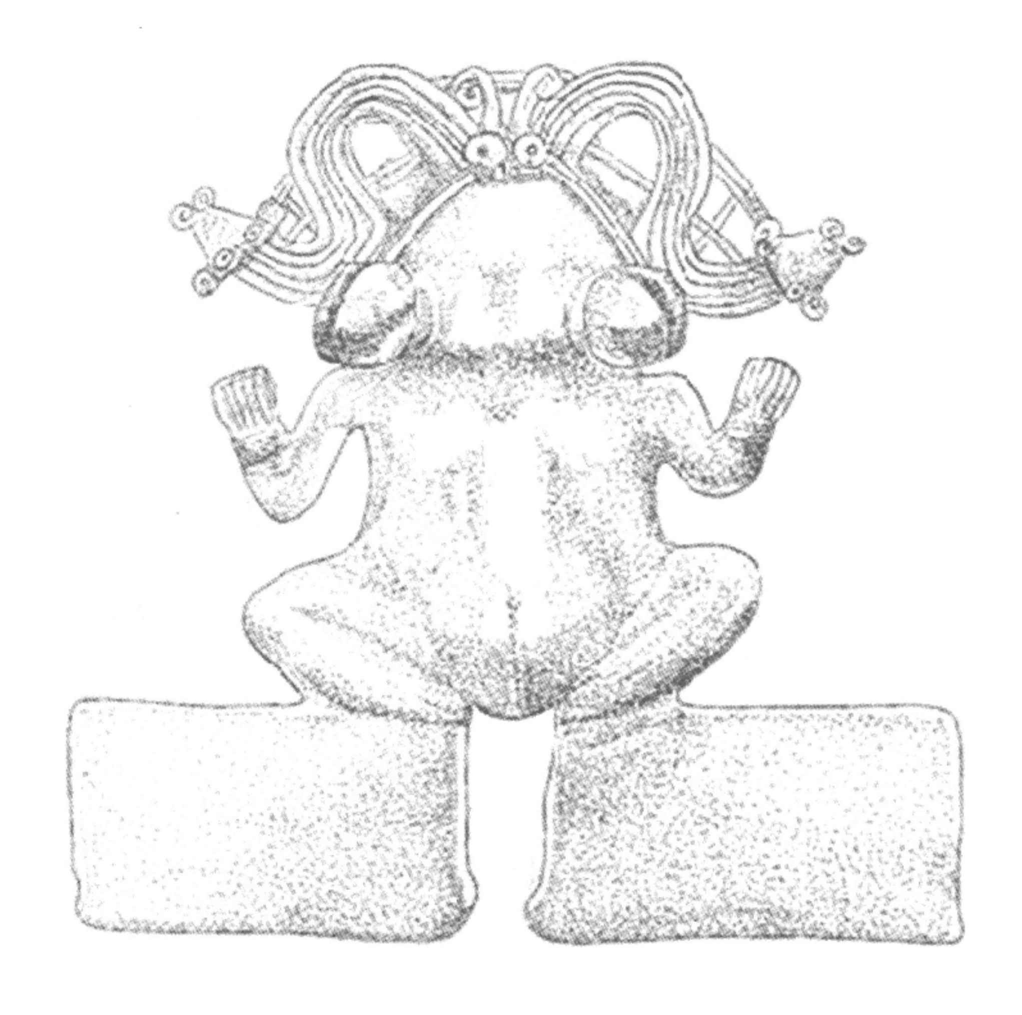
美洲的黄金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航海之前，冶金术在美洲新大陆已使用了2 000年。这一技术从南美洲的安第斯慢慢传入中美洲南部，最后传到了中部美洲。虽然前哥伦布时期具备高超的冶金技术，但是却未能用任何金属制造出实用的物件来。黑硅石和黑曜石是制作工具的主要材料，不过在后古典时期的末期（1250—1519），也会用铜制造夹钳、鱼钩和斧子等。黄金专门用于制作饰物、宗教相关的物品（如动物形状的坠饰、锤造好的用于葬礼的头盔、绿宝石的底托和其他珠宝首饰）、舞蹈仪式的响铃、装饰品以及宗教仪式中的面具和供品。尽管铜、锡和银都有挖掘，黄金始终是前哥伦布时期的主要金属。黄金的绚烂色彩让人联想到对太阳神的热爱。事实上，西班牙征服者在阿兹特克发现了一个象征太阳的黄金圆盘，重36磅。他们将此圆盘带回了西班牙宫廷，欧洲艺术家们对此惊叹不已。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就是其中一位。

一般会在黄金中加入铜以增强硬度。制作黄金物件需要用到多种冶金技术，包括脱蜡铸造、锤打、退火、焊接和熔接。冶金技术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出现于秘鲁和哥伦比亚，有可能更早。用了一千年时间才传到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交界，所以用了如此长久的时间着实让人惊讶。一旦传入以后，黄金便在这一带迅速普及。到600年的时候，黄金已经取代玉石成为哥斯达黎加贵族葬礼的首要陪葬品，在巴拿马则替代了海菊蛤贝壳饰品。锡蒂奥孔特(Sitio Conte，700—900）是巴拿马中部的一个科克莱人遗址，曾挖掘出史上最富有的墓葬之一。那里实行群葬，能够将酋长与仆人区分开来的就是黄金：酋长的头部往往盖有一个锻金面罩，胸部也会专门罩起来，另外手腕、耳朵和鼻子等处也穿戴有各类饰物。关于黄金的传统在西班牙征服之后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甚至到了18世纪，方济各会的教徒还在塔拉曼卡地区发现以黄金小雕像陪葬的习俗。

中部美洲虽然在很多方面成就卓越，但在冶金术上，的确起步较晚。玛雅人直到8世纪才开始从中美洲南部大量进口黄金。在此之后不久，工艺精湛的凸纹黄金圆盘、金铜合金的铃铛等就被扔进了奇琴伊察的圣井，作为贡品。考古学家从该圣井中找回的许多黄金制品都来自哥斯达黎加；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样式很明显是为出口中部美洲、投其所好制成的，而不是出于中美洲南部自己使用的目的。其他一些物件虽然具有完美的玛雅风格，但运用了南部的黄金技术，让人不禁猜想它们可能生产于尤卡坦地区，但想必是由南方过来的金匠或者金匠的学徒制造的。很明显，中部美洲很快就意识到了黄金的价值，不但培养了自己的金匠，还开始了这一贵重金属的贸易。虽然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对中部美洲的黄金出口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墨西哥本土尤其是瓦哈卡地区的冶金工匠们已经能够生产出绝美的黄金首饰了。到了西班牙征服的时代，阿兹特克国王蒙特苏马每年接受的黄金贡品达两吨之多。

42



迪基斯（Diquis）铸金青蛙坠饰（800—1500），出土于哥斯达黎加。舌头分叉，每个支叉的末端连接有神秘的蛇头。这个图案为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的收藏物。（图由切拉·怀利绘制）

43

中美洲南部的酋邦的文化，其实与南美洲北部、中部美洲的文化有诸多共通之处。从树皮布、吊床、塔拉曼卡式雕塑、精细的黄金物品等都可以看出与安第斯文化的相似。萨满统治者头戴大咬鹃羽毛头饰、身绘美洲豹纹，说明他们对中部美洲最强势的政治标签的认可。从祭祀用的石磨盘和当代的口头传说也可以发现，他们与中部美洲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包括供奉祖先和创世神话，核心都是玉米和活人祭祀。

来自前哥伦布时期的文化遗产

44

在前哥伦布文明的几千年里，从复杂并且有文字记载的玛雅文明，到太平洋沿海较为简单但艺术精湛的酋邦，再到加勒比部分沿海更为闭塞的部落社会，中美洲地峡可谓见证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纵然中美洲人民拥有不同的语言、迥异的艺术风格和天差地别的社会化程度，但他们都穿越了崎岖的大山和热带雨林，驶出了狂风暴雨的大海，为的就是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贸易，交换统治者声威的宗教仪式和创世故事。

古代文明留给中美洲的文化遗产没有随着西班牙征服而终结。现在，超过20%的中美洲人民仍然在祖先土著美洲人的文化框架和口口相传的传统之中生活。他们得到的遗产包括很多，比如考古学家从中美洲北部的雨林和高地盆地中挽救回来的玛雅文明城市遗址，又比如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看到的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黄金坠饰。他们的祖先见证了中美洲历史上变化最大最突然的时刻：他们与入侵的西班牙人开战，可是战败了，遭受无尽的奴役；有些祖先，比如米斯基托人和玛雅人中的反抗派甚至跟英国的海盗和投机商联合起来抵抗西班牙。不管怎样，土著民族生存了下来，有时候站在历史的最前沿，有时候掩藏在封闭或遥远的社会背后，那里往往还保留着古代的习俗。他们也通过通婚得以延续，由此而来的梅斯蒂索印欧混血人种，占整个中美洲人口的62%。今天，地峡上的每一个国家不是受土著文化的影响，就是由于土著文化的缺失而受到影响。比如哥斯达黎加，自西班牙征服开始，土著民族已经绝迹；而在危地马拉，玛雅人口至今仍占一半。中美洲的历史、中美洲每个现代国家的现状，都与这些美洲人的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章　西班牙征服（1492—1541）

45

……在外来者到来的时候。
红色是太阳之子的胡须，
长胡须的那些人自东方而来
当他们来到这片土地的附近
作为外国人……
从此，我们便因他们的到来而悲伤哭泣，他们的到来……

——《丘马耶尔的奇拉·巴拉之书》［埃德蒙森（Edmonson），1986年，第115—117页］

自美洲大陆的惊奇发现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好像都能让过去的一切丰功伟绩黯然失色，让世界上其他任何奇迹都哑口无言。有关这个故事的点点滴滴一直紧抓着人们的想象力，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无辜的民族进行屠杀……

——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修士（Bartolomé de Las Casas），1542年（1992年，第3页）

西班牙的征服其实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世界之间的碰撞，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讲述区区几百个征服者便击垮了阿兹特克和印卡两大帝国；讲述征服者处心积虑制伏中美洲各民族的漫长征程。征服者于1492年抵达加

勒比海。之后几十年间，他们摧毁了美洲大陆的城市文明，宣布自己对这片土地享有主权，要知道那可是一块有40个西班牙大小的土地。

46

从地峡最初形成开始，中美洲就贯通了南北，这一次西班牙人入侵也是两面夹击。无论去哪里，地峡都是必经之路，它是通往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门户。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和巴拿马进入中美洲，同时也从海路抵达，尤其是从加勒比海，因为他们在附近岛屿已经安营扎寨。西班牙人穿过巴拿马找到了太平洋，进而发现了印卡文明；进入洪都拉斯海湾，又遇上了精明的玛雅生意人，从他们那儿西班牙人得知一个叫尤卡坦的地方。中美洲地峡不仅意味着黄金和新的土地，也许它还是去往印度的通道。然而，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时全方位受阻，征服并不容易。西班牙王室等了40多年才在得以在中美洲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政府控制体系。然而，就算到了那个时候，仍有半个中美洲未开发也未被征服。

西班牙与征服者

是上帝和他的教会准许的，把那些王国托付给了西班牙王室……

——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修士（1992年，第6页）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502年驶入洪都拉斯湾，随即宣布周围的土地归西班牙所有。此时距离他意外发现美洲新大陆已过去10年。其实哥伦布航行的初衷是要寻找亚洲，寻找那片有丝绸和象牙，有肉桂和丁香，有陶瓷和美玉的土地。他一直以为欧洲和东方之间只隔着一个宽阔的大洋，所以当他首次接近美洲大陆时，便深信不疑亚洲的海岸已经找到了。在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航行中，哥伦布探索了中美洲的加勒比沿海，仍在寻找通往印度的通道。但是，他既没有找到去印度的海峡，也没有找到太平洋。当初他决定从洪都拉斯向东航行，就注定了失败。在落后的莫斯基托海岸，映入他眼帘的是三三两两茅草藤条的简陋房屋，土著人除了身上绘有些许图案之外，几乎一丝不挂；如果当时他能够往相反的方向航行，迎接他的就会是中部美洲的

石城和身穿棉布衣物的尤卡坦玛雅人。哥伦布就这样失败地返回了西班牙，渐渐为世人所忘却，让身后的美洲把名誉和财富拱手献给了其他人，比如巴拿马与太平洋的发现者——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中美洲最有影响力的征服者——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还有更大的荣誉则留给了墨西哥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和秘鲁的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47 这些人、他们对美洲新大陆的征服与探险，都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西班牙战争机器的产物。西班牙与十字军征战了200年[①]。到了1491年，也就是哥伦布航海的前夕，穆斯林人终于在格拉纳达（Granada）战役中被赶出了西班牙。对天主教的君主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来说，有所新动作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时候，哥伦布提议寻找一条通往东方世界的海上路线。这一计划在两个层面上满足君主的利益：为教会提供了一个挽救新的灵魂的机会，也为积累财富提供了一个占领贸易航道的机会。

此时的西班牙当然是急需增长其财富的。几个世纪的战争和战乱已经摧毁了西班牙的经济。战争机器不能代替贸易和充足的农业；通过战乱和冒险发迹的士兵根本不屑于花时间和精力到工农业上。当欧洲其他国家都开始试行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时候，西班牙仍维持着封建制度。整个国家充斥着无业的老兵，暴躁的士兵后代，和一文不名的贵族，因为当时的继承体系规定财产只传长子。

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归来的时候，满载着黄金、鹦鹉和印第安奴隶。西班牙即刻意识到这是一条出路。天主教的君主们想让哥伦布重返新大陆，为了把这一帝国举动合法化，他们恳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同

① 从8世纪初起，伊比利亚半岛被穆斯林征服，但穆斯林对半岛的控制从未彻底完成。其统治地位，在北部面临基督徒的不断抵抗，在南部因穆斯林中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而显得时强时弱。到了13世纪，半岛北部基督徒的力量陡增，再加上十字军重新征服半岛的行动，最终将穆斯林人从伊比利亚半岛逐走。——译者注

意。教皇大笔一挥[1]，便把新大陆的统治权授予了西班牙，以此为新大陆上未开化的居民换来与上帝沟通的机会。就这样，西班牙被托付了一场新的圣战。西班牙人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怀抱着发财的梦想，从塞维利亚（Seville）出发了。他们坚信上帝定会保佑他们。

加勒比的西班牙

来到美洲的西班牙人良莠不齐。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等许多人大字不识；其他有些人是普通的罪犯；科尔特斯、蒙特霍（Montejo）、阿尔瓦拉多等一部分人的出身算不上贵族；还有一撮人则是达官显贵的后代，比如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Pedrarias Dávila），也叫佩德罗·阿里亚斯·德·阿维拉（Pedro Arias deÁvila），他是梅德林伯爵（the count of Medelín）的弟弟。这个家族投身战争几十年，已经习惯于从征服中获得些什么。就拿佩德拉里亚斯来说，在中美洲大显身手之前，其实在争夺格拉纳达的战役中就早已经备受瞩目。大部分征服者是西班牙人，但也有一部分人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还有一些是非洲奴隶。无论这批人出身何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贫穷。

他们以上帝和王室的名义来到加勒比地区，但事实上，他们全都是义无反顾地来寻找财富的。战利品、黄金和珍珠能让他们富裕，体力活则不行。艰苦的工作一般都由土著奴隶来完成。很多人都计划着能携带金银珠宝回到西班牙去，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个梦想简直太诱人了，很多家族不惜让众多成员都加入到危险的航海中去，到陌生的土地上去。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与自己的四个兄弟一同踏上征程，在后来对危地马拉的征服与掌管中，他将许多地方都托付给了这些兄弟；弗兰西斯科·德·蒙特霍与儿子和侄子一起航行，一起征战尤卡坦。西班牙的有些地区尤其受到这一梦想的席卷——科尔特斯、皮萨罗、阿尔瓦拉多兄弟，及佩德拉里亚斯全都来

48

① 指1494年6月7日在罗马教皇调停下，西、葡两国在美洲划分其殖民势力范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译者注

自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地区。

事实证明，岛屿殖民地不被看好。那儿几乎没有矿藏，大片的土地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资，这些都不能够满足一个士兵想迅速发财的大计。几年下来，也没有得到什么奴隶：欧洲的一些疾病和非人的待遇使得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该岛现为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共同所有）和古巴的印第安人惨遭灭绝。西班牙突袭了其他一些岛屿，绑架印第安人，逼他们在西班牙殖民地的矿藏中工作。西班牙人当时急需劳动力，他们甚至花钱雇来了非洲奴隶。

矿藏很快就枯竭了。很多西班牙人走投无路只好依赖他们的大庄园获得些收入。如果算不上富裕的话，至少他们活得很像上流社会。科尔特斯把所有钱都用在穿着打扮和赌博上。巴尔沃亚负债累累，迫于无奈逃离了伊斯帕尼奥拉，偷渡去了巴拿马。这个殖民者渴望获得奴隶和黄金，在这双重诱惑之下，又一次对加勒比海进行仔细探索，很快就找到了去巴拿马的路线。哥伦布早前曾报告过，巴拿马遍地是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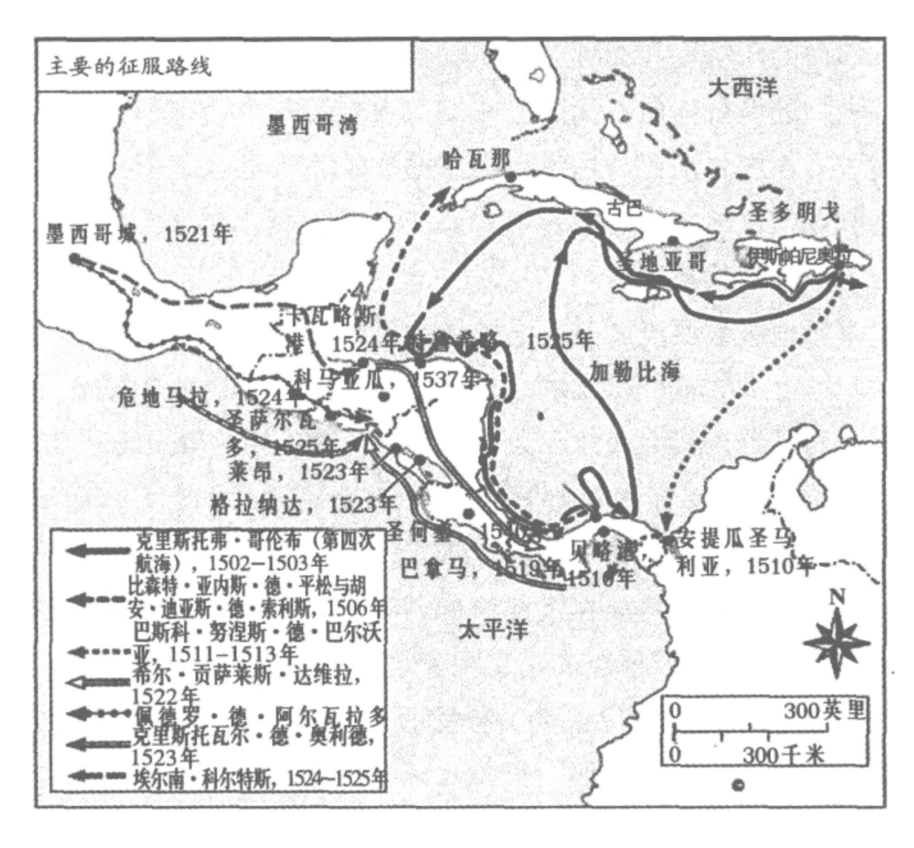
巴拿马：第一个殖民地

我夺取之后便紧抓着不放……真正地占有了这些海洋和陆地，海岸和港口，还有南部的岛屿……

——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1513 年［安德森（Anderson），1941 年，第 176 页］

事实上，美洲大陆上最早的欧洲殖民地在巴拿马，但墨西哥和秘鲁两地神奇的征服混淆了人们的视线。在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的领导下，第一个殖民地——安提瓜的圣马利亚（Santa Maria la Antigua）于1510 年在达里恩这个几乎不可能的地方成功建立。达里恩是地峡上一个地势低洼的海岬，南美洲就是通过它与美洲的其他地区相连接的。今天的达里恩地区到处是茂密的雨林，是世界上最原始的热带荒野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非常偏远，半游牧印第安人比如库纳族（Kuna）和埃姆维拉族（Emberá）的生活习性得以保留，西班牙人在达里恩落脚的时候，只是隐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根本不知道原来

49



中美洲几乎从各个方位被攻克：从墨西哥，也从太平洋和加勒比海。

还有墨西哥、秘鲁那样丰富的文明存在。虽然西班牙人很快就放弃了达里恩转而寻找气候温和的地带，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地区还是成就了西班牙最伟大的一些发现。

50

早在1498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南美洲的北部沿海一带航行时，就怀疑此处的高山大河意味着大片陆地的存在，与当时正被西班牙占领的几个小岛完全不同。猴子、珍珠等陆续出现，让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国王深信不疑——亚洲海岸终于找到了。他立即派遣船只前往该地区探察。然而，他们虽然满载着珍珠、黄金和奴隶而归，但还是没有找到印度。

为了寻求一个通往印度的海峡，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Rodrigo de Bastidas，1501）、哥伦布（1502—1503）等人最终被吸引至巴拿马。他们在巴拿马发现了大量黄金，而且听说南部附近有一个海洋——哥伦布于是乐观地认为那一定就是恒河（Ganges river）。哥伦布受黄金的启发在贝拉瓜斯（Veraguas）建立了一个贸易站，但是很

快就被愤怒的印第安人驱逐了，贸易站也狼狈结束。还没等西班牙人对岛屿上的处境有任何不满，巴拿马淘金热和搜寻南部海的热潮就已经上演了。在巴尔沃亚与达里恩地区的印第安人结成了朋友并建立起了圣马利亚殖民地之后，也就是1513年，西班牙人终于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太平洋。

达里恩地区被西班牙王室正式命名为“黄金的卡斯蒂利亚”（Castilla del Oro，即 Golden Castile）。这儿有来自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两地的黄金，而且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提供了一条相对较短的陆地路线，其关键性在1532年征服秘鲁时会更加显露无疑。1519年，西班牙人为了气候更加温和的巴拿马城而废弃了圣马利亚殖民地。从太平洋一侧运输货物和奴隶到停放在大西洋的西班牙船只上，刚开始走的是达里恩陆路，后来也改为更靠近现在的巴拿马运河的一条路线。截止1519年，巴拿马的战略位置不仅造就了一个永久性殖民地，还引发了对太平洋的探索。但也在那一年，西班牙征服的重心随着埃尔南·科尔特斯进军高地上的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而转移到了墨西哥。

征服前夕的玛雅人

阿兹特克帝国的统治者蒙特苏马派遣信使到他的同盟国和敌对国，提醒大家一场征服者的入侵即将来临。他提议，这个时候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这个敌人。征服前夕，阿兹特克统治着中部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其岛都特诺奇蒂特兰人口接近25万，是当地最大的城市，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成为独立的国家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阿兹特克帝国蒸蒸日上，迫使曾经也同样强大的国家为其效忠，更是制服了许多其他城邦为其进贡。哪里有反抗，阿兹特克军队就攻打哪里；哪里企图酝酿叛乱，他们就在那儿建立永久性军事驻防。阿兹特克商人同时也充当着军事间谍的角色，他们牢牢控制了许多古代贸易之路。然而，即便是如此不可一世的阿兹特克人，见到长着胡须的白种西班牙人，仍感畏惧。

51

玛雅人不仅与阿兹特克人有贸易往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仿阿

兹特克文化。在尤卡坦和危地马拉，贵族们用阿兹特克进口的贵重物品装扮自己，他们的宫殿也绘有中部墨西哥风格的湿壁画①。尽管玛雅人乐得沉浸于中部美洲最强大的帝国——阿兹特克的光辉之中，他们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始终是非常警觉的。基切族玛雅人甚至禁止阿兹特克商人进入他们位于危地马拉高地上的王国。然而，就在西班牙征服之前，阿兹特克人似乎信心满满，企图扩张领土至各个玛雅地区。在中美洲的太平洋和加勒比两大沿海的偏远贸易站里，西班牙探险队都遇到过阿兹特克商人。而且，他们的纳瓦特尔语（Nahuatl）是贸易的通用语言。阿兹特克人在玛雅领地的外围加固势力的同时，直接控制了其东南部。到 1500 年，包括索科努斯科（Soconusco）的可可种植区在内的恰帕斯部分地区已经被阿兹特克人并入其帝国的范围。

阿兹特克人在索科努斯科地区的扩张遭到了基切族玛雅王国的抵抗。从 14 世纪开始，基切人就以坚固的库马尔卡赫（K' umarcaaj）为都城，统治了危地马拉高地的大部分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大片肥沃的土地。而最终，库马尔卡赫还是按纳瓦特尔语，被叫成了乌塔特兰（Utatlán）。基切族联盟是整个中美洲最大的王国，由骁勇善战的传奇人物库库马特斯（K' ucumatz，1375—1425）与他的儿子基卡夫（Quik' ab，1425—1475）创建。基切族人相信他们父子拥有萨满的神力。在乌塔特兰发现过一本象形文字手抄本（于西班牙征服之后丢失），用古老的长纪年历法描述了 800 年的玛雅历史。乌塔特兰不仅保持着学习新鲜事物的姿态，而且军事强大，一直被认为是个受神灵眷顾的城市。乌塔特兰的贵族们还统治者其他许多城市。各领地（principalities）在其要求之下，向其进贡，远至索科努斯科地区以及与今天的萨尔瓦多交界的地区，无一幸免。

然而，当时在蒙特苏马强大的影响力之下，乌塔特兰无人能够力挽狂澜将基切王国从分崩离析中挽救回来。其西部高地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开始出现土地的激烈竞争，在太平洋沿海盛产可可和玉米的

① 湿壁画即在墙面灰泥未干之时描绘的一种壁画。

一些地方，甚至爆发了可怕的战争。有学者估计，仅乌塔特兰地区人口曾飙升至5万，而在危地马拉，尽管佩滕地区几乎人烟绝迹，其总人口仍可能达到了200万。在基切王国最强大的几个分支之中，卡克奇克尔玛雅人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于1470年起义，在基切王国的南边，一举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叫做伊西姆切［Iximché，或者叫“玉米树”，阿兹特克人将这个意思译成了“森林之国（Cuanhtemallan）”——“危地马拉（Guatemala）”由此而来］。他们的独立引发了其他分支的反抗，比如来自阿蒂特兰湖的楚图希尔人（Tzutujil）。

52

从14世纪基切族到处征战开始，战争从未停止。许多有着1 000多年居住历史的峡谷地区由于易受侵袭而遭到废弃，人们转而寻求防御功能强大的堡垒城市。这些山顶城市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那样，雄踞在山脊之上，四周的峡谷仿佛护城河一般。放眼望去，披满松林的群山和耕作好的高地谷底，一览无余。农民也纷纷涌向这些城堡，加入到了统治者及其奴隶的队伍当中。如此一来，祭司、士兵、工匠等原有人口加上农民的人数，使人口总数一下子膨胀至超过15 000人。神圣的都城乌塔特兰共有140个城镇建筑物，在其周围，设有至少3座其他的城堡作为防卫。其余城堡在整个基切王国内呈战略性分布。征服者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称乌塔特兰建造精良而且强大得令人称奇，对征服者构成了巨大隐患而不得不加以铲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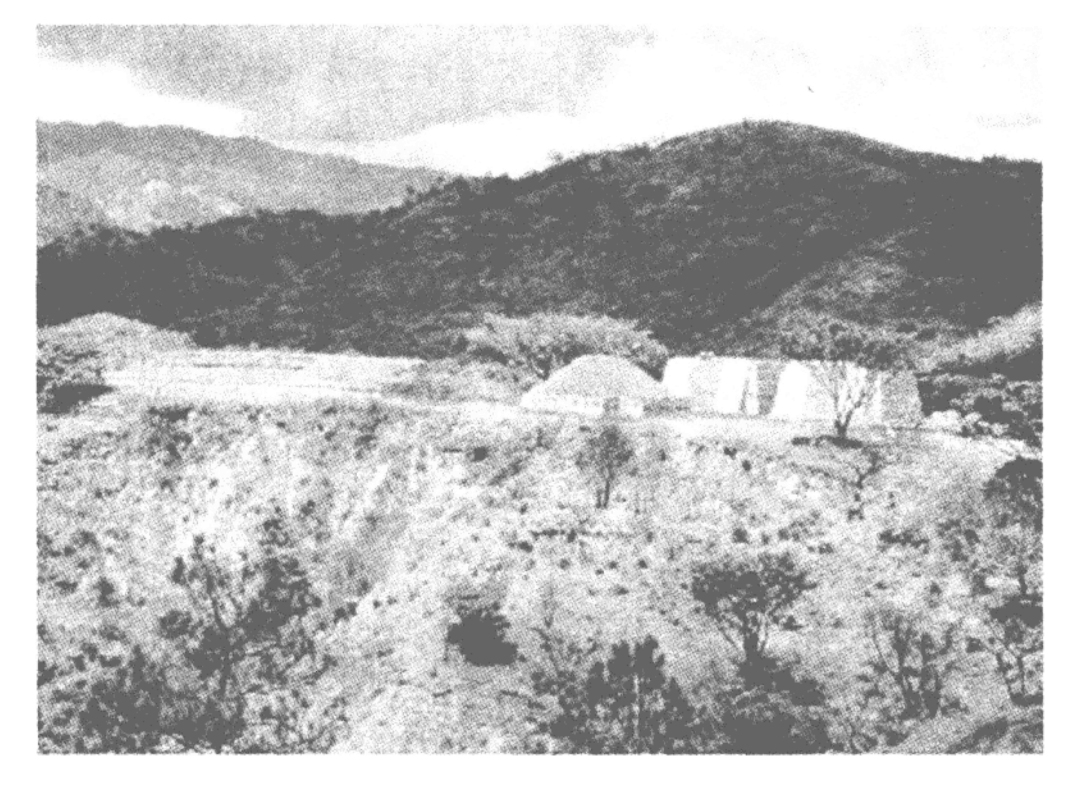
阿兹特克历代国王都称基切人富有而强大，但是战争大大削弱了基切玛雅人的实力。到了1510年，他们已经被迫向特诺奇蒂特兰进献黄金、可可、大咬鹃羽毛和纺织物等作为贡品。蒙特苏马向来偏好于让各地统治者留有实权，以此来保证他们的效忠。所以，作为回馈，蒙特苏马似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基切族统治者。这对基切人的王室血统来说，可谓注入了无上的荣耀。基切人立刻就接受了阿兹特克帝国的一切：贵族们学习纳瓦特尔语，甚至模仿阿兹特克都城内的宗教区域，建起了一模一样的庙宇和球场。基切人响应蒙特苏马要求相互扶持的号召，毫无二心，尽管祭司的预言已经警告过他们，基切族将败于西班牙人。

乌塔特兰被征服

加内尔 I（I Ganel，即 1524 年 2 月 20 日）那一天，西班牙人击垮了基切人。他们的头领，被称为图纳蒂乌·阿维兰塔罗（Tunatiuh Avilantaro，也就是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征服了所有人。在此之前，谁也没见过西班牙人。

——《卡克奇克人史》（雷西诺斯，1953 年，第 119 页）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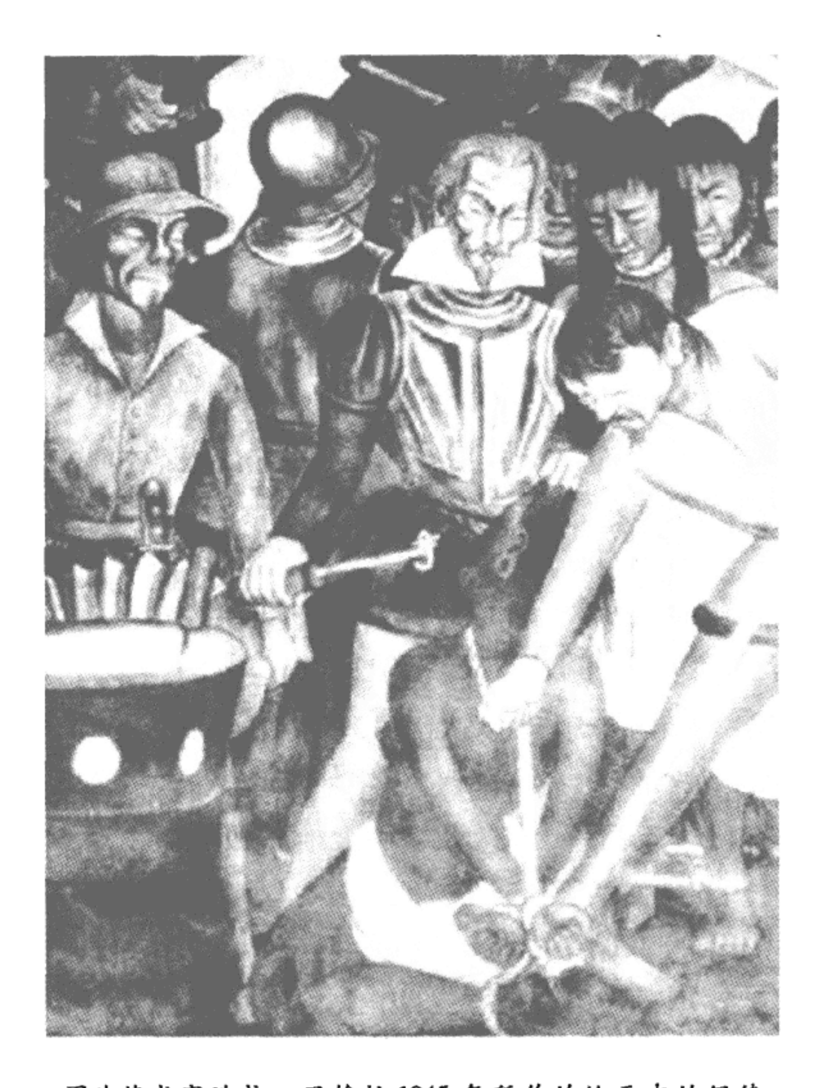
米斯科别霍（Mixco Viejo）原为防备坚固的玛雅城市，位于危地马拉高地，图为其遗址。（照片提供：切拉·怀利）

1521 年，在对特诺奇蒂特兰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锁及数场残酷的战役之后，埃尔南·科尔特斯终于在特拉斯卡拉人（Tlaxcala）印第安盟友的支持下将其攻陷。蒙特苏马死了，这个庞大的城市也毁于一旦。科尔特斯利用蒙特苏马的进贡名单，派遣其各个头领至各地进行勘察，并要求他们向西班牙国王尽忠。如遇抵抗，必要的时候，就以武力将

他们奴役。没过几年，科尔特斯又对危地马拉虎视眈眈。他在给卡洛斯五世（Charles V）的一封信中提到，索科努斯科地区的基切人一直在挑衅，他会派遣最得力的爱将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前去解决问题。阿尔瓦拉多会迅速办妥此事。

55 阿尔瓦拉多注定会成为中美洲北部唯一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征服者。这不仅是简单地因为他为西班牙王室赢得了大片领地，也因为他以省督的身份在此统治了17年之久。25岁那年他从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出发，虽然此前的生平无从查证，但他的勇敢和残暴全部清晰地记录在册。阿尔瓦拉多无所畏惧、充满野心，是理想的征服者人选。1510年，他刚刚踏上美洲大陆的土地就参加了秘鲁的征服之战。他与胡安·德·格里哈尔瓦（Juan de Grijalva）一起考察了墨西哥的尤卡坦沿海，听说了阿兹特克人的金银财宝后，他和他的兄弟便欣然加入了科尔特斯1519年的远征探险队。阿尔瓦拉多是一名很好的骑手，而且生性粗野几乎到了躁动难安的地步，因此他一直参与新的探险和远征，直到1541年在企图镇压印第安人叛乱时被他的马踩踏致死。据一位名叫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的征服者描述，阿尔瓦拉多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心地率直。他是一位天生的将领，成为了科尔特斯最器重的头领，也是最受信赖的解决问题能手。然而，连科尔特斯都对他的极度残暴有所抱怨。比如，阿尔瓦拉多曾经在特诺奇蒂特兰的主庙中屠杀手无寸铁的阿兹特克人，由此引发的政治骚动，也被他一并消灭。但他模样俊俏，好打扮，经常戴着黄金项链和珠宝首饰，所以在印第安人中间，这位满头金发的阿尔瓦拉多被称为托纳蒂乌（Tonatiuh），意思是金灿灿的太阳神。

1523年12月6日，阿尔瓦拉多携400名西班牙士兵（其中130名为弓箭手和火枪手）和5 000—10 000名印第安随从，从墨西哥城出发前往南部。随从当中有一些是忠诚的特拉斯卡拉人，其余则是后来陆续征服来的阿兹特克人、米斯特克人和萨波特克人。那次远征带有



图为艺术家迭戈·里维拉1945年所作的绘画中的佩德罗·阿尔瓦拉多。当代没有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的画像留存下来，但是他残忍至极的名声在这幅20世纪的壁画中得以展现。图中，这位金发征服者（最右侧）正在给一名印第安奴隶烙印。就如玛雅人所说："战争中图纳蒂乌（即阿尔瓦拉多）对人们从未心怀怜悯。"（《卡克奇克人史》，1953年，第120页）。他甚至奴役了自己的盟友特拉斯卡拉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他们在征服危地马拉时可是与阿尔瓦拉多并肩而战的。然而，他显然因自己过度的行为而饱受良心的煎熬，要不然不会让他的奴隶在他死后得以自由。（照片由劳伦斯·福斯特摄）

160 匹马、120 名骑手、充足的火炮和弹药，如此巨额的成本让科尔特斯负债累累，但是他估计从那片“有着许多不一样的人，富裕而奇特的土地”（科尔特斯，第 316 页）上赚回这些花费一定绰绰有余。阿尔拉瓦多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行进了 1 100 英里到达了索科努斯科。2 月份，他离开太平洋坡地，登越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进入了危地马拉高地。

他所看见的危地马拉已经毁于战争和疾病。在阿尔瓦拉多的军队到达的前几年，天花在这里蔓延，成千上万的玛雅人因此丧命。到了 1521 年，超过 1/3 的高地人口已经死于流行病。成堆的尸体根本来不及掩埋，都留给了秃鹫。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虚弱的幸存者留守在高地上重新拼凑他们的生活。“我们都是孩子，就剩下我们了。”（《卡克奇克人史》，1953 年，第 117 页）

虽然乌塔特兰的实力已被大大削弱，但是他们仍然拒绝与西班牙人合作。阿尔瓦拉多的信使给了基切人这样一个选择：要么和平地接受王室的统治；要么遭受战争，就算战争中大难不死，也会饱受奴役之苦。基切人没有因此就屈从。和蒙特苏马一样，基切人的统治者克赫第三（Three Quej）呼吁危地马拉所有互相战斗着的族群团结起来抵御外敌。可是，与蒙特苏马的遭遇一样，结果让他很失望。事实上，卡克奇克尔人已经与征服者达成协议，以此讨好征服者。他们协助西班牙人打败自己的宿敌，与当时特拉斯卡拉人对付阿兹特克人如出一辙。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卡克奇克人派了 2 000 名士兵“将基切人一网打尽”（《卡克奇克人史》，第 121 页）。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战场上的两种文化

这幅亚麻布画（Lienzo），是一位来自墨西哥中部的特拉斯卡拉印第安人的作品。画中描绘的是一个骑着马、穿着盔甲的西班牙人在特拉斯卡拉人同盟军的帮助下攻打玛雅人。

征服者的金属盔甲所发出的噪声、他带来的猛犬那狂野的眼睛、楼层般高大的马匹所流下的汗水，所有这一切，印第安人全都用画笔有所描绘。他们对征服者那会开火的武器感到畏惧，对那闪闪发亮的钢剑崇拜不已。但是，畏惧和不解是双向的。比如，当时巴尔沃亚手下被困的士兵已经饥饿难忍，但是他们非常害怕印第安人的毒箭，宁可走进达里恩沼泽地来避开使用毒箭的印第安人。哥伦布也记录过一种锐利可致命的印第安击棍，装着由黑曜石制成的刀刃，还用羽毛和黄金来装饰。印第安人身穿象征着圣兽的衣服或者只是简单地以图腾遮体，呼喊着神的名字冲向战场。他们用螺号、石笛和木鼓奏出刺耳的音乐，听得出非常愤怒，对欧洲人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大炮发射之于印第安人的冲击。阿隆索·德·阿吉拉尔（Alonso de Aguilar）曾经说过（德·富恩特斯，1963 年，第 149 页），印第安人的数量之多、噪音之大，以及他们的凶猛吓得科尔特斯的士兵们忏悔不已。

对于克萨尔特南戈（Quetzaltenango）城外的那一场战役，玛雅人和西班牙人两方的描述有着天壤之别。这大概是对玛雅和西班牙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最好的对比：

我集结骑手之后，向他们（基切人）发起突然进攻。我们在这儿展开了残酷的搜捕和惩罚。乌塔特兰的四大首领之一在这一事件中被杀，他也是整个国家的总首领。我撤回到温泉附近，在那里扎营过夜。非常疲惫，有几个西班牙人和部分马匹受了伤。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1524 年（1972 年，第 58 页）

然后首领特库姆（Tecum）飞了起来，像一只雄鹰一样飞过来，身上长满了羽毛……都是真的羽毛；他有翅膀，也是从他身上长出来的，还戴着三个皇冠……这位特库姆首领决心杀掉马背上的图纳迪乌（Tunadiu，即阿尔瓦拉多）。

特库姆没有击中阿德兰塔多（Adelantado[1]，即阿尔瓦拉多），反而击中了马。他用长矛砍下了马头。这支长矛不是铁做的，而是用闪闪发亮的石头制成，首领对它设了咒语。当首领看到阿德兰塔多没有死，只有马被打死的时候，他又折回来从头顶飞过……阿德兰塔多手持长矛等着特库姆首领，然后，他把特库姆刺穿了……那位阿德兰塔多对他的士兵说，他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一个印第安人像特库姆那么英勇、高贵，而且浑身都披着那么漂亮的大咬鹃羽毛……

——《尼海夫之书》（*Titulo de Nijaib*），对16世纪危地马拉莫莫斯特南戈地区的尼海夫王朝的记载（布克哈特与加斯科，1996年，第151页）

56
57



1524年危地马拉城镇——圣地亚哥阿蒂特兰（Santiago Atitlán）被征服。［该图由迪奥多罗·塞尔拉诺（查维罗，1892年）根据16世纪的原图仿作，原图为《特拉斯卡拉历史》的一部分，现已丢失。］

① Adelantado，一译先遣官。指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时期受王室授权探索、征服并占领印第安人领地的西班牙殖民者首领。——译者注

基切人有备而战。他们伟大的首领特库姆（Tecum）从各个城镇集结了一万大军；其他首领也纷纷带着勇士前来参战。所有人都在乌塔特兰进行了七天的战前准备，包括宗教仪式和特殊的出战舞。特库姆像神一样坐在一个轿子上，人们抬着轿子按照特定的仪式方位来回走动。他身上佩戴着镜子、宝石和大咬鹃羽毛，根据基切人的书本记载，他被赋予了“眼明心亮、料事如神”的魔力。他们的密探提供消息称阿尔瓦拉多正逼近一个现在名为克萨尔特南戈（Quetzaltenango）的地方，基切人便由鼓手、海螺号手和39名旗手打头阵，浩浩荡荡地杀向战场。阿尔瓦拉多和他的部队、战马刚刚从海岸艰难地爬上高地平原，已经非常疲惫，可是他们一到基切王国就遭遇了大军，据阿尔瓦拉多估计有三万人。

阿尔瓦拉多在克萨尔特南戈城外的空地上大胜基切军队。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步兵实现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毁灭性打击。”（1972年，第59页）基切人似乎也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说：“那天那场浩大的血战把一切都染红了。”（布克哈特与加斯科，1996年，第151页）基切人同意言和，并盛邀西班牙人去乌塔特兰以便款待。阿尔瓦拉多骑马前往他们的城堡，当他经由一个活动坡道跨过沟壑进入城门之后，感觉到这是个陷阱。城内的街道非常狭窄，西班牙人骑在马背上根本没有空间调头。而且一旦活动坡道撤去，就没有出口了。阿尔瓦拉多利用各种借口才勉强带领他的部队逃回到城下的平地上。就在这儿，在卡克奇克盟军的帮助下，阿尔瓦拉多与基切人上演了最后一战。他逮捕了很多基切人首领，将他们活活烧死，然后一把火烧毁了乌塔特兰城。就这样，阿尔瓦拉多仅用了几个月便征服了基切王国。

既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基切人的存在，这样就足够了……

——《波波尔·乌》，基切玛雅人的圣书（特德洛克，1985年，第227页）

59

阿尔瓦拉多扩大征服范围

一场三三两两的征战，反抗、再征服。

——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市政会（Town Council of Santiago de Guatemala）[麦克劳德（MacLeod），1973 年，第 404 页]

虽然基切人被打败了，但是危地马拉并没有就此被征服。在墨西哥，科尔特斯承袭了阿兹特克帝国的组织结构和庞大进贡体系。但是危地马拉与墨西哥不同，它的政治权力结构已经分崩离析。的确如此，西班牙人很快就能发现，整个中美洲地区种族众多但是没有权力中心，所以几乎每一个城邦和酋邦都需要单独攻克、单独谈判。而且，并不是一朝征服便万事大吉，有些种族乘着西班牙人转移精力到下一个征服时就会有所动作。

面对这一政治现实，阿尔瓦拉多派遣远征队前往高地上的 12 个独立的玛雅王国，把已经被征服但不太心甘情愿的玛雅人征召起来去攻打他们还在抵抗的同胞。为了达到震慑印第安人的目的，他折磨印第安人的统治者，把他们活活烧死，至少也会把他们当做人质囚禁在自己的军营里。甚至当印第安人和平地归降于王室的时候，阿尔瓦拉多还允许他的士兵奴役他们，这与王室法令是完全违背的，而且他完全没有考虑过印第安人在精神上的皈依。随着征服向南推进到了萨尔瓦多的库斯卡特兰（Cuzcatlán）地区，那里的皮比尔（Pibil）印第安人不愿冒险抵抗引来奴役、折磨或者死亡之苦，直接逃进了周边的大山，把他们的城市拱手让给了征服者。阿尔瓦拉多因这样的和平抵抗而倍感受挫，他对皮比尔人进行了缺席审讯，宣判他们死刑，理由是违抗崇高的卡洛斯五世，犯了叛国罪。

阿尔瓦拉多的气馁不仅是因为征服方面的成绩黯淡，也因为基切王国的战利品实在让人失望。实际上，就财富而言，整个危地马拉都不尽如人意，阿尔瓦拉多还就此写信给科尔特斯抱怨了一番利润的欠缺。庞大的人口，尤其是萨尔瓦多（该国的圣萨尔瓦多市于 1525 年快速建立）能够提供大量有用的奴隶，但是像在阿兹特克的宝库中那样

成堆的黄金是绝对无处可找的。那时的阿尔瓦拉多以伊西姆切（Ix-imche）为首都，他偷占了土地，把盟军卡克奇克人当成奴隶，以各种名义分给他的士兵们。然后他召开了卡克奇克人首领会议，恐吓他们交出黄金，否则就活活烧死他们。卡克奇克人担心永远无法满足这些贪婪的西班牙人，而且对西班牙人的残暴更是从未怀疑过，因此他们选择在半夜悄悄地逃走，舍弃了自己的城市。 60

西班牙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伊西姆切这样一个山城之中，没有食物，或者说没有人给他们送来食物。迫于无奈，他们只好在山下的峡谷重新安营扎寨。由于卡克奇克人不断攻击，他们也未能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卡克奇克人不但在数量上远超西班牙人，而且非常聪明地设计了用草覆盖的坑，以此来杀死对方的马匹。虽然基切族和楚图希尔族（Tzutujil）的勇士们被迫站在征服者的一边攻打卡克奇克人，但是西班牙一方的形势一度极其恶化，一些士兵甚至逃到了墨西哥。又过了两年，西班牙人才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并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1527 年 11 月在阿瓜火山（Volcan Agua）的山脚下建造了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Santiago de Guatemala）。阿尔瓦拉多临时回到墨西哥，宣布他对危地马拉的征服。然而，卡克奇克人撤回大山之中，拒绝归顺于西班牙，一拖又是两年。到 1532 年，卡克奇克人终于以奴隶的身份为西班牙人做起了苦力，而伊西姆切的前统治者贝莱埃夸特（Belehé Qat）也在为奴隶主淘金的苦役中命丧黄泉。

征服者之间的争斗

他们在那儿打砸抢烧……那是地球上最富饶、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16 世纪的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修士（拉斯·卡萨斯，1992 年，第 61 页）

阿尔瓦拉多并不是中美洲唯一的征服者。当时西班牙王室再次下

令寻找通往印度之路，科尔特斯于是扩大征服范围进入了中美洲。他的头领们与从巴拿马蜂拥而上的大批征服者狭路相逢。那些人当中，有的也在履行自己的王室命令，有的则实属胡来。每个派系都对他人手中的领土控制权馋涎欲滴，甚至起过内讧。这些征服者放纵的野心和贪婪拉长了征服的时间，给本就伤痕累累的中美洲平添了数年的战乱和伤亡。

61

1524—1526 年间的洪都拉斯可以说见证了个人野心最赤裸裸的暴露。当时至少有 6 位征服者抢夺洪都拉斯的控制权。克里斯托瓦尔·德·奥利德（Cristóbal de Olid）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科尔特斯的一名头领，奉命航行至洪都拉斯湾之后，随即宣布此处为其独立的封地。为了将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杀害了亲生侄子，逮捕并囚禁了另外两位征服者。其中一位是科尔特斯派去的，另一位则持有西班牙新任国王（至高无上的罗马皇帝卡洛斯五世）的特准书。科尔特斯决定教训一下这位叛变的头领，不惜撇下位于墨西哥城的首都，穿越佩滕雨林的腹地，就此踏上了一次不同寻常的陆上远征。科尔特斯迷了路，与外界失去联系长达 6 个月之久，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等他到了洪都拉斯，发现奥利德已经被逮捕、审判并已斩首。当时另外一位巴拿马征服者和圣多明各的殖民政府派来的征服者正在洪都拉斯制造威胁，但是科尔特斯在回墨西哥之前将其解除了。1528 年洪都拉斯面临着更多的政治动荡。那一年，科尔特斯的另一位头领弗兰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 de Montejo）在企图征服尤卡坦玛雅人失败之后，向王室请求授予洪都拉斯的控制权。王室最终应允了他的请求，但是 1530 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因镇压印第安人起义从邻国危地马拉来到洪都拉斯，在此后的数年中，阿尔瓦拉多成功地挑战了蒙特霍的权威。

前哥伦布时期与西班牙的奴隶制度

玛雅人和其他印第安人自己也进行奴隶贸易，但是他们的操作办法与欧洲人的奴隶制度有些不同。在玛雅，战俘一般会变成敌对方的奴隶，小偷会变成受害者的仆人。虽然在中部美洲，奴役不是终身制的，比如小偷只要支付赔款就可赎回人身自由，但也很可能遭遇这些情况：奴隶被杀害，为的是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侍奉其主人，贵族出身的战俘通常需要为祭祀神灵而献身。玛雅人的奴隶制度并非世袭，因为法律和习俗都明确规定孩子必须得到救赎。然而，奴隶是可以用于贸易的。在一些宗教仪式当中，有钱人也的确会花钱购买孤儿以作祭祀之用。根据早期的王室法规，西班牙人只可以奴役叛乱的印第安人，和原本就被印第安人奴役的人，但是一旦成为西班牙人的奴隶，世世代代都无法翻身。虽然西班牙人不会在一些宗教仪式上挖出奴隶的心脏来，但是奴隶经常死于虐待和超负荷工作。一开始，西班牙的政策将奴隶制度合法化，目的是确保贩卖奴隶能为王室带来雷打不动的 1/5 收入。只有王室的大臣们才有权给奴隶烙印，但是浑水摸鱼的人太过泛滥，最终连同奴隶的贩卖一起被取消了。

西班牙人之间的争斗也扰乱了中美洲的其他地区。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是巴拿马城的创建者，同时也是达里恩地区的省督，他为了争夺土地和黄金，策划将巴尔沃亚处死。同时期的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修士（1992 年，第 31 页）称他为“最残酷的暴君”。佩德拉里亚斯的所作所为为冲突和暴政奠定了基础，在其之后的数年中，类似的事件在中美洲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到了 1550 年，还有两位后继者为了侵吞财产谋杀了尼加拉瓜的主教，并与西班牙对抗。 62

随着佩德拉里亚斯年龄的增长，加上担心官职不保，他向地峡北部推进，企图故技重施，伺机讨好王室。虽然其他征服者已经先他一

步拥有合法的领土权，但佩德拉里亚斯对此视而不见。比如，希尔·贡萨莱斯·达维拉（Gil Gonzáles Dávila）1522 年由王室批准对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海、往上直到洪都拉斯的丰塞卡海湾（Bay of Fonseca）一带进行了探索。他发现了中部美洲风格的城市和繁荣的市场，与地峡南部零散的茅草木屋完全不同。在尼加拉瓜，甚至发现了一个金匠聚集区。这位征服者没有使用任何威胁的手段，而是采取谈判的方式和平地获得了两位有权势的当地首领的合作：一位是尼科亚（Nicoya），在每一张现代地图上都能找到他的名字；另一位是尼卡拉奥（Nicarao），尼加拉瓜正是因他的名字而命名。这片地区的人口非常之大，保守估计超过 100 万。据说，希尔·贡萨莱斯·达维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为 32 000 名印第安人进行了洗礼。

尼科亚蕴藏的财富和丰富的奴隶资源吸引了贪得无厌的佩德拉里亚斯，于是他派遣胡安·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Juan Vásquez de Coronado）及其他代理人前往，并宣布对土地的控制权。就这样，两个西班牙人之间的战争又一次上演，但是最后佩德拉里亚斯在尼加拉瓜取得了胜利。他掌管了刚刚建立的莱昂和格拉纳达两个城市，虐待原本和平相处的各个族群。佩德拉里亚斯还想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闯进了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侵犯了阿尔瓦拉多的领土。此前，阿尔瓦拉多已经征服这片土地并宣布此为危地马拉的一部分。征服者之间的争斗再一次引发武装冲突。

中美洲的征服就是这样进行的：任何关于金银财宝或者人口密集城镇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一次又一次鲁莽的进攻；征服者们相互竞争、各自为营，将中美洲土地分割得仿若补丁，导致地峡此后几个世纪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征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高死亡率和社会混乱，甚至与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相比仍有过之而无不及。

63

奴隶贸易和印第安人的反抗

对中美洲的征服引起了印第安人频繁的反抗。地峡上的阿尔瓦拉多帮和佩德拉里亚斯帮没能像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巴拿马的巴尔沃亚

那样得到联盟军持久的效忠，被征服的民族也不甘愿一直被压制，所以对有些地区他们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征服。比如，阿尔瓦拉多 1536 年在洪都拉斯西部的乌卢亚（Ulúa）峡谷镇压了一次起义，但是那个地区的动乱愈演愈烈，持续了许多年。

动乱的原因很明显。印第安人饱受战争和流行病的摧残。而且，他们受到非人的对待、被残忍地杀害。西班牙人甚至让猛犬将他们撕咬成碎片。印第安人背井离乡，被迫到西班牙人的战场上去打仗。更何况，在中美洲，他们受奴隶贸易的蹂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

许多中美洲征服者目无王法，这一点在印第安奴隶贸易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西班牙法律规定，他们只能奴役那些抵抗西班牙统治的印第安人并在他们身上加以烙印，凡和平归顺者皆不能奴役。然而在西班牙统治的头几十年里，中美洲征服者奴役了印第安人同盟，把未加烙印的印第安人贩卖到出价最高的地方。最初，他们还从洪都拉斯湾的几个港口运送奴隶到一些岛屿上的矿藏中去干活，比如古巴、牙买加。1525 年，科尔特斯目睹了这些行径之后，大为震惊，随即要求王室下达命令召回那些印第安人。然而，印第安奴隶活着回家的案例仅有一例被记录下来，它发生在哈瓦那。当时一些印第安人偷了一艘西班牙船只，驶回了洪都拉斯。

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最恶劣的奴隶贸易发生在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海。第一批西班牙人发现那里有大量城市人口，而且他们所在的位置又很方便于船运至巴拿马和秘鲁。最后，奴隶被运到了巴拿马。当时，疾病加上佩德拉里亚斯对土著民众的非人待遇已经使巴拿马的劳力严重短缺，急需搬运工把货物从太平洋运到加勒比的港口。16 世纪 20 年代后期，佩德拉里亚斯从尼加拉瓜不断往他的前殖民地提供必要的劳动力，他发现这样做非常有利可图，有时候如果西班牙人有需要，他也提供女性。

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印第安人的维护者

西班牙人对这些印第安人从未有过任何怜悯之心，对待他们简直猪狗不如（我从一开始就在那儿，说的这些都是亲眼目睹的真实情况），甚至就像对待路上的一堆粪便——真的，我都请求了上帝，希望西班牙人能用对待畜牲的那点关心来对待印第安人。他们对印第安人的肉体和精神统统漠不关心。那么多死去的人们，他们到死都不知道有上帝存在……

——16世纪的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修士（1992年，第13页）

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84—1576）是西班牙的一位庄园主，也是美洲新大陆的一位冒险家。1510年，他目睹西班牙同胞在古巴屠杀当地人口，随后便加入了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他在有生之年一直热心游说，为印第安人争取人道待遇。他把征服中美洲过程中西班牙人犯下的种种暴行都记录了下来，希望以此唤醒王室的良知并废除奴隶制度。他甚至到征服者的土地上去劳作来抵抗他们的暴虐行为。为了减轻印第安人从佩德拉里亚斯时期开始就受到的虐待，他在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开了一个女修道院，但是于1536年放弃了。然后，他搬到了危地马拉，公开批评阿尔瓦拉多，但是没能对政策带来任何影响。直到1537年，他才说服了政府，允许多明我会以非武力的方式对现在的科万城（Cobán）附近一些反抗的玛雅人进行安抚。他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定居点，名叫贝拉帕斯（Verapaz），也叫“真正和平的土地”。一开始很成功，但是23年后以惨剧终结。当时，西班牙殖民者侵吞贝拉帕斯，不仅引起了印第安人的反抗，还有大批修士被屠杀。1542年，拉斯·卡萨斯撰写了《西印度毁灭述略》（*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一书，终于说服西班牙王室对政策进行了改革，并颁布了废除印第安奴隶制度的《新法》。

64 65 66

1532 年，印卡帝国被发现以后，西班牙人对奴隶的需求也随之升温。在驶往秘鲁的船只上由奴隶们充当船员；那些不受西班牙人信任而没被派上战场去征伐秘鲁的奴隶，也得做搬运工、矿工、仆人和情妇，直到印卡人本身也被征服和奴役为止。成百上千的奴隶被贩卖到秘鲁；具体数字尚不清楚，但是有人估计多达 50 万的尼加拉瓜人和 15 万洪都拉斯人被当成奴隶出口。然而，对奴隶的需求持续走高；船只上的条件太过恶劣，多数情况下，20 名印第安人中只有 4 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而那些到了巴拿马或秘鲁的奴隶也都活活累死。很明显，仅尼加拉瓜的印第安人口已经满足不了对奴隶的需求。于是，他们南下尼科亚半岛，北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对这些地区进行突袭以抓捕身体条件良好的成年人。

有些印第安人逃进了尼加拉瓜高地的偏远地区或者加勒比沿海和佩滕的森林里。那些留在城镇的印第安人，从遇到西班牙人的第一天起便与之抗争，那真是背水一战。最有名的一次起义发生在洪都拉斯的加勒比奴隶贸易中心，由伦卡（Lenca）印第安人的传奇领袖莱姆皮拉（Lempira）领导。1537 年，他成功地从 200 个城镇调动了 3 万名大军对抗西班牙人；他的成功鼓舞了洪都拉斯大部分地区的反抗。一年之后，西班牙人在和平谈判时暗杀了莱姆皮拉，但是在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抵抗活动仍然此起彼伏。在一些西班牙殖民地的边境地带，印第安人成功地打了多年的游击战；在一些地区，甚至打了几个世纪。

以寡敌众

我一见到他们，就下令让我的人随时待命，然后率领 90 名骑兵攻打了他们……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1524）》［麦基（Mackie），1972 年，第 15 页］

关于美洲大陆被征服，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这么少的西班牙人怎么可能打败这么多的印第安人呢？据估计，哥伦布抵达美洲的时候，

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可能多达2 500万，中美洲则约有550万。而科尔特斯最初的远征队只有区区550人；阿尔瓦拉多在危地马拉打的第一场仗，凭几百个西班牙人战胜了10 000多人的玛雅大军；巴尔沃亚则在远征迷路之后，仅凭180个虚弱的幸存者接管了达里恩地区。征服者是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切的？很多人的意见是，欧洲先进的武器让两方实力悬殊。欧洲的火枪和火炮自然比印第安人的弓箭厉害得多，但是面对如此浩荡的印第安大军，仅凭这些枪炮是否真的就能占据致命的上风呢？与装有黑曜石的击棍相比，西班牙人的钢剑杀起人来更加有效，但是钢剑远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炮和火枪数量本就不多，在攻击目标时极不可靠也是臭名昭著的。事实是西班牙人有两样秘密武器：一是疾病，常常被称为征服的“突击部队”；二是印第安人盟军，让战场上双方的人数一下子持平了，但是在官方报告中极少提及盟军。印第安人团结对外的时候，他们经常把西班牙人撵走，比如他们在巴拿马赶走了哥伦布，在尤卡坦赶走了蒙特霍。而且，阿兹特克人事实上打败了科尔特斯。在那个有名的“悲伤之夜”（Noche Triste），科尔特斯和他的部下在堤道上仓皇逃跑——在塔拉斯卡拉人的帮助下，他才得以挽回局面。

玛雅据点

那位领主［卡内克（Can Ek）］到了，大约有30人随行，分坐在五六条独木舟里。来见我，他好像兴致很高，而我也尽了地主之谊，很好地招待了他……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1525年［帕格登（Pagden），1986年，第375页］

他们不想与外来者为伍；他们不渴望基督教；他们不想交贡金。那些人，他们的标志是鸟、宝石和美洲豹，他们有三块神石，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丘马耶尔的奇拉·巴拉之书》（罗伊斯，1967年，第83页）

西班牙人的征服给中美洲带来了一场浩劫，尤其是对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是地峡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太偏僻没有吸引西班牙的注意，而且许多印第安人都逃到了那些地区，比如库纳人逃到了巴拿马的圣布拉斯（San Blas）海岸，布里布里人（Bribri）逃到了塔拉曼卡山脉，而玛雅人则逃进了佩滕。佩滕的中心地区曾是古典时期最大的玛雅城市的核心地带，但是到16世纪为止，已经被废弃了600多年。然而，佩滕并没有完全被废弃。1525年，科尔特斯为了去洪都拉斯找他手下那位不可一世的新任总督，骑马穿越了佩滕的雨林地带。途中他就发现佩滕伊察湖（Lake Petén Itzá）的湖滨有明显耕作，还发现了塔亚萨尔（Tayasal）岛国。这个遥远的玛雅据点由卡内克王朝统治，他们自称是奇琴伊察国王的后代。这里的玛雅人听说过征服者和他们在墨西哥取得的胜利，而且也清楚地知道征服者攻进了洪都拉斯；他们一定非常好奇，很想亲眼见见这些征服者。塔亚萨尔四周地形崎岖，到处是岩石凸耸的峡谷，和大片无人居住的森林，科尔特斯和他的远征队差一点就饿死了。很多马死了，剩下的几匹也虚弱得几乎无法行走。有一匹受伤的马留给了卡内克。后来，传教士发现这匹马死后被当成神像供奉了起来，叫做“蒂西明·查克”（Tizimín Chak）。科尔特斯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到过塔亚萨尔的西班牙人，在此之后的几百年里再也没人去过。然而，在中部美洲被征服和殖民化的过程中，玛雅人从西班牙的各个殖民地纷纷逃进塔亚萨尔，使其人口一下子膨胀至25 000人。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富有的王国，依照前哥伦布时期由玛雅人所控制的贸易路线，将从尤卡坦北部经由伯利兹到洪都拉斯湾的可可贸易牢牢控制在手中。虽然他们的工具中多了铁制的斧子，蒂西明·查克也被加入到诸神的行列，但是塔亚萨尔仍然遵循古老的传统，那里的抄写员用象形文字书写。这种书写知识在玛雅王国的其他地区已经失传。直到1697年，西班牙才最终征服了塔亚萨尔。

征服的后遗症

阿尔瓦拉多对中美洲北部的征服是整个地峡的写照。他控制大片土地，没有得到任何土著人帝国的辅助。对地峡的征服持久而复杂，又没有充足的经济回报。西班牙人受贪欲和个人权力的诱惑，多数情况下，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他们屠杀、奴役印第安人，甚至包括他们的盟军。为此，印第安人频频抵抗，几乎持续了整个 16 世纪。西班牙人甚至互相残杀，留下了分裂的后遗症，困扰了中美洲的整个历史。



通常把 1541 年阿尔瓦拉多之死作为征服的结束。这个日子挑得很省事，但有些随意了，因为在此之后仍有许多土著人的起义发生，而且地峡的大部分地区还未被发现。其实这么一场杂乱无章的征服，很难确定什么时候是真正的终结，但是在制度上实施控制则是很显著的一个转折点。16 世纪 50 年代前，阿尔瓦拉多等大部分著名的征服者，不是死了，就是政治上毫无作用。这么一来，王室便有机会对西班牙殖民地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加强控制。

第四章　危地马拉王国的建立
(1541—1570)

这片土地开始受到王室及其国王的管辖……各种头衔的人被派到这里，比如庭长、法官、省督①。他们依法治理城镇，还承担起宣扬福音的责任。　68

——佩德罗·德·贝坦索斯修士（Friar Pedro de Betanzos），1559年［卡拉斯科（Carrasco），1967年，第255页］

随着征服进入尾声，神圣的罗马皇帝卡洛斯五世纵然威严无比，仍免不了遇到意外的挑战。西班牙整个国家的土地面积与中美洲地峡相差无几，在人口数量上也不占优势，却要治理美洲新大陆如此广阔的领土——从秘鲁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美国。单个的征服者可以粗暴劫掠、一走了之，但是西班牙必须在这个充斥着死亡和毁灭的烂摊子上建立起一个持久的殖民地。打征服战的时候，有印第安士兵相助来打败其他印第安人；但在宗教改造方面，几百个欧洲来的神父和传教士要把信仰强行灌输给几百万讲着上百种不同语言的印第安人，这样的任务比起打仗来就微妙得多了。尽管西班牙与美洲新大陆相隔着5 500

① Governor：一译为总管，本书中统一译为省督。——译者注

英里的大洋，到16世纪末，一个即将持续300年的帝国已经建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拉丁美洲，语言、宗教、文化都被打上了西班牙的烙印，永远无法抹去。

69

危地马拉王国

那些征服者，他们公然藐视陛下您的旨意。

——佩德罗·德·安古洛（Pedro de Angulo）修士致王室的信，1545年（比尔霍斯特，1990年，第468页）

西班牙不放心由征服者来管理殖民地：他们是冒险家不是拿俸禄的士兵，正因为如此，他们太桀骜不驯、太在意个人财富、太漠视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救助。王室嫉妒他们所具有的这些优势，生怕自己的地位被篡夺，于是要求任何事情都要有三重保障方能罢休。西班牙王室创造了一个拜占庭式的古板的官僚体制，每位官员不仅要接受监督，而且是双重监督。征服者根本无法胜任这样的角色，只有老式的温和派官员才能适应。埃尔南·科尔特斯在西班牙俨然是个民族英雄，但是在征服了阿兹特克短短6年之后，也就是1528年，他就从省督一职上被剔除了。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尔瓦拉多却能管理危地马拉长达18年之久，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与卡洛斯五世的大臣是亲戚；残暴的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也与王室有所牵连，因此他也得以掌控尼加拉瓜直至一命呜呼。

由于强势征服者的长期存在，王室很难在中美洲实施起一套完整的政府体系。西班牙想对中美洲地区加以控制，但是无论他们从墨西哥还是伊斯帕尼奥拉派使者去中美洲，征服者们一概无视。1530年，墨西哥全部地区已经确立中央集权，但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仍然受命于不同的王室派别，映射出各个征服者的不同领地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纷纷扰扰的争端。各地渐渐演化出独立的管理中心，比如，在阿尔瓦拉多的首都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在佩德

拉里亚斯的首都格拉纳达、在蒙特霍的首都科马尤阿加[①]（Comayuaga），以及在最古老的殖民地——巴拿马城。

王室最终取得了控制权，试行了各种政府体制。一开始，把整个地峡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后来又将它归为由新西班牙直接管辖。边境也略有更改，现在的墨西哥东南部曾经划给了中美洲。在更迭与权力游戏中，都城也随之变化，从洪都拉斯的科马亚瓜（Comayagua）以及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Gracias a Dios）迁至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也就是现在的安提瓜。

16世纪中叶，西班牙最终建立了危地马拉王国，这一行政管理体制持续了整个殖民地时期。危地马拉王国由几大省组成：危地马拉省（包括萨尔瓦多和伯利兹）、洪都拉斯省、尼加拉瓜省（包括哥斯达黎加），和恰帕斯省（现为墨西哥的一部分）。当时的巴拿马作为连接两大洋的桥梁，不包括在王国范围之内，而成了秘鲁省督管辖区中的一个重要辖区。危地马拉王国由自己的检审庭（audiencia）或者皇家议会（royal council）来管理。检审庭名义上归新西班牙省督管辖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典型的西班牙监督机构，有权直接向王室报告。 70

征服之后，有一批全新的人来到危地马拉王国。他们头戴官帽、深受皇家青睐，并且基本上都熟习法律。这批人受王室信赖，都被委任以殖民地政府最重要的官职，包括检审庭庭长这样至高无上的职位。检审庭坐落于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为了照顾到征服者们所创建的各个独立的封地，允许每个省拥有自己的都城和省督；然而，省督也是由王室来指派的。余下的征服者，比如洪都拉斯的弗兰西斯科·德·蒙特霍等等，陡然发现自己已从要职上被除名。至此，多年来由征服者管理的历史步入尾声。 71

① 根据 Comayuaga 这一拼写，此处拟为科马尤阿加，但据译者推测，该地名应为 Comayagua，即下文的科马亚瓜。疑为拼写或印刷上的疏忽。——译者注



危地马拉王国所覆盖的地区，如今为几个国家分有，包括墨西哥的恰帕斯州、伯利兹、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不包括巴拿马。王国的首都是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现在叫做安提瓜，后来都城迁至现在的危地马拉城所在地。

西班牙对地峡的行政管理给中美洲的历史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有史以来第一次，地峡大部分统一成了单个政治实体；但仍被分割成了省，即被官方化了的征服者的个人领地，也加剧了竞争和分裂。除了自身的权势以外，王室总企图将一切都分散，因此出现了重叠的官僚体制，不仅造成管辖上的争端，而且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现在

的伯利兹一带有珊瑚礁，本是防御西班牙船只的天然屏障，但这片地区被完全忽视，以至于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在此驻扎。巴拿马被划入了南美洲，其历史进程与地峡上的邻居因此有所差异。一直到20世纪，巴拿马才摆脱哥伦比亚，得以独立。

从征服者到殖民者

一要对征服者的贡献给予报偿，二要把征服者吸引到被征服的土地上去永久定居。同时解决这两大任务的首要方法就是实施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①，即让一批印第安人以劳力和货物的方式向西班牙人进贡。在这一制度之下，很可能将一个市镇的所有人口一次性托管给单个征服者，比如，阿尔瓦拉多就对克萨尔特南戈和阿蒂特兰地区人口稠密的玛雅村落享有监护和接受进贡的权力。西班牙人把以前基切王国的首都叫做圣克鲁斯乌塔特兰（Santa Cruz Utatlan），该地区成了阿尔瓦拉多手下一个头领的独立领地，而基切省的其他地区则分给了阿尔瓦拉多的其他亲信。在尼加拉瓜，佩德拉里亚斯把一半的托管地区都归为己有。每个西班牙人都能分到土地，但是根据他们的地位有所差别：步兵受封50英亩左右的土地，骑兵得到的土地为步兵的两倍，但是两者均没有资格以委托监护制的方式分到印第安人。

委托监护制实际上也是对印第安人的一种奴役，作为交换，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s）需承担起教化印第安人的责任，使他们“文明化”，并用天主教的信仰引导他们。西班牙希望委托监护制为他们解决许多利害关系：征服者的俸禄、印第安人的宗教皈依和同化、维持殖民地所需食品的生产。在对印第安人的文明影响方面，王室很快就意识到此路不通：专门负责印第安人宗教皈依的修士曾经说过，保护及基督教化印第安人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单独住在市镇里，不要与西班牙人混在一起。

72

① Encomienda：一译监护征赋制或大授地制，规定印第安人向西班牙殖民者提供劳役、缴纳贡税，并接受教化、皈依天主教。1720年被西班牙国王下令废止。——译者注

73



该王宫位于危地马拉的安提瓜，始建于1543年。1541年，阿瓜火山的火山锥坍塌引发泥石流，掩埋了最初的定居点。危地马拉王国的政府所在地因此从阿尔瓦拉多的第一个首都迁至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也就是现在的“安提瓜”。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把这场灾难称为“一场天灾，是上帝在伸张正义”（1992年，第61页）。（照片提供：劳伦斯·福斯特）

王宫内的徇私枉法

这些官员们……坐在凉爽的树荫里收受俸禄……讨好西班牙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这也是因为他们都有女婿、大小舅子、亲戚，或者好朋友在身边。

——阿隆索·德·索里塔，1553 年（基恩，1994 年，第 218 页）

无论王室出于好意向新大陆派遣多少官员，他们在法律的实施上始终遇到各种问题，并不如西班牙人想象得那么称心如意。其中一大原因是裙带关系，可是这一点连王室本身也无法幸免，比如有些贵族有渎职行为，王室却未能绳之以法。危地马拉王国充斥着各种裙带关系。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离开都城圣地亚哥时，他的兄弟豪尔赫（Jorge）接替他成为省督。1541 年佩德罗死后，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德·拉·奎瓦（Beatriz de la Cueva）成为了危地马拉历史上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省督。不久，她在那场掩埋了都城的泥石流中丧生，由她的兄弟继位。佩德罗也将最有利可图的土地和转让权拨给其他亲戚。他依靠着这些亲戚征服了诸多省份，从中得来的战利品和土地大部分由他掌控。阿尔瓦拉多偏袒他的亲戚和他最信任的头领，其中多数来自阿尔瓦拉多的家乡——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他的偏袒使得这些人和他自己一样都成为了危地马拉的贵族：阿尔瓦拉多名下的土地、矿藏、船只、牲畜和奴隶每年产生的收入达 10 万美元；他的大小舅子的后代——奎瓦家族，拥有 1549 年危地马拉最大的委托监护权。裙带关系甚至渗透进入了以马尔多纳多（Maldonado）为庭长的第一届检审庭，他利用职位的便利为家人和党羽谋求最富裕的种植可可的委托监护权。这种做法在当时的西班牙帝国很普遍，因为官员的俸禄普遍太低。一直到第二届检审庭，这种做法仍在继续。庭长塞拉托本人

> 刚正不阿，在个人利益上从未以权谋私，但还是利用了自己的职位帮助了一些家庭成员。有些人，甚至超出了利用私人关系谋求个职位这一范围级别的徇私枉法，而影响到了法律的实施。16 世纪的法官阿隆索·德·索里塔（Alonso de Zorita）说过，裙带关系“让他们目不见睫”。对信得过的家族关系的依赖，使得政府体系最终崩溃。这样的做法也成了危地马拉王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74 中美洲的征服者几乎个个视财如命，委托监护制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求。地峡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稀疏，殖民者得不到足够的劳动力来耕作土地，经常觉得劳动力人数比他们还少。结果大片大片的地区无人居住，也不受西班牙控制，特别是从洪都拉斯东部一直到巴拿马的加勒比沿海地区。甚至在一些有足够印第安人来为殖民地生产食物的地方，有些中美洲征服者发现还是直接贩卖印第安人更加有利可图。

奴隶是早期殖民地最大的出口品。印第安人就算没有被卖掉、没有被出口，无论男女都会被强行带离家园，成堆的人为征服者淘金、挖金。在洪都拉斯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的矿井中，有半数印第安人死去。剩下的当成人力搬运工，叫做特拉梅梅（tlamemes），被迫长途跋涉。据说，阿尔瓦拉多在南美洲的一次商业活动中向厄瓜多尔运输了 8 000 名印第安人。对征服者来说，有兴趣的是劫掠和奴役，而不是殖民和管理。中美洲为此苦不堪言。

只要征服者认为奴隶贸易和开矿仍有利可图，他们就会留在中美洲。奴隶和容易挖掘的黄金资源一旦枯竭，许多征服者便扬长而去。阿尔瓦拉多自己就有一半的省督生涯不在危地马拉，而是到处远征，去寻找充满黄金的新土地、去厄瓜多尔和锡沃拉（Cibola）那样遥远的地方（位于现在的美国西南部）。那些留在中美洲的征服者躲在他们的大庄园内，饲养欧洲的牲畜、耕种欧洲的农作物，尤其是小麦。有一部分人出口原始牛皮和美洲很了不起的产品——可可，从中赚得了可观的利润。征服者这个冒险阶层的离开，就算不能带来其他任何

好处，至少能让中美洲社会更加稳定一些。

殖民地的美洲居民：梅斯蒂索人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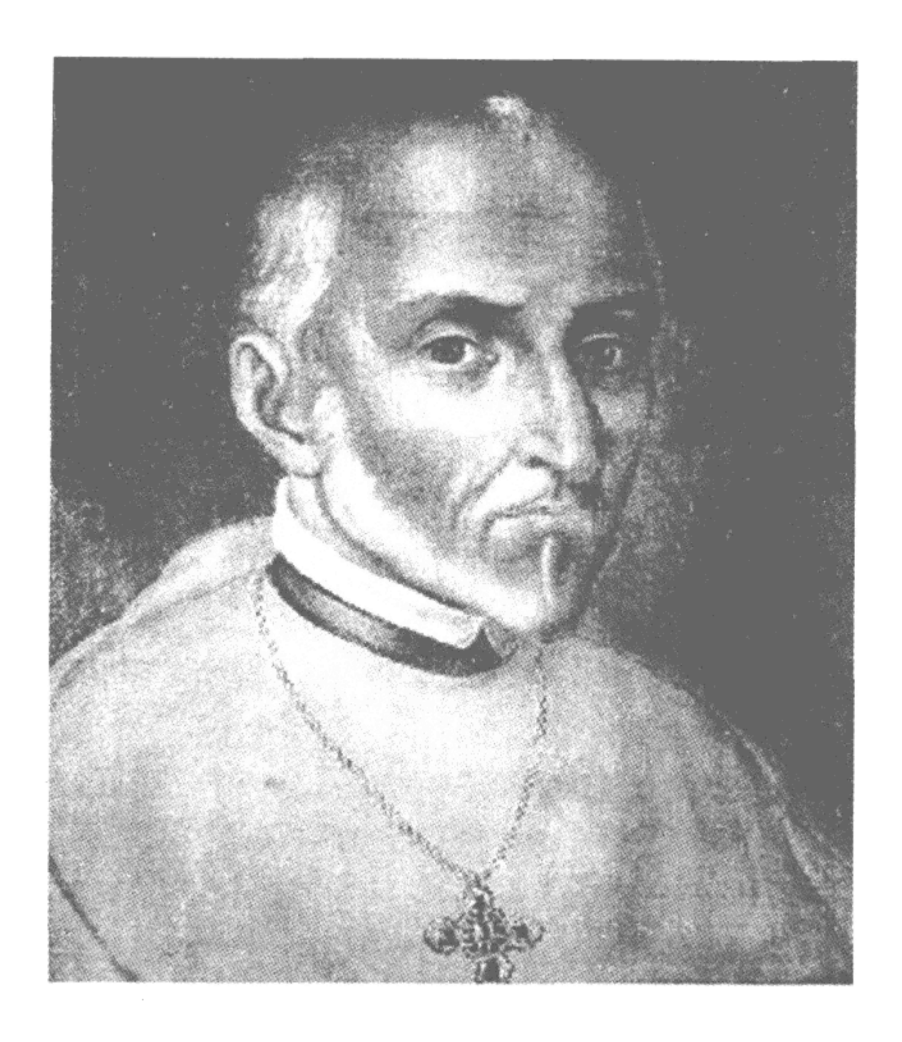
家庭和殖民地定居点一样关键，但是早期几乎没有女性从西班牙来到美洲。科尔特斯分发奖金，鼓励士兵们把妻子带到新西班牙来，但是很多士兵还是没那么做。所以西班牙男性大多在印第安女性中挑选配偶，但都不长久，而且往往不是心甘情愿。据克里斯托瓦尔·德·佩德拉萨（Cristóbal de Pedraza）主教观察，在洪都拉斯的所有西班牙人中，只有10位没有情妇。一个全新的种族就此诞生：梅斯蒂索人，在危地马拉也叫做拉迪诺人（ladino），即父母双方为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一个混血人种。路易莎·西科滕卡特尔（Luisa Xicotencatl）是特拉斯卡拉族的一位贵族女性。她的父亲为谋求和平将她送给了征服者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另有黄金作为嫁妆。路易莎跟随阿尔瓦拉多来到危地马拉。他们的女儿名叫莱昂诺拉·德·阿尔瓦拉多（Leonora de Alvarado），出生在乌塔特兰城外的一个军营里，也许是危地马拉第一个梅斯蒂索人。天主教鼓励征服者们与印第安情妇结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下一代才能合法，才能当成基督教徒来养育。卡洛斯五世曾经给尼加拉瓜的主教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一位名叫多尼亚·阿纳（Doña Ana）的女性正从欧洲回去，她是某位印第安土著领袖（*cacique*）的女儿，建议主教帮她找到一位体面的西班牙籍丈夫。

大多数征服者选择不去理会这样的建议。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认为，还是与比阿特丽斯·德·拉·奎瓦（Beatriz de la Cueva）结婚更为合适，因为她是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公爵的侄女。不过，阿尔瓦拉多的梅斯蒂索女儿（莱昂诺拉）还是能生活在首都的西班牙人社区里，住得上漂亮的房子。有些出身名门但后来穷困潦倒的西班牙人，通过与多尼亚·阿纳这样的印第安贵族女性结婚，在经济上确实得到了不少的回报，有时候这样的婚姻还能帮他们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那就更划算了。征服后的初期，许多梅斯蒂索儿童无论其

地位合法与否都为西班牙社区所接纳，但是绝大多数混血儿还是流入了印第安城镇。后来，很多梅斯蒂索人发现不管是印第安社会还是西班牙人的世界，都无法轻易融入。在首都圣地亚哥，梅斯蒂索“孤儿”的数量持续增长，让马罗金（Marroquín）主教忙得不可开交。到了世纪中叶，更多的适婚女性从西班牙来到殖民地，比如新官僚的姐妹、表亲、女儿等等。然而，梅斯蒂索人的数量依然成倍增加，直到在绝大多数城市中都变成最大的群体为止。最后，梅斯蒂索人在整个中美洲都是最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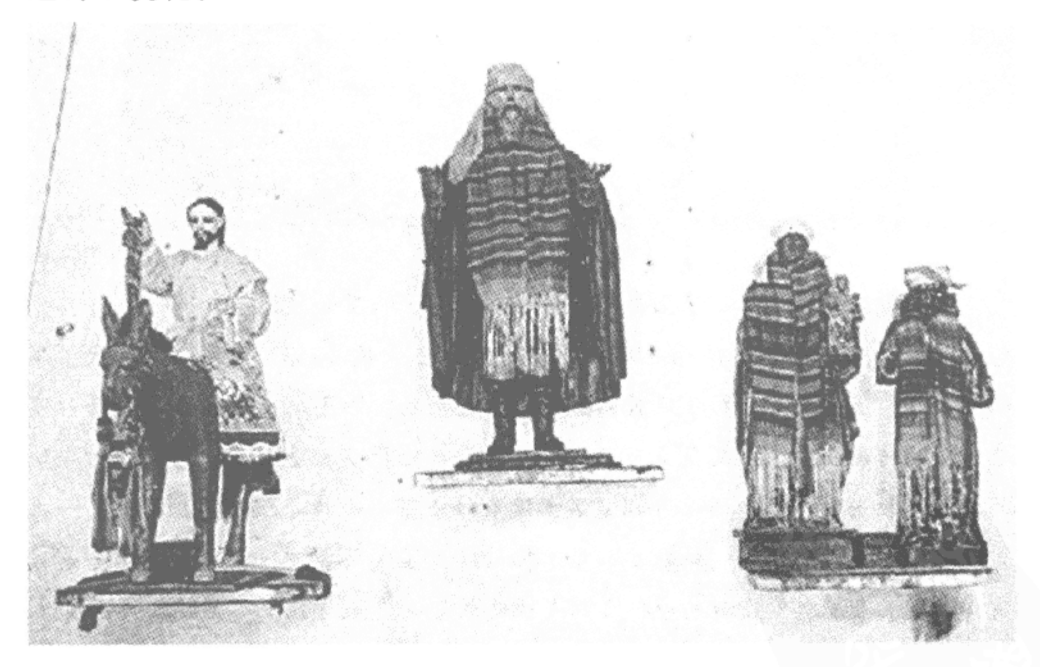
托钵修士

在哥伦布的第四次航海中，有部分天主教的神父随行。1502 年，他们在洪都拉斯做了中美洲的第一场弥撒——的确也是美洲大陆的第一场。神父们捣毁了神像，为印第安人洗礼。很显然，他们的立场与同行的征服者是一致的。然而，卡洛斯五世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君主，对待自己所担负的天主教牧师的角色非常认真。所以征服之后，他决定将拯救印第安民众的任务托付给托钵修会，而不交给既非宗教又非僧侣的教堂统治集团（church hierarchy）。16 世纪，多明我会的修士（the Dominicans）、方济各会的修士（the Franciscans），以及施恩会的修士（the Mercedarians）肩负起了一项光荣的任务，那就是把基督教的信念教授给中美洲的各民族。后来，奥古斯丁会的修士（the Augustinians）和耶稣会的修士（the Jesuits）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图为危地马拉的第一位主教——弗兰西斯科·马罗金（Francisco Marroquín）。弗兰西斯科·马罗金担任危地马拉王国的第一任主教（1537—1563），取代了军队的牧师，成为西班牙殖民地首屈一指的宗教人物。他要求让更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去危地马拉，而且，如果有需要他愿意负责旅费。因为当时危地马拉的传教士太少了，1542 年以前甚至没有修士可以去指导阿尔瓦拉多的第一批盟友——卡克奇克尔人。他在首都为孤儿们建立了一所学校，还成立了第一家医院和大学。马罗金对宗教的诠释可以说既非最好也非最坏。他尽力阻止对土著人口的一切非人虐待，还邀请拉斯·卡萨斯去安抚住在贝拉帕斯的玛雅人。然而，他支持印第安奴隶制度，为反对其结束竭力奔走，同样也是兢兢业业。这可能是因为他与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等委托监护主是私人朋友。马罗金在危地马拉生活了 33 年，颇具权势。其中一小段时间，他甚至同时担任了主教和总督。（图片临摹自危地马拉城大教堂内的肖像）

77 总体来说，修士比非宗教（世俗）的教士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支撑他们的是简朴的生活作风，而不是委托监护主那俗不可耐的社会。他们把理想主义和传教的热情带到了新大陆。其中很多人都相信千年至福（millenarians），相信印第安人的皈依能够带来基督的重生。他们在印第安社区里建造教堂和女修道院，效仿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或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有些修士被派到其他人不敢去的偏僻地区，比如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和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洪都拉斯东部最遥远的区域和巴拿马的达里恩。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半游牧印第安人非常贫穷，对征服者来说毫无吸引力，而修士们则愿意安抚这些印第安人，尝试着把他们基督教化。为此丢了性命的修士数不胜数，其中有一些是按照前哥伦布时期的祭祀习俗被挖了心。幸存下来的修士为成千上万个新的信徒进行了洗礼。



圣人，位于危地马拉阿蒂特兰圣地亚哥的圣托马斯教堂（Church of Santo Tomas）内。他们自己也打扮成了玛雅村民的样子。［照片提供：内奥米·史密斯（Naomi Smith）］

印第安救星

征服后不久，在这个王国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听了修士所说的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圣彼得，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事迹之后，出现了一个墨西哥印第安人，他是一个伪先知……这件事在印第安人中间闹得沸沸扬扬，整个王国都差一点因此断送，因为他们开始想象我们的神圣福音早就没什么新鲜的了。

——弗兰西斯科·希梅内斯神父（Father Francisco Ximenez），1700年（卡马克，1981年，第301页）

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接受宗教皈依。地峡南部的许多半游牧印第安人拒绝住在传教区的村落里，因为那里的修士整天盯着他们。像这样的新定居点很少有成功的。格雷戈里奥·德·蒙塔尔沃（Gregorio de Montalvo）主教认为，印第安人远离家乡时终因忧郁而死（纽森，1986年，第242页）。特别是在加勒比沿海，以及佩滕腹地和哥斯达黎加的高地，印第安人维持着不受教会和王室干扰的状态。一位修士在被愤怒的印第安人赶走之后，不无诧异地观察到，印第安人只有这样才能"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生活"（琼斯，1983年，第78页）。在西班牙控制更紧密的地区，出现了一些土著宗教的反抗。在乌塔特兰，有基切族的祭司指出印第安人祖先的教义与基督教修士的教义互不相容，对天主教所宣称的任何权威都表示怀疑。当地的祭司号召大家抵抗修士。在乌塔特兰，事态恶化，演化成了上文中希梅内斯所叙述的暴乱。

许多修士都发誓一世清贫，新西班牙的第一个方济各会强调了修士与征服者之间的差别：有12名传教士，他们身上习惯性地披一块简单的布，从贝拉克鲁斯（Veracruz）海湾的一个港口赤脚走到了墨西 78

哥城。早期的传教士致力于拯救灵魂、保护印第安人，他们发现自己的立场与西班牙殖民者和政府权威严重分歧。拉斯·卡萨斯一度被吓得考虑过放弃布道。尼加拉瓜的主教安托尼奥·德·巴尔迪维索（Antonio de Valdivieso）由于对印第安人受省督虐待一事表示不满，被暗杀了。甚至连一贯支持殖民者的危地马拉主教马罗金也曾遇刺。洪都拉斯的主教佩德拉萨担心殖民者会像"街上的狗"一样对待他（舍曼，1979年，第51页）。他虽没有受到肉体上的伤害，但是在保护印第安人的过程中，他经常使用作为一个神父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绝罚（excommunication）。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大公无私：有个名叫布拉斯·德·卡斯蒂略（Blas de Castillo）的修士，当他旅行到尼加拉瓜最活跃的一个火山口时，错把岩浆当成了融化的黄金，立马显露出了人类最常见的本性——贪婪。

79

精神征服

印第安人随时可接受洗礼的态势，让修士们忙得不知所措：征服后的头几年，新西班牙就有成千上万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刚开始，为了挽救尽可能多的灵魂，几名传教士不得不走遍新西班牙。到了1600年，危地马拉省也只有42名传教士。他们依靠土著劳动力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石器刀具建起了教堂和女修道院，开始改造印第安世界。

修士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印第安人沟通。很难想象在早期的大规模洗礼中，修士和印第安人之间究竟交流了些什么。有一部分印第安人被训练成了翻译人员，其他人（一般都是玛雅贵族）则学会了用拉丁字母读写。但是，修士们仍想取得更进一步的理解，于是他们自己开始学习土著语言。在拉斯·卡萨斯传教的贝拉帕斯（Verapaz）地区，共有7种玛雅语言；都城圣地亚哥周边地区，除了若干玛雅语之外，还讲墨西哥的纳瓦特尔语和萨波特克语。所以对修士来讲，永远也学不够。因此，他们让印第安贵族学习西班牙语，希望这些人能够像样地把自己的语言教给当地人。就这样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将基督教的教理从西班牙语较为准确地翻译成各种土著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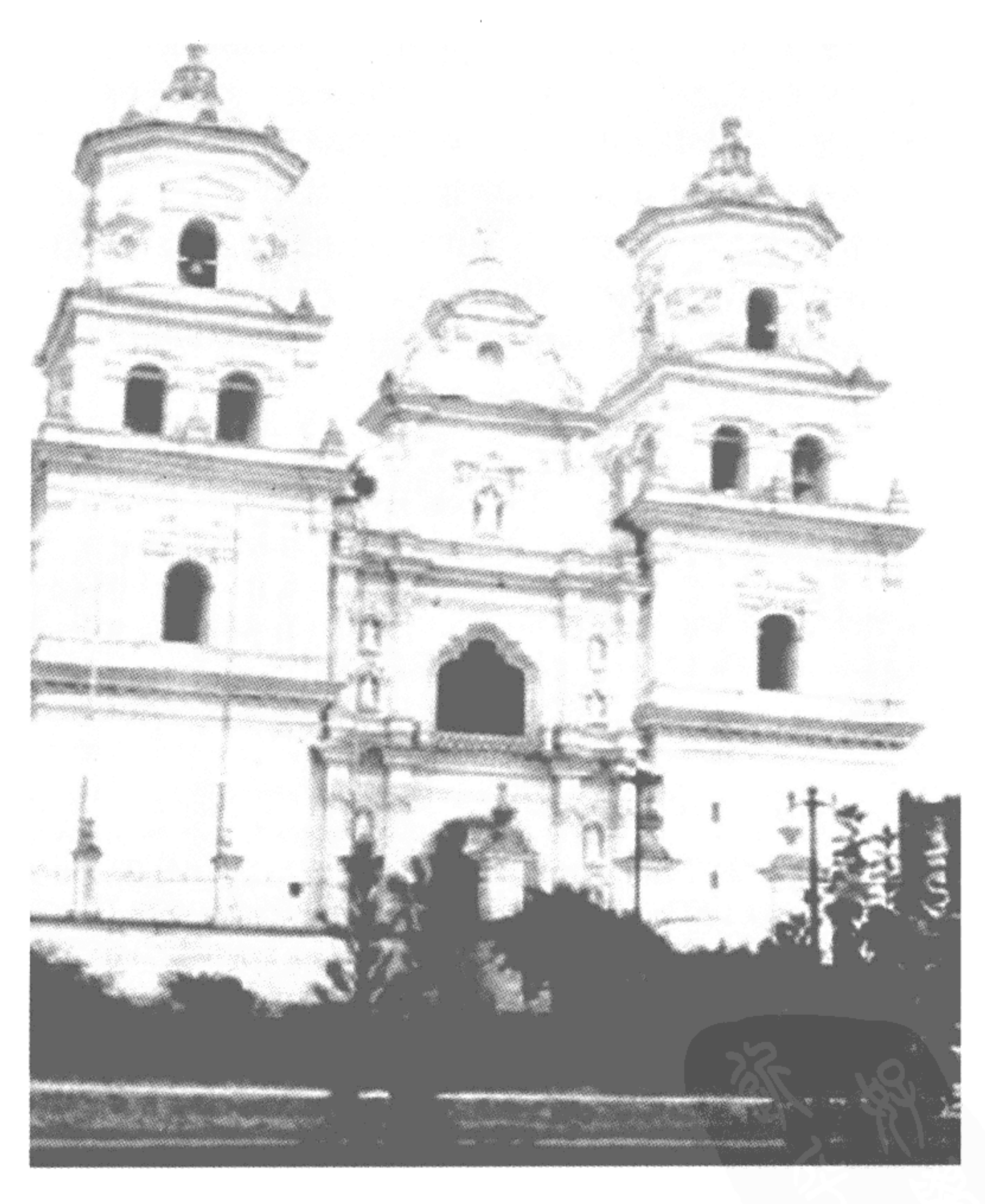
交流上做不到很细致，却造成了非常明显的后果：比如，玛雅人总是很容易接受天主教，因为天主教与他们自己的宗教看起来很相似——虽然有时候，这种相似恰恰被用来抵御天主教的信仰。十字架代表着他们的万物之树，是与来世进行沟通的渠道；基督牺牲的故事让他们想起了玉米神的牺牲和复活；而施洗约翰的斩首，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熟悉的一种牺牲方式。一年一度的节日与玛雅人的习俗相近，而且印第安人也会抬着神像按特定仪式的方位走动，也会烧香，所以对天主教的仪式过程并不陌生。印第安人对天主教的这些方面非常拥戴，而且贵族成员很愿意领导那些为某个圣人而设的宗教团体组织。这让修士们很是高兴。

中部美洲的天主教

那座教堂孤单地矗立在一片荒芜之中，显得十分壮丽，简直是个迷人的作品。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1839 年（第一章，第 169 页）

1578 年，印第安人的祭礼被废除。乔尔蒂人（Chorti）的一个玛雅城镇叫埃斯基普拉斯（Esquipulas），那儿有一个圣泉，传说自征服前开始就有治疗的功效。人们在圣泉的上面建了一个基督教堂。几年后，该镇为教堂专门做了一个雕像，被称为埃斯基普拉斯之神（El Senor de Esquipulas），或者黑基督。黑基督很快就因为他的神奇疗效而名震四方。据斯蒂芬斯报告，每年有 8 万朝圣者聚集在埃斯基普拉斯，其中一些来自遥远的秘鲁。在新墨西哥的奇马约（Chimayo），还有另外一座神庙，据传也有神奇的疗效。1737 年，天主教正式认可了埃斯基普拉斯之神的威力。为了答谢每年来教堂朝拜的成千上万名朝圣者，教皇于 1961 年荣升它为中美洲的第一大教堂（Basilica）。



埃斯基普拉斯大教堂（Basilica of Esquipulas）（照片提供：危地马拉旅游学会、危地马拉贸易委员会）

修士作为民族志者

这个叫基切的地方，是古文字的起源地。我们应当在这里刻下、植入古文字……我们应当写写基切的故事，虽然如今这里已被上帝的道义、被基督教徒所包围。

——《波波尔·乌》（特德洛克，1985年，第71页）

修士们急于发现是否有印第安人退回到原有的宗教，于是尝试着去了解前哥伦布时期的神和习俗。在尽力根除他们眼中的异教徒的过程中，他们记录了种族历史方面的信息，对今天来说，非常宝贵。有大量关于征服前的宗教习俗的材料被记录下来。传教士还对一些看起来很像翻版《创世纪》的土著神话加以注解。玛雅人的许多法典到了1540年的时候仍然存在。拉斯·卡萨斯称它们是以“图形和符号”写成的，还称其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我们的书写体系不具备多少优势”（卡马克，1973年，第13页）。拉斯·卡萨斯还说过，那些修士把书都烧毁了，“因为那些书似乎是讲宗教问题的”（卡马克，1973年，第173页）。尤卡坦的迭戈·德·兰达的确曾经烧过这类书，他也记录过大量关于新人教的玛雅信徒的资料，20世纪对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解也得益于从中找到了关键信息。

传教士也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印第安人的信仰方面的知识，来促成印第安人改宗。在一些印第安贵族学校里，比如由洪都拉斯的主教佩德拉萨（Pedraza）建立的那所，传教士先为印第安统治者灌输信仰，希望通过统治者在民众中间引起相似的投入。他们把当地的传说重新解释成圣经故事；让前哥伦布时期的神圣历法生搬硬套基督教纪念各个圣人的节日；把春秋分时的礼仪吸收进了复活节；而为纪念先祖所进行的土著仪式则成了万圣节的一部分，这一习俗以亡灵节（Day of the Dead）的身份延续至今。一些主要的印第安人朝圣的神庙变成了天主教堂。印第安人和传教士在处理各自的宗教习俗时，都顾及到对方。渐渐地，他们创造了所谓的“中部美洲天主教”。

82 也许，修士们在无意中留下了种族历史方面一部分最伟大的遗产。他们教会了许多玛雅贵族用西班牙语读写。之后，印第安人自己的语言也开始以拉丁字母来写。随着懂得征服前书写系统的印第安人越来越少，象形文字逐渐被拉丁字母所取代。玛雅的抄写员害怕圣书中包含的知识就此丢失，用欧洲的字母重写了这些圣书，然后小心地藏起来，不让西班牙人发现。在索洛拉（Sololá），卡克奇克人的统治者洪·伊克（Jun Ik'）的孙子弗兰西斯科·埃尔南德斯·阿拉纳（Francisco Hernández Arana），记录下了现在所知的《卡克奇克人史》（*Annals of the Cakchiquels*）的大部分内容。在他1582年去世之前，另一位王室成员弗兰西斯科·迪亚斯（Francisco Díaz）接替他撰写这部编年史。西班牙人直到17世纪才意识到这本史书的存在。16世纪中叶，乌塔特兰统治者的后代也把基切语用拉丁字母记录了下来，成就了有名的玛雅书籍《波波尔·乌》。这本书也是一直被藏匿，但1701年还是被一位西班牙教士发现了。幸运的是，他没有把书烧毁，而是保存了这一伟大的著作。

尽管被征服、宗教上接受改变，但是新大陆上的很多种族依然顽强地坚持他们自己的传统。有些人很幸运，能够住在离世代居住的家园不远的地方，四周仍然被神圣的大山和洞穴所围绕。这些山和洞穴几千年来一直是他们身份的象征。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印第安人，仍然会纪念祖先的神灵和生命的活力，因为他们的世界总是因此而充满生机。今天的中美洲，从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到巴拿马的库纳人，全都虔诚地奉行基督教，但是中间无疑添加了美洲新大陆原有的信仰和习俗。

印第安人数的下降

他们（印第安人）是这片土地的支柱；如果他们消失了，一切都完了。

——阿隆索·德·索里塔（Alonso de Zorita），1553年（基恩，1994年，第243页）

第二个阿霍日（II Ahau），那些强有力的人从东方来到这里。就是

他们，第一次把疾病带到我们这片土地——这片属于玛雅人的土地……

——《丘马耶尔的奇拉·巴拉之书》（罗伊斯，1967 年，第 138 页）

印第安人口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前哥伦布时期繁盛一时的港口，比如加勒比沿海的纳科港（Naco），1530 年有 10 000 个男性印第安人，但 1539 年只剩下 250 人。短期内也未见回升：到了 1586 年，纳科仅存 10 个男性印第安人，几乎成了一座鬼城。 83

奴役、战争和社会混乱都造成了重大伤亡。再加上西班牙人所到之处，流行病横扫印第安人社区。他们把欧洲的疾病传播到印第安人中间，天花、麻疹、腮腺炎，或者水痘，这些疾病印第安人从未见识过，更不用说肺鼠疫、淋巴腺鼠疫、伤风和疟疾了。1545 年，肺炎型鼠疫大爆发，持续了 3 年之久，袭击了新西班牙的各族人民。在危地马拉，这次大流行病被叫做古库马兹鼠疫（Gucumatz Plague）。它给人口原本就濒临崩溃的热带雨林低地地区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危地马拉高地上的人口原来略微充足，但也因这场流行病大大减少。

古库马兹鼠疫不是第一场流行病，当然也远远不是最后一场——1558 年另一场流行病如约而至，还有其他一些疾病在该地区反复肆虐。1804 年，王室尝试着让民众对天花免疫。在此之前，一直未采取任何防御措施。这种流行病之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饥荒，因为几乎无人能到土地上劳作。到了 18 世纪，在偏远地区，传教士与疾病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印第安人会尽量与神父们保持距离，还会当着他们的面咀嚼烟草叶，希望这样能够让自己免受感染。

印第安人口的减少（单位：人）

年份	1500 *	1548	1570
中美洲 * *	5650000	不详	550000
危地马拉 * * *	1500000	不详	180000
尼加拉瓜	500000	44500	26000
洪都拉斯	800000	不详	40000
基切城镇	50000	5000	不详

*直到16世纪后期才有官方的人口统计，但那时候土著印第安人口已经大大削弱，所以为征服时期重新估计的数据差别很大。本表中的数据为适中的估计，基切城镇数据来源于罗伯特·卡马克（Robert M. Carmack）；中美洲数据来自威廉姆·德内万（William E. Denevan）；尼加拉瓜数据来自默多·麦克劳德（Murdo MacLeod）；危地马拉数据来自韦斯特（West）和奥吉利（Augelli）；洪都拉斯的数据估计得较为乐观，来自琳达·纽森（Linda Newson）。
**该数据不包括巴拿马。
***该数据包括圣萨尔瓦多。

84　人口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殖民地中对劳动力的滥用。比如，玛雅人和中部美洲的印第安人搬运货物靠背来驮，西班牙人把这种搬运工称为塔梅梅（tamemes），这一叫法来源于阿兹特克人的特拉梅梅[①]（tlameme）一词。这些搬运工在额头挂一根草绳，以此来负重。在当时的那个世界，既没有驮畜也没有带轮的车辆，这是陆上运输的唯一方式。但是西班牙人在使用这些搬运工时把征服前的规矩都破坏了。首先，他们没有为印第安人的劳动支付报酬，而是把印第安人当成奴隶对待。第二，他们强迫特拉梅梅过度负重，比前哥伦布时期允许的重量多出3倍，而且运输的路程也比以前远得多。从高地到热带雨林，单是气候变化就夺走了很多印第安人的性命。连老妪和孕妇都不得不背着75磅的重量爬山。在中美洲，缺少马路和车辆的状态持续了几个世纪，所以尽管16世纪的时候特拉梅梅已经被明文禁止，他们一直都没有消失。甚至驴子等驮畜的出现，也未能消除特拉梅梅。19世纪中叶，探险家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说过，坐西利亚（silla）翻山越岭是司空见惯的。所谓西利亚就是“印第安人用背扛的一把座椅”（1969年，第2

① 本书在讲到印第安搬运工时有多种说法，包括西班牙语的tameme，阿兹特克人的tlameme，作者有时也使用tlalmene。——译者注

章，第 269 页）。

人力的损失对殖民地的影响很大，印第安人自己所受的折磨就更不用说了。政府修建城镇、马路、港口都需要劳动力。修士和世俗的教士也需要当地的工匠来建造、装修教堂，还需要人充当唱诗班成员，需要人在修道院里打杂。委托监护主想让印第安人种地、为他们在城里的住宅供应食物——他们还指望着印第安人替他们建造住宅。随着人口不断下降，奴隶贩子发现很难再集中足够的奴隶来挣钱，开矿者不得已只好花钱雇非洲奴隶来干活。到 1570 年为止，生活在危地马拉王国的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有 10 000 人，但是这个数量还远不够维持殖民地。一部分是因为王室对奴隶的人数有严格的限定，另外也有成本的问题：雇一名非洲奴隶需要 200 比索，一名印第安男性需要 15 比索，而一名委托监护的印第安人则不用花一分钱。

对劳动力和税收的要求没有随着人口的减少而下降，而人数越来越多的梅斯蒂索人是根本不需要进贡的。因此，随着印第安人人数的减少，每一个印第安人承担的贡赋就更重了：塞拉托庭长表示，就算 1548 年的时候印第安人的数量翻倍，他们依然连贡赋数额的一半都付不起。有些人不堪重负，只好离开家园，从此逃亡；有些人则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更糟糕的是，印第安人控制下一代的出生，所以也未能使人口有所增多。许多省份的印第安人实行禁欲，而在尼加拉瓜有时他们宁可把婴儿杀死也不愿意让他们成为奴隶而慢慢等死。出生率不断下降，到了世纪末，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口数量减少了 90%：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人口统计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85

印第安统治者

他有专人替他看马，有人为他钓鱼，还有人为他的房子供应木材……

——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约为 1630 年（1985 年，第 202 页）

并不是所有印第安人都经受了同样的煎熬。恰帕斯有一位叫堂·贝尔纳维·德·古斯曼（Don Bernabe de Guzmán）的玛雅人领袖，他所过的生活对于后征服时代来说，可以说出奇的优越。他和其他印第安贵族一样，由于贵族地位受到认可，享有一定的优先权。当时只有印第安贵族才被允许穿得和西班牙人一样，使用西班牙绅士的称谓——堂（Don），平民百姓则不行。也只有贵族才能养马、佩剑，才能拥有土地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奴。他们从修士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有些人甚至行至欧洲觐见了菲利普二世。据多明我会的神父弗兰西斯科·西梅内斯（Francisco Ximénez）透露，圣克鲁斯·乌塔特兰（Santa Cruz Utatlán）的基切族国王胡安·德·罗哈斯（Juan de Rojas）在 16 世纪权盛一时，以至于安提瓜的王宫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接待室。当然，特权是有代价的。西班牙需要利用当地贵族世代承袭下来的权威和公信度去控制印第安人。伊斯金·尼海夫（Izquín Nijaib）是莫莫斯特南戈地区（Momostenango）的基切族统治者，也是对战阿尔瓦拉多的首领，他在印第安民众转化为基督教的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印第安统治者负责维持和平，把信徒聚集到教堂，征集贡品和税收；作为交换，他们自己被免去了交付贡品和税收的义务。但是，土著民族的贵族总体来说境况不济。甚至连堂·贝尔纳维每天都需要提醒自己面对现实。因为，尽管他有那么多仆人，可是据盖奇所说，他自己“随同、伺候住在邻镇的修士……除了修士应允的，什么都不敢做……”

对变革的反抗

86

王家法官自己都有两三百个奴隶，印第安奴隶怎么可能获得自由呢？……再说了，塔梅内[①]（tamenes，即印第安搬运工）怎么可能取消？法官自己就有800名塔梅内在矿井里为他干活，甚至连他的狗都要塔梅内来抬！

——阿隆索·洛佩斯·德·塞拉托（Alonso Lopez de Cerrato）致王室的信，1548年（舍曼，1983年，第188页）

殖民者同意了，必须得采取一些行动。有些人争辩说，有必要在哥斯达黎加和佩滕地区再次展开征服和偷袭，以获得奴隶。其他一些人在利用劳动力上变得谨慎了一些，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虽然高地上的印第安人口死亡率也非常之高，但总人数已很庞大。佩德拉萨主教自己动手处理问题，这样一来检审庭成员"就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舍曼，1979年，第90页）[②]"，而且他重新估计了洪都拉斯印第安人的贡品数额。然而，影响最深远的还属拉斯·卡萨斯主教，1542年他说服西班牙颁布法律，使印第安人免受虐待并且摆脱奴隶制度重获自由。殖民者抵制这些所谓的《新法》，有时候甚至动用武力。据拉斯·卡萨斯的观察，这些委托监护主根本不想接受任何限制他们的地位和财富的条款。在恰帕斯，殖民者把拉斯·卡萨斯从他的教区驱逐出去；在奴役和虐待最严重的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殖民者公然反抗王室。

王室也遇到了温和一些的抵抗。检审庭的第一任庭长阿隆索·马尔多纳多（Alonso Maldonado）就参与了很多违反《新法》的事情。议会的许多法官拥有矿井，还有奴隶在矿井上工作。王室的官员与殖民者之间除了在商业机会上互通有无，还有别的关系：比如，马尔多

① 上文中提到西班牙把这类印第安搬运工称为tamemes，此处的tamenes疑为印刷或拼写上的疏忽。——译者注

② 原文为Sherman 979，90，此处疑为1979。——译者注

纳多庭长就是弗兰西斯科·德·蒙特霍的女婿，而且同情委托监护主。

就算不牵扯私人利益，官员们也害怕一旦法律强制实施，殖民者会放弃殖民地。马罗金主教担心没有新的殖民者愿意到他的地区来，主张逐渐进行改革。他的顾虑得到了证实。《新法》让一些委托监护主遗弃了恰帕斯和洪都拉斯的土地；一些地区，比如哥斯达黎加边境的偏远村镇几乎未被征服，在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就放弃了；首都的西班牙人数下降了1/3。殖民地中的欧洲人口有任何减少都引人担忧：1570年，只有15 000个欧洲人仍在危地马拉王国。

87

世纪中叶的改革：塞拉托庭长

很快，淘金热停止了，进贡男孩、女孩的行为也被勒令禁止。很快，火焚、绞刑等处决方式也结束了……尊敬的塞拉托先生切切实实地缓解了人民的痛苦。

——《卡克奇克人史》（雷西诺，1953年，第20页）

西班牙王室顶住了殖民者的反抗，1548年，终于把廉洁的阿隆索·洛佩斯·德·塞拉托派到了危地马拉王国，开始实施《新法》。这是第一次由王国内官衔最高的官员支持传教士结束印第安奴隶制度。塞拉托年事已高并且患有疾病，他其实已经请求退休，希望从西印度回到西班牙。但是，他不但没能回去，还以60岁高龄成为检审庭的第二任庭长。从1548年到1555年，他生命中这接下来的七年时间，他以饱满的热情推行《新法》。但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在巨大的敌意中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而且与他绝大多数的同事相反，他连死时都一贫如洗。

塞拉托到这里的时候，奴隶贸易最恶劣的年份已经过去，但所见所闻还是让他深深不安。据他估计，土著人口中有1/3被奴役，而第一届检审庭的贪官们根本没有保护印第安人。他以私人的名义放了5 000名奴隶，而且大刀阔斧地减轻了对印第安劳动力的剥削。根据法律规定，因为当时没有适用于陆地搬运的道路，使用特拉梅梅这一做法是不能消除的，但是塞拉托的确为印第安人的劳动争取了报酬，还

对负重、离家的远近等做了规定。他把印第安人的贡品数额减半。还联合修士和殖民者把印第安人聚集到大一点的村落，这样他们才能受到更好的保护，也更容易被“文明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虐待都能得到消除，尤其是在一些他看管不到的偏远地区。然而，塞拉托的确为许多印第安人改善了生存环境。

88 尽管殖民者有种种反对，塞拉托证明了改革是可能的。印第安人的反抗渐渐平息。检审庭的其他官员，比如备受尊敬的阿隆索·德·索里塔也努力学习他的刚正不阿。西班牙人发现，去哥斯达黎加抓捕奴隶的请求被拒绝了或者被密切监管了。印第安人发现，他们请求解脱的诉求将要实现了。不管在实施过程中有多么不完美，进步是实实在在的。最后，殖民者说服了王室撤换了塞拉托，派了一位不那么激情四射的庭长。短暂的理想主义时期就此结束。不过，在此之前，王室政策得以有力实施，政治上也得以稳定。

西班牙控制了一个帝国

16 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统一成了一个帝国，而且扩张到了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于 1564 年在高地上建立了首都卡塔戈（Cartago）。虽然不是每个地区或角落都被殖民化或者受保护——或者被勘探，但是西班牙已经实行了一套官僚体制的政府系统，不再是从前的个人统治，而且还部分实施了在贡赋和对待印第安人等方面的王室法律。成千上万的土著民众变成了基督教徒，前哥伦布时期那些国王的后代也接受了洗礼，并取了胡安·科尔特斯（Juan Cortes）、迭戈·佩雷斯（Diego Perez）这样的名字。

89 西班牙人取代了征服前首领的位置，站在社会最顶层进行管理。但是，在社会最高层以外，16 世纪的风俗社会因土著人民而得以留存。西班牙人在印第安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定居，基本上都在属于中美洲的中部美洲地区：危地马拉高地和太平洋沿海。西班牙人所控制的世界，只能通过已有的印第安人等级制度和印第安劳动力而存在——印第安首领收集税款、印第安劳动力建造市镇厅、装饰教堂、为殖民地市场

供应食物。甚至连最赚钱的贸易也是通过前哥伦布时期的路线，和印第安搬运工特拉梅梅来完成的，而且集中贸易的是印第安人的产品，比如可可。

16 世纪末期，中美洲已经俨然成了欧洲殖民地。从民族构成（越来越多的梅斯蒂索人和非洲裔美洲人）到铁制工具和漫步在稀树平原上的牲畜，都可以看出中美洲已经变了。了解前哥伦布世界的印第安人已经灭绝，取而代之的儿孙辈印第安人只知道西班牙的规矩。征服者的后代同样也是出生在一个与父辈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欧洲。最初的那种发现新大陆的兴奋渐渐消逝：神父们失去了热情，王室开始关注银子甚过救世传道。甚至连印第安人自己的反抗都停止了。殖民地已经建立。



第五章　殖民地的生活

要是没有印第安人或者印第安奴隶贸易，西班牙就无法维持它的辉煌，因为没有银子可以献给陛下，给大臣们，给每个人……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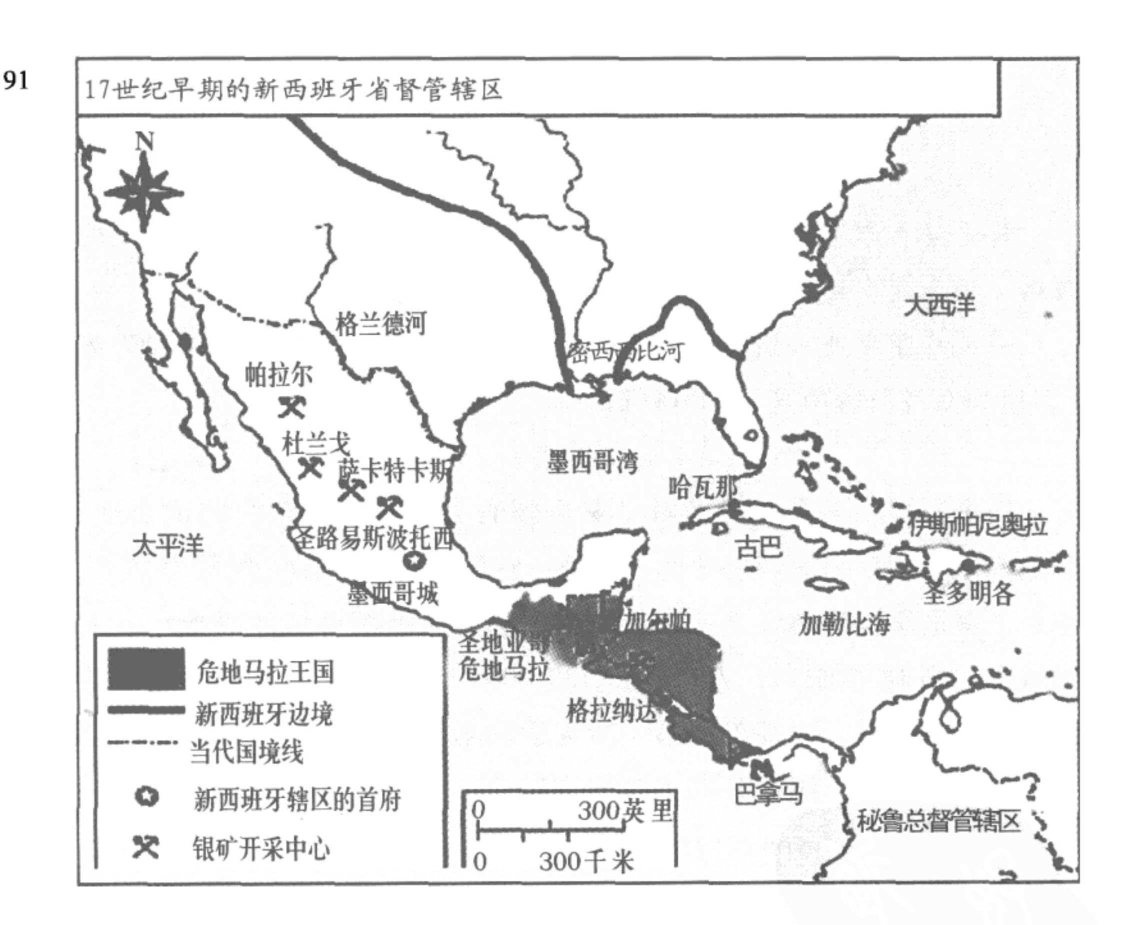
——马尔克斯·德·巴里尼亚斯（Marqués de Variñas），1687 年（斯坦和斯坦，1970 年，第 44 页）

西班牙按照各个殖民地对皇家金库的贡献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危地马拉王国作为新西班牙的一部分，它所在的地区在美洲最为繁荣，也是王室最重视的地区之一。新西班牙的首府墨西哥城是西半球最大的城市，到 18 世纪末，人口超过 137 000。它拥有大教堂和宫殿、花园、宽阔的街道，以及美洲第一所大学和第一家医院。新西班牙北部的银矿极其多产，因而开辟了新的定居点，比如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塔斯科（Taxco）。教会热使得一些城市的市容得到美化，比如普埃夫拉（Puebla）。然而，新大陆的物质财富几乎一年一度地都被大帆船运往了西班牙。

危地马拉王国没有墨西哥那样丰富的资源，因此其财富、国际闻名度（Cosmopolitanism）也从未达到与墨西哥相同的水平。但是只要随便拿一幅地图看一眼，就会发现在西班牙的所有美洲领地中，中美洲地峡处于中心地带。夹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中间，这么一个富

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使得危地马拉王国成了八方旅客的必经之路。在加勒比沿海，一些重要的西班牙属地与其相毗邻，包括哈瓦那、巴拿马贝略港（Portobelo）和哥伦比亚的卡尔塔赫纳（Cartagena），它们是为西班牙贸易大帆船服务的几大港口。除了西班牙，其他国家对这个地区（危地马拉王国）的重要性也一清二楚，而且垂涎已久：加勒比沿海长期受海盗纠缠，英国干脆把未平定的地区据为己有。

91



危地马拉王国所在的地理位置是西班牙领地的中心，但不巧，处于由墨西哥城（新西班牙的首府）所控制的富庶地区的外围，离墨西哥北部的丰富银矿更是遥远，因此被西班牙所忽略。

危地马拉王国这片土地充满着希望，但是珍贵金属资源不够丰富，

因此想要吸引西班牙人前来投资和定居，很有难度。它虽然是新西班牙的一个重要地区（比如，不像下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等边远地区的殖民地），但是光靠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充足的印第安人口不足以使之蓬勃发展。经过早年的暴力压榨与武装冲突，危地马拉王国最终以一个省级殖民地的姿态安定下来。

首府：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

我住在那儿的时间里，山里的噪音、烟雾和不带火花的闪光、夏季的地震一直不断，但是这些东西一旦习惯了，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相反，我认为那个城市是我在旅行途中居住过的最健康、也最快乐的地方。

——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1648 年（1984 年，第 184 页）

92

首府圣地亚哥是美洲新大陆最好的城市之一。虽然其人口在 1770 年仅 25 000 多，在规模和发达程度上不能与墨西哥城相媲美，但作为一个都城，绝对值得把新大陆上最重要的检审庭之一放在这里。圣地亚哥坐落在一个肥沃的峡谷，温和的气候让其声名远扬。周边火山耸立，经常火光四射，这也是其出名的原因。中心广场上矗立着权力机构的宏伟建筑——王宫、市政厅、大教堂，显得熠熠生辉。大教堂高 66 英尺，正厅两侧各排列有 8 个小教堂。城内还有 18 个其他的教堂、11 个小教堂和 18 个女修道院。此外，皇家铸币厂、出版社、1676 年由王室和教皇共同建立的圣卡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 Carlos）——中美洲唯一的高等学府，也为圣地亚哥增辉不少。

首府作为市政和宗教权威的所在地，控制了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西班牙人（有的出生在美洲）在圣地亚哥安家，伺机为自己捞得好处——政府下拨的用于种植小麦和饲养牲口的土地、糖和靛蓝贸易的许可证。随着委托监护主的后代也渐渐绝迹，这些拥有大批土地的商

人成了新的贵族阶层。他们控制了危地马拉王国的绝大部分贸易，对各省很不利。最富有的群体通常是欧洲来的西班牙人（这个自不必说），以及归化了的热那亚人和葡萄牙人，而不是克里奥尔人（Creoles）。不过还是有一些克里奥尔人能够排上富豪榜：阿伊西内纳（Aycinena）家族富到可以从王室买来侯爵的头衔，它是王国内唯一正式升为贵族阶层的一个克里奥尔家族。这些有钱的商人和官员，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克里奥尔人，他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精致的房屋和殖民地中最奢华的社交生活。

西班牙人的数量占圣地亚哥总人口数不到6%。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黑人（被奴役的和自由的）在城内到处可见。有一些在市中心的大楼里干活，其他人生活在市郊一些的居住区。最初，不管是征服者的同盟军还是战俘，都住在他们单独的聚集区里。渐渐地，社区内的种族越来越混合，人口构成也是如此。梅斯蒂索人成了市内最大的族群，他们的文化也最多样化。绝大多数梅斯蒂索人生活艰苦，住在茅草房顶的小屋里，但有一部分人开了小店、做了工匠，过得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毁于地震的圣地亚哥

（地震）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那么可怕……没掉下去的人，飞快地躺下趴在地上，动物也一样，4英尺高不够支撑它们。有些树没倒下，但是东斜西歪，树枝都碰到了地面。用水泥牢牢粘在一起的砖块……裂开、摔碎了。

费利佩·卡德纳神父（Father Felipe Cádena），1773年7月29日（琼斯，1994年，第3页）

1773年，圣地亚哥在一年内遭受第二次大地震的严重破坏以后，王室决定将首都迁到现在的危地马拉城所在地。建设新都城的艰难任务落到印第安人身上，他们遭受了更多的劳役。并不是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要废弃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或者按现在的叫法——安提瓜。1779年，大主教和其他教士迫于无奈搬到新的首都与政府当局汇合。西班牙人为了享受大山带来的温和气候，把他们的定居点建在一条很大的地质裂纹线上。地震和所有火山活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不仅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被迫迁址，圣萨尔瓦多和莱昂等城市也是如此。"新"的危地马拉城内的所有城市建筑在1917年的地震中又毁于一旦。

93



图为圣特里莎（Santa Teresa）教堂遗址，位于安提瓜，即从前的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照片提供：劳伦斯·福斯特）

94 圣地亚哥（即现在的安提瓜）主宰危地马拉王国内的一切事务。它将殖民地的大量财富集中在城内。圣地亚哥的商人控制着从殖民地到西班牙的大部分航运业。无论是去往墨西哥的首府还是去往贝拉克鲁斯港的一些重要线路，都始于圣地亚哥。从洪都拉斯湾的一些加勒比沿岸港口到圣地亚哥一路非常难走，但是那里的货物也会先运进首府。王国的首府落在危地马拉省，是人口最多的一个省。王国内超过一半的人都居住在危地马拉省以及它的许多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定居点。圣地亚哥市场依靠这些定居点获得食物、毛线和纺织物、陶器和其他物品，除了供城内消费使用外，也在殖民地王国内进行贸易。

圣地亚哥是王国内最大、最漂亮，也最强大的城市。1773 年，接二连三的地震基本上摧毁了圣地亚哥，王室将都城迁到了新危地马拉，也就是现在的危地马拉城所在地，而圣地亚哥渐渐地被叫成了“安提瓜”。不管都城在哪里，它始终主宰着危地马拉王国。

诸省

我们开始进入崎岖不平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去卡塔戈（Cartago）的整个旅程中，我们没看到任何值得让后人铭记的东西。只看到了太平洋一侧巨大的森林和树木，非常适合用来制作结实的船只；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山和荒漠。有时我们会在那儿接连睡两个晚上，要么在树林里，要么在空地上，总之离任何城镇或者印第安人居住区都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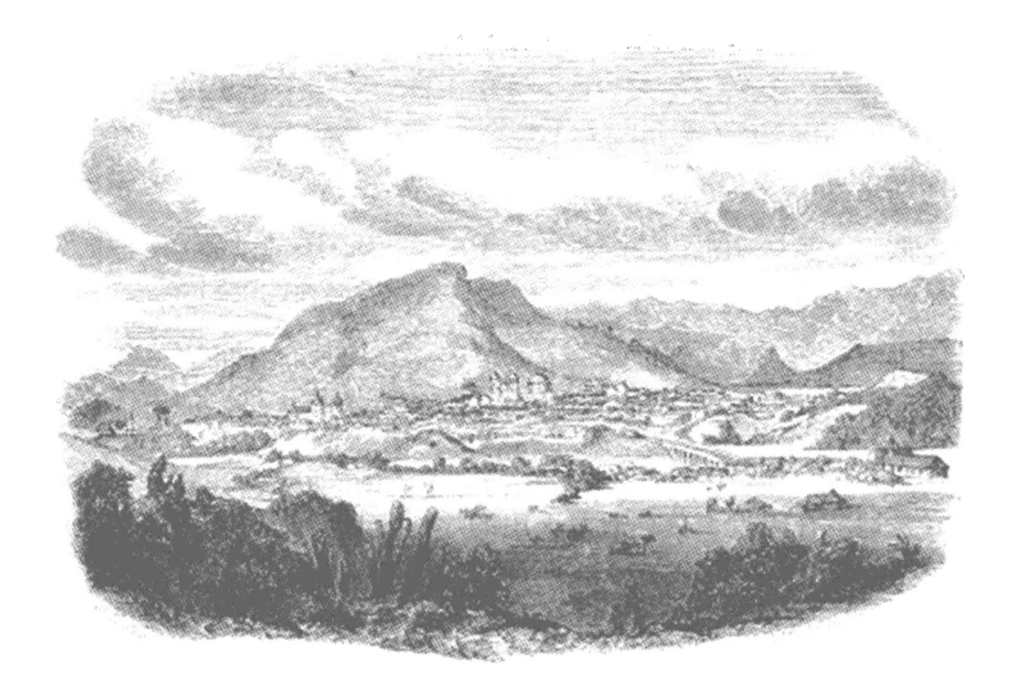
——托马斯·盖奇，1648 年（1985 年，第 312 页）

西班牙人是城市居民。就算他们拥有大庄园，只要还能负担得起社交生活，他们仍然偏好于住在城里。而且，他们很重视与其他欧洲人住在一起所带来的安全感。据托马斯·盖奇观察，出了城，他们“在偌大一片宽敞的土地上只稀稀拉拉地住了几个人”（1985 年，第 215 页）。西班牙人的数量小到连很多省级城市也无法维持：圣萨尔瓦多、科马亚瓜和格拉纳达是最大的省级城市，而 1620 年的时候，每个城市仅有 1 000 个西班牙人。那时候，总共不到 15 000 个西班牙人分

散在 15 个城镇，其中 40% 住在首府。在哥斯达黎加的卡塔戈，建城一个世纪之后，依然只有不到 400 个西班牙人。

95

整个领地的面积巨大，但只有几个城镇，所以非常闭塞。各定居点之间往往隔着非常遥远的距离，各地之间的交流很是匮乏——只有驴道与河流连通着彼此。18 世纪晚期，国王要求进行人口普查，但是官员们对这一行动纷纷抱怨。因为原始的“道路”骑马经常行不通，又缺乏食物和住宿，在这样的条件下穿越各省肯定会生病，还可能会死。尽管城市零散分布，但它们都集中在地峡的太平洋一侧。加勒比沿海，除了有几个港口和因银矿而发展起来的城镇以外，总体比较落后。



图为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帕城（Tegucigalpa）的景观。特古西加尔帕在土著印第安语中意为“银山”，根据王室颁布的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建于 1578 年。当地的银矿可以产出高质量的矿石，所以吸引了部分西班牙人到如此偏僻的洪都拉斯地区来定居。然而，银矿产量有限，不足以使特古西加尔帕成为重要的殖民地城市。该城海拔 3 000 英尺，是典型的温和高地气候，受西班牙人所喜爱。四周为大山环绕，但不是火山。所以灾难摧毁了其他殖民地定居点，这个城市却从未受过此种摧残。就这一点来说，它十分特殊。［据斯奎尔（E. G. Squier）1855 年的绘画］

96 包括首府在内的每个城镇，都要依照西班牙设计的方案来建造。有一个中心广场，四周为官方的行政大楼。从此处延伸出的街道互相垂直，构成的网状结构，形成各个居住区和商店区。但是除了首府，大多数城镇的街道不用砖石铺设，也没有地标性的大型公共建筑，而且有些住宅的空间可能非常有限。然而，地方行政长官（corregidor）向每个城镇下派官员，专门负责向到处收受进贡，从城镇及其所在的区域（包括由土著领袖掌管的印第安定居点），到当地的市长，到各个省会的省督和主教，无一例外。西班牙事无巨细地对一切事务都做了规定，共颁布了超过6 000条法令用于管理殖民地的生活。

尽管这些城镇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但是它们所在的城市和省份则情形各异。比如，圣萨尔瓦多从一个印第安人口密集的地区演变成了非洲奴隶聚集的地区。这个城市与洪都拉斯中部因矿藏发展起来的城镇一样，因为印第安奴隶贸易以及后来的靛蓝染料贸易而蓬勃发展，有实力从非洲进口奴隶。卡塔戈也是一个都城，但是非常贫穷。因为它所在的地区内印第安人寥寥无几，其他城市有复杂的种族构成、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它都没有。哥斯达黎加的商人则靠养猪业给西班牙的大帆船提供咸肉勉强维持生活，直到后来加勒比地区的可可走私更能赚钱，才取代了养猪业。而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是天然资源最丰富的早期殖民地之一。太平洋坡地就在附近，莫莫通博火山的爆发定期为土地补给肥料，所以种植可可和靛蓝染料正合适。这两种作物可是殖民地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格拉纳达在尼加拉瓜湖上，成为从太平洋经圣胡安河到加勒比海这条运输线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港口。然而，富庶的格拉纳达竟不是尼加拉瓜省的殖民地首府。西班牙将这一恩惠赐予了对手城市莱昂。

城市四周是非常广阔的乡村，再远则是荒野。从哥斯达黎加到伯利兹，印第安反抗者就藏在这些偏远的森林和大山中，逃跑的黑人奴隶也在此找到庇护。17世纪，少数几个胆大的传教士试着去帮助伯利兹的玛雅人，但是被驱逐了。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去这些遥远的地方探险都太过危险，更别说拓殖了。

西班牙人的大庄园，加上成群的牛羊和麦田，一般选址乡村。对

那里的征服更为成功，印第安人也更为归顺。一些穷困的梅斯蒂索人和自由的黑人尤其被养牛的大牧场所吸引。他们能在开阔的牧场上过着非常自由的牛仔生活，碰上牧场的主人又住在城里的话，就更自由了。从 1630 年到 1680 年的经济萧条期间，西班牙殖民者也会选择躲在农村，比起城市来，大庄园内的食物供给可靠多了。

巴拿马城

它一直是整个美洲最富裕的地方之一，通过陆路和查格雷斯河（river Chagres），往北与大西洋、往南与太平洋有贸易往来，与秘鲁、东印度、墨西哥和洪都拉斯都进行贸易。

——托马斯·盖奇，1648 年（1985 年，第 327 页）

巴拿马城是太平洋沿海唯一一个坚固的港口，因而迅速发展起来。秘鲁的黄金白银从巴拿马城转运到加勒比沿海，最后装载到停泊在贝略港（Portobelo）的西班牙大帆船上。虽然巴拿马城是一个港口，但是它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好：从秘鲁过来的护卫舰只能在几英里以外抛锚。而且，它虽然是省政府所在地，就好比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的角色，却只是个热带边陲小镇，而没有都城那种优雅的气派。由于石头或黏土非常稀少，王宫、教堂和 8 个女修道院、富商们的住宅都是用木板和瓦片建造的。巴拿马城与世界各地的港口一样，人口多元化，社会结构也可以说比较随意。据盖奇记载，非洲裔美洲人位列最富裕的商人行列。1610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永久居民中，有 1 007 名白人（其中男性超过一半）、146 名黑白混血种人、148 名黑人和 3 500 名非洲奴隶。巴拿马城从秘鲁进口过多的葡萄酒和白银，不过都本地消化了。另外，妓女也到处都是。用盖奇的话来总结："这个城市的西班牙人面临着太多的罪恶。"（1985 年，第 327 页）1671 年，英国海盗亨利·摩根（Henry Morgan）毁了巴拿马城，之后当地居民向西搬迁了几英里。

西班牙控制经济

他们跟我们玩各种钱的花样，却让我们衣不遮体。

《18世纪的尼加拉瓜谚语》（摘自佩雷斯—布里格诺利 Perez-Brignoli，1989年，第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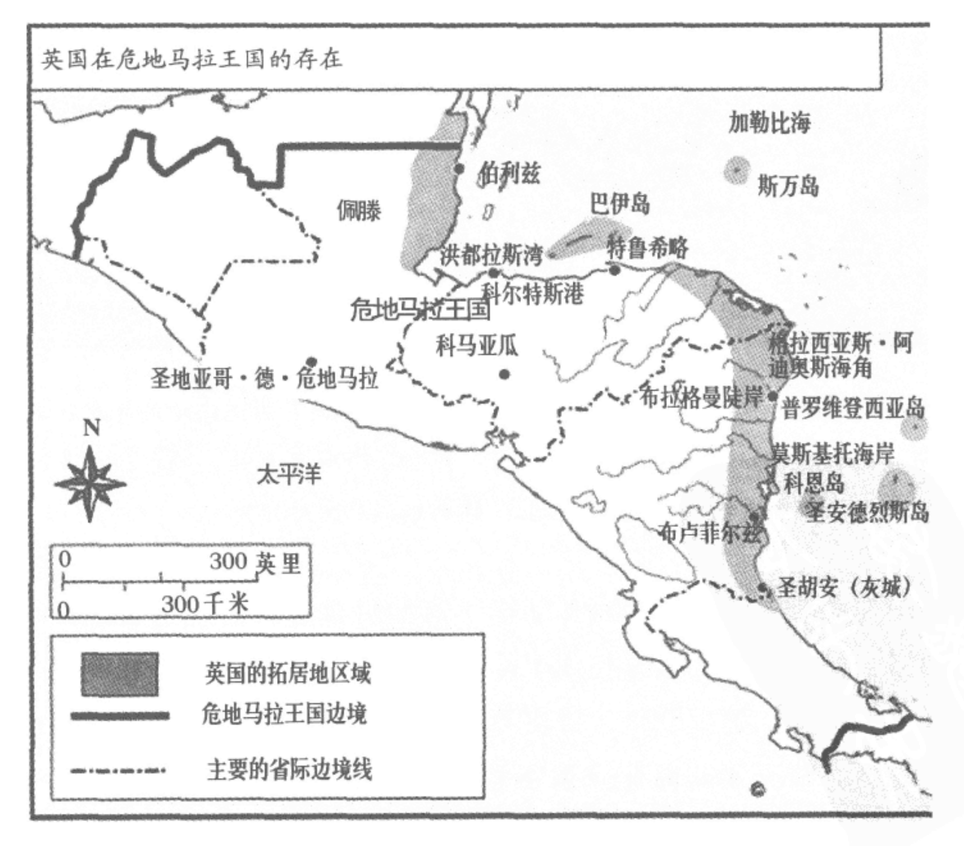
……在哥斯达黎加省……我们极度贫穷……当你的国库里只有1 000多个硬币的时候，真的没钱来付省督和神父们的工资。

费尔南德斯·德·萨利纳斯（Fernandez de Salinas）省督，1651年（摘自佩雷斯—布里格诺利，1989年，第45页）

欧洲入侵者

到了16世纪中叶，欧洲的敌对势力已经入侵西班牙在美洲的新大陆。面对财富，他们也想要分一杯羹。在英国、荷兰和法国，海盗受到推崇，成了民族英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因对英国做出巨大贡献，被伊丽莎白一世封为爵士。亨利·摩根（1635？—1688）作为海盗的首领，不仅受封为爵士，还成为了牙买加的省督。而牙买加成了他洗劫中美洲的跳板。迭戈·埃尔·穆拉托（Diego el Mulato）和皮耶·德·帕洛（Pie de Palo，人称“假腿”）在没有头衔的情况下已然成了传奇人物。他们劫掠了防卫坚固的西班牙港口，然后要求西班牙交赎金。他们等着装满白银的大帆船，仅洪都拉斯的船只就从中夺走了930吨白银。这个数量超过了1606年到1610年间运往西班牙的所有商品的10%。他们隐藏在被西班牙忽视的加勒比沿海及小岛上，而且胆大到通过河流进入殖民地内部抢劫。连格拉纳达都遭到了不止一次的洗劫。1630年左右，英国人的兴趣不断扩大了，开始进军伐木业，瞄准的是围绕着危地马拉王国的热带雨林。现在的伯利兹沿海，不但被西班牙人所轻视，当时玛雅人也为了佩滕腹地更加安全的

地区而将它废弃。英国人却在这里安营扎寨，砍伐苏木，因为它能够生产出一种欧洲的纺织物所需的紫色染料。海盗和伐木工用斧子、枪和朗姆酒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半游牧的米斯基托印第安人交换海龟和鱼。他们之间竟然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联盟，米斯基托人甚至坐着独木舟去哥斯达黎加的可可种植区，然后去巴拿马西部替英国人抢劫。到了1670年，西班牙已经答应妥协，允许英国在伯利兹伐木，条件是英国人停止海盗行为。英国人发现走私会比抢劫来得更加有利可图：英国的纺织产业需要靛蓝染料，与用苏木生产染料相比，它更加稳定也更加经济。走私贸易虽然违法，但是渐渐取代了抢劫。危地马拉王国和欧洲入侵者都从此受惠，西班牙就很难说了。英国的存在渐渐深入，如今在伯利兹，常把当初的情形形容为一个名叫“彼得·华莱士”的英国海盗的堕落。



98
99



图为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的肖像。[原图由小马库斯·海拉特斯（Marcus Gheeraerts，the Younger）] 于大约1590年创作，现存放于英国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本图由切拉·怀利根据原图仿作)。

中美洲没有墨西哥和秘鲁那样丰富的贵重金属，经济发展因此较为缓慢。尽管该殖民地也找到了除了白银以外其他可以盈利的出口产品，比如可可、靛蓝染料、兽皮等，但其经济仍然经常受阻，不能够繁荣发展。西班牙的商业政策本意就在于为西班牙创造收入的同时，扼杀任何与西班牙的工业或商品构成竞争的可能。殖民地的作用只限

于提供原料，几乎不允许开发生产成品的技术。举例来说，殖民地出口兽皮，但没有皮革；出口染料，但没有上色的纺织物。就算一些工业刚开始在新大陆有很好的发展，王室也会迅速禁止他们贸易或者以收税的方式扼杀他们的利润，墨西哥的丝绸工业和秘鲁的葡萄酒工业就是如此。只要是西班牙制造的商品，美洲就必须无条件进口，包括最基本的食用油等。所以，殖民地发展水平很低，生活成本却很高。

中美洲变得一穷二白，西班牙终于允许当地的一些工厂自己制造货品，但严格规定只限于本地消费，包括纺织物、鞋、肥皂、玻璃、家居用品及火药。然而，在17世纪的进程中，西班牙对这些商品和其他所有商品的贸易越来越限制。到了该世纪后期，西班牙完全禁止了殖民地之间的相互贸易，任何交易都需要通过西班牙。但这一政策的本质就是扼杀，因为西班牙的船队每年只来美洲一次，到危地马拉王国的频率就更低了。 100

中美洲人为了生存，学会了规避这些政策。一种途径是逃税和欺诈，而所有途径中最重要的就是走私。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存在与其他殖民地交换违禁品的现象。到了18世纪，与欧洲势力甚至与西班牙的一些敌对国之间进行走私，已经非常普遍。最初，走私仅在加勒比海一些孤立的潟湖上发生，但是随着西班牙的势力不断削弱，殖民地陷入了长达50年（1630—1680）的经济萧条，走私也越来越大胆。

殖民地穷到一些富商选择放弃，带着家人和资本回到了西班牙。出生在美洲的克里奥尔人撤到乡村，勉强维持生计。到17世纪末，由于经济仍然停滞，城里的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数量已经减少了30%。只有走私才能为殖民地供应足够的商品，而且到了18世纪，中美洲的经济也因走私而复苏。

采矿业

文艺复兴的浪潮把欧洲带入了工业化时代，但是西班牙没有赶上。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得到了那么多黄金白银，所以可以直接从其他国家进口成品。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之后，战争带来的债务让西班牙帝国一蹶不振，只能更加依赖美洲的白银。17世纪，王室对贵重

金属的需求疯涨，曾一度导致殖民地连硬币都没有了。从殖民地收缴来的白银中，2/3 都用于偿还他们在欧洲各银行的欠款。那里需要更多的贵重金属，但是西班牙的政策使高效率的采矿业成为不可能，还削弱了本就不过尔尔的中美洲工业。

101 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尔帕（Tegucigalpa）地区和尼加拉瓜的东北部偶尔能发现银矿。危地马拉的大山里也有银矿，但是少一些。虽然通常情况下矿石的质量很高，但是产量有限：一个地区每年的白银产量为 7 000 个计量单位，相比之下，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银矿则能生产 100 000 个。要提高采矿的效率，仅靠在河边淘沙、用火提炼是不够的，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但是西班牙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可以提高银矿利润的人力物力上。王室对水银的垄断进一步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水银用来熔炼矿石，但是曾经一度几年都无法运到，好不容易运来了，成本又太高。

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贵重金属的产量当然会让西班牙失望。而且，果不其然，西班牙的规章制度导致各种欺诈行为的出现，以规避政策。洪都拉斯人与王室官员勾结，经常不为他们的矿业注册或者不向王室交纳矿石税。这种欺瞒的行为为一部分人带来了不为人知的财富，但是对所有的探矿者来说，白银永远都不够：特古西加尔帕周围只有 4 个银矿，却有 300 个人抢夺所有权。

可可豆和靛蓝

西班牙的重商主义鼓励出口作物的种植。殖民地上下这一类作物有很多——从糖和菝葜到烟草——但是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盈利。危地马拉王国的经济体系很容易依赖单个作物。每当对某种作物有高需求时，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有权势的商人就会承包下该作物的生产而且负责运输。地主们也不惜放弃生计作物的种植，把土地都投入到该作物上去。一段风靡期后，接踵而来的势必是欧洲不再对该作物有任何需求，以致该地植被荒芜，土壤也因过度利用而变得贫瘠。可可豆也好，靛蓝也好，只要是殖民地所依赖的那一种作物，到最后都落入先迅速发展再快速消亡的模式。唯一不同的就是周期的长短。牧场

经营也遭遇了和作物种植类似的命运：开始的几十年，牛肉供应太过充足，生肉骨架都只能浪费腐烂。然而到了16世纪末期，牛的数量迅速减少，导致牛肉稀缺、牛皮出口也难有利润。经济低迷期也是食物短缺的时期。

可可豆是第一种有价值的出口作物。阿兹特克国王的巧克力饮料成了西班牙宫廷最喜爱的饮料，还因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eresa）与路易十四结婚而传入了17世纪的法国。然而，中美洲的可可豆主要还是在新西班牙境内交易。在新西班牙，可可豆也充当货币，主要用于支付印第安人的劳动报酬和充当贡品，但在制造的硬币不够时也会直接用作钱币。到了17世纪中叶，巧克力风靡欧洲；在英国，可可吧取代咖啡馆成为知识阶层的首选聚会地点。这一切都说明可可豆已经开拓了世界市场。但是此时，殖民地的可可热已经结束。可可豆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作物，只有印第安人懂得它的种植技巧，而且需要长年照料。到了16世纪末，劳动力本就稀缺，再加上许多植株遭受虫害，可可产量减少。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可可生产又带来了竞争，使中美洲可可贸易的利润进一步变少。到了17世纪早期，玛雅人的土地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可可生产地。哥斯达黎加很快就在加勒比沿海种上了新的作物，这是典型的中美洲式的复苏方法。但是新作物的产量太小，除了海盗和后来的走私者，没能吸引大规模的贸易。 102

靛蓝是继可可豆之后，又一种主要的出口作物。靛蓝是高质量染料，欧洲的纺织物对它的需求很大。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一些商人担心可可豆的需求下降，开始在荒野圈地并播种一种能够生产出蓝色染料的灌木。靛蓝的生产与可可豆不同，只需雇几名熟练的劳工便可照管一年的运作。而且，靛蓝与糖的生产也不同，几乎不需要在机械设备上有任何投资，而糖的生产则需要，要不然糖是可以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更何况在印第安劳动力奇缺的时期，染料活儿只需要少量黑人奴隶或者梅斯蒂索人工薪劳动者就可以照看，这一事实让染料生产更加可行。不过，虽说如此，劳动力短缺、王室又禁止让印第安人到不健康的染坊工作，还是限制了季节性收成的规模。到了17世纪

晚期，英国的走私团伙让靛蓝贸易的利润变得十分可观，那些用来保护印第安劳动力的限制条款就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103

基切商人

……所有有钱的印第安人，是半个商人，也是了不起的工人——我想说，都一样出色，因为他们有 3 000 头骡子为他们干活。

——托维利亚（M. A. Tovilla），1635 年（卡马克，1981 年，第 326 页）

殖民地内的贸易并没有为西班牙人所垄断。托马斯·盖奇观察到，危地马拉高地上的每一个玛雅城镇都生产一种特色产品，而且有人在市集上买卖，比如盐、蜂蜜、瓷器、水果，或是纺织物。据托维利亚所说，建造乌塔特兰城的那批人的后代，也就是居住在奇奇卡斯特南戈（Chichicastenango）的玛雅人，与沿海地区建立起了一套盈利的交易模式：用高地上的玉米和织布交换可可豆和棉花，或者直接进行买卖。其中大部分贸易可能依然是根据前哥伦布时期的模式进行的。中部美洲时代，印第安人就把可可豆用作货币或贡品；殖民地时期对可可豆的需求，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让西班牙商人发了财、让奇奇卡斯特南戈的生意人蜂拥而至的这些可可田地，其中一些正是当年基切人与阿兹特克人大打出手、争夺不休的地方。西班牙人和拉迪诺人越来越把殖民地内任何可以赚钱的东西从印第安人那里占为己有，但在危地马拉高地上，今天的奇奇卡斯特南戈依然是基切玛雅人的一个重要市镇。

靛蓝对许多种植商来说，也颇具吸引力，因为它与小麦和其他作物放在一起照样能轻易生长。更巧合的是，放牧时牛正好可以把小块土地上的杂草除去，又不破坏植株。在印第安村落里的一些拉迪诺人

开辟的小型牧场上、在特古西加尔帕的采矿区，都很容易种植靛蓝，而且卖给城里的商人去加工和出口，利润很高。虽然蝗灾频发，火山爆发又将整个农场都掩埋了，但是到 17 世纪末的时候，靛蓝依旧成了最热的出口商品。而且，受靛蓝生产这一共同利益的驱使，太平洋坡地一带的城市和农村第一次连接在一起。

靛蓝非常适合危地马拉王国。走私打开了靛蓝贸易的市场，一下子让殖民地尝到了繁荣的滋味。1800 年以前，靛蓝一直是殖民地的经济支柱。后来，大部分利润因蝗灾、商业欺诈、欧洲的战争而终止了。然而，尽管利润微薄，靛蓝作为该地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一直持续到了 19 世纪，最后被苯胺染料淘汰。

贸易港

西班牙把地峡视为与太平洋进行贸易的一大障碍。西班牙的船队从大西洋靠岸，但是大多数殖民者和印第安人都住在太平洋附近。加勒比沿海不但缺少天然的港口，而且西班牙从未真正征服半游牧的米斯基托印第安人。他们住在从洪都拉斯东部一直到尼加拉瓜的这一带沿海区域，也就是常说的莫斯基托海岸（见原书第 98 页地图）。西班牙需要一个可靠的港口，以方便与殖民者之间的联络，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点。

104
105

洪都拉斯湾内的首选港口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化，从很小的巴里奥斯港（Puerto Barrios）到卡瓦略斯港（Puerto Caballos），甚至东移到了特鲁希略（Trujillo）。但是无论用哪一个港口，都需要再乘坐独木舟或骑驴子，舟车劳顿才能到达殖民地王国内主要的人口中心，比如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圣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的雷亚莱霍（Realejo），都在太平洋一侧。对危地马拉王国来说，洪都拉斯的这些港口十分重要，但是西班牙的船队常常绕道而行。有时，过几年才有大帆船前来贸易，尤其是在可可市场崩溃以后的萧条时期：从洪都拉斯运往塞维利亚的货物量从 9 000 吨（1606—1610）直跌至 925 吨（1641—1645）。

尼加拉瓜境内的圣胡安河附近的一些加勒比小海湾、哥斯达黎加

境内的利蒙港（现名），在殖民地之间的货物运输（和走私）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的圣胡安河除了几个水流湍急之处，总体上是适于通航的，而且经由尼加拉瓜湖和格拉纳达几乎与太平洋相连。在19世纪和20世纪寻找两大洋之间的便捷通道时，圣胡安河的依然如此。太平洋沿海与加勒比沿海不同，在丰塞卡湾（Gulf of Fonseca）和尼科亚半岛上有很好的天然港口。对西班牙的殖民地来说，这些港口十分便利。对于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到秘鲁这一带的太平洋沿海的殖民地来说，这些港口用于当地的旅行和偶尔的走私活动都很有用；但是对西班牙来说，这些港口应该出现在地峡的另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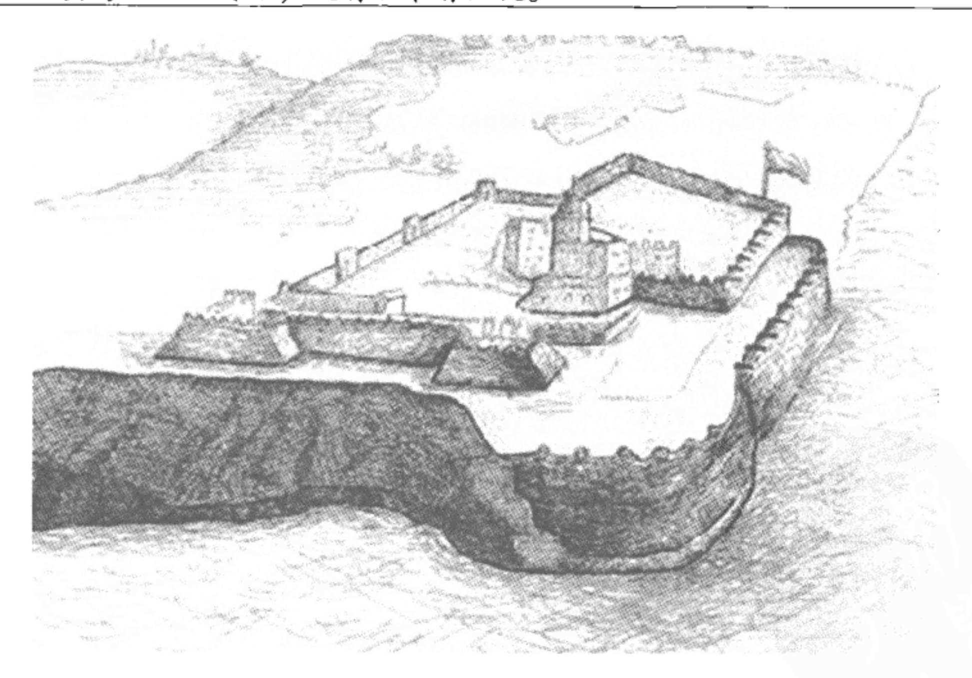
巴拿马贝略港

我对那……从巴拿马城向那儿移动的成群的骡子感到吃惊，它们背上装满了楔银。有一天，我数了一下，有200头骡子除了银子什么都没驮。把这些白银卸在露天市场上，成堆的楔子留在街上就像成堆的石头……

——托马斯·盖奇，1648年（第329—330页）

位于巴拿马的贝略港港位于加勒比沿海，据说坚不可摧，尤其是在1596年成功抵御了弗朗西斯·德雷克发起的进攻以后。除了几个堡垒，这个港口没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因疟疾和其他疾病在热带肆虐，这里长年几乎无人居住（德雷克自己也死于痢疾，被悄悄葬在了海湾）。没有船队要来的时候，整个港口只有几个店家和士兵留守。但是每年，由8艘大帆船和1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都会来一次，从欧洲和美洲殖民地带来大量货物，还有5 000名士兵。哥伦比亚卡尔塔赫纳（Cartagena）港和其他西班牙港口的船只也闻名而来。贝略港顿时变成了中美洲最重要的一个巨大的集贸市场，到处都是商人、士兵、王室官员，熙熙攘攘、

好不热闹。西班牙的大帆船就算会绕过中美洲的其他港口，也一定会在贝略港停靠，运走大量秘鲁白银。从巴拿马城到贝略港在太平洋上的直线距离不到50英里，但是得走山里的崎岖小路。由于维护起来费用太高，这些山路一般都被西班牙关闭着，除非有白银或者更贵重的货物需要运输。运输白银需要几百头驴子，途中需要大量粮食供应。所有粮食都需要从危地马拉王国的牧场主和商人那里进口。尽管贝略港防卫坚固，还是遭到了英国海盗多次成功的突袭，比如1601年的威廉姆·派克（William Parker）和1688年的亨利·摩根爵士。1738年，贝略港再次遭袭，这一次由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带领。直到此时，西班牙才决定，绕道合恩角（Cape Horn）去秘鲁可能是更加安全但又不太昂贵的一条航线。1746年，贝略港遭弃，巴拿马因此与世隔绝。危地马拉王国境内由该港口带来的贸易也就此终结，没有后来者出现。



图为位于巴拿马贝略港的一个贸易站。［本图由切拉·怀利仿自赫雷德斯·霍曼（Heredes Homann，1743年，纽伦堡）的蚀刻城市地图集］

106 最初，西班牙兴致勃勃地在大西洋上寻找港口，希望以此在地峡上打开一个通往太平洋的缺口，希望能发现一个海峡带他们去找秘鲁丰富的白银，但事实并不如他们所愿，只好考虑折中的办法。殖民地有些贸易家推举圣胡安河作为运输航线，还有一些人力荐在洪都拉斯开发一条通往丰塞卡湾的陆地路线。然而，不管是哪一条路线，都不如穿过巴拿马来得更加直接——贝略港和巴拿马城之间的这一过境路于1597年建立。危地马拉王国面临着长期的供应和出口问题。此时的西班牙本身也是债务缠身，无法定期向殖民地派遣船队。一旦海盗在加勒比沿海开始猖獗，很可能几十年都没有大帆船在洪都拉斯湾靠岸。只有最富的商人才有能力通过墨西哥或者巴拿马进行出口贸易。许多商业都被昂贵的运输成本拖垮了。

到17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已经封闭得近乎绝望。托马斯·盖奇企图从危地马拉王国出发回到欧洲去，而不是从墨西哥出发，这是一个错误。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尝试从各个小的港口起航。最后，他登上了一艘从哥斯达黎加开往贝略港、沿加勒比海行驶的货船。但是帆还没打开，货船就被迭戈·埃尔·穆拉托（Diego el Mulato）和皮耶·德·帕洛（Pie de Palo）劫持了。盖奇被扔上了岸，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找可搭乘的货船。

社会等级和种族构成

在西班牙，只要不是犹太人和摩尔人的后代，就算得上是一种贵族的荣耀；在美洲，只要肤色偏白，就意味着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807年（斯坦和斯坦，1970年，第56页）

107

17世纪中叶危地马拉王国的种族构成＊

	整个王国	圣地亚哥	卡塔戈＊＊
印第安人	540 000	5 600	144
白人	50 000	6 100	365

<table>
<tr><td>拉迪诺人</td><td></td><td>24 620</td><td></td></tr>
<tr><td>梅斯蒂索人</td><td>30 000</td><td></td><td>16</td></tr>
<tr><td>黑人</td><td>20 000</td><td></td><td>41</td></tr>
<tr><td>穆拉托人
（黑白混血）</td><td>10 000</td><td></td><td>12</td></tr>
<tr><td>总计</td><td>650 000</td><td>36 320</td><td>578</td></tr>
<tr><td colspan="4">* 由于缺乏精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本表中的数字为估算值。</td></tr>
<tr><td colspan="4">* * 卡塔戈位于哥斯达黎加的中央高地，是中美洲唯一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城镇；拉迪诺人逐渐成为主要的城市人口，而印第安人以居住在隔离的村庄为主，这是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的一种保护方式。</td></tr>
<tr><td colspan="4">来源：克里斯托弗·卢茨（Christopher H. Lutz），默多·麦克劳德（Murdo J. MacLeod，1973）和奥卡·琼斯（Oakah L. Jones）。</td></tr>
</table>

危地马拉王国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其他殖民地一样，依法推行一套社会等级制度，主要的依据便是种族。法律对一切事物都做了规定，从是否有资格穿中国的丝绸服饰，到是否开办市政机关，以及是否能够持有武器，无所不包。许多明显的种族等级排列在那套古板混乱的法规当中就看得出来。这些所谓的法规可能让奴隶的后代自由，也可能强迫梅斯蒂索人交纳贡金。

殖民地内不同种族之间通婚非常普遍，所以这套体系不管理论上有多么严密，实际操作起来都会大打折扣。贵族“白人”家庭只要给日渐贫困的西班牙交一笔钱，就可以得到证明其家族内的印第安和非洲血统已经“绝迹”。在这样一个随时需要劳动力和手艺的社会，种族法为个人开绿灯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迭戈·德·波尔雷斯（Diego de Porres）祖上本是混合血统，但他在首府仍是备受尊敬的建筑师。1707年，还加入了步兵。事实上，波旁王朝加强了殖民地的防御能力之后，就彻底解除了除白人以外其他人一律不准携带武器这一规定。1803年，60名非洲奴隶甚至组成了一个火炮连。但是，骑兵依然只有白人。托马斯·盖奇（第191页）说过，在首府无论哪个种族都“穿得富丽光鲜”；而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地区，混血种的那些人活得更是自由自在。在一

个压迫性的体制之下，纵然破例经常可见，但社会等级制度无可避免地疏远了主流群体，在殖民地留下了种族主义的烙印。

克里奥略人（Criollos）和半岛人[1]（Peninsulares）

108 白人作为统治阶级，排在社会等级的最高处。但是就算在白人内部，也有区分。比起生在美洲的克里奥略人（Criollos），或者叫克里奥尔人（Creoles），王室更钟爱于半岛人，也就是出生在西班牙的正宗西班牙人。西班牙对克里奥尔人不信任，仿佛陌生的土地会削弱他们对王室的忠诚一样。在西班牙看来，同样的状况在西班牙籍官员中也会发生，甚至包括那些出生在西班牙的官员。因此，王室把他们的任期都限定在几年之内，以防他们也改变效忠的对象。绝大多数克里奥尔人的皮肤和半岛人一样白。虽说他们的祖先当中许多人出身卑微，但无论如何，克里奥尔人总算得上是贵族。当然，跟纯种白人相比，他们在社会阶层上的位置绝对要低一些，而且一如所料，法律对他们也有所歧视。

王室和教会中最重要也最能赚钱的职位是不会安排给克里奥尔人的，但次要的职位还是能够选上的，比如有时候，克里奥尔人是城镇的长官，这么一来他们的境遇就能好很多（特古西加尔帕的一位市长，虽然薪水只有不到 700 比索，但是利用职位之便每年可以创收 8 000 比索）。克里奥尔人能够参与的职位少之又少，因为所有王室的任命都预留给了半岛人，包括最有权势的宗教职位，比如主教，还有许多无足轻重的省级职位。

半岛人利用自己的官位帮助家人和朋友升官发财。可可豆的种植、靛蓝染料工艺、船运业等往往被半岛人牢牢控制。在 5 个最富的可可商人中，没有一个是克里奥尔人。他们清一色地生于欧洲。在一些最无耻的走私和诈骗交易中，也常常可见王室官员的踪影。据托马斯·盖奇观察，早在 1630 年，不管是克里奥尔族的神职人员还是定居者，就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愤怒不已。

17 世纪，殖民地的经济几乎停滞。许多克里奥尔人不得不放弃城

[1] 半岛人指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译者注.

市生活，到乡村寻求庇护。大部分人没有庞大的地产。原来的委托监护主的后代已经渐渐消失，那些没有投资土地的克里奥尔人只能靠日渐减少的印第安人进贡维生。大多数克里奥尔人拥有的土地很小，根本不能叫做庄园。而且，他们不像半岛人，手头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权势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于是他们侵吞印第安人的土地，以求过上个安稳日子，或者小打小闹地投资靛蓝。

109

马丁·卡洛斯·德·门科斯（Martin Carlos de Mencos）庭长

关于洪都拉斯沿海一带的贸易……提出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加强管制，严禁与外来者进行交易，并且承诺一律严查严惩……

——马尔克斯·德·巴里尼亚斯（Marqués de Variñas）1677 年给国王的汇报（麦克劳德，1973 年，第 360 页）

马丁·卡洛斯·德·门科斯将军为王室服务 50 年，一直倍受信任。1659 年至 1667 年间，他还是危地马拉检审庭的一位受人敬仰的庭长。然而，他被控于 1663 年走私 400 箱靛蓝和 8 个银条到荷兰。他所犯之罪，证据确凿——港口仓库里的目击者和嫉妒使然的商人都提供了证据指证他。这位庭长在陈述案情时，提出窘迫的经济状况和对宗教的虔诚是他犯罪的诱因，讲得似乎情有可原：他说，为了来中美洲，他变卖了所有家当以支付昂贵的航行费用，初到殖民地时，已穷困不堪。然后，他的妻子在贝略港死于热病。他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将妻子的遗产慷慨地捐赠给西班牙的一个女修道院以缅怀妻子，要么将这笔资助从修女那里无情地剥夺。为了达成妻子虔诚的心愿，他参与了与荷兰之间的非法交易。国王还会让他做些什么呢？他是有罪，但是国王菲利普四世一定是非常富有同情心，不但让将军保留官职，还重新任命他担任第二期庭长，并且赏给了他委托监护权，好让他有更高的收入＊。王室并不是一直如此宽恕的：克里奥尔族的富商阿伊西内亚（Aycinena）家族参与了非法贸易，他们的靛蓝全被没收；其他一些人则受到巨额罚款，甚至被威

胁驱逐出殖民地。但是西班牙发现，随着走私越来越普遍，大多数王室官员和海军成员也都纷纷卷入，阻止走私贸易的难度越来越大。

* 以上情况参见默多·麦克劳德（Murdo J. MacLeod），1973 年，第 356—357 页

拉迪诺人和卡斯塔人[①]（Castas）

110 肤色比出生地更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王室总能很快地发觉每个种族之间的肤色区别，然后给它们贴上标签。在今天的中美洲，大部分人称自己为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混血种族，可能还有非洲人的成分。在王室的法律里，总共有 16 个种族类别，对每一个种族都有不同的对待方法。在诸多卡斯塔人（即混种人）中，属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和白人混种）的种族位置最高，所受待遇也最好；另有穆拉托人（mulattoes，非洲人和白人混种）和桑博人与科约特人（zambos and coyotes，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混种）。所有的卡斯塔人和黑人，被归为一个类别，叫拉迪诺人（ladinos）。尽管殖民地内的种族标签有所完善，但总的效果是一目了然的：对殖民者来说，混种人都属于“另一个”阶级。

卡斯塔人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所以在西班牙的殖民地阶层中没有确定的身份。他们不像印第安人那样受法院的特殊保护，没有法律条例禁止他们在不健康的环境中劳作，也没有法令终止他们的非洲奴隶或者穆拉托奴隶的身份。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也不用像印第安人那样，被迫交纳贡金。他们还能通过教会、军队、甚至大学等途径来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中上层阶级的拉迪诺人一般为神父、教师、军队长官、警察、律师和医生。

梅斯蒂索人从未被奴役过。在城市里，他们可以是小店店主、工匠，但是在手工业行会，他们被限制在学徒的级别（言下之意，只有

① 卡斯塔（Casta），在西班牙语中，是对 17、18 世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内混血人种的统称；在英语中，也指殖民地内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译者注

白人才能获得师傅的地位）。他们也四处奔走，到农村地区的印第安人定居点去做买卖。穆拉托人作为西班牙人的后代，不被奴役时，享受特殊的关照。18 世纪，由他们来监督城内的印第安人社区。这一做法其实是王室典型的伎俩：这么一来各种族就掉入了互相抵制的陷阱，而不会去针对人数较少的白人群体。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大庄园内、农场上、染料坊和糖厂里，由拉迪诺人负责看管印第安人的工作，他们自己只需要赶赶骡群，而有时候替殖民者干些肮脏的差事，比如非法雇佣印第安劳动力。有些拉迪诺人成了靛蓝种植商。还有人独辟蹊径，做起了牲口盗窃、拦路抢劫、走私等非法勾当。

除了穆拉托奴隶，其余拉迪诺人都不听白人的使唤。拉迪诺人不专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比起住在村落里的印第安人，他们更容易逃脱本地政府的控制。他们可以通过在各省之间游窜来避开艰苦的工作，许多人也的确这么做了。王室尝试过把拉迪诺人安置在农村，也尝试过以劳务偿债的方式把他们绑定在工作岗位上，但是这些方法都只是偶尔奏效。

111

有一部分拉迪诺人可以说完全不在殖民地控制范围之内。举例来说，米斯基托印第安人与英国海盗、走私者，以及他们的非洲奴隶通婚。久而久之，成为了殖民地最大的桑博人群体。他们特征显著，与其祖先很不相同。事实上，“米斯基托（Miskito）”这个词很可能是后征服时期，由他们所携带的英国火枪（musket）的单词衍生而来。当时邻近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对火枪十分警觉。加利夫那人（Garifuna）也是渊源于黑人和印第安人，这一点与米斯基托人类似，但是他们从英国人手里逃脱之后，与西班牙人结成了联盟。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构成了最大的一个阶层。17 世纪，他们依然占人口的80%以上。殖民地时期末期，尽管拉迪诺人数量疯涨，印第安人口仍然超过一半。他们作为王室和天主教的特殊保护对象，在许多方面都受明文规定的保护，因此一般认为，他们的处境比非洲奴隶要好很多。印第安人由土著首领来管理，拥有社区土地。《新法》还把他们从奴

隶制度中解救出来，并且规范了对印第安劳动力的使用。

然而，仍有 50 万印第安人被逼迫劳动，以向王室、天主教和仅存的几个委托监护主支付贡金。在劳役摊派制（repartimiento）下，即一种劳动力选派机制下，印第安人为地主、城市和教会服劳役的时间是特别规定的。除此之外，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还要在社区土地上耕作。在整个 17 世纪，印第安劳动力保障了殖民地 70% 的财力资源。哥斯达黎加的印第安人非常之少（1651 年只有 800 人），是最贫穷的地区。

尽管王室法令严禁印第安人在不健康的染坊和矿井工作，也不允许以任何形式的劳动妨碍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以及向王室交纳贡金，但印第安人依然很穷，依然受到多方面的剥削。连修士和土著领袖在急需劳动力时都对这些法律条款熟视无睹，殖民者就更不用说了。官员也经常收受贿赂，对这样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当王室派来监察员，就对虐待者进行适当地罚款。这么做就算不能杜绝这一现象，也能帮王室填补金库。17 世纪，随着西班牙本身也日渐潦倒，只要收入能增加，它非常愿意放任一些最坏的违法行为。直到 18 世纪波旁王朝改革之后，通过向政府诉求，印第安人才渐渐得到宽免。

112

马丁国王：印第安人的先知和解救者

给我们一束坚毅的光，一个平坦的地方，
一束吉祥的光，一个美好的地方，
一个美好的生活和开始。

——《波波尔·乌》，基切玛雅人的圣书（特德洛克，1985 年，第 170 页）

1773 年 7 月毁灭了首都圣地亚哥的那场地震，在许多玛雅人眼里，预示着他们的先知马尔图姆（Martum）的归来。就在地震前，马丁·德·马约尔加（Martin de Mayorga）当了检审庭庭长。玛雅人认为，他就是先知的化身。马

> 尔图姆承诺过，会消灭西班牙人，让他们从进贡的苦役中解脱出来。在圣地亚哥，他显然已经做到了。他们觉得，马尔图姆紧接着就会让这片土地还原到征服前的样子。为了支持他们的新国王——马丁，玛雅人奋起反抗，从他们的村落逃至新都城所在地危地马拉城。但这次起义，几乎没有战争，希望也如昙花一现。印第安人最终被说服，回到了自己的村落。
>
> ——摘自迈尔士·沃特曼（Miles L. Wortman），1982年，第183页

新的奴役方式不断涌现，取代了奴隶制度、委托监护制，甚至是最新的劳役摊派制。劳役偿债制（debt peonage）是最恶毒的一种方式。印第安人自告奋勇要求工作；一段固定期限的劳动所得会提前支付，然后印第安人在这段时间内就离家在外劳作。这样的劳动方式能帮助他们交纳贡金、养活家人。随后，印第安人发现，不管他们怎样工作，都偿还不清欠债。印第安人被迫无奈，以通胀的价格从公司或者大庄园的店里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所以他们欠下的债款反而上涨，直到最初承诺的一段时期的劳役变成了终生离家的工作。他们到死也是负债累累，根据西班牙法律的规定，他们的孩子也不得不加入劳役的大军。在接下来的整个殖民地时期，陷入劳役偿债制的印第安人越来越多。

113 在一些地区，印第安人的数量已经减少到几乎朝不保夕，他们发现在劳役偿债的体制下，不可能维持他们的种族身份。印第安人都去沿海的大庄园和能够种植靛蓝的太平洋坡地上做农奴，常常整个村庄从此不复存在。并不是所有在大庄园工作的印第安人都是违背意愿的；有些人为了逃避交纳贡金和劳役摊派制分给印第安村落的劳役，主动选择了大庄园的生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沿海的印第安人由于远离家庭和村落，渐渐地同化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贫农阶层。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他们成了拉迪诺人。然而，对于危地马拉北部和西部高地上的印第安人来说，17

世纪低迷的经济反而对他们有所帮助。他们的土地海拔太高、气候太潮湿、阴冷，种靛蓝不合适，西班牙人也不感兴趣。因此，没有西班牙人在此拓殖。相应地，劳役的苦差也就减少了。甚至以行乞为生的修士也大都退居到了城里的修道院。这部分玛雅族印第安人，是少数几个不管人数多少都能幸存下来的种族之一。而且 17 世纪下半叶，尽管流行病时有发生，他们的人数却开始增长。到了殖民地末期，他们的种族文化特征还非常完整。

非洲奴隶

第一批奴隶跟着征服者进入了危地马拉王国。1821 年，奴隶制度废除。截至此时，已经有成千上万名非洲奴隶（男女均有）被合法带入了殖民地。在奴隶贸易的鼎盛时期，有 3 万名奴隶在殖民地生活——可能更多，因为有一部分奴隶是走私进入中美洲的，但由于美洲其他更繁荣的港口出价更高，所以这部分奴隶数量不大。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不同，他们不是王室的臣民。17 世纪中的绝大多数年代里，没有规定黑人需要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指导。波旁王朝于 1784 年改变了这一状况。当时的卡洛斯三世针对如何对待黑人奴隶这一问题，开始实施一套更为开明的规章制度，希望他们能成为“有用的基督教臣民”。再也不能在他们的脸上烙印，而且他们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也得以规范化、人性化。

但是，奴隶制度仍然合法。奴隶主有权释放奴隶，或者奴隶自己也可以花钱赎回自由。与之构成对比的是，穆拉托（而不是非洲）奴隶的后代则自动获得自由。从伯利兹逃离的黑人奴隶，只要接受洗礼就可获得自由——这一举动其实是西班牙人对英国人的公然挑衅。

奴隶之城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边境附近有一个村落，被称为“奴隶之城”（Pueblo de los Esclavos），可能是由殖民地政府建造的，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个人奴隶主的记载。1821 年的人口普查，对当时住在这个村落后来自由的那些奴隶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职业都做了一一记录。总共有 395 名女性和 376 名男性，年龄跨度从 5 个月到 100 岁，其中 6 人已达 80、90 岁高龄。有夫妻、寡妇鳏夫、69 名单身男性和 47 名单身女性。75% 的人都是农民，14% 是仆人，几个人做了牛仔，剩余的人都做日工。还有极少数幸运儿：两位地主、两名管家、一位圣器守司、一个木匠和一个织布工。

——摘自小奥卡·琼斯（Oakah L. Jones, Jr.），1994 年，第 115 页

非洲奴隶不便宜，只能部分解决殖民地长期缺乏劳动力的问题。采矿者、染坊主、僧侣会开办的糖厂等，反复向王室请求购买更多的奴隶。但是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官员战战兢兢，不敢增加奴隶的数量。16 世纪有过几次奴隶抗议。在洪都拉斯的矿井和圣萨尔瓦多城内也爆发过抗议，当时有 2 000 名奴隶试图起义。在加勒比沿海，奴隶与海盗也有密谋。逃跑的奴隶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在农村地区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通婚生下了桑博人。政府对这两个现象担忧无比，于 1671 年正式宣布不再允许非洲奴隶进入危地马拉王国。然而，18 世纪经济一旦复苏，又开始进口奴隶，但是数量不大。

教会和文化

天主教把旧大陆的文化引入了美洲新大陆。几个世纪以来，到处建起了天主教堂，后来又翻新成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巴洛克等各种欧洲艺术和建筑风格。唱诗班和管风琴让大众也听到了巴赫、维瓦尔第等人所作的神圣音乐。最新流行的艺术一般很晚才能到达这远离

欧洲文明的殖民地。一旦有新的艺术进来，经常是整个省气象一新。建筑物正面的雕塑也好，回廊上的壁画也好，都会翻新。这些翻新工作一般由欧洲来的巡游工匠来做，或者让专门训练的印第安人和拉迪诺人的工匠来临摹。不过，也有些艺术家是在国外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比如雕塑家基里奥·卡塔尼奥（Quirio Cataño）和阿隆索·德·帕斯（Alonso de Paz）。

115 修建教堂最初的经费来自贡物和捐税。玛雅人把他们自己的传统信仰与对基督教圣人的敬仰凝结在一起形成了印第安人的兄弟会（cofradías）。兄弟会为圣人的雕像以及与圣人相关的庆祝活动所捐经费绰绰有余。1776 年，兄弟会的资金占到了教会总收入的 1/3，甚至超过了王室所收贡金的数额。其他教区居民的遗产也为教堂的装饰添砖加瓦。

印第安人的进贡、教区居民的遗产、兄弟会的资助让各大修会经费充足。在新西班牙，教会富到可以做商人和大庄园主的主要贷款来源。不但如此，教会还在民众有需求时提供紧急援助。教会掌管着每个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地产。那些不彻底归教会所有的地产，多数情况下也已经抵押给它，因为教会是殖民地内最大的放款人。到 1700 年为止，危地马拉王国内共有 759 个教堂，其中 60% 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仅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一个城市就有一个大教堂、24 个教堂、8 个修道院和 15 个女修道院。

宏伟的多明我会女修道院在首府地区可谓富甲一方。它在危地马拉因遗赠所得的资产包括一座用于磨玉米的水磨房、一个饲养马和骡的农场、一个产糖的农场，甚至还有一座银矿。托马斯·盖奇去过这个修道院，他挖苦地评论道："那些肥胖的修士先是大吃大喝，剩下的钱用来到处盖房子，装修教堂和圣坛。"到 1818 年，危地马拉教区的教会拥有并且运营了 914 个大庄园和 910 个糖作坊——运作这些作坊所需的设备和奴隶方面的投资，只有教会才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

城镇的生活舒适惬意，所以不难想象为何那么多神职人员都从印第安人的定居点搬到了附近的城镇上去生活。到 1750 年为止，已有

1 000名神职人员在首府定居，占到了整个城市人口的26%。这么一来，首府的神父人数过剩，而在大多数农村，一年能见到一个神父都算是走运的。那些留守在农村地区的神父也并非一心想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奇奇卡斯特南戈（Chichicastenango）的希梅内斯（Ximénez）神父抱怨说，与向土著居民布道相比，他的那些多明我会的同伴对自己的大庄园更感兴趣。很明显，住在农村的印第安人和其他人很可能因此而不能接受洗礼、不结婚、不识字，事实也确实如此。1768年，科尔特斯·伊·拉尔拉斯（Cortés y Larraz）大主教发现同居盛行，他为这样的不轨行为而深感罪恶，抱怨不已。幸运的是，1572年开始，在危地马拉施行的宗教裁判所在殖民地几乎没有影响力——在110年中，平均每年也就审理两个案件——而且没有一个案件与印第安人相关，因为按规定，印第安人不受其管理。

116

堂·迭戈·比森特（Don Diego Vicente）：教会的捐赠者

迭戈·比森特（1595？—1675？）在一个叫莫莫斯特南戈的基切族玛雅城镇里，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土著领袖。他是伊斯金·尼海夫（Izquín Nijaib）的后代。伊斯金是基切族的一位统治者，曾经带领军队对阵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在西班牙的统治下，比森特兴旺发达，拥有自己的大庄园，园内牛羊成群。虽然他已经获得了西班牙的一些特权，比如骑马、穿马刺、称自己为“堂”，但是他从头至尾都不讲西班牙语，还会在村里的祖先神庙内按照玛雅人的传统进行供奉。为了让自己继承的土地合法化，他甚至有资金专门去一趟西班牙。衣锦还乡的比森特，作为感谢，把成箱的黄金白银和一个做工精细的银质圣爵送给了莫莫斯特南戈的教堂。

——摘自罗伯特·卡马克（Robert M. Carmack，1995年，第105页）和芭芭拉·特德洛克（Barbara Tedlock，1992年，第16页）

多尼亚·胡亚纳·德·马尔多纳多·伊·帕斯（Doña Juana de Maldonado y Paz）：教会的捐赠者与男修道院一样，女修道院也因各方赞助而变得富裕，尤其是在贵族的女儿加入修院的时候，她们会随身带来大量“嫁妆”。王国内最富裕的修女可能是20岁的多尼亚·胡亚纳·德·马尔多纳多·伊·帕斯。她是检审庭一位王室法官的女儿，1632年左右加入了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的修道院。她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是位极富灵性的音乐家和诗人。她在修道院的生活过得十分舒适。她为自己和6个非洲女仆建了一个崭新而宽敞的生活区，还有一个私人花园走廊和一个小教堂，里面挂满了从罗马买来的画。她住所的许多房间里都装饰得金碧辉煌，还配了一架管风琴。她常常弹奏管风琴来取悦主教。她死后，所有这些财产都归修道院所有。

——摘自托马斯·盖奇（1958年，第190页）

117 教会的财富，以及教会对文化资源的控制都成了波旁王朝君主的目标。王室为了给自己创造更大的利益，也为了推行进步的思想、鼓励世俗的高等教育和文化体制，没收了教会的资产。同时还限制教堂的修建，并且任命世俗的神职人员到僧侣会曾经服务过的地方任职，尤其在印第安人的村落里。这些限制教会势力的举措是独立后的反教会运动的前奏。

学校和医院

教育民众、传授信仰是教会的义务。耶稣会在提供学校教育方面最为投入，但是在波旁王朝与教皇的政治对决中，1767年耶稣会被逐出了殖民地。多明我会资助建立了圣卡洛斯大学。这是殖民地内的唯一一所大学。18世纪末期，每年大约有15名学生拿到学位成功毕业。大多数的宗教修会赞助开办学校（colegios）。西班牙男孩在学校里学习读书、写字和宗教知识，而女孩则学习缝纫和唱歌的技巧。有些修会向孤儿院资助，让梅斯蒂索小孩有接受培训的机会。还有的修会教

印第安人西班牙语和天主教的教理问答（据估计，1770 年左右，在危地马拉全省的 50 万人口中，有 2 400—4 000 名印第安人进学校学习；大多数人只学习背诵经文）。

波旁国王规定，所有印第安人都必须学会用西班牙语读书写字。这一理想可歌可泣，但是几乎人人反对：印第安人不让后代学习西班牙语，因为害怕他们被同化；学习西班牙语需要花钱雇老师，城镇上下更是人人避而远之；而且，神父们必须先学习土著语言才能正常授课，他们也不情愿。在波旁王朝改革之前，危地马拉王国没有世俗学校。但即使是改革之后，殖民地内那点可怜的教育依然是教会和神父提供的。

拉法埃尔·兰迪瓦尔（Rafael Landívar，1731—1793）：克里奥尔诗人　118

拉法埃尔·兰迪瓦尔出生在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是圣卡洛斯皇家教会大学（Universidad RealyPontificia de San Carlos）最杰出的毕业生。兰迪瓦尔是耶稣会的神父，是一位教育家，也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内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描绘殖民地风景方面，也许还是最好的一位。1767 年，波旁国王卡洛斯三世在一次反教会的法令中，下令把所有耶稣会成员驱逐出殖民地，兰迪瓦尔因此被迫离开故乡。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居住时，兰迪瓦尔用拉丁文写下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墨西哥乡村》（*Rusticatio Mexicano*）。这是一部分 10 个篇章的长诗，颂扬了他的出生地危地马拉的美景。

啊，我深爱的故土，我亲爱的危地马拉，
你是我生命中的乐与爱，是我的源泉；
记着你赋予我的一切，我是多么快乐，多么滋润，
你的天空，你的泉涌，你的广场，你的教堂，你千千万万的家！
我依然能想起你那郁郁葱葱的大山
和碧绿的田野，那是上帝赐予的永恒的春天……
——摘自《墨西哥乡村》，1782 年（英语原文由拉丁文翻译而来）

一部分神父延续着早期传教士的人性化传统。他们选择住在印第

安人的村落里，不但教他们宗教文化，也尝试着保护他们免受虐待。迭戈·马科特拉（Diego Macotela）修士就是一位出色的神父。他身处哥斯达黎加的偏远农村，却于1690年说服了检审庭停止从塔拉曼卡的荒野地区抓印第安劳动力去可可种植区干活。18世纪的科尔特斯·伊·拉尔拉斯大主教谴责西班牙人和拉迪诺人对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非法剥削，还批评了印第安人的首领。但是，最著名的对穷人行善施恩者还是佩德罗·德·何塞（Pedro de José）。17世纪中叶，他在首府创建了一家医院，因此被称为美洲的圣弗朗西斯。他的善举激发了更多的善行：伯利恒会（Bethlehemite Order）作为唯一一个起源于美洲西班牙的男性宗教修会，在殖民地境内建造了17家医院和若干学校。2002年，佩德罗·德·何塞修士被正式宣布为圣徒。他是唯一一个与中美洲息息相关的天主教圣人。

西班牙留下的遗产

119

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殖民地经历若干次改革和改善，但是它的基础构架和固有的缺陷，在1700年波旁王朝开始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从地理角度来讲，整个王国几乎未被拓殖，地峡近一半地域一直没有被探索。道路和沿河的通道开发得太少，所以地峡纵向的运输效率一直没能提高，有人定居的区域也因此闭塞不已，而且地区之间互相仇恨，本不该如此。殖民体制已经建立，有时候初衷虽然非常人性化也非常开明，但都因徇私枉法而以失败告终。

在经济上，对港口的开发力度不够而影响了贸易，而且未能有效防备海盗。采矿技术几乎不存在，农业带有压迫性的封建主义特点。西班牙美洲鼓励欧洲的牛和美洲土著的靛蓝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虽然社会等级制度惩罚种族混合，但是它产生了一个种族构成越来越混杂的平民阶层。一个社会底层就此形成，而且它会延续下去。

第六章　波旁王朝与独立（1700—1823）

我们拥有肥沃的土地，但是缺少利润。我们积极工作，工业发达，但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我们交纳巨额税款，但是他们说这还不够……究竟是什么样的敌人将我们吞噬了？ 120

——立宪派的社论撰稿人，1821 年 8 月 6 日（布姆加特纳 Bumgartner，1963 年，第 139 页）

1700 年，法国的波旁王朝接替西班牙的君主统治，把整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带入了启蒙运动。波旁国王所接管的这个帝国已经因战争而破产，腐败、官僚体制也已让它腐朽不堪。卡洛斯二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他被叫做“中了妖术的人”（1665—1700）。他死后，波旁王朝先后任命了几位能干的君王，其中就包括尤其出色的卡洛斯三世（1759—1788）。理性取代了宗教裁判所；现代化改善了经济状况。政府开始考虑教育和医疗的问题。然而，虽说波旁王朝的改革从殖民地为西班牙谋得了更大的财富，但是在危地马拉王国内部激起了民众深层的愤恨，尤其在新西班牙。美国和法国革命带来了自我治理与社会平等概念，

这些启蒙运动的新思想煽诱民众的仇恨情绪，导致了印第安人反抗运动重新出现，商人开始违抗法令，克里奥尔人和神职人员也抱怨纷纷。墨西哥展开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独立战争。到了1821年，危地马拉王国作为新西班牙的一部分，发现在没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已经从西班牙独立了。

121

波旁王朝的改革

波旁王朝为了从殖民地榨取更多的财富，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把一批训练有素、薪酬昂贵的地区长官派到了殖民地，他们尤其擅长于征派苛捐杂税。此外，波旁王朝精简了官僚体制，将新西班牙的地方官员减少了60%。但与此同时，赋予了洪都拉斯省、尼加拉瓜省，还有新设的萨尔瓦多省更多的地方控制权。王室通过开辟新港口的方式刺激商业，允许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大力投资洪都拉斯矿藏的同时，鼓励发掘新矿。为了提高运输能力，跨地峡的贸易航线也得到了改善。另外，王室向洪都拉斯湾增派舰队以防走私者。

最关键的一项改革是，王室扩大了税基。不但强化了原有的政府垄断商品，还开发了新产品。这样一来，从烟、酒、火药，乃至扑克牌等产品上都能收获巨大的利润。许多作物的产量增加了，包括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哥斯达黎加种植的烟草（英国人从1761年开始就一直在莫斯基托海岸地区非法种植烟草）。王室甚至试图通过只收贡金不收贡品的办法，开创印第安人有偿劳动的先河。这就终结了委托监护制残留下来的最后一点痕迹。这些改革措施刺激了经济发展，税收收入水涨船高。随着产量的增加，1777年，危地马拉王国历史上首次销售税超过了贡赋数额。



图为危地马拉城大教堂。危地马拉城是危地马拉王国的“新”都城，1773年由波旁王朝建造。（照片提供：危地马拉旅游学会、危地马拉贸易委员会）

波旁王朝的防御

122

波旁王朝让西班牙重现了往日的辉煌和繁荣。为了防御印第安人的反抗和确保边境地区不受走私者、外来非法捕猎者的袭击，波旁国王在殖民地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加强防卫。做皮毛买卖的俄国人在加利福尼亚有了竞争对手；阿帕切人（Apaches）在亚利桑那州遭遇了扩编的自卫队；荷兰人则不得不更加谨慎行事。自从1789年特鲁希略遭到荷兰人进攻以后，王室便在洪都拉斯湾和重要河流的河口建起了诸多堡垒。而且，为了占据从加利福尼亚到莫斯基托海岸一带位置偏远但极为关键的地区，王室还专门从欧洲和美洲其他地区选派拓居者。

实际上，洪都拉斯的特鲁希略港为研究那一时期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案例。由于该港口频繁受到海盗偷袭，17世纪一度被废弃。后来，

西班牙人为了保住海岸，鼓励新的拓居者到此定居。不过，到18世纪末为止，梅斯蒂索人和白人加起来仍不到1 000人，还有几百个从加勒比岛屿逃出来的讲法语的奴隶和40个讲英语的穆拉托人。1777年，波旁王朝企图将莫斯基托海岸变成其殖民地，于是从卡纳里群岛和西班牙其他地区调派了1 300个拓居者前往该地。大多数拓居者因疾病、饥饿、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的袭击等等相继死去，但有500个幸存者到了特鲁希略避难。

由此可见，特鲁希略的人口构成已经非常混杂，但还得加上加利夫那人（Garifuna），也就是黑加勒比人（Black Caribs，他们的祖辈是非洲人和加勒比印第安人）。17世纪，加勒比印第安人与因船只失事的非洲奴隶通婚。他们通过在加勒比海卖棉花，在圣文森特岛上建立起了相对繁荣的社会。后来，英国人企图争夺该岛，因此引发了战争——最后，英国人决定将加利夫那人驱逐出境，战争告终。1797年，1 700个加利夫那人集体逃至特鲁希略这个洪都拉斯的港口。对这里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既是宝贵的劳动力又是热带农业专家，所以十分受欢迎。1804年，科马亚瓜的地方长官拉蒙·安吉亚诺（Ramón Anguiano）担心这些加利夫那人可能会与米斯基托印第安人和英国人一起给危地马拉王国制造麻烦。有些人的确如他所料，还有人为在伯利兹伐木的英国人干起了活。事实上，加利夫那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的定居点也沿着加勒比海扩散。从伯利兹的斯坦港（Stann Creek，现在叫丹格里加 Dangriga）一直到尼加拉瓜，至今仍有大约8万后代生活在那里。不过，很多加利夫那人是效忠于西班牙人的，而且反复为王室而战。科洛内尔·佩德罗·格雷戈里奥（Colonel Pedro Gregorío）是黑加勒比人，1819年他领导一支全由加利夫那人组成的游击队在洪都拉斯湾的圣费利佩堡（San Felipe fort）展开激战。也有人以自卫队为单位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征战。甚至在殖民地宣布独立以后，他们仍然为王室而战。



图为马蒂亚斯·德·加尔维斯（Matías de Gálvez）上将。（照片提供：萨尔瓦多教育部）

波旁王朝与英国人

123

无论在哪儿，无论是谁，只要想打边境地区的主意，西班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中美洲，西班牙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至少短期内做到了。1777 年，西班牙在中美洲殖民地境内的自卫队规模翻番，还增派了炮兵部队。马蒂亚斯·德·加尔维斯（Matías de Gálvez）上将是 1779 年

到1783年的检审庭庭长。在像他这样的军事领袖的带领下，危地马拉王国有足够的实力将英国人从大部分地区赶出去。但是在罗阿坦岛（Roatan Island）和莫斯基托海岸，则需要与走私分子打拉锯战。在1783年的《巴黎和约》中，英国同意从这些地区撤离，条件是允许他们在伯利兹伐木。尽管如此，西班牙最终还是靠打仗才得以把英国人和他们的奴隶从莫斯基托海岸的定居点彻底清除，比如在布卢菲尔兹（Bluefields）。西班牙借此显示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此后十多年，英国都没有再试图占据这些地区。然而，英国的走私贸易开展得如火如荼，其同盟米斯基托印第安人又在哥斯达黎加的可可种植区大肆劫掠，一直持续至19世纪，西班牙一手打下的江山随之被破坏。不过，此时的西班牙波旁王朝已经恢复了殖民地的经济，而且对殖民地的边境地区有了更牢固的掌控。只是欧洲的战争很快就会将这一切瓦解。

124
125

边境上的定居点——英国人在伯利兹

英国的定居者携妻儿和仆人来到殖民地，住在圣乔治岛（St George's Key），那儿有一个非常好的港口……虽然对定居者来说，这个岛主要为居住之用，但他们也开辟了一些种植区，不过只是偶尔会去视察。他们雇来奴隶在种植区内砍伐原木，费用也是越来越高……

——1779年致达林（Dalling）总督的信［博兰（Bolland），1977年，第30页］

伯利兹的圣乔治岛是英国人在中美洲的沿海地区中最中意的一个定居点。第一批定居者被称为湾民，他们其实是以前的海盗，后来发现伐木比做海盗安全一些。18世纪时，共有3 500人在此居住，其中3 000人都是奴隶。虽然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英国人都已经被西班牙赶了出去，1779年，圣乔治岛的所有权事实上也已被西班牙人夺得；但在伯利兹，英国人得到了特许。其实英国人从未真正离开加勒比海，

直到20世纪仍试图控制这一地区。西班牙和英国再一次陷入战争。1798年，英国人在圣乔治岛的定居点遭到西班牙的进攻。西班牙战败，从此放弃将英国人赶出伯利兹。然而，18世纪末期，英国人遭遇新的阻力，因为随着欧洲市场对桃花心木的需求越来越高，英国伐木者沿河流向内陆推进，侵占了在此隐居的玛雅人的土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伐木场不断遭到玛雅人的猛烈攻击，甚至需要出动英国军队来防卫。到1820年的时候，玛雅人退居到了更隐蔽的热带雨林深处。但是玛雅人和伐木者之间的争端还在继续。1996年，在哥伦比亚河森林保护区伐木的马来西亚人就激起了莫潘玛雅人的抵制。

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

……一个生在大山里的人，他生活的地方远离政府，不用承担社会责任。他的自由……

——卡洛斯·蒙赫·阿尔法罗（Carlos Monge Alfaro）（爱德曼和凯南 Edelman and Kenen，1989年，第2页）

哥斯达黎加肥沃的中央高地以及它的首府卡塔戈（Cartago）由于缺乏印第安劳动力，而且地理位置远离殖民地的权力中心，一直非常贫穷。1720年，哥斯达黎加全境只有3 500个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以及不到1 000个印第安人，其中多数还维持着极其独立的状态。在这样的条件下，西班牙人不得不自力更生——为了养家糊口，连总督都得亲自耕种田地。同样因为印第安人实在太少，教会也非常有限。哥斯达黎加成了一个由劳动的克里奥尔人农民组成的社会。虽然一些可可种植商和王室官员组成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权贵阶级（说是权贵，但很贫穷），但封建阶级、精细的教会等级制度这些在美洲西班牙的其他地区非常典型的现象在哥斯达黎加从未能真正形成。20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罗德里戈·法西奥（Rodrigo Facio）和卡洛斯·蒙赫·阿尔

> 法罗认为殖民地时期的这一现实是现代哥斯达黎加民主体制的基础，而在中美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明显没有这样的体制。在波旁王朝的推动之下，高地上的殖民者除了种植小麦以外，还种植烟草。这么一来，就有新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来此定居、劳动。该地区人口激增，以至于新建了阿拉胡埃拉（Alajuela，建于1706年）和圣何塞（建于1736年）两座城镇来缓解拥挤。王室为了垄断烟草贸易，还专门在此设立了办事处。几乎整个世纪，在卡塔戈的西班牙人不到100个。独立之前，在中央高地（Meseta Central），每平方英里才超过100人。然而，地区经济极度不发达，整个殖民地时期，一直把可可豆当做货币使用。地理位置的偏远无法改变，宣布独立以后一个月，消息才传到了哥斯达黎加。

126

对波旁王朝的抵制

波旁王朝的改革一开始成功改善了西班牙的经济状况，但是在殖民地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克里奥尔人和拉迪诺人因改革而变得一贫如洗，为此十分不满。改革还激起印第安人的反抗，而且王室企图削减教会的势力和财富，所以与教会的关系也濒临破裂。1756年，西班牙对酒的消费进行管制，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随即发生暴乱。1766年由于税费提高和烟草垄断形成，更多的动乱爆发。王室的政策鼓励出口，但是广大民众生产的食品和货物主要供给本地市场，所以几乎不能从王室的政策上受益。在各省之间的交流或贸易方面，基础设施的加强也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开始的时候，西班牙舰队在殖民地的势力还非常强大，走私贸易受阻，很多在首府的贵族商人都因此受到不利的影响。他们对新增的港口税也大为恼怒。不过，当他们正式晋级成立商会（Consulado）或者加入商人行会的时候，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商人行会成立于1792年，有自己的特别法庭，目的是解决商业争端。另外，他们也承担了一部分改善王国商业的责任。

行会内的商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但也有一些克里奥尔人。不管属于哪个群体，他们都是殖民地内最富有也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西班牙通过商会授权给他们，这样一来，与王国内其他团体的关系就有所恶化，甚至包括首府的那批思想先进、要求自由贸易的克里奥尔商人。行会商人富裕了，但是牺牲了各省的克里奥尔人和拉迪诺人。比如，行会商人修桥铺路，但修的只是对他们的投资有利的路线，像是与西班牙的商人贸易时或从洪都拉斯湾的港口出口货物时所走的路线。他们把大部分靛蓝贸易的利润都占为己有，很多小的家庭农场因此无路可走，负债累累。而小农场一般为拉迪诺人所有，粮食产量占到了总额的2/3。贵族商人的商业诈骗和贪得无厌，也间接导致了洪都拉斯采矿主的穷困潦倒。

税基的增大和收缴效率的提高，不仅榨干了殖民地的资金，也严重影响了民众。波旁王朝的高效率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公共机关少了，或者有时候，克里奥尔人突然发现自己已被政府除名，而分给他们的职位原本就少得可怜。过去太多的人因腐败行为而大发横财，精简后的官僚体制对此是一个有效的打击。印第安人的村落也直接受到官僚体制精简的影响，因为不再需要土著领袖去收集贡赋了。一些极度认真负责的官员甚至连过去到期未付的那部分也企图重新收缴。王室禁止教会收受印第安人的贡赋，因此激怒了教会。另外，王室要求来自兄弟会的资助也需要交税，神职人员和印第安人都因此愤怒不已。因为兄弟会的资助对玛雅人来说是来之不易的一笔财富，而对教会来说也构成了其1/3的资金。

玛雅人的反抗

127

玛雅人不想要任何西班牙人的东西，不要他们的宗教信条，也不要他们的社会习俗。

——佩德罗·科尔特斯·伊·拉尔拉斯大主教（Archbishop Pedro Cortes y Larraz）1770年给国王的报告（卡尔森，1997年，第71页）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印第安人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意味着冲突在节节攀升。托钵会修士已经通过和平方式接受了印第安人的习俗，但在世俗教士严厉的监视下他们被撤换掉了。世俗教士对印第安人祭拜神圣的祖山、节日里大肆喝酒大跳传统舞蹈等土著习俗比较不能容忍。冲突通常导致流血牺牲。1712 年发生在特塞尔塔尔（Tzeltal）的那次印第安人起义持续了两年时间，因西班牙人镇压当地的一个崇拜圣母玛利亚的宗教团体而起，是殖民地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印第安人反抗活动。虽然并不是所有印第安人的反抗都那么暴力和持久，但是在殖民地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反抗常常发生。

莫莫斯特南戈的基切族印第安人就不断受到检审庭官员和自卫队的密切监视。1770 年，科尔特斯·伊·拉尔拉斯主教把他们形容为胆大的异教徒。莫莫斯特南戈的反抗者在任何事情上都能与官员引起冲突，从村庄的管理、土地到裸体洗澡的习俗。然而，最能撩起他们的怒火的还是贡赋和改宗的要求。1785 年，世俗的教士企图更改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要求他们参加弥撒，不允许他们跳传统的舞蹈，到最后不得不叫来自卫队才能维持秩序。1803 年，一个新教士又激起了类似的事件，不得不被撤掉。同年，玛雅人的土著领袖拒交贡赋，连迭戈·比森特捐赠给教堂的圣爵都要上税，这一点特别让他耿耿于怀（见本书原文 114 页）。这位领袖被戴上镣铐抓进监狱关了两个月。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尽管惩罚中多加了 50 下鞭笞，他依然拒付。西班牙的自由人士主张废除进贡制度。与此同时，在莫莫斯特南戈持续的反抗运动中出现了要求独立的呼声。1810 年，整个印第安村落奋起反抗，把关在大牢里的基切族领袖胡安·比森特拯救了出来。反抗运动不断爆发。1820 年，莫莫斯特南戈的 600 名男女老少与其他村落一起，在危地马拉西部高地上发起了一次本土主义的起义。他们在新晋封的基切族国王——来自托托尼卡潘（Totonicapan）的阿塔纳西奥·特苏尔（Atanasio Tzul）的带领下对战西班牙的自卫队，但是失败了。在殖民地，当大部分地区都只是谈论对王室的抵抗之时，基切玛雅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不断挑战权威，直到获得独立。

克里奥尔的知识分子——何塞·德尔·巴列（José del Valle）

美洲不应该落后欧洲一个世纪：开始它会与欧洲并肩前行，之后再超越；到最后，科学将让它变成最先进的地方，就像在太阳下它一直是最耀眼的明星。

——何塞·德尔·巴列，《祖国之友》，1821年（佩雷斯·布里格诺利 Pérez Brignoli，1989年，第64页）

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José Cecilio del Valle，1776—1834）是独立时期和共和国早期首都知识分子圈内的一位重要成员。他出生在洪都拉斯的乔卢特卡（Choluteca）牧区，父母很富有，都是克里奥尔人。1789年，为了巴列能够接受大学教育，举家迁至危地马拉城。他就读于圣卡洛斯大学。教授当中包括了多位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启蒙思想家，比如何塞·列恩多·伊·戈伊凯切亚（José Liendo y Goicoechea）修士，他是哥斯达黎加的一位克里奥尔人，把科学推理运用了中美洲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当中。巴列的时代重视科学和政治研究。巴列以物理学的学位毕业，之后为了进入政府发展事业又攻读了法学学位。他为自由派报纸《危地马拉公报》撰写科学、教育、民主等方面的文章，在自由贸易、自由言论和民主原则等领域对知识分子阶层有一定影响力。作为一个克里奥尔人，在西班牙王国他一直被当成二等公民，但是巴列却不以为然，反而对出生地的美洲特征、自然风光、西班牙征服前的文明等感到分外自豪。但是巴列和所有官僚体制下的克里奥尔人一样，对王室一直忠贞不渝。他甚至还是何塞·德·布斯塔曼特（José de Bustamante）的秘书。布斯塔曼特在1811年到1818年间任检审庭庭长，为人专横保守，被人所鄙视。在任秘书期间，他为政府删减《危地马拉公报》的内容。巴列虽然是保守派最

重要的发言人，但是1820年，他开始在自己的报纸《祖国之友》上主张独立。1821年，还起草了中美洲的独立宣言。在独立后的头几十年中，巴列是新国家首要政治家之一。1834年，他当选为中美洲联邦（Federation of Central America）的总统，但是未等投票合计公布便撒手人寰。



图为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José Cecilio del Valle）。（临摹自1825年左右的肖像，作者匿名，现存放于哥斯达黎加博物馆）

不满的加剧

已然河流因泉水的注入而溢出，已然街道因人们而充满活力，已然那盼望已久的美好的和平在我的国家扎根……

——拉法埃尔·兰迪瓦尔，1781 年（译自《墨西哥乡村》）

18 世纪末期，反抗的火种开始生长。周报《危地马拉公报》（*Gazeta de Guatemala*，出版于 1793 年至 1816 年间）等报纸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传播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国家经济之友协会（Sociedad Económica de Amigos del País，设立于 1794 年）等启蒙运动的机构成了讨论自由贸易和君主制弊端的聚会场所。圣卡洛斯大学的教师和毕业生积极鼓动把对政治经济的科学研究加入到课程当中。克里奥尔人也越来越为自己的美洲身份而感到自豪：拉法埃尔·兰迪瓦尔等诗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片土地之美；知识分子撰写了地区历史。不过，首都的贵族克里奥尔人因为一直受西班牙政策的优厚待遇，希望改革能让他们与半岛人平起平坐。1808 年他们向政府请愿，要求委任一名克里奥尔人为危地马拉城的大主教，但是没有被理睬。殖民地已经蠢蠢欲动，但是在最有权势的克里奥人中，对要不要独立达不成共识。

130 经济的增长加剧了对西班牙的不满。法国革命之后，西班牙陷入了几乎无休止的拿破仑战争。西班牙一度无法自己派船，便允许殖民地与国外势力进行贸易，但必须是中立的势力，尤其是新近独立的美国。中美洲在波士顿、费城和英国等地找到了一些出口伙伴。英国从前是中美洲的走私伙伴，后来又成了西班牙的同盟。1800 年西班牙撤销了许可权，殖民地不得不放弃靛蓝、白银、可可等贸易，但是并不容易。西班牙还强迫殖民地出资为欧洲的战争买单，但是殖民地并没有轻易答应“爱国贷款”。

19 世纪早期，经济萧条再次出现，可谓火上浇油。靛蓝市场崩溃，正式的出口额从 1810 年的 100 万比索下降至 1820 年的 50 万。小的农场主因欠债未还，商人取消了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许多牛牧场

也被关闭了。与此同时，人口不断增长，到1825年已经达到了100多万。造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土地之争，包括印第安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庄稼歉收，加上过多的土地都投入了靛蓝种植，结果造成了大范围食物紧缺。很多外省居民开始相信，殖民地与西班牙的利益已不再一致。

动乱中的西班牙

1808年到1821年，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经济状况袖手旁观。拿破仑入侵西班牙，1808年波旁王朝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迫退位。费迪南德流亡以后，拿破仑将自己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安排在了马德里的西班牙王位上。西班牙人不接受由一个篡位者来统治，于是成立了一个军政府，来代替费迪南德管理国家，并宣布对法国开战。殖民地仍然被波旁王朝委任的官员统治，宣誓效忠军政府。安东尼奥·贡萨莱斯（Antonio González）将军，同时也是1804年到1810年的检审庭庭长，考虑到眼下动荡的情形，在危地马拉城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公开会议，邀请所有相关人士参加。他邀请的人都是王国内能够左右时局的人物：检审庭的法官与市议员、大主教与教会理事会的成员和部分修道院的代表、圣卡洛斯大学的校长、自卫队首领以及商人行会的会长。他们一起投票，决定支持军政府。

事实证明，军政府在政治上比波旁王朝国王和殖民地长官要自由开放得多。军政府要求墨西哥和其他殖民地独立，通过这种方式建议（也许说服更合适）政府当中加入了美洲人的代表，不过不是按照人口比例（印第安人口不在计算范围之内）。而且，要求美洲不再以殖民地的身份遭受剥削。圣卡洛斯大学的教授——安东尼奥·德·拉尔拉萨巴尔（Antonio de Larrazábal）博士是挑选出来的几名代表之一，他在西班牙卡迪斯的宪法大会上代表危地马拉王国。他于1810年11月23日启程离开危地马拉，但是殖民地交通落后，直到1811年8月17日才抵达西班牙，此时许多商议已经结束。1812年3月，宪法颁布，建立了自由贸易体系，限制了教会的权势，成立了与代议制议会分享权力的君主立宪制。

1812 年宪法吸收了启蒙运动中的一些最理想的准则，但是费迪南德七世信奉的是君主制的绝对权力，他在殖民地的更为保守的拥护者也是如此。所以 1814 年费迪南德复辟之后，立刻废止了 1812 年宪法。然而，自由党已经习惯了代议制的政府。内部冲突爆发，1820 年以国王接受宪法告终。

在危地马拉王国的统治阶层中，也分为保守和自由这样两种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多方的较量：王室的官僚体制与当地选举产生的市议会之间、主张贸易保护的商人行会与倡导自由贸易的靛蓝种植商之间、半岛人和教会与刚刚致富的克里奥尔人和省级贵族之间。所有这些冲突的观念将导致两大对立党派的产生、煽动内战，最后摧毁独立的共和国。

独立

在墨西哥和南美洲，自由党掀开了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战争。1810 年，随着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加入战役，对抗一直以来压榨他们的保皇势力，意味着战争席卷了整个美洲大陆。在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的带领下，1819 年哥伦比亚（包括巴拿马在内）打败了西班牙。1821 年 2 月，墨西哥获得独立。在危地马拉王国，独立对各省来说也时时放在心上：萨尔瓦多被附近都城里的半岛人的傲慢激怒；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也能看到些许抗议。偶尔也会有反抗活动爆发，但是缺乏广泛的支持所以很容易被镇压，由何塞·马蒂亚斯·德尔加多（José Matías Delgado）神父及其侄子曼努埃尔·何塞·阿尔塞（Manuel Jose Arce，后来成为中美洲独立后的首位领导人）领导的反抗运动 1811 年就非常迅速地被镇压了。

1808 年到 1821 年是非常关键的几年，尽管危地马拉王国四周为独立战争所围绕，但却保持着比较安静的状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王国分成了很多省份，而且省与省之间、城市之间互不往来。另外一个导致独立不能在王国大范围展开的原因是何塞·布斯塔曼特·伊·古埃尔拉（José Bustamante y Guerra）。他是 1812 年宪法之下的检审庭 132

庭长（1811—1818），为人顽固不化，十分保守。他相信自由党代表着堕落，所以就像他说过的那样，需要用“铁燎和火刑”牢牢予以监控。这位毫不退让的君主主义者还有一位和他一样保守的同伴——拉蒙·卡绍斯·托尔雷斯·伊·普拉萨斯（Ramon Casaus Torres y Plazas）大主教，他视自由派神父为异教徒。

布斯塔曼特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手段来阻止一切反对西班牙的言行。合法支持1812年宪法的贵族克里奥尔人，发现自己常有的特权被剥夺了；有一些甚至被削除官职关进了监狱。有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来“预防”有碍公共秩序的犯罪活动；私人集会被驱散；还派遣了一支自卫队到墨西哥边境，一切革命派的东西都休想进入中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的自由派人士施行自由言论和自由贸易，但是布斯塔曼特对此不屑一顾，就像他无视宪法中的许多条款一样，对《危地马拉公报》的内容照删不误，还干预对外贸易，对他来说，那简直跟走私没有区别。

他的所作所为不但引起强烈不满，还导致他的敌人自发联合起来对付他。从贵族阿伊西内纳（Aycinena）家族到更激进一些的克里奥尔人，每个人都想让布斯塔曼特下台。他们计划在1813年的圣诞节那天发动政变。但是，布斯塔曼特知道了这件事，逮捕了密谋者。之后，圣萨尔瓦多企图发动起义。费迪南德重登王位以后，布斯塔曼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决叛乱者，无论是神父还是非贵族成员，一个都不放过。但是克里奥尔人最终还是赢了：尽管布斯塔曼特坚持不懈地支持君主专制，费迪南德七世还是把他撤了。

133 西班牙殖民地的终结

美洲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半边天。

——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1813年［惠特克（Whitaker），1954年，第29页］

到了1818年布斯塔曼特被撤换的时候，独立已是大势所趋。西班

牙官僚体制已经混乱不堪，保守派费迪南德七世惹怒了自由派。1820年，对1812年宪法的重新肯定让保守派无比憎恶，因为他们眼里只想看到君主专制的一切旧传统。虽然自由派想要的是独立和自由贸易，保守派希望推行逐步自治和贸易保护。另外，人们的反抗运动也让西班牙越来越闻风丧胆，在一些基切族村落里，反抗已经出现。到了1821年，尽管贵族阶层立场不同，但是连他们也认为独立和随即而来的选举，能够给予他们一直追求的解脱。

1821年夏秋之交，墨西哥军队出现在危地马拉边境，要求作为新西班牙一部分的危地马拉王国加入到已经独立的墨西哥。本来对独立还有些许疑虑的中美洲人也不再犹豫。在没有遇到殖民者或者西班牙官员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危地马拉王国宣布从西班牙独立。

从西班牙政府独立，是危地马拉王国民众普遍的自觉意愿。

——《独立法案》1821年，9月15日

第七章　中美洲联邦（1823—1839）

134　（中美洲）处于两大洋之间，这个绝佳的位置总有一天能把它变成世界的汇集点。中美洲的运河将会缩短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加强与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商贸纽带，也将带来五湖四海对这片欢乐的土地的向往。也许有一天，世界的首都也会落座在这里，就像康斯坦丁[①]（Constantine）曾经宣称拜占庭是古代世界的中心一样。

——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815 年［哈格蒂（Haggerty），1990 年，第 7 页］

但要达到权力的顶峰，攀越崎岖的高山是不可避免的。

——何塞·德尔·巴列，1815 年（佩雷斯·布里格诺利，1989 年，第 67 页）

没等中美洲各省决定好未来如何发展，独立已经来到，不过他们乐观地讨论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政治可能性。然而，地峡的独立不是通过长期的斗争得来的，所以似乎缺乏一种国家特性或者团结意识。一开始，中美洲依附于新的墨西哥帝国，这与独立前它一直作为新西班牙的一部分是类似的。然后，地峡各省联合成立了一个联邦国家。但

① 另译君士坦丁大帝。——译者注

是长达3个世纪的危地马拉王国时期造成了各省之间的分歧和政治上的不均衡，事实证明这些障碍无法逾越。独立早期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斥着矛盾。省份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在军队成形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唯有让对手倒在血泊之中才能达成心目中的理想形式。联邦瓦解了，但是统一地峡的理想没有破灭。

被墨西哥并吞

135

我的目的是要向您展示，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目前的利益是多么一致，简直无法区分，所以他们不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各自为营，否则一定会给彼此的安全带来隐患……

——奥古斯丁·伊图尔维德（Agustín Iturbide）国王，1821年，11月27日（布姆加特纳，1963年，第163页）

新成立的中美洲国家独立于西班牙，但是不独立于墨西哥。墨西哥在宣布独立的时候，新成立的帝国吞并了新西班牙的所有省份。中美洲对墨西哥这一威胁背后的含义一清二楚，所以宣布自己为墨西哥帝国的一部分。中美洲没有资源可以抵抗它的邻居，所以全盘接受墨西哥军队进驻危地马拉城，由墨西哥的一位准将文森特·菲利索拉（Vicente Filísola）管辖。幸运的是，墨西哥宪法中的许多条款都让中美洲人民受益，包括所有奴役、进贡制度的废除和自由贸易的建立。

对于墨西哥的吞并，虽然中美洲境内的很多利益团体和地区觉得这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案，但其实存在不同的意见。绝大多数市镇议会拥护这一做法，还选举议员参加墨西哥议会。备受敬仰的何塞·德尔·巴列就是议员中最著名的代表。保守派大多赞成吞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保留自己的权利，就如同当年在西班牙的羽翼之下，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戴皇冠的是一个克里奥尔人。他们相信土生土长的国王——奥古斯丁·伊图尔维德能够实现足够的中央集权，以扼杀省份之间威胁到地峡统一的冲突势

力。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墨西哥的财富，认为墨西哥能帮助中美洲加强经济发展。

吞并一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广大的印第安人和农村穷人形同虚设。但是，西部高地上的一些族群，比如莫莫斯特南戈的基切人，他们积极支持吞并，对菲利索拉非常之拥戴。因为他答应让反抗的玛雅人自己掌管地方事务。哥斯达黎加宣布中立。反对吞并者包括特古西加尔帕和格拉纳达等重要城市，以及一些激情澎湃的自由派人士，比如危地马拉的佩德罗·莫利纳（Pedro Molina）、萨尔瓦多的米格尔·何塞·阿尔塞（Miguel Jose Arce）。圣萨尔瓦多竟然宣布想要依附于美国而不是墨西哥。很快，驻扎在圣萨尔瓦多的墨西哥军队就将其占领，不留任何反抗的余地。

136

1823年菲利索拉成功地吞并了萨尔瓦多，但当时的墨西哥根本无心为中美洲而战，甚至养不起驻扎在危地马拉城的军队，在格拉纳达或者遥远的哥斯达黎加就更说不上什么服从军队了。事实证明，与其说伊图尔维德是一位君主，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小丑。萨尔瓦多叛乱后不久，国王就被罢免了。作为省督，菲利索拉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根据墨西哥宪法召集中美洲议会（Central American Parliament）。1823年7月1日，议会召开，随即宣布脱离墨西哥正式独立。恰帕斯作为唯一反对独立的省份，留在了墨西哥。然而，为了赶走滞留在首都的那些不受酬的墨西哥军队，危地马拉城的居民不得不募集几千比索为他们北上买单。

联邦的成立

一旦脱离墨西哥，中美洲面对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各种利益的冲击。这个刚刚结束殖民地的地区，没有国王，没有国库，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统一，要么分成5个自治州，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尽管伯利兹的沿海地区被英国人占领，但理论上它仍属于危地马拉；巴拿马则属于哥伦比亚）。

菲利索拉的议会演变成了制宪会议，乐观地宣布以上帝、统一和

自由的名义成立一个新主权国家——中美洲联合省。这一决议体现了共和国最初几年的希望和实践。中美洲人满脑子都是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想主义，他们乐此不疲地辩论着哪里才是未来最好的发展方向。大家都明白，单个省地域狭小、经济薄弱，作为主权国家生存下去会很困难。所以任性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认真地商量，以防地峡再次分裂。尽管制宪会议中保守派占多数（46 名保守派和 13 名自由派成员），但 1824 年 11 月 22 日还是在参考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制原则的基础上，表决通过了一部自由的宪法。另外从伦敦一家银行协商贷款了 500 万比索以充国库。

137 联合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便是各省对危地马拉城的既得利益有所不信任。这个问题反复出现，最终联邦首都不得不改迁至圣萨尔瓦多。对于一个代表制政府来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障碍。那就是各成员之间在人口和地理面积上的不均衡。危地马拉作为权力的中心已经备受芥蒂，其人口又占到了总人口的 40%。1825 年联邦议会召开的时候，各省的议员人数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危地马拉 18 人、萨尔瓦多 9 人、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各 6 人，而哥斯达黎加只有 2 人。虽然参议院在这一问题上有所均衡，每个州都占两个席位，但是在立法机关，危地马拉依然占据多数优势，在其他省看来这依然是个问题。

中美洲联合省的人口

	联邦 *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城
印第安人	836 869	358 484	20 814	7 800	不详
拉迪诺人	399 122	不详	146 339	不详	不详
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	51 500	不详	6 960	不详	不详
总计	1 287 491	512 120	174 213 **	60 000 ***	23 33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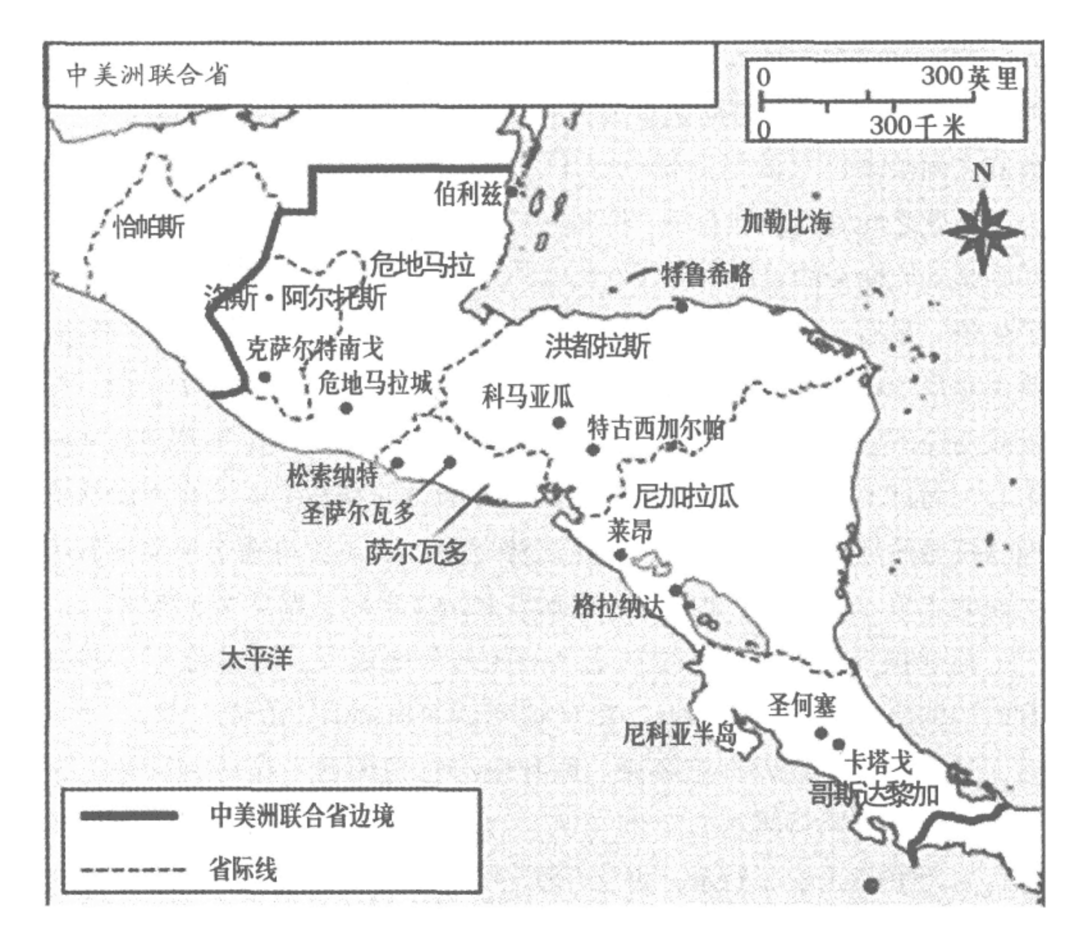
* 这一时期的人口数据有多个版本。据观察家斯奎尔（E. G. Squier）所说："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数据是不完全的或者完全空缺。"（1855 年，第 52 页）1825 年的联邦人口总数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得出，危地马拉的人口数量也是如此得来。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各族相对的人口规模表示同意。他们坚信在 19 世纪的进程中，除哥斯达黎加外，白人越来越少。在哥斯达黎加，克里奥尔人的数量一直占主导地位。1823 年，尼加拉瓜的拉迪诺人比例最高（84%）；萨尔瓦多的比例也比较高，达到 54%。19 世纪中叶开始，洪都拉斯超过一半人口是印第安人。城市人口中，梅斯蒂索人占据多数；绝大多数印第安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在危地马拉，直到今天，印第安人口的数量依然接近多数。

* * 在萨拉维亚（Sarabia）的基础上得出的 1823 年总人口（斯奎尔，1855 年）；关于种族分布的估计数字。

* * * 根据代表分布得出的 1823 年的估计数字（托雷斯·里瓦斯，Torres Rivas）；它是联邦中最小的省；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根据 1836 年的一个报告得出（托雷斯·里瓦斯），报告还指出大多数印第安人零散地生活在丛林里。

* * * * 1825 年人口普查。

138 各州之间的边界重新修改，部分更改得以和平解决。危地马拉把太平洋沿海肥沃的松索纳特（Sonsonate）给了萨尔瓦多，同时考虑把西部高地的一部分划出去成立第六个州，叫做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洛斯·阿尔托斯会以危地马拉第二大城市克萨尔特南戈为首府，所以人口达到 20 多万，比危地马拉以外其他任何一个省的人口还要多。然而，出于害怕这一基切族的地区会脱离主体（他们的确这么做过，只不过时间很短，从 1838 年到 1939 年），建立洛斯·阿尔托斯的最终决策一拖再拖。哥斯达黎加正式从尼加拉瓜分离出来，同时兼并了尼加拉瓜的瓜纳卡斯特（Guanacaste）地区，包括尼科亚半岛在内。然而，其他州的边界直到 20 世纪仍有分歧，尤其是在莫斯基蒂亚和伯利兹等涉及英国利益的地区。究其原因，不是简单的领地范围上的争端，而是对地峡的地形地貌的无知。虽然各州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均衡的局面也没有改变，但事实证明通过联邦的方式，关键时候妥协是可以做到的，就像在起草宪法时，他们就彼此做出了让步。



恰帕斯从中美洲联邦分离出去，归墨西哥所有。联邦内部，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边界线有所修改，还从较大的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划分出来一个全新的而短暂的洛斯·阿尔托斯州。由于独立时期地峡近一半地区仍处于原始状态，联邦在尽其所能为各州划定边界线时，很大程度上靠推猜（直到21世纪，边界才得以完全裁定）。斯奎尔是19世纪来自北美的一位旅行家，他观察到："……中美洲早期的地图……从地理的角度来讲只能说是一团糟……内陆的地理环境和一百年前一样令人费解。"（1855年，第8章）

各州与联邦之间的对抗

139

人们的无知、当地的竞争、缺乏公共资金……给最高政府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国会议员胡安·林多·塞拉亚（Juan Lindo Zelaya），1824年（布姆加特纳，1963年，第211页）

制宪会议想法设法塑造中美洲未来，但与此同时，各省之内的利益冲突愈益恶化。除了哥斯达黎加，在其他省内，贵族家族与邻近的地方政府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情绪浮上水面，为了争取新政府体制下的权力，彼此之间发生激烈竞争。科马亚瓜是洪都拉斯的省会，特古西加尔帕则是欣欣向荣的经济中心。它们为争夺洪都拉斯的控制权，不惜展开了战争。最后，决定两个城市每隔一年轮流做省会，战争才得以平息。莱昂是尼加拉瓜的一个自由派城市，也是中美洲第二所大学所在地，与贵族的经济要塞格拉纳达之间也有残酷的争斗。危地马拉是西部高地的中心，而且不断壮大。保守派在克萨尔特南戈的利益削弱了自由派在危地马拉城的利益。所见之处，尽是权势之争，甚至可追溯至早期征服者之间的竞争。权力中心的缺乏，对所有的争端来说，真是火上浇油。

尼加拉瓜的莱昂与格拉纳达之间的战争的爆发，充分显示了联合政府的弱点。直到 1857 年，在马那瓜（Managua）成立一个中立省会，这场冲突才得以真正解决。联邦政府希望派遣一位谈判代表，但是萨尔瓦多却坚持派遣自己的军队，这么做是对宪法的公然违抗。萨尔瓦多单方面采取了行动，并于 1825 年 1 月带来了短暂的和平。这对联邦政府来说，是个悲剧。

140
141

爱国主义与玛雅文明遗址（1834）

有了对纪念碑和古代遗迹的描述，这个国家的历史显得更加崇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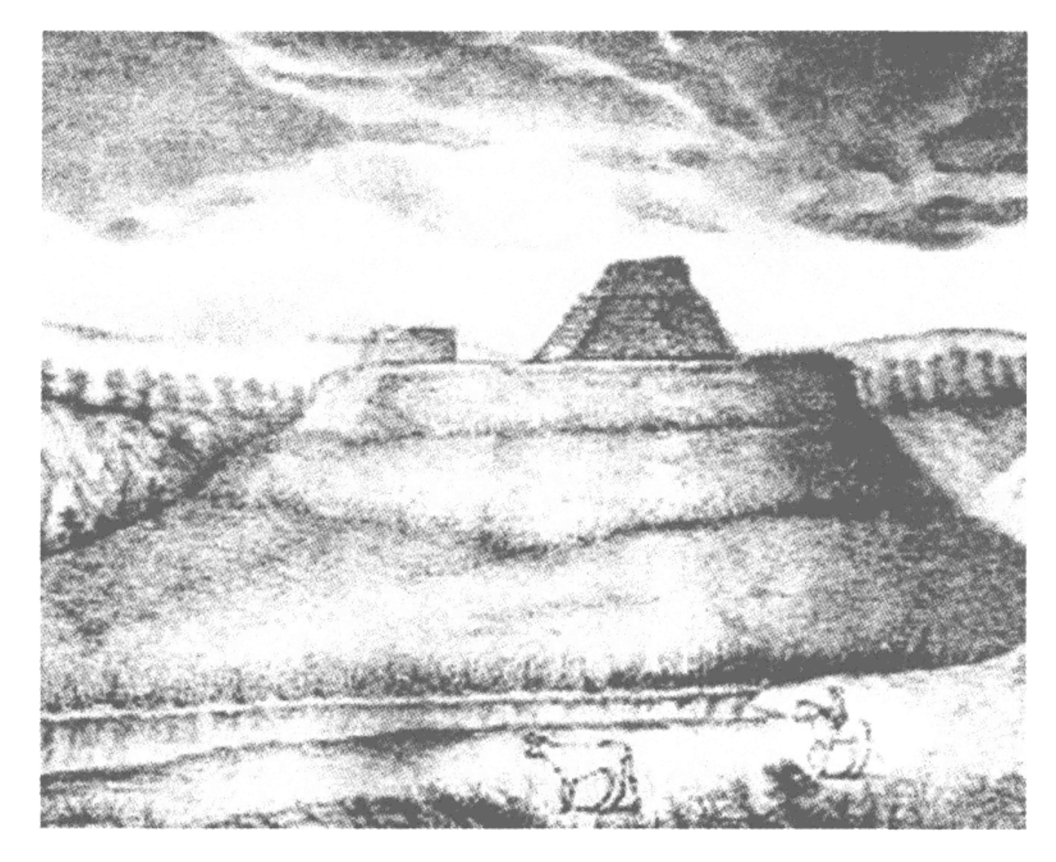
——1834 年联邦法令（钦奇利亚，1998 年，第 380 页）

……我跟着向导，他带领着我们穿越茂密的森林……来到大山……这些大山宛如巧夺天工的工艺品，堪比埃及最秀美的大山……这里有个被掩埋了的城市——科潘，一片寂静。唯有猴子在树枝上蹿跃，发出的声响显得格外突兀。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1839 年（第 1 章，第 103 页）

正当中美洲联邦政府竭力统一地峡之时，危地马拉采取行动来强化它的定位。危地马拉省自由党领导人马里亚诺·加尔维斯（Mariano Galvez）委托一批历史学家为前殖民地撰写历史，还资助了美洲大陆上最早的一些考古探险行动。他坚信与欧洲国家的历史相比，危地马拉的过去由于前哥伦布时期留下来的遗产定会更加古老而令人向往。1834年，米格尔·里维拉·马埃斯特雷（Miguel Rivera Maestre）对乌塔特兰和伊西姆切（Iximche）两大玛雅遗址的探险也是由加尔维斯资助的。与此同时，胡安·加林多（Juan Galindo）上校奉命考察科潘。随后加林多在巴黎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见闻。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也发表了有关伟大的玛雅遗址的旅游日志。因此一时间，国际社会对前哥伦布时期文明的认可极大地增强了当地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征服前文明的崇敬往往不代表现存的玛雅人就能受到同等的尊敬。据斯蒂芬斯观察，玛雅人的处境今非昔比，有些玛雅人甚至不敢相信他们曾经就是科潘这样宏伟的城市的缔造者。然而，自由宪法确实赋予了印第安人与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平等的公民地位。在一个新的国家树立其特性的关键时刻，克里奥尔人政客剥夺玛雅人的遗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以前，危地马拉省没有再资助别的考古探索。

——摘自奥斯瓦尔多·钦奇利亚·马扎里埃戈斯（Oswaldo Chinchilla Mazariegos，1998年）



图为乌塔特兰一个堡垒的景观。[朱利安·法利亚（Julián Falla）根据里维拉·伊·马埃斯特雷（Rivera y Maestre）1834年的写生画所作的平版印刷图]

税收也是一个痼疾。如果没有各州的财政支持，国会绝不会赋予政府足够的行使权。举例来说，烟草的垄断分给了各省，条件是它们把一定比例的收入付给联邦政府，但各省基本上选择无视此条款。它们对中央政府持深刻的怀疑态度，所以似乎很愿意看到政府破产。而且越来越明显，大多数国会议员掌控着自己省内的那部分狭隘的利益，而不关心共和国的利益。

142 国会还使用手段控制了第一届总统选举。国会预感到德高望重的政客何塞·德尔·巴列对此次选举志在必得，因此通过推举无数候选者的方式，企图分散巴列的得票数。当时的选举最终表决权归国会所有，保守派议员计划选择一位最便于他们控制的候选人。最终，巴列还是众望所归，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但是，国会利用技术性细则

宣布巴列的得票无效。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是曼努埃尔·何塞·阿尔塞（Manuel Jose Arce）。他本该是来自萨尔瓦多的一名自由派，但是从保守派得到的选票比他们的保守派同事巴列还要多。就这样，中美洲联合省的第一届选举违背了民心所向，第一任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前就遭到质疑。共和国又沦落到了议员和地方利益团体的手中，而联邦的实质也开始模糊，与其说是一个完整的共和国，不如说更像几个独立的小国家构成的联盟。

内战（1827—1829）

法律，法律，就是它从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中把国家拯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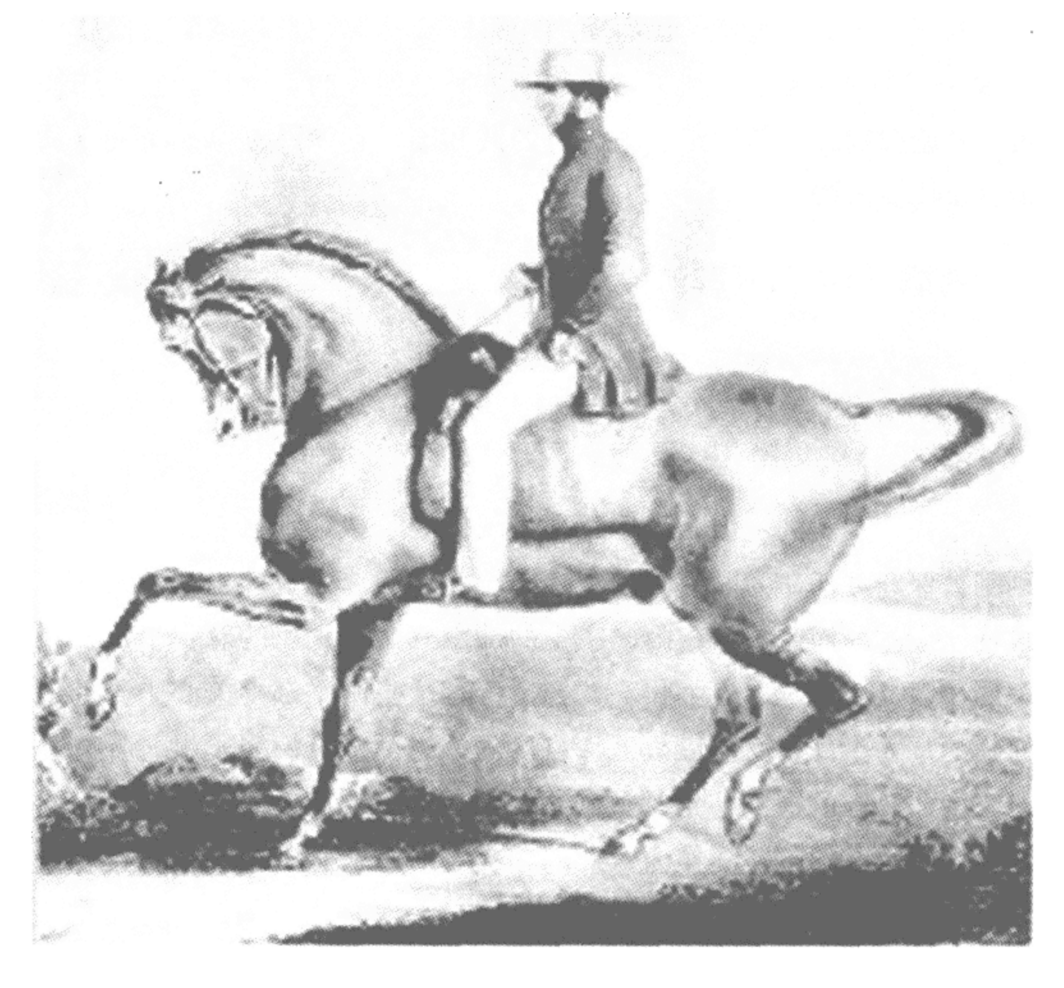
——何塞·德尔·巴列，1826年（布姆加特纳，1963年，第256页）

很快，中美洲境内充斥着各种小规模的争执和地区对立。阿尔塞刚刚被保守派任命为联邦的第一任总统，新的选举就产生了由自由派控制国会的局面。然而，因此产生的冲突其实与党派的意识形态是无关的。议员、总统、各个州、教会，所有这些派系都不关心中美洲所面临的重大事件，反而借机试探自己的权力。议员们与军事领导人作对，削弱总统的职权。危地马拉以地方法律优先于联邦法律为借口，干预联邦政府的事务。作为对此的回应，阿尔塞总统企图把首都移到圣萨尔瓦多。据说洪都拉斯的主教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目标就是洪都拉斯省督迪奥尼西奥·埃尔拉拉（Dionisio Herrara）。危地马拉的副省督在克萨尔特南戈由教会和保守派组织的一次暴民起义中被杀。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中美洲饱受各种冲突带来的折磨：危地马拉与其他省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与地方权势之间的冲突、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等等。在争夺权势的过程中，法律和秩序逐渐丢失，因为各个派系拒绝接受宪法赋予各种机构和各级政府的权力。结果只能是内战。

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密谋罢免阿尔塞的联邦总统职位。1827年3月，143 阿尔塞派遣军队前往洪都拉斯逮捕埃尔拉拉。作为报复，萨尔瓦多军队向

联邦首都行进以示抗议。内战即将爆发，将会波及尼加拉瓜，但是哥斯达黎加不会受到牵连。哥斯达黎加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但是保守派的极端分子在教会的资助下，拒绝了这个提议。战争不得不继续下去。



图为洪都拉斯的弗兰西斯科·莫拉桑将军（1792—1842）。莫拉桑出生于洪都拉斯一个克里奥尔地主家庭，依靠开矿发迹。他起初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做职员。独立后，他在特古西加尔帕参军，从此平步青云，后来自由党省督埃尔拉拉任命他为洪都拉斯秘书长。从1829年开始，直到1842去世为止，他一直为维持联邦政府而战。1837年，保守党取消联邦制的时候，尽管只有萨尔瓦多一个省留下，他依然尽力维护统一。1840年，他战败之后，被迫流亡。但后来他为了重整联邦又回到哥斯达黎加，遭遇行刑队，于1842年在圣何塞去世。当时他的自由主义原则受到保守党的极大蔑视，连葬礼在中美洲都没被允许。（照片提供：萨尔瓦多教育部）

1829年4月，保守派的最后一个据点危地马拉城被弗兰西斯科·莫拉桑（Francisco Morazan）带领的自由派军队攻陷。保守派坚持武力解决，他们为自己的顽固付出了代价。莫拉桑逮捕了保守派首领，以叛国的名义宣判他们死刑。不过随后宣布赦免，并没有执行死刑，而代之以流放。教会也因为积极支持保守派而付出了代价。主教和40位神父被流放，没收教会财产的立法也很快获得了通过。在主张严惩的风气推动之下，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完全失去。 144

自由派的胜利

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强的决心，不靠税收，又没有权力的话，他如何能统治国家？

——何塞·德尔·巴列，1833年（布姆加特纳，1963年，第264页）

自由派取得了内战的胜利。1829年国会重新召开，决定在年底进行总统选举。然而，所谓的选举其实只会在中美洲最受欢迎的两位政治家之间角逐。他们都来自洪都拉斯，一位是保守派政治家何塞·德尔·巴列，另一位是凯旋而归的自由派弗兰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由于刚刚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莫拉桑赢得了选举。

自由派规划的蓝图对一个极度不发达、民众文化程度极度落后的国家来说，可谓是雄心壮志。很多保守派人员认为，那简直就是过于野心勃勃。在一个国家国库亏空的情况下，自由派想开展大众教育和发展经济，的确非常有雄心。但是自由派对自己的政策非常坚持，他们甚至在危地马拉推行了一部新的法典，准备实行陪审团审判制等外来的做法。要知道，在危地马拉有一半的人口讲的是玛雅语而不是司法体系所用的西班牙语。1831年到1838年间，马里亚诺·加尔维斯（Mariano Galvez）统治下的危地马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积极推行这些先进的理想。

加尔维斯在刺激危地马拉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包括修缮道路 145

和促进出口，如纺织物、靛蓝和另一种当地的染料——胭脂红。他把洪都拉斯沿海一带落后港口的贸易转移到英国人在伯利兹城建造的港口。他认为西班牙的殖民主义阻碍了危地马拉的发展，积极鼓励资本更加雄厚的英语国家前来投资。他还为自己的国家引入了一些国外的拓殖地项目，作为使经济现代化的另一种尝试。比如，在贝拉帕斯地区建了一个叫“新利物浦”的定居点。200 年前，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就曾满怀希望地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玛雅人社区。加尔维斯在 1834—1836 这两年内使交易量翻番。有几年时间，危地马拉真正取得了进步，但由于资金的缺乏和政府的债台高筑，危地马拉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

在自由派的议程表中最容易造成分裂的一项是关于教会与政府的分立，加尔维斯却致力于贯彻这一点。他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并颁布了其他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法律，比如教育世俗化——圣卡洛斯大学因此变成了危地马拉科学院；又比如创造了出生、结婚、死亡等公民登记制度，这些领域以前都是由教会掌控的。教会对这些变化很抵触，但是任何利用教堂内小讲坛之便而违抗命令的神父都被政府从严处罚、流放异乡了。

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出现富裕且有权势的教会，是自由派所不能容忍的。危地马拉的自由派为了创造更自由的贸易环境和更多的商业机会，尝试着解散由来已久的商人行会。而且，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印第安人会对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文化的西化感激涕零。但事实上，在一些最传统的玛雅村落里，当自由派终结了统治了玛雅人 3 个世纪的特殊法律，不但没得到印第安人的感激，反而被看成干预了当地事务。的确，取代西班牙法律的这些自由派政策允许一小部分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尔人以新的方式介入印第安人的事务，甚至购买他们共有的土地。此外，联邦政府实行人头税，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打击无异于旧时西班牙的贡赋。印第安人满以为独立已经将此废除了。自由派的这些措施促使了印第安族群与保守派之间的联盟，危地马拉高地上的基切玛雅人就这么做了。

自由派与保守派

尽管其他州不像危地马拉如此激进地推行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议事日程始终有悖于保守派的理念。保守派拥护的是国王而不是选举出来的总统，主张教育和道德体系应该由教会而不是世俗来掌控。保守派还希望恢复旧时的贸易保护主义法律，认为殖民地的专制政策能让印第安人恭顺，所以更符合自然的社会秩序。在中美洲人眼里，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更优于美国和英国的新教徒所提出的先进政策——事实上，很多中美洲人养成了一种仇外情绪，不喜欢生活在他们土地上的非西班牙人的外来者；而在自由派的政策鼓励之下，外来者越来越多。

146 在哥斯达黎加，省督胡安·莫拉·费尔南德斯（Juan Mora Fernández，1829—1833）推行以协商为主的施政方式。除此以外，自由派在其他省总是试图煽动最有权势的两个群体：克里奥尔富商和教会。这两股保守势力以结盟能够保护他们传统的、独居的社会为由，说服了人数最多的印第安人与之联盟。这三个群体，再加上梅斯蒂索农民，最终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势力瓦解了政府，并进入了近半个世纪的保守派独裁统治。

境内外的保守派势力使中美洲的统一受到威胁。内战后，保守派领袖并没有默默接受流放的判决。阿尔塞企图从墨西哥入侵，但是没有成功。连西班牙都趁机威胁半岛，1832 年，亲西班牙的势力企图占领洪都拉斯湾其中一个堡垒。大自然似乎不甘示弱，在中美洲共和国饱受政治家折磨的时候，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830 年，自安提瓜毁灭以来最严重的地震倾覆了危地马拉；1831 年，另外两次地震毁坏了圣萨尔瓦多，灾民到处逃窜。1835 年，尼加拉瓜的科西吉纳火山（Volcan Cosiguina）猛烈爆发，远在 800 英里外的牙买加都能听见。这是中美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导致河流改道，引发地峡多次地震，喷出的火山灰甚至蔓延至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就像地震接二连三地爆发，政府也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每次保守派带来的变化都会阶段性地引发要求更大自治权的

大潮。哥斯达黎加率先脱离联邦。大概维持了一年的独立，1830 年 5 月再次向联邦政府屈服。萨尔瓦多一直跃跃欲试争取独立，1832 年终于采取了行动，但是很快就被联邦军队阻止了。加上联邦首府迁至圣萨尔瓦多。如此一来，萨尔瓦多再顽强也被联邦进一步牵制。洪都拉斯也惨遭压制。1833 年，在萨尔瓦多中部地区，印第安人因对自由派的政策和强迫征兵不满而爆发起义，震慑了克里奥尔人。阿纳斯塔西奥·阿基诺（Anastasio Aquino）本是靛蓝庄园里的一名劳工，成功领导了几千名反抗者对阵萨尔瓦多的军队。但是他的胜利是短暂的，萨尔瓦多军方在莫拉桑的帮助下，次日便重新夺回了控制权。阿基诺被处决了，但是印第安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息，直到联邦结束。

147 在如此动乱的环境下，莫拉桑将军也许已经是当时最好的中美洲总统了。但他同时也是一名彻底的自由派，而要与保守派和平相处必须妥协，他根本做不到。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中央权威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地带，他选择以武力来填补。何塞·德尔·巴列的主张则更为中立，因此有可能把不太极端的派系联合起来，但是历史最终没有给他表现的机会。1834 年，巴列在选举为总统的前夕与世长辞。莫拉桑的选票紧随其后，理所当然地接替了总统一职。虽然莫拉桑成功地维持了几年的和平，但 1838 年，就在莫拉桑任期结束前，中美洲联邦还是瓦解了。本可以改善商业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的联邦制改革到最后都没能实行。中美洲联邦还未真正站稳脚跟，便匆匆灭亡。

动乱（1837—1840）

那真是一片狼藉……威胁着家族的荣誉、财产，以及文明和社会上一切神圣、有价值的事物。

——《1838 年危地马拉公民致莫拉桑总统的请愿书》（伍德沃德 Woodward，1993 年，第 86 页）

联邦政府通过向教会和富有的贵族强制借款的方式资助其军队以及推行政策。到了 1836 年，仅凭这种临时的募集已经不够，因此推出了新的税

款项目，不仅涉及到贵族阶层，还影响到了中产阶级和贫困的群众。梅斯蒂索人和工匠被要求直接纳税；克里奥尔人和拉迪诺人也一律受到土地税的影响。印第安人认为各种苛捐杂税其实就是进贡，对此愤怒不已。政治上的不满和动荡在大范围蔓延，甚至连自由派都讨厌交税。

1837 年，危地马拉高地爆发霍乱疫情。加尔维斯送药到玛雅人的村落里为他们理治水源，神父却对玛雅人和拉迪诺农民说政府在井里下了毒。起初的动乱在至少 30 个印第安人村落里演变成了起义，而且反抗运动愈演愈烈，铺天盖地向其他省蔓延，从墨西哥边境一直到哥斯达黎加。由疾病引起的这场歇斯底里的暴动，受到教会的煽动。“宗教万岁”、“处死异教徒”、“处死外国佬”等战斗口号在自由派人的耳边阵阵回响。

对自由派最愤怒的抵制发生在危地马拉。一群武装起来的暴民占领了危地马拉城，将其洗劫一空。马里亚诺·加尔维斯被迫退位，用立法机关的话来说，此乃民心所向。为了安抚暴动的村民，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法律被废除，政府对教会的支持恢复原状，鼓励外来人口的政策也被叫停。火上浇油的是，包括洛斯·阿尔托斯在内的许多地区脱离了危地马拉的权限，所以危地马拉省的绝大部分区域不是在打仗就是在闹独立。 148

这次之前的暴动，自由派都控制住了，但是这一次，他们非但没有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对付不断扩大的反抗运动，反而起了内讧。比如，危地马拉最激进的自由派成员企图与反抗者结成联盟。保守派方面，史无前例地发现了一位极具号召力的领袖，为他们的事业而战。他就是拉法埃尔·卡雷拉（Rafael Carrera）。

卡雷拉是危地马拉东部一位目不识丁的拉迪诺猪倌。他在教区神父的鼓励下，成功领导了对当地政府的一次攻击。他的成功激励了其他村落，甚至包括了萨尔瓦多的部分地区。他们在卡雷拉的带领下奋起反抗。政府军队展开了反击，他们在村落里打砸抢烧，捣毁了卡雷拉的房屋，据说还强暴了他的妻子。卡雷拉把圣人的图像挂在自己的棉质军服上，以宗教圣歌“欢呼玛丽亚”为他的战斗呐喊助威；他发

誓，不消灭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自由派官员，决不罢休。卡雷拉反复受伤，但依然无所畏惧。他的狂热鼓舞着农民游击队们，他们的勇猛和牺牲精神简直难以置信。保守派贵族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试图利用卡雷拉，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卡雷拉所领导的印第安人和拉迪诺人群众大起义针对的是所有白人特权阶级，不管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1837年至1840年的中美洲处于无政府状态。保守派和自由派罕见地同时请求联邦总统弗兰西斯科·莫拉桑重整秩序。但就在莫拉桑与卡雷拉对峙之时，联邦破裂。反抗者的要求与保守派的议程如出一辙，这便导致了保守派政治家越来越具权势。1838年7月，由保守派马尔克斯·德·阿伊西内纳（Marques de Aycinena）领导下的国会正式认可各个省为主权国家。同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新成立的保守派政府宣布从联邦脱离。国会没有安排下届选举，悄然结束。1839年2月，就在莫拉桑总统任期的末尾，依法成立的联邦政府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149

一位目击者的叙述：卡雷拉的军队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第1章，第231—232页）1839年在中美洲旅行，他讲述了亲眼所见有关1838年2月1日，卡雷拉的农村游击队进攻危地马拉城的事情：

……卡雷拉的人群在前进……在领军队伍中有蒙里亚尔（Monreal）和其他一些知名的亡命徒、罪犯、抢劫犯和谋杀犯……有位绅士从他家房顶看到了他们……看到这一大批野蛮人蜂拥而入；他们堵塞了街道，帽子上都装着绿色的灌木，从远处看，仿佛是一片移动的森林。他们手持生锈的火枪、旧式的手枪、鸟枪……木棍被做成火枪的形状，装着镀锡的气塞；长竿的一段绑着击棍、大刀、小刀；两三千妇女涌在人群之中，她们身背麻袋，用于搬走劫掠品。很多人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落，他们看到房屋、教堂和城市的宏伟，显得目瞪口呆……卡雷拉自己也为亲手发起的这场运动震惊了……事后他说控制那个庞大而混乱的局面很困难，他当时非常害怕。

就在莫拉桑努力打败卡雷拉以期维持联邦的同时，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成立了以洪都拉斯的弗兰西斯科·费尔拉拉（Francisco Ferrara）将军为首的联盟。莫拉桑在危地马拉对战卡雷拉，差一点就取得了胜利。然后他又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对抗联盟军。然而，一旦费尔拉拉将军说服卡雷拉加入了保守派的阵营，莫拉桑和联邦政府便彻底失去了取胜的机会。战争严重毁坏了农村地区。在首府，哨兵会枪击入夜后仍在室外的无辜百姓。暴虐行为不断加剧。萨尔瓦多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入侵；外来者在任何角落都受到威胁、被杀害。整个地峡向恐怖统治屈服了，中美洲破产了。到了1840年，莫拉桑在一次关键的战役中被卡雷拉打败后，逃窜至巴拿马。此时的联邦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颜面无存的尽头，再也没有复兴的可能。

最后的联邦尝试

150

独立后的头几十年见证了中美洲的统一。而在地峡的后殖民地历史中，中美洲联合省是唯一受到国际认可的政治联合体。1840年，尼加拉瓜号召统一中美洲，但是除了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其他省都不愿意加入。所谓的联邦，断断续续地只维持了几年（1840—1845）。统一小国家的尝试仍有发生，但无一成功。1839年，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出任美国驻中美洲联邦领事，但是当他来到中美洲时根本找不到政府。在他接受的建议之中，最坦白的一点就是让他向各个国家分别出示国书。

英国领事弗雷德里克·查特菲尔德（Frederick Chatfield）

保守派和自由派虽然在涉外利益上各执一词，但他们都需要外国机构的帮助。参与当地事务最多的是弗雷德里克·查特菲尔德，他代表着英国利益，自独立开始便一直在中美洲。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中美洲联邦瓦解的关键因素，因为地峡一旦分割和削弱，他就更容易促进英国的利益。但事实上，1839年以前查特菲尔德是莫拉桑和联邦的积极拥护

者，是中美洲人民自己做出了太多瓦解联邦的行为。要把联邦的瓦解归咎于单个外国领事，是很难讲得通的。不过，战争的最后一年，莫拉桑提出向英国强行借款之后，查特菲尔德确实转而支持了马尔克斯·德·阿伊西内纳（Marquis de Aycinena）和危地马拉城的保守派。他到处发送信函，否认中央政府的存在。为了让英国得到伯利兹、罗亚坦（Roatan）和莫斯基蒂亚，他在幕后与保守派合作。这让卡雷拉十分确信，在与莫拉桑的关键对决中，他会获得足够的弹药。查特菲尔德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开始暗中操纵中美洲事务，直到他越来越野心勃勃的行为让英国在国际社会十分难堪，于1851年撤销了他的任命。诸如此类，对中美洲政治事务的外交干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十分普遍。

151 中美洲各省从未真正实现作为一个国家的前景，他们也无法调和保守派的贵族和自由派的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受西班牙统治时，社会等级极其严格，财富和权力只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中。危地马拉王国在融合各个地区的政治尝试上是失败的，大部分地区因封闭而渐渐演变成以主要城市为中心的领地。这些小规模的领地之间只靠驴道相连，四周为大片人烟罕至的荒野所围绕，他们无法超越自己对权力的渴望，也无法克服长久以来彼此的不信任，哪怕有时候对自己有利也无能为力。

在联邦政府统治下所经历的政治波动（只有哥斯达黎加因远离政治中心，所以较为稳定），让中美洲各省以后想要统一更加困难。讽刺的是，联邦使得5个州之间的边境虽略有争议但更为清晰，确定了之后它们成为独立国家的界线。地峡曾经是大陆之间重要的桥梁，如今的分崩离析不仅是因为崎岖的大山，也因为地方主义的观念。独立之后，何塞·德尔·巴列对他的故土抱有众多崇高而先进的理想，而今他亲眼看着它分裂、互相敌对。在去世的前一年，他总结说：

美洲大陆在政治上和地理上是一样的：是一片地震的土地。

——何塞·德尔·巴列，1833年（布姆加特纳，1963年，第263页）

第八章　保守派与外来投机商
（1840—1870）

在很多元老家族中，其主要成员不是被流放就是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所以当自由派被逐出、可继承的统治权又被夺回的时候，他们和教会的神职人员都无比兴奋；他们说起了……把中美洲打造成……原来的模样，那可是西班牙美洲的瑰宝。 152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1839年（第1章，第200页）

整个19世纪中叶，中美洲都处于保守派的统治之下。长达30年里，保守派对中美洲的每一个独立的国家都实行严密监控，但是没能把它们再次统一成一个联邦。在中美洲联邦时期，危地马拉的权势和规模一直是个问题，但讽刺的是，当各个国家纷纷主张独立的时候，危地马拉依然操控着地峡。保守派意识到了统一地峡的必要性，于是召开国会计划统一大业。然而，在外来的诸多承诺的诱惑之下，本地利益往往变得无法抗拒进而压倒一切。联邦主义于是沦落为入侵邻国的借口；或者，比如在威廉姆·沃克事件中（见原文167页），也成了驱逐外来入侵者的理由。也有时候自由派得势，他们便设法恢复联邦制，但是只要拉法埃尔·卡雷拉在危地马拉统治一天，自由派就永远无法成功。保守派在外部利益的推动下，创建了一个分裂的中美洲，

分为5个独立自治的国家以及一个英属殖民地。中美洲地峡将维持这样的状态。

153 保守派贵族在西班牙殖民地期间受益良多，因此企图复制西班牙殖民地模式但是失败了。出现了一批新的独裁者，他们多为梅斯蒂索人且目不识丁。保守派被迫与这样的独裁者结盟。独立之后一直主宰政治的克里奥尔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但依赖梅斯蒂索人，其贸易和经济发展也紧紧依赖着工业界。外来的投机商和政客，或者是来寻找两大洋之间的便捷通道，或者是为了投资出口作物，但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闯入了地峡，永远地改变了中美洲。

保守派

起初，（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加害怕……卡雷拉……但让他们万分惊讶的是，突然之间，卡雷拉把保守派捧上了政府的最高舞台。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1839年（第1章，第199页）

随着联邦体制的土崩瓦解，中美洲这片土地不再受共和原则的约束。保守派重新启用西班牙殖民地期间的法律，同时恢复了针对印第安村落的特殊法律——保护他们的共有土地和风俗习惯、取消人头税。克里奥尔贵族商人再次得到垄断权力，经济命脉几乎操纵在他们手中。教会特权得以恢复；神父政客转身成为了国家的决策者；部分教会土地被归还（并非所有土地，保守派和自由派通过出售教会土地赚取暴利）。

由于不需要去资助额外的一层联邦政府，只需维持各个国家独立的政府，因此政府开支紧缩；比如，在危地马拉，国家官员的薪酬下降超过了25%。教育重新由神父负责，因此自由派所推导的大规模公共教育项目不再需要投入资金；反而，教会的什一税重新建立，证明与国家的需求相比教会的权力更加强大。对酒精和烟草征收的海关关税和其他税收足够用于支付国家的各种开销；保守派对此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对直接纳税深恶痛绝。然而，军队成了负担，有时候军队支

出超过国家预算的一半；以特殊的战争税来供养军队的做法并不罕见，除此之外，向商人强迫借款的做法也时有发生。但总体说来，税收压力有所减轻。

税收与首都

154

那些漂亮的教堂、树木和花园……让危地马拉从不远处看显得非常美观；但是一进入市内，幻想就破灭了……

——罗伯特·邓洛普（Robert Dunlop），1847 年（第 78 页）

有限的税收导致危地马拉共和国首都的市政服务不可避免地有所限制。1847 年，尽管谋杀率居高不下，但警察局只有 4 名警官。[虽然某城市条例明令禁止携带火器，但英国人弗兰西斯科·克罗（Francisco Crowe）发现“每个土著人腰带上都佩着一把尖锐的大刀，一般由英国制造，而且装在一个皮制的刀鞘里，或多或少都有所装饰”（1850 年，第 295 页）。] 有钱人都得自己花钱雇佣保镖。事实上，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公民有职责保卫自己的财产安全。1843 年，商人行会出资铺设了街道，但是安装路灯的费用只能靠收取一种特殊的城市销售税——一袋面粉或者一磅肉桂收 0.06 美分，酒精、醋和油等则收得更多。即使这样，危地马拉城一直到了 1862 年才终于装上了煤气灯，不用再点蜡烛。教育任务重新归教会所有，政府不再对此负责；由自由派所建立的世俗大学再次成为教会管理的圣卡洛斯大学，而且基本上只有贵族男性才能接受学校教育。除了流行病爆发期间的特殊接种项目以外，其他一切医疗也由教会负责。圣胡安德迪奥斯医院是中美洲唯一的一家正规医院，由修女负责打理，但是背后由一个富人组成的理事会来监管。政府无法提供的服务，贵族商人们轻易就能安排妥当，比如他们买得起商店里的进口钢琴、马车、丝绸和大吊灯。

考迪罗（Caudil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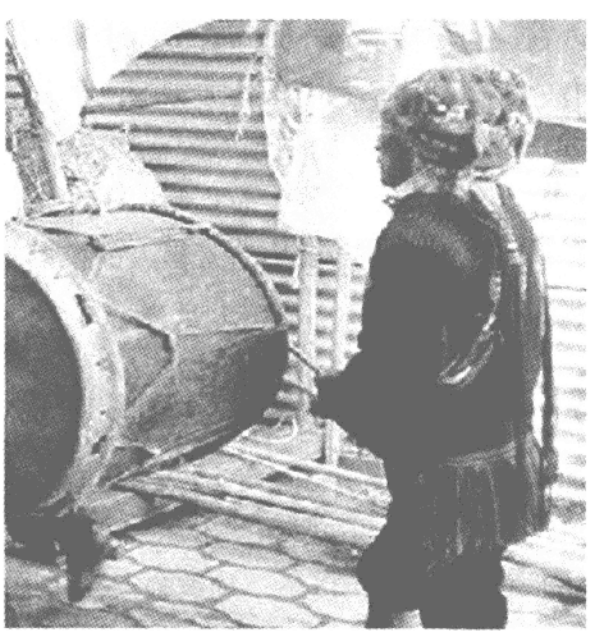
这个马鞭就是我统治中的宪法。

——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Justo Rufino Barrios），约1870年（伯吉斯 Burgess，1926年，第134页）

155

保守派统治下的基切人

《西印度法》的恢复强化了危地马拉高地上玛雅人的隔离传统。在这之前，多种不同的法律施加在他们身上，玛雅人不得不突出其印第安人的身份，但是仅凭肤色已经不能够将欧化了的危地马拉人与印第安人区分开来；语言和服装则可以。每一个玛雅村落都有其传统而独特的民族服装，而且保留着自己的玛雅语。很多这样的传统服饰和方言直到21世纪仍然存在。和大部分玛雅人一样，莫莫斯特南戈的民众也是拉法埃尔·卡雷拉的忠实拥护者。况且，任何时候只要他们对梅斯蒂索和克里奥尔官员有意见，都有直接向危地马拉总统禀告的权利。1848年洛斯·阿尔托斯的自由派企图脱离危地马拉的事件发生之后，莫莫斯特南戈人在卡雷拉相助之下揭竿起义。梅斯蒂索人被这些基切族玛雅人吓坏了，绝大多数人弃城逃跑。1849年，只剩下9个梅斯蒂索家庭敢于留在莫莫斯特南戈，生活在五六千个玛雅人中间。如此一来，对莫莫斯特南戈人来说，同化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不再如从前那么困难了。他们可以根据本土的天主教教义自由地庆祝节日；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习俗来为当地事务做出裁决，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对于这一切，玛雅人心怀感激。作为回报，他们全力支持保守派。

左图是来自圣克鲁斯德尔基切（Santa Cruz del Quiché）的一名玛雅妇女。右图是来自奇奇卡斯特南戈的一位基切族玛雅人，是教友会成员，摄于 1989 年。（照片提供：内奥米·史密斯）

156

保守派亲眼目睹了过去几十年间的混乱，因此坚信中美洲根本还不具备实行民主制的条件。他们争辩说，中美洲需要的是牢不可破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为中美洲的各个小国家指明未来的道路。各国政府未受任何民主思想的影响，开始精简结构：总统变成了独裁者，共和政府内为相互制衡而设的职位，甚至包括为宪法的制衡而设的职位，全都成了多余。不过，每个国家对外宣称时，都称自己为共和国。

中美洲国家除了保守派的统治以外，还有考迪罗的统治。所谓考迪罗是指军事上的独裁者，比如危地马拉的拉法埃尔·卡雷拉将军、洪都拉斯的桑托斯·瓜尔迪奥洛将军（General Santos Guardiola[①]，绰号"屠夫"）等。他们本身就意味着法律。这些人经常把政府当成个人升官敛财的途径。在之后的 100 年内，可以说他们就是中美洲政府

① 此处虽拼写为 Guardiola，但是下文均为 Guardiolo，故译为瓜尔迪奥洛。——译者注

内官员的典型，保守派和自由派全都如此。在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政府内，裙带关系和个人施加影响的风气盛行，而这些考迪罗以各自的方式延续了这一“优良传统”。然而，这批新近产生的政客偏袒的不仅仅是保守派的贵族，而是制造了一个由梅斯蒂索人担纲的全新官员阶层。军队尤其受到梅斯蒂索人的控制，但凡沾亲带故者都在总统身边担任顾问职位。

考迪罗们在政策和管理上大多严密而死板，但各人之间有所区别。布劳利奥·卡里略（Braulio Carrillo）于1841年宣布自己为哥斯达黎加的终身独裁者，但一年后就被罢免了。洪都拉斯的桑托斯·瓜尔迪奥洛（1856—1862）和萨尔瓦多的弗兰西斯科·马莱斯平（Francisco Malespín，1840—1846）均被暗杀，而尼加拉瓜的特里尼达德·穆尼奥斯（Trinidad Muñoz，1845—1851）对权力没有如饥似渴反而活着离任。哥斯达黎加的胡安·拉法埃尔·莫拉·波拉斯（Juan Rafael Mora Porras，1849—1859）任期十年，他的事迹更为典型。加上卡雷拉在危地马拉长时间当政，中美洲体验到了难得的政治稳定，与联邦时期的战火纷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危地马拉的拉法埃尔·卡雷拉（1839—1865）是最为典型的一位考迪罗。他统治的时间之长、对中美洲事务的影响之大，无人能及。卡雷拉不满足于仅统治危地马拉，于是在邻邦安插了保守派独裁者，其中包括洪都拉斯的弗兰西斯科·费尔拉拉将军（1839—1847）和“屠夫”瓜尔迪奥洛，以及萨尔瓦多的马莱斯平。1854年卡雷拉赞助了尼加拉瓜捣毁自由派财物的活动。1863年，他入侵萨尔瓦多并推翻了自由派总统——赫拉尔多·巴里奥斯（Gerardo Barrios）将军的统治。巴里奥斯曾经积极推动教育改革，而且曾大胆提出为弗兰西斯科·莫拉桑实行国葬。卡雷拉深谙权术，时而理性，时而野蛮，把自己的权力运用得恰到好处。在当政的许多年里，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美洲所有权势人物中，属卡雷拉的影响力最大。在他死后6年，由他亲手挑选的继任者比森特·塞尔纳（Vicente Cerna，1865—1871）终于被推翻，卡雷拉的影响力才算最终结束。

拉法埃尔·卡雷拉（Rafael Carrera）：考迪罗

……那么年轻，出身又那么卑微……也许有过人的直觉，但他始终不懂礼数、狂热、血腥，简直就是野蛮抱负的奴隶，他操纵的绝对只是这个国家粗暴和武力的一面……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1839 年（第 1 章，第 249 页）

拉法埃尔·卡雷拉（1841—1865）出生在危地马拉城犯罪频发的贫民窟。他的父亲以赶骡子为生，他的母亲开始是别人的家仆，后来在市场里摆摊做点小买卖。卡雷拉长着一副印第安人面孔，穷困潦倒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最初，他在联邦军队里当一名小鼓手，后来在一个产胭脂红染料的农场做工，因为赌博被开除了。1832 年，他在危地马拉东部定居，当起了猪倌。在此之前，一直居无定所。至此为止，他的生活是许多穷苦梅斯蒂索人命运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自从领导了反自由派起义，他成了危地马拉最有权势的人。那时的卡雷拉将军才 25 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却变成了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玩家，与保守派贵族、神职人员这些支持者的阴谋不相上下。下面这一连串的绰号和官方头衔可以简洁明了地概括他一生的事业：从 1838 年的“强盗和谋杀犯”到 1839 年的“将军”，然后是 1844 年的“杰出领导人和大将军”，再到 1854 年的“危地马拉终身总统”；1854 年，教皇授予他圣格雷戈里勋位的荣誉；1866 年他被追封为“危地马拉共和国的奠基人”，这一称谓与他的半身像一起被刻在了银币上。他去世时，已是腰缠万贯。



图为拉法埃尔·卡雷拉（Rafael Carrera，1814—1865）。（肖像提供：萨尔瓦多教育部）

158

保守派的政策

无论出身平民还是贵族，这些专制统治者都是教会和贵族经济利益的拥护者。不过，他们的统治方式各异，关心的事务也各不相同。弗鲁托斯·查莫罗（Frutos Chamorro）来自格拉纳达的一个经营牧场的上流社会家庭，他所做的事情是确保1854年的尼加拉瓜宪法只允许“有价值”的个人才能拥有自由和特权。所谓“有价值”指的当然就是那些有财产的人，以及有高贵品德的人，而且不管品德是如何衡量

的。别的考迪罗由于依靠农民阶层才坐上权力的宝座，所以相对来说更关心农民所急。卡雷拉亲自调解了印第安人在土地上的争端，还下令整修农村地区的灌溉系统；他深受底层人民爱戴，甚至被亲切地称为“天使”。卡里略（Carrillo）为了鼓励种植咖啡这一新的出口作物，在哥斯达黎加免费分发小块土地。有些考迪罗实行的是毫不容忍的恐怖统治，但莫拉（Mora）在哥斯达黎加的政策总体来说相当温和，而洪都拉斯的胡安·林多·塞拉亚（Juan Lindo Zelaya）于1852年更是令人意想不到地让一位自由派人士和平地继承了自己的总统之位。

经济

联邦时期的大萧条之后，经济状况必须得到改善。但是，自由贸易是自由派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对此时控制经济的寡头家族来说，并不合其意。反而把贸易保护主义的一套政策重新搬上舞台。19世纪40年代的中美洲实际上与刚刚独立之时并无很大差别。由于关税的重新启用，从工业国家进口便宜货品的速度有所放慢，比如英国的纺织品。主要的出口货物依然是两大天然染料，即靛蓝和胭脂红。大庄园主继续养牛以供应本地市场。在保守派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旧依靠印第安搬运工沿原来的驴道把货物运输到加勒比沿海的港口——殖民地留传下来的这些出口产品利用的是与之同样古老的殖民地时期的基础设施。从位于伊萨维尔（Izabel）的加勒比海港口到危地马拉城的主要商用道路，可能走12英里就能耗费10个小时，而且来自巴黎和伦敦的商人经常横穿此道。

159

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以及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地区，以殖民地经济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几乎一直没有改变。经济的缺乏活力说明还没有因印第安劳动力的问题而提出各种需求。考虑到内战期间保守派与当地种族的结盟，不得不说这一经济现象对保守派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洪都拉斯的采矿业每况愈下，因此保守派统治时期，洪都拉斯陷入了极大的贫困与混乱之中，而英国在海湾群岛和莫斯基蒂亚的干预使得洪都拉斯的境遇更为恶化。尼加拉瓜的情况也不

容乐观，英国在加勒比沿海的攻击加上莱昂的自由派与格拉纳达的保守派之间无休止的内战，让尼加拉瓜饱受摧残。但是在琼塔莱斯（Chontales）地区发现的新矿让尼加拉瓜的经济有所发展。

到了19世纪中叶，新的努力方向是提高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危地马拉的保守派人士对于外来资金的使用谨慎小心以至于铁路建设落后于巴拿马等国家（见原文165页），但是外来的投资，尤其是与某些国家签订的排他性协议，还是大大推动了许多项目的开展。一家比利时公司应约为危地马拉提供电信服务，另有一家英国公司承包建造一座桥梁。比利时和英国的轮渡航线接到正式委托，负责在加勒比沿海提供服务。他们把乘客和出口货物从小的港口转运到位于伯利兹的跨大西洋深海港口。但是，许多发展大计只停留在调查阶段，还有一些计划也只是完成了一部分。

总体上，除了几个主要港口之外，运输能力的提高非常有限。但是在一些最重要的商用道路上出现了最早的驿站马车和运货马车，降低了运输成本。出口贸易更加有利可图，中美洲经济也着实有所增强，尤其是危地马拉与哥斯达黎加——当然，农作物遭蝗灾的年份除外。

蝗灾

昆虫之中最令人害怕的当属蝗虫。它们间歇性来袭，让整个国家受尽折磨，无数的蝗虫成片地从这头飞到那头，所到之处所有绿色植被无不遭殃。我有一次就从这样一片蝗虫群里穿过，足有10英里宽。我在前进的时候，骡道两边仿若乌云升起一般，这些蝗虫不仅把地面遮得严严实实，连开放的松林在无数的虫身掩盖之下也变成了褐色，树木就像被大火烤焦了一样，天空也完全被它们覆盖……

——斯奎尔，1855年（第201页）

160

1856年，苯胺染料的发明，让依赖靛蓝和胭脂红利润的国家被迫重整出口结构。虽然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天然染料一直是中美洲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但是随着人造染料的普及，天然染料的出口利润

逐步减少。举例来说，胭脂红 1858 年的价格与 1846 年的价格相比，降低了 42%。危地马拉成功以棉花出口来填补胭脂红的出口空缺。在美国内战期间，危地马拉的棉花出口从 1862 年占出口总额的 0.1% 增至 1865 年的超过 19%。有几个国家尝试了食糖出口。然而，真正具有潜力的出口产品是咖啡。

英国

考迪罗们为中美洲带来的社会秩序与稳定，让外来者喜出望外。而且，与一手掌握所有实权的总统就可以直接达成商业协议这一事实，为中美洲吸引来了许多投资者。当时的英国是海上霸主，也是加勒比和中美洲最具威慑性的一股势力。1840 年，危地马拉 20% 的进口商品都直接来自英国，另有 60% 是通过伯利兹英国控制下的港口进口而来的。联邦政府 1824 年向英国欠下了 50 亿比索的债务，如今落在了各个国家身上，英国为了收缴这一巨额欠款，陷入了中美洲各政府的财政泥沼。中美洲国家为了偿还原先的债务不得不再去贷款，结果导致其经济依赖性进一步恶化：1856 年，危地马拉为了偿还这样一项贷款，不得不将其关税收入的一半作为抵押。

英国以债务相要挟，迫使这些新国家接受其在地峡上扩张领土的野心。尼加拉瓜坚持反对英国在莫斯基蒂亚地区的入侵，结果被海上封锁，官方理由就是为了促使其偿还欠款，封锁是必要之举。洪都拉斯反对英国在海湾群岛上的举动，英国船只立马就排成一线、严阵以待，借口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

炮舰外交只是英国在中美洲的战略之一。查特菲尔德领事（Consul Chatfield）设法确保当中美洲国家的主权被侵犯时，它们不找英国的麻烦，也不让英国难堪。比如，英国进攻了名叫圣胡安·德·尼加拉瓜的一个加勒比海港口，重新命名为“灰城”，然后将其并入了莫斯基蒂亚。这个时候，中美洲国家终于意识到，它们必须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尼加拉瓜的保守派成员弗鲁托斯·查莫罗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带头创建中美洲联盟，但是查特菲尔德领事技高一筹。他承诺危地马拉与哥斯达黎

加无需与英国结盟，而加勒比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则由英国控制。

161 ## 英属洪都拉斯

乍看之下，在与政府达成的所有协议中最有利可图的当属 1859 年英国与卡雷拉之间的交易：当时卡雷拉把伯利兹让给英国人，作为交换，英国人需要修建一条从危地马拉城到加勒比海的道路。伯利兹顺利变成了英属洪都拉斯，但是那条路却永远没有完工。英国人盘算着不让道路超出自己的领地范围，如此一来，危地马拉就不得不借用他们的港口。危地马拉表示反对，因此这项工程无果而终。英国虽然得到了伯利兹，但是伯利兹这个殖民地很快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桃花心木和苏方木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一落千丈，而且在 60 年代，中美洲的贸易市场一转到太平洋地区，伯利兹的贸易量立刻就减少了 60%，成了一潭死水。当英国明确表示不会修建所承诺的道路，危地马拉宣布重新夺回伯利兹的所有权。两国之间爆发零星的战火。直到 1991 年，危地马拉才最终承认伯利兹不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而此时的伯利兹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 10 年了。危地马拉与伯利兹之间有关分界线的争端持续至 2007 年。

一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成功地操纵着这一地区而未受国际谴责。虽然法国在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危地马拉 17% 的进口商品都是法国货），德国和比利时规模略小但也存在商业利益，但是它们所处的地位不足以对英国提出异议。西班牙通过古巴与该地区保持着贸易往来，但是直到 1863 年才认可了中美洲的独立。中美洲的这些小国家只能自生自灭。查特菲尔德的阴谋加上当地考迪罗自身的利益，决定了中美洲地峡分裂而薄弱的现实。

然而，1848 年，美国这个离中美洲最近的军事强国在与墨西哥的战争中获胜，并将其扩张主义的魔爪伸向南方。1823 年的门罗主义庆祝拉丁美洲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根据门罗主义，美国只将西半球划为其势力范围。当时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强国，在中美洲更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而此时的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已经准备好向英国宣战了。

162
163

莫斯基蒂亚王国

……要不是米斯基托印第安人正好符合英国政府将其神秘化推广的目的，他们很可能已经从这个地球上不着痕迹地消失了……

——斯奎尔，1855 年（第 245 页）

从 17 世纪开始，英国就一直想方设法把他们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领土上的入侵行为合法化——他们创造了一个所谓的“莫斯基蒂亚王国”，并宣布其为英国的保护国。牙买加的英国总督适时地为国王安排了就职仪式。虽然在这个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的“村国”里，君王和村民之间基本平等，君王也从不需要因任何行政职务而交税，但是这一假象能有效地保持米斯基托人的分离特征，不至于与西班牙拓居点相混淆。然而，假想的王国处于废弃状态长达 50 年。后来创建一条跨地峡的运河成了全世界谈论的话题，其中一个航道方案就是横穿尼加拉瓜的圣胡安河，毗邻莫斯基蒂亚。英国于是又把莫斯基蒂亚王国提上了日程，因为他们使尽伎俩想要控制一切与海相关的工程项目。1843 年，英国重新宣布该地区归其所有，还加冕了一位新的米斯基托国王。为了加固这位国王对几千人的统治，英国赏给他几艘军舰，这是无上的荣誉。英国企图扩张莫斯基蒂亚的领土，于是突袭并占领了圣胡安河上的一个港口——圣胡安德尔诺特（San Juan del Norte），更名为“灰城”（Greytown）。英国发表的地图显示莫斯基蒂亚王国占整个中美洲三分之一的领土。最终，除了在伯利兹取得胜利以外，“王国”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美国开始在世界政治上为自己的影响力试水，坚决主张限定英国在中美洲的存在。为此，1850 年美国与英国协商签订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英国终于不堪重压，

分别于1859年和1860年把莫斯基蒂亚让给了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不过直到20世纪英国才彻底从这一地区撤离。莫斯基蒂亚王国确实也给了讲英语的米斯基托印第安人一种独立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经常让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惊诧不已。



图为一位20岁的米斯基托族首领（前排中间）及其来自英属牙买加的顾问，摄于1893年。（该照片发表在《科普月刊》1894年6月号）

很快，查特菲尔德就注意到了来自北美洲的对手斯奎尔（E. G. Squier）。美国政府和商界1849年为开凿一条运河，派斯奎尔到尼加拉瓜调查圣胡安的经济萧条状况。查特菲尔德要不择手段保持中美洲的分裂状态，而斯奎尔则主张统一。查特菲尔德散播恐怖情绪，声称美国吞并了包括德克萨斯在内的半个墨西哥，紧接着必定是野心勃勃地吞并中美洲。对此，斯奎尔以门罗主义

的口号作为回应："美洲是美洲人的。"随着修建一条跨地峡通道的实际需求越来越紧迫，英美之间的政治对决也演变成了战舰之间的对抗。

大洋之间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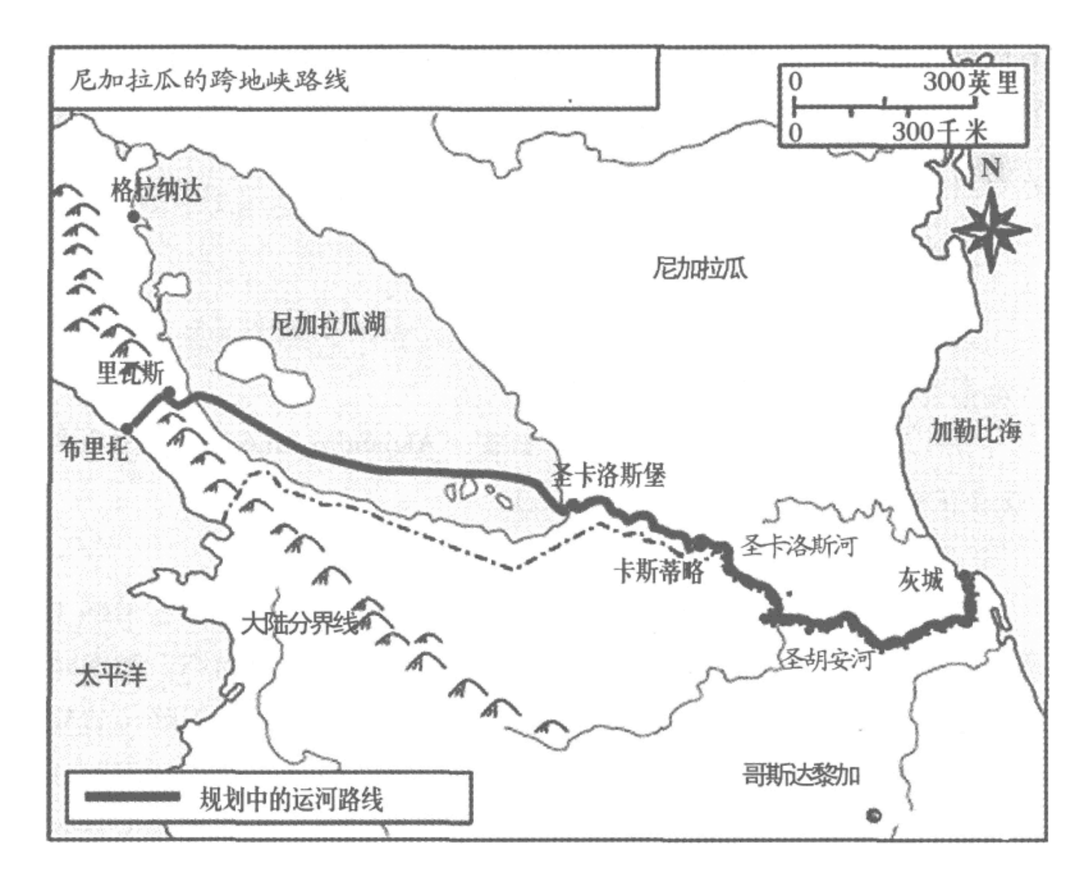
通过修建运河，用不了几年的时间，这个共和国就会改造成世界上最富有、最受欢迎和最幸福的国家。

——历史学家阿莱汉德罗·马鲁雷（Alejandro Marure），1837年（摘自伍德沃德，1985年，第122页）

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时代起，不管是探险家还是海盗、是国王还是检审庭庭长，他们都梦想着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找到一条便捷的通道。中美洲人相信要找到这样一条通道，地峡所处的战略位置定能助其雄霸一方。中美各国纷纷与外国政府商讨陆地通道与运河的建设问题，以尼加拉瓜尤甚，但洪都拉斯也颇为积极，甚至连哥斯达黎加都与法国公司合作追求自己的梦想。 164

1848年又出现了一股全新的推动力量。美国与墨西哥开战后，国土面积从大西洋一直连到了太平洋。在1869年跨洲铁路开通以前，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最快也最安全的一条路线便是穿过一块叫做中美洲的狭长陆地。在1848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驱使之下，中美洲对于美国利益来说就更为关键了。

英国侵略莫斯基蒂亚之后，尼加拉瓜迫切寻求美国的庇护。1849年，为了在其境内找到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通道，尼加拉瓜允许美国以及任何美国的同伴无条件过境。圣胡安河是最合适的一条路线。从灰城开始，圣胡安河流经一个天然洼地，最后汇入太平洋附近的尼加拉瓜湖。该洼地宽31英里，只高出海平面165英尺。按这条路线，尽管加勒比海与太平洋之间的穿越距离比巴拿马似乎长了些，但是从墨西哥湾到这一路线更为方便，因此从纽约到旧金山的实际旅途短了500英里，也快了两天。 165



由美国地峡运河委员会所提议的尼加拉瓜运河路线。（图片来源：《国家地理杂志》1901 年 1 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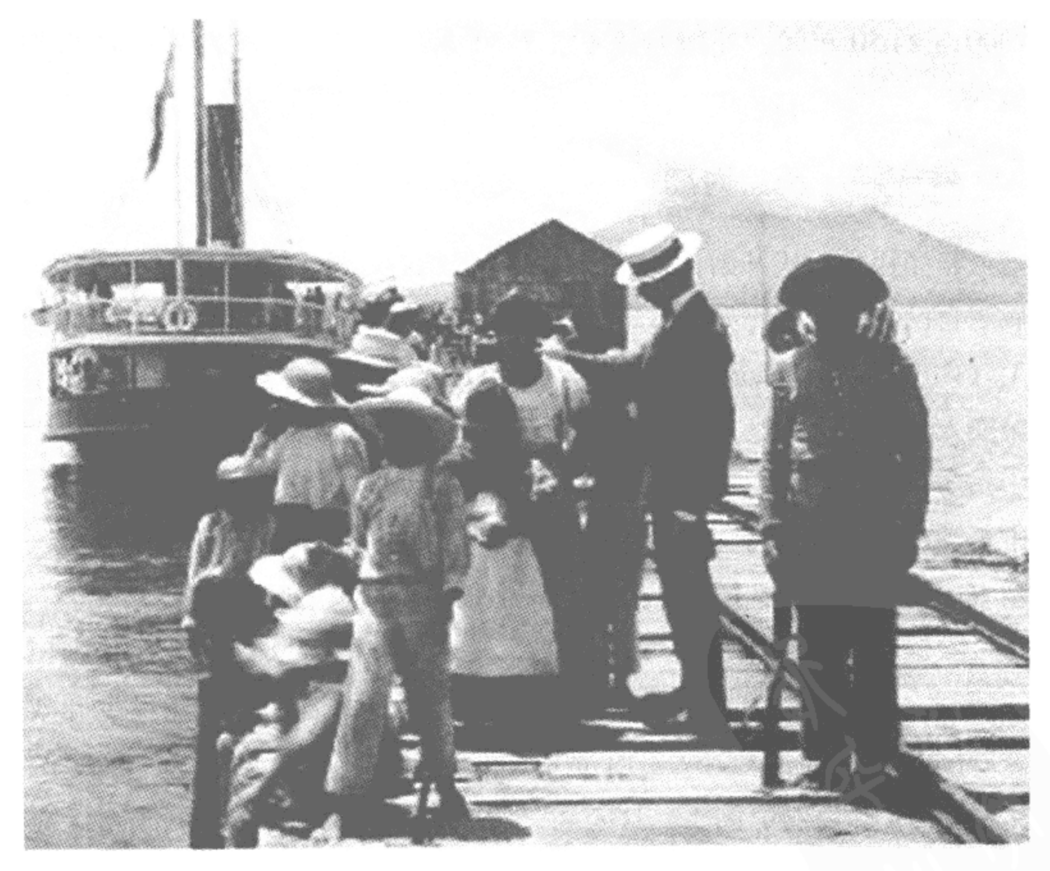
英国和美国为了垄断这一大洋之间的通道，都使尽了手段。查特菲尔德怂恿哥斯达黎加把灰城占为己有，然后，在未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强行征收了洪都拉斯的一个地理位置很关键的岛屿，而该岛屿早已通过斯奎尔转让给了美国。一场国际冲突随即产生，迫使英国在 1850 年与美国签订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 – Bulwer Treaty）。该条约有效防止了任何一方霸占运河的控制权，而且旨在限制英国在中美洲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一条约表明英国承认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日益崛起的实力。1852 年查特菲尔德被迫召回国内，但是冲突进一步恶化，并愈演愈烈。第二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炮轰了灰城。

尽管在外部事物上遭遇诸多危机，寻找两大洋之间通道的计划仍

在继续。勘探者们焦急万分，根本等不及挖掘一条运河或者修建一条铁路。柯尼勒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大西洋与太平洋船舶运河公司于1852年之前很快开发了另一条穿越地峡的路线：乘客首先在圣胡安河上坐小型汽船，穿过尼加拉瓜湖，然后在湖边乘坐12英里的驿站马车到达太平洋。此外，从纽约或旧金山到尼加拉瓜的旅程，范德比尔特的公司也分别提供了汽船服务。

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实行炮舰外交，但是无论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这一政策全都弄巧成拙。19世纪中叶，作为哥伦比亚一部分的巴拿马担心英国会将其加勒比沿海并入莫斯基蒂亚。哥伦比亚向美国寻求帮助，要求其确保这一地区的中立。作为交换，允许美国从巴拿马地峡过境。1850年到1855年，美国的一个公司在巴拿马建成了铁路。

166



该照片取名为“尼加拉瓜湖上的汽船在由美国管制的尼加拉瓜运河航路上”。（截自19世纪末所摄的一段立体摄影）

巴拿马路线为范德比尔特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从纽约到旧金山的一等旅票从 400 美元暴跌至 150 美元一张。但是在 1855 年巴拿马铁路竣工之前，大多数旅客从尼加拉瓜过境，因为这一路线更快也更舒适。巨大的客流量让范德比尔特着实赚了一笔。到 1868 年为止，总共有 6.8 万人次穿过尼加拉瓜去加利福尼亚，另有 5.7 万人按此路返程。

然而，尼加拉瓜路线渐渐失去其重要性，最终于 1868 年被废弃。1869 年横跨大陆的铁路建成以后，横穿美国就成了东西海岸之间最有效的路线。乘坐蒸汽火车从巴拿马铁路穿越地峡需要 3 个小时，这对中美洲的发展至关重要：太平洋港口渐渐取代加勒比海的港口，对咖啡出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开凿一条运河的梦想依然存在，1850 年到 1900 年的 50 年间，外国列强考察了 30 条具有可能性的两大洋之间的航线。

167

威廉姆·沃克时期

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冒险家们就像走私者一样，企图在中美洲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比如，1820 年，来自苏格兰的投机商格雷戈·麦格雷戈（Gregor MacGregor）在洪都拉斯以几桶酒和几匹厚棉布向米斯基托印第安人购买了 7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诸如此类的征地计划有 200 起，由于拓居者们遇到了无数困难，所以大多数计划以放弃告终。但 1855 年，中美洲出现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冒险家，他甚至做成了一个国家的总统，结果成功地将中美洲团结了起来，其他任何人都没能做到。

威廉姆·沃克是一位煽风点火、狼奔豕突的行家，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他与美国许多雇佣兵一样，相信土地的征服是传播民主和奴隶制度的好办法。美国从墨西哥那里接管西部地区，完成了“天定的命运”，这就是一个例子。1855 年，内战中的尼加拉瓜自由派与沃克及其由 57 名雇佣兵组成的军队达成协议：铲除保守派，在尼加拉瓜建立一个更主张共和主义、由自由党执政的政府。沃克的投资商希望控制范德比尔特的大西洋与太平洋船舶运输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沃

克同意助自由派一臂之力，条件是土地和权力。

最初，自由派接二连三地失败，但是沃克赢得了几场战役；成了自由派的军队将领。保守派要地格拉纳达被沃克攻占以后，保守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保守派成员帕特里西奥·里瓦斯（Patricio Rivas）作为政府的名义领导人，雇佣兵沃克则担任军事首领，掌握尼加拉瓜的实权。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自由派改革。1856 年美国政府不顾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反对，操之过急地正式承认了该政府。1856 年不久后，里瓦斯离职，沃克成为了中美洲地峡上最大一个国家的总统。

民族战争

……我正准备持续这场战役，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对你们说：煽风点火、狼奔豕突之事将不复存在。我以此自励。

——胡安·拉法埃尔·莫拉（Juan Rafael Mora）总统，1856 年 4 月 15 日（爱德曼和凯南，1989 年，第 35 页）

168

有关美国准备强占尼加拉瓜并把它变成一个奴隶州的谣言在中美洲四处传播。此时，2 500 个雇佣兵和南方奴隶主从美国来到中美洲，加入了沃克的军队，以此换得大片尼加拉瓜土地。所有这些事实似乎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然后，沃克让奴役合法化并规定英语为尼加拉瓜的官方语言。到了这时，几乎无人再怀疑他的目的。

保守派破例提出中美洲需要统一，1856 年尼加拉瓜与其他四个国家的保守派为了驱逐沃克，组成了一个军队。卡雷拉宣称自己在筹集赞助和弹药（两者皆来自英国国库）、组织军队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该军队即后来的民族解放军（National Army of Liberation）。这场战役被称为“民族战争”，战争的领导交给了卡雷拉最紧密的同盟——哥斯达黎加的胡安·拉法埃尔·莫拉总统。战争持续了一年，尼加拉瓜大部受到重创：格拉纳达这块曾经的殖民地瑰宝被焚毁。但是中美洲取得胜利已经指日可待。英国的封锁使沃克得不到供应；范德比尔特一怒之下，允许哥斯达黎加人使用他的汽船。当莫拉总统赦免了美国的雇佣兵，并提出

免费送他们回家（由范德比尔特付账）之时，绝大多数人都撤离了。此时的沃克身边只剩下200名士兵，而中美洲军队日益壮大，他选择了投降。1857年，美国出于怜悯，派船把沃克接回了家。但沃克并不死心，他企图重返尼加拉瓜，在灰城被美国海军拦截。1860年，他再次企图发动侵略，但这一次他被英国人逮捕，然后转交给了洪都拉斯的总统桑托斯·瓜尔迪奥洛。桑托斯随即处决了沃克。

沃克的这段插曲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自由派对沃克的支持间接巩固了保守派在地峡的控制地位。中美洲把威廉姆·沃克以及与之相连的自由派视为它们自治的巨大威胁，因此没有一个国家选举自由派政府，直到新一代政治家诞生才有所改观。美国也名声狼藉，不受中美洲人民信任，作为预防措施，尼加拉瓜把运河权交给了法国人。最重要的是，民族战争证明中美洲统一的有效性；然而，所谓的统一只坚持了一年，即驱逐沃克那一年。

169

保守派留下的遗产

保守派时代结束时，留下了一个分裂而脆弱的地峡，包括5个国家和英属洪都拉斯。单个国家都太过弱小、落后，根本无力抵抗外来军队的入侵，工业强国的人侵就更无法抵挡了。每个国家的独立都付出了代价，比如外国的欠债以及土地的割让。

保守派的统治持续到了1870年，但在尼加拉瓜，沃克事件让这一代的自由派名誉扫地，所以保守派统治到了1893年。考迪罗式的独裁者及国家的军事化比保守派统治时间长，一直延续至下个世纪。

巴拿马铁路的竣工第一次将两大洋有效地连接起来。这条跨地峡铁路线的控制权并不在中美洲人手里，最受益的往往也不是中美洲人。然而，这条铁路彻底改变了地峡的商业重心，使得太平洋的港口比加勒比海的港口更为便捷。洪都拉斯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伯利兹陷入绝境，但是大多数中美洲国家发现他们的城市和生产区域离港口更加方便了。这为中美洲经济的转型打下了基础：从殖民地经济转变为以咖啡出口为主的新经济。

第九章　咖啡共和国的形成（1870—1900）

19 世纪 70 年代，自由派接管了中美洲。他们承诺带领中美洲实现现代化并进行资本主义改革。19 世纪最后几十年，是“咖啡共和国”蓬勃发展的几十年。世界的影响以及资本的投资加速了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来自德国、英国以及北美（呈上升趋势）等地的投资促进了各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但到了 20 世纪初，外来投资导致了外部势力过度控制本地经济和政策的局面，于是出现了“香蕉共和国”。自由派时代结束的时候，铁路系统和电信线缆已经在中美洲各国全面铺设，崭新、但未必更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秩序已经形成。政府依然被牢牢掌控在军事独裁者的手中。 170

自由派的接任

19 世纪 70 年代自由派推翻了保守派的统治。1871 年发生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武装斗争把自由派推上了权力的舞台。这部分自由派继续斗争，为的就是让其他自由派人士掌管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而且要维持自由派的统治。墨西哥对这一结果也颇感兴趣。比如，危地马拉的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在墨西哥自由派总统贝尼托·胡

亚雷斯（Benito Juárez）的帮助下打败了卡雷拉的继任者，从1873年开始统治危地马拉直到1885年。自由派统治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军事强大，但政治稳定往往只是黄粱一梦，只是在与之前50年的混乱相提并论时才略显进步。军事政变和边境冲突等依然是政治继任和地区关系的主要因素。

171 由于靛蓝和胭脂红染料市场的萎缩，失业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时的中美洲已经准备好迎接变化的到来。保守派统治期间，在民众内部造成了权力与财富都在外来者手里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许多中美洲人认为是到了寻求进步的时候了。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政策。此时的圣卡洛斯大学正好向学生教授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都加速了改革的步伐。那一代的毕业生满怀着通过孔德所谓的“共和专政”来实现社会进化和物质进步的“科学”理想。其中两位毕业生后来成为了总统，他们就是危地马拉的巴里奥斯和洪都拉斯的马尔科·奥雷利奥·索托（Marco Aurelio Soto，1885—1890）。

新自由派

和平、教育和物质繁荣。

——19世纪70年代自由派的口号

在新自由派眼里，教会和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他们鼓励以外部投资和拓殖的方式把新的科技和发展引入到中美洲。但与联邦时期的莫拉桑自由派不同，讲求实证主义的新一代自由派更为务实而不是盲目激进。民主制原则的确很诱人，但他们相信此时的中美洲条件还未成熟，这样的政治原则并不合适。他们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印第安人本就低人一等，所以不需要平等的对待。在他们看来，当务之急是经济进步而不是社会公正问题。

虽然自由派起草了新的宪法，但是他们的政府依然按照当初在保守派考迪罗统治下的模式——军事独裁——来运行。不过这些自由派独裁者比他们的先辈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一心想要实现现代化，因此为中美洲政治带来了一种新的执政风格。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例子就是他们有了专业的军队，以此取代保守派所依赖的农民游击队。然而，他们与保守派考迪罗一样对国内事务进行严密控制：拉法埃尔·萨尔迪瓦尔（Rafael Zaldívar）领导萨尔瓦多 11 年（1876—1885）；托马斯·瓜迪亚（Tomás Guardia）管理哥斯达黎加 12 年（1870—1882）；何塞·桑托斯·塞拉亚（José Santos Zelaya）统治尼加拉瓜长达 16 年（1893—1909）；而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Manuel Estrada Cabrera）控制了危地马拉整整 22 年（1898—1920）。保守派考迪罗如果看到了这些，定会对自由派的坚韧不拔羡慕不已。

172 自由派政府确实完成了联邦时期未尽的事业。他们成功削弱了教会的权力，接管了许多之前由神职人员负责的市政事务；神父如果反对，就被流放。自由派倡导的自由市场政策对保守派贵族的经济特权构成了威胁，而且他们把货币的控制权交给了地峡上的首批银行，其中许多银行为咖啡企业主所有。自由派的劳动力政策再一次在印第安人和农村贫困人口中引起不满，土地改革极大地影响了旧的社会秩序。土地与劳动力的相关政策都是在推广咖啡这一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

再度统一

……分裂而闭塞，我们什么都不是。

——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1885 年（佩雷斯·布里格诺利，1989 年，第 87 页）

尽管在联邦这个概念上，很少有人像危地马拉的总统巴里奥斯那样全情投入，但总的来说，新一代自由派并没有打消成立联邦的念头。巴里奥斯设想如果成立这样一个联盟，

他就是领导人，于是单方面宣布自己是新联邦至高无上的军事指挥官。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等政府在墨西哥和美国的鼓动下，加入了抵抗危地马拉独裁者的大军。巴里奥斯在1885年的查尔丘阿帕（Chachuapa）战役中被杀害。尼加拉瓜的独裁者何塞·桑托斯·塞拉亚（José Santos Zelaya）步他后尘，企图统一地峡，但是只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这三个中间国家走到了颁布共同宪法这一步，那是在1898年。这个所谓"中美洲大共和国"（Greater Republic of Central America）维持了不到一年。塞拉亚的雄心让美国有所警觉，因此后来为统一所作的努力都遭到阻挠。19世纪后期最明显的就是强化国家认同，而不是大步迈向统一。

173

哥斯达黎加咖啡

咖啡的植株1796年就从古巴传到了哥斯达黎加，但是直到1830年才开始种植咖啡。高地山谷和太平洋坡地上温和的气候以及火山灰土壤让咖啡种植在哥斯达黎加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845年，哥斯达黎加已经向英国出口咖啡豆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从太平洋港口运输咖啡豆，这样做是因为去加勒比海港口需要先穿越雨林，不仅难走而且时间更长。哥斯达黎加还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励咖啡的种植：把未耕种的农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提高小型家庭农场的收益；取消了咖啡和其他农产品的宗教什一税。

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买下了哥斯达黎加的全部咖啡作物，投入资金进行商业化运作。新的交通网络得以建立，把卡塔戈、圣何塞等高地上的中央谷地城市与太平洋港口彭塔雷纳斯（Puntarenas）连接起来。咖啡豆从彭塔雷纳先运往智利，然后绕道合恩角到欧洲和美国。巴拿马铁路建成以后，横穿47.5英里就可抵达大西洋，往欧洲和北美的船运因此变得更加便捷高效，绕道南美的航线于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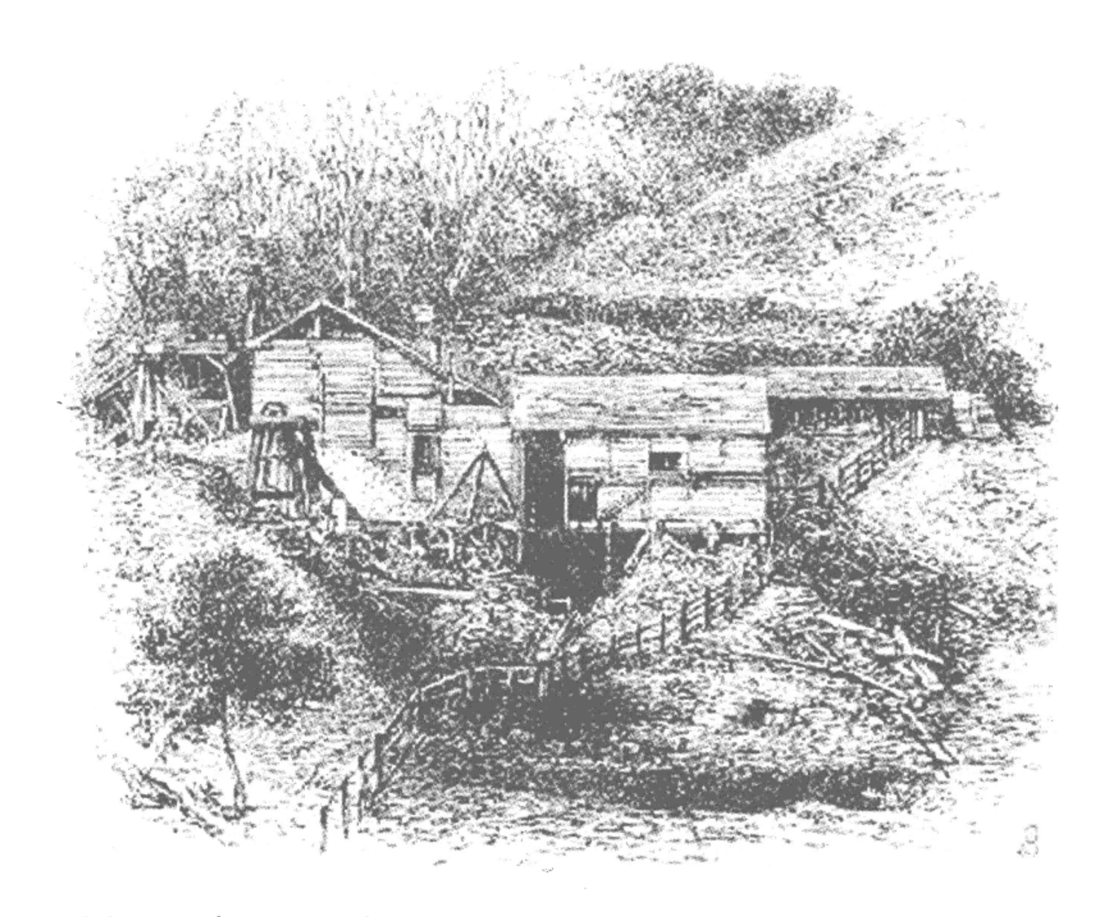
咖啡繁荣

哥斯达黎加对咖啡种植的尝试，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意。到了50年代，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已经开始种植咖啡，尼加拉瓜也跃跃欲试。1860年，咖啡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总出口额中都占1%，而到了70年代末，已经增长至50%。虽然初期的咖啡种植也得到了部分保守派政府的支持，但是让保守派贵族从靛蓝和胭脂红的生产中转变过来是非常缓慢的。第一批咖啡种植商自然不是传统的贵族成员，他们是对自由贸易和其他自由派政策饶有兴趣的一批人。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等一些自由派咖啡生产商甚至推翻了保守派的统治。

多数自由派独裁者都是巴里奥斯那样的咖啡生产商，他们为经济作物主导中美洲出口创造了经济条件。他们也仿照哥斯达黎加的做法，千方百计出台政策刺激咖啡种植，比如废除教会的什一税、为生产商提供贷款等。此外，他们改善了交通，让往来太平洋沿海港口的交通更加便捷。哥斯达黎加的成功很快就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得以复制。自由派在咖啡这一新兴的农业出口作物上的投入算是得到了很好的回报。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世界市场对咖啡的需求不断扩大，价格也节节攀升。在萨尔瓦多，从1880年到1914年，咖啡出口的产值增长了1100%。

19世纪80年代，中美洲的咖啡产量占到了全世界的14%。随着咖啡种植和出口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咖啡产量不断增加，推动着中美洲经济的发展。一直到1929年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才停下脚步。然而，并不是每个中美洲国家都经历了咖啡繁荣。尼加拉瓜在1893年之前一直处于保守派的政治统治之下，它与洪都拉斯一样致力于金银矿的开采，因此从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大力投资咖啡。后来，这两个国家也开始大规模出口咖啡，但起步太晚；洪都拉斯甚至拖延到了二战之后才开始。

174



图为位于洪都拉斯琼塔莱斯（Chontales）的一个金矿开采公司。自由派执政时期，咖啡不是每个中美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19 世纪 90 年代，出口的金条银条占洪都拉斯出口的 75%，而且 1915 年以前白银一直是洪都拉斯的头号出口产品。在尼加拉瓜，牧牛业和采矿业依然十分重要；1890 年在尼加拉瓜发现了多处藏量丰富的金矿银矿，为采矿业带来了一次飞速发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在盈利。（图由托马斯·贝尔特 Thomas Belt 绘于 1874 年）

175 咖啡的出口不仅把中美洲带入了世界市场，而且为其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急需的诱因。虽然种植与出口咖啡所得的利润未曾交税，但是它引入了外币，让人们买得起进口货物。进口的增长又带来了可观的关税收入，政府金库充盈。以萨尔瓦多为例，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进口税几乎占其收入的 60%。对单一出口农产品的过度依赖，导致中美洲国家无力掌控由外部资本引起的价格波动。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也相继开始出口咖啡。剧烈的竞争之下，中美洲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断萎缩。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国内生产量一直在

提高，占市场份额不到5%。1929年，哥斯达黎加平均每人生产94磅咖啡（占世界生产总量的1%），而萨尔瓦多每人91磅（占世界生产总量的2.6%）（原文如此，编者注）。1929年大萧条过后，咖啡依然是中美洲最大也最不可替代的出口商品，在整个20世纪都是如此。

土地“改革”

自由派希望通过农产品的出口使增长达到最大化，一切他们认为不盈利的土地使用都要转而为种植经济作物所用。自由派的另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削弱教会的势力。在努力实现这两点的过程中，大量修道士的财产被没收，然后进行了重新分配。在危地马拉，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没收了958 143英亩的教会土地。在萨尔瓦多，这些财产变成了咖啡农场。购买土地的人与新自由派政府有着紧密联系，他们是军队长官、政客和商人。自由派一旦开始为种植而分配教会土地，便会接着把其他土地也分配出去，只要他们认为该土地带来的利润不够。公共土地就是下一个目标。

中美洲的咖啡产量

以1 000磅计				
	1885	1900	1930	1940
哥斯达黎加	19 842	35 715	51 809	41 227
萨尔瓦多	20 062	48 943	143 301	140 788
危地马拉	47 620	66 947	97 224	132 013
洪都拉斯	3 307	2 646	3 527	3 704
尼加拉瓜	9 700	19 842	33 731	29 013
总计	100 531	174 093	329 592	346 745
数据来源：《世界咖啡》（1947）与托雷斯·里瓦斯（Torres Rivas，1993）				

土地的重新分配使梅斯蒂索人变得富有而具有影响力，从而取代了很多保守派贵族的地位。政府赠予土地最大的受惠者是中美洲人，但外来投资商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移民也从中受益。德 176

国人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种植咖啡；英国人在哥斯达黎加做咖啡生产的生意。中美洲国家纷纷将土地和资源拨给外来企业家，目的是要以此换来现代化建设项目，比如电报和电线、船坞和铁路。但不出几十年，这些外国人的赠地和贷款就会成为中美洲国家的一大问题。

除了对教会和国有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以外，自由派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公共土地或者村社（ejido）土地。即使是在殖民地时期以前，村社土地都是作为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耕作土地而被保留下来，然而从自由派彻底的资本主义角度来看，这些土地本可以用来种植出口作物，因此没有产生其应有的效益。咖啡种植商有权向印第安人租用这些公共土地，而印第安人几乎没有反对的余地。印第安人经常收不到租金，而当他们向政府官员反映这一情况的时候，政府不予理睬。

政府往往以派遣勘测员去重新丈量分界线的方法来解决土地方面的争端，但测量时常常偏袒种植商，就算印第安人一方是老练的拉迪诺人政客也不例外。例如，1883 年，莫莫斯特南戈德比森特（Vicente）家族是基切玛雅人中的贵族，为了防止梅斯蒂索人抢走自己的玉米地，他们先发制人，不仅贿赂了巴里奥斯总统 1000 比索，还送给梅斯蒂索人 1 000 块琢石、60 只羊和 1 头公牛以求他们放过玉米地，结果却是石沉大海。

印第安人的公共土地日渐被剥夺，最后，自由派颁布法律规定印第安人必须出售其土地。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的咖啡庄园就是靠租赁玛雅人的村社土地起家；他当了危地马拉的总统之后，就彻底拥有了这些土地。萨尔瓦多是这一类土地政策实施最彻底的一个国家，1882 年颁布了《废除公地法》（Extinction of the Ejidos Law）。公共土地被卖给了私人，许多小地主甚至连财产都被没收。

177 就这样，土地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19 世纪后期，随着咖啡价格的不断上涨，更多的土地投入到了咖啡生产中去。靛蓝和胭脂红等传统作物几乎全面停止种植。咖啡也取代了粮食作物，因此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进口食品。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粮食短缺逼得农民四处迁徙寻找土地。印第安和拉迪诺农民几乎难以为生，尤其在萨尔

瓦多。

咖啡贵族

到了19世纪末期，中美洲国家已经由咖啡种植商统治，至少也是咖啡种植商的利益集团。中美洲的社会等级结构几乎没有改变，但是自由派的政策和咖啡经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统治阶层。例如，梅伦德斯—基尼奥内斯（Meléndez – Quiñónez）家族便是萨尔瓦多咖啡贵族中的一员。从1913年到1927年，先后有三位成员如家族领地一般统治着这个国家：萨尔瓦多的卡洛斯·梅伦德斯（Carlos Meléndez）总统、他的继承者也是他的弟弟豪尔赫（Jorge）以及豪尔赫的继承者也是他的妹夫阿尔丰索·基尼奥内斯·莫利纳（Alfonso Quiñónez Molina）。

对自由派独裁者来说，咖啡的利润关系到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这样才能同时确保国家和咖啡种植商的经济利益。因此而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网络十分紧凑，除了最富裕的阶层，其他人一概排除在外。据说萨尔瓦多的寡头统治集团仅包括16个家族，不过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萨尔瓦多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在各地的40—100个家族中间。

咖啡贵族走上政治舞台始于自由派统治时期，他们牢牢控制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直到21世纪。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Oscar Arias Sanchez）1986年和2006年两度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哥斯达黎加有三个最富裕的咖啡家族，桑切斯就是其中两个家族的后代，而他的生意伙伴就在第三个家族。也有时候，这些贵族家庭对其他人产生兴趣而与外来投资者联姻。例如，20世纪90年代萨尔瓦多的总统是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Alfredo Cristiani），他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咖啡生产商与寡头统治家族联姻的后代。殖民地时期的贵族以通婚和经济多样化等方式维持自己的权力，很长时间内没有被淘汰：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是显赫的咖啡种植商的后代，但同时也是征服者胡安·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Juan Vásquez de Coronado）的后代。尼加拉瓜的查莫罗家族依靠在格拉纳达地区开

牧场实现了财富的原始积累，虽然不是自由派的咖啡贵族，但这个家族现在也拥有了咖啡庄园而且培养出了政治领导人，包括比奥莱塔·巴里奥斯·德·查莫罗（Violeta Barrios de Chamorro）总统（1990 年至 1996 年在位）。

178

基切玛雅人

玛雅人的聚集区在危地马拉高地上，高于海平面 4 500 英尺，其气候由于太过阴凉不适合种植咖啡。正因为如此，虽然低海拔的农田在自由派的土地改革中被夺走，但是大部分传统村落没有因土地改革而全部遭殃。不过，自由派还是连高地上的玉米地都没有放过，把它们都分给了政治盟友。例如，在莫莫斯特南戈，梅斯蒂索族军官都被赠予了基切玛雅人的土地。那个时候，由于对天花等流行病的控制加强，印第安人口正好翻番，所以土地的流失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到 1894 年，只有 20% 的莫莫斯特南戈人能靠田地养活自己。没有足够的土地，玛雅人只好进口玉米和大豆来维持生活，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依赖于一些商业行为，比如编织毯子来出售。莫莫斯特南戈成了危地马拉最重要的羊毛纺织中心。不过，印第安人由于被迫四处迁徙以从事季节性的咖啡收割，所以连羊毛纺织这个活计都不得不中断。尽管莫莫斯特南戈的玛雅人对于他们文化的独立性一直以来都具有强烈的保护意识，但是商业行为还是让一部分人抛弃了传统服饰，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然而，他们不赞同自由派所倡导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而是把闲钱都用在了宗教庆典上。



图为1920年莫莫斯特南戈的一个集市日（照片由安东尼A. W. Anthony所摄，现存于杜兰大学拉丁美洲图书馆）

劳动力改革

179

所以你要明白……印第安村落……在农场主的要求下被迫向对方提供劳动力，有时候给单个农场主的数量就达到50或100个……

——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总统，1876年（伍德沃德，1993年，第427页）

住在农场里的工人却不知道咖啡是什么味道。

——路易斯·山姆·科洛普（Luis Sam Colop），《感伤的逃亡》（*Refuges Sentimentals*）［摘自汉迪（Handy），1984年，第55页］

随着咖啡产量的提高，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益显著。自由派独裁者想方设法把农民变成雇佣工人。他们颁布了反对流浪的法律，然后由警方大力实施。他们以威胁的方式让农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接受预付工资，然后允许种植商分文不付，或者以公司的货物代替现金支付。失业的农民在薪酬上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农忙收割的季节，连那些有幸自己拥有土地的农民都不得不随季迁徙，到各个咖啡

庄园里去收割，一去就是1—3个月。印第安人还被强迫为修路等自由派工程“自愿”贡献劳动力。独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这些独裁者事实上就已经重新启用了殖民地期间的劳役偿债制和劳力贡赋制。只有哥斯达黎加采取了家庭农场体制，因此没有重蹈封建体系的覆辙。

自由派统治时期结束的时候，工钱降低了而营养不良的状况增多。比如在危地马拉，从1900年到1917年期间，一天的工钱只能够买2.5—4.5磅玉米。与之相比，采取更为保护主义政策的保守派统治时期(1853年至1866年)，反而能买7—12磅。虐待劳工行为招致动乱。1876年，莫莫斯特南戈的玛雅人由于不满土地改革，攻击了危地马拉的军队，还参加了保守派策划的一场暗杀巴里奥斯总统的运动。几年后，在尼加拉瓜的马塔加尔帕（Matagalpa）地区，为了建设道路，印第安劳动力遭到剥削，他们因此爆发反抗运动，连尼加拉瓜的莱昂城都受到威胁。诸如此类的事件并不罕见。军队越来越关注国内的动乱，无暇顾及边境的保卫。而这样的动乱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不断加剧。1912年，萨尔瓦多专门成立了国民警卫队，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咖啡庄园的安全；为了确保士兵的忠诚，种植商自己补贴士兵的工资。

180

哥斯达黎加的独特之处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有政治见解而遭到侵扰或迫害，除非那个人犯了罪或者密谋犯罪。

——《个人权利法》第8条，1877年

人口稀少的哥斯达黎加就算在19世纪的中美洲也是落后的，它有大量闲置土地可以分配。哥斯达黎加印第安人口少且分散，所以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哥斯达黎加人一直是自己耕种土地。政府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从咖啡中盈利，以此来鼓励这一新作物的种植，理由已经足够。结果出现了很多家庭农场，家庭成员自己收割作物。与其他中美洲国家一样，哥斯达黎加也通过咖啡生产成了一个整体；但它又有独特之处：在其他中美洲国家，佃农和印第安人的公共土地被夺，

被迫陷于劳役偿债制；但大多数哥斯达黎加人确实从咖啡种植中受益。社会差别的确存在，但是这种差别不是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因为其人口几乎全是白人。有些地主的固定资产得到巩固，因而成了出口权贵。不过小型种植商仍占多数，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有6.5万至10万个咖啡生产农场。哥斯达黎加的这种包容性经济加速了民主改革的进程，迎来了托马斯·瓜迪亚将军（General Tomás Guardia）的开明领导。虽然瓜迪亚将军本人也是一名军事独裁者（1870—1882），但是他让富裕的咖啡种植者明白政变无益于商业，在文官治军的政策上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颁布了普及教育的法律，以发展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还实施一套覆盖范围广泛的公共教育体系。另外，他制定了个人权利法，取缔了罚金。到19世纪末，哥斯达黎加虽然仍受独裁者统治，但与其他中美洲国家比已经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军事权威有所抑制，而且实现了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和平选举。

洪都拉斯的投资：香蕉

181

香蕉增加了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等中美洲国家的出口多样性。就这一点来说，英属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也是如此，但在洪都拉斯，香蕉成了最主要的出口。19世纪末期，香蕉生产的商业化使得人们对咖啡生产的负面因素夸大其词。政府再一次想尽办法鼓励投资，为该种农产品的出口盈利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次，各种刺激条件不是针对中美洲的土地拥有者或者商人，甚至不是单个外国人，而是针对外国企业的。

中美洲政府之所以如此慷慨，部分原因是他们想发展加勒比地区。殖民地时期，加勒比沿海几乎被忽略了，后来咖啡出口商又大力发展太平洋港口，情况便进一步恶化。外国企业有资金、也有办法在这片从前疟疾风行的土地上发展香蕉种植，并且用铁路把种植区与加勒比海的港口相连接。

洪都拉斯尤为积极慷慨。洪国三面与他国接壤，与尼加拉瓜因边境问题争执不断，与危地马拉有政治纷争，与萨尔瓦多又有军事冲突，所有这些让洪都拉斯政府不得安宁，遭受接二连三的政变。在咖啡繁荣时期，洪都拉斯依然以农业为主，贫穷而落后。特古西加尔帕自1880年起就是洪都拉斯的首都而且坐落在最赚钱的矿藏附近，可连这样的城市也到1891年才有城市供水。中美洲城市曾经一度用咖啡带来的巨大财富四处建设高楼，一派大好时代的景象。例如，哥斯达黎加耗资200万美元在圣何塞建了一座歌剧院，是当时中南美洲最昂贵的建筑。但洪都拉斯的城市依然显得寒酸而落后。19世纪70年代早期，洪都拉斯国内没有报纸也没有图书馆。其所有出口贸易的总产值比危地马拉咖啡出口的单项还要低。在自由派的统治下，情况有所好转，但收入的欠缺让洪都拉斯远远落后于咖啡共和国。

……特古西加尔帕，那可是“银山之城”，是主权独立的洪都拉斯共和国的首都，看到它第一眼，发现它没有任何惊奇之处；这样的地方顶多就是个大农村，放眼望去尽是一层小楼，还有一个涂白了的教堂。在那个略显贫瘠的山谷里也只占了极小的一隅……

——亨利·A·弗兰克（Harry A. Franck），1916年（第363—364页）

182

联合果品公司

政府出让80万英亩未耕种的土地给公司，可以是铁路沿线或者公司选择的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在国土范围内），所选区域除了建设铁路和必要建筑物所必需的土地以外，任何自然资源也全部包括在内……还有利蒙港……的两块土地……也都不计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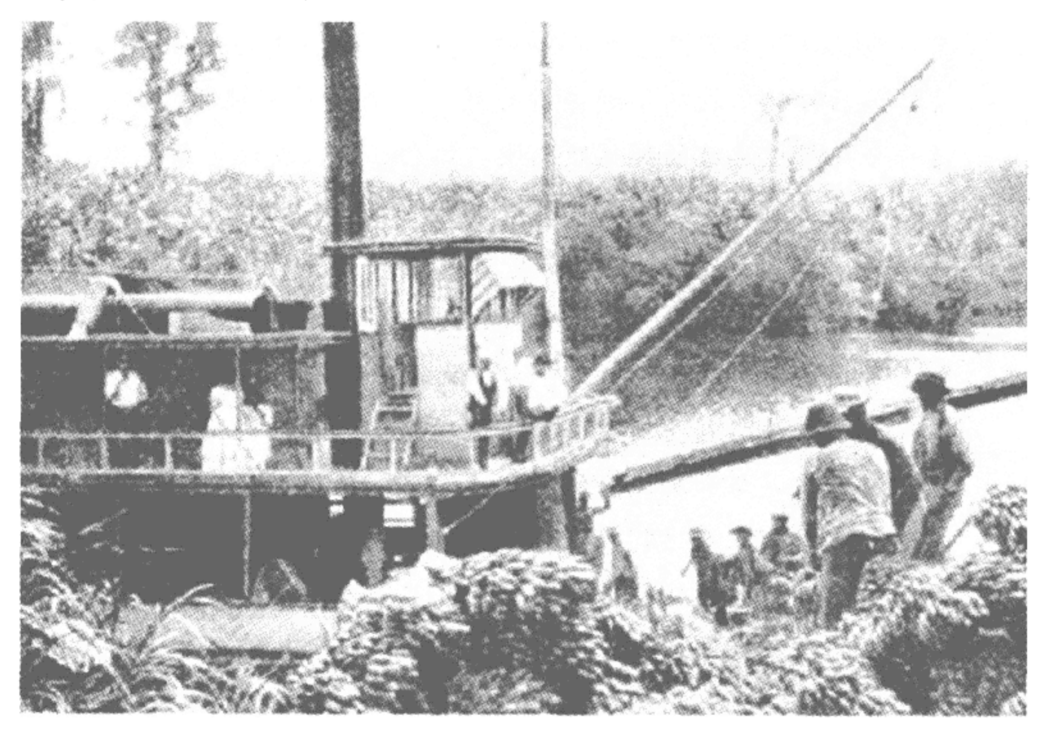
——哥斯达黎加与迈纳·基思（Minor Keith）的合约，1883年（爱德曼和凯南，1989年，第61页）

香蕉出口开始得很偶然。早在19世纪70年代，定期往来加勒比海的美国汽船就从洪都拉斯装一些香蕉去新奥尔良卖。最后，他们也从伯利兹进香蕉。当时的伯利兹很贫穷，是一个几乎被忽略的英属殖民地。伯利兹很快发现与新奥尔良的贸易远比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有利可图。直到1878年，哥斯达黎加拨给了美国人迈纳·基思大片土地，香蕉出口产业才算真正踏上商业化道路。基思得到的土地占整个哥斯达黎加的7%，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基思从利蒙港建设一条铁路到圣何塞，有了这段铁路，哥斯达黎加就有了贯通太平洋与加勒比海的跨地峡铁路。铁路1890年竣工，在这之前很久，基思就开始利用已完成的铁路向利蒙港运输香蕉，然后打包装载到返回美国的供应船上。随着人们对热带水果的需求越来越大，基思很快就从香蕉上狠狠赚了一笔。他把从洪都拉斯到哥伦比亚的其他小型香蕉公司都召集起来，1899年，他将自己的公司与波士顿果品公司合并成立了联合果品公司。基思没能按照合约履行职责，大部分土地都没有耕种，因此他被迫将土地还给哥斯达黎加。但无论如何，他太有钱有势了，有些人甚至称他为中美洲的无冕之王。

世纪交迭之际，洪都拉斯的采矿业利润骤降，因而认为香蕉出口是弥补的良机。水果的商业出口要求冷藏运输，要有铁路，还要有快速货船，外来资金（具体到香蕉产业，是美国来的资金）就显得十分必要。为了吸引企业投资以及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铁路系统（史上第一次），洪都拉斯基本上将自己的国民经济双手奉送于人。经济中效益最高的部分由于赠地的关系掌握在外来企业的手中，而洪都拉斯公民则只能束手相望。到了1910年，香蕉作物的80%收入都归北美的企业所有，而且他们还占据了加勒比沿海最好的土地；连科尔特斯港和特鲁希略等港口都仿佛是为企业服务的附属城镇。那些企业只付一笔固定的出口税，到1925年的时候，香蕉构成了洪都拉斯88%的出

口，但是所得利润却没有交税。

183



图为1893年，停泊在尼加拉瓜加勒比海岸的一艘美国汽船正在装载香蕉。（照片来源：《科普月刊》1894年6月号）

香蕉公司也会雇佣洪都拉斯工人，但是工人被迫在公司的商店购买商品，要知道那些商店只卖进口商品而不是洪都拉斯商品。而且，商品装在公司的汽船上运来卖给洪都拉斯人，是免交关税的。洪都拉斯人一般都不愿意从高地搬迁到疾病肆虐的加勒比海，在长期缺乏劳动力的状况下，也会从讲英语的西印度输入劳务工人。这就强化了加勒比沿海长期以来偏好英语的现实，而且使得讲英语的外国公司在这里的支配地位更为稳固。香蕉公司的影响力渐渐地变得比洪都拉斯政府还要大。虽然从1925年到1939年，洪都拉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蕉生产国，但依然如此落后，真是可悲可叹。铁路确实把香蕉种植区连接到了港口，但是，特古西加尔帕是中美洲唯一没有火车的一个首都。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才得以改变。

五国的特征

184

自由派的政策发展了国民经济，进而增强了每个国家的独立。铁路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外来投资者从咖啡庄园和香蕉种植区到港口可谓利益赚尽，但是他们从不超越国界，也从未将地峡联合起来。电报线和公路把曾经闭塞的省与城市相连接，也第一次把一个国家连成一个整体。全国性的农产品出口也起到了统一国家的作用，因为城市和乡村有了一个共同的经济目的。

自由派统治使得每一个中美洲国家都得到巩固，它们从实证主义出发，各自展示出清晰的国家特征。就连那三个主要的咖啡共和国，其社会和政治特征也各不相同。哥斯达黎加为民主共和国打下了基础，其国民经济依赖于小型家庭农场。萨尔瓦多恰恰相反，取缔小地主，创造了咖啡寡头政治，这在其他中美洲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危地马拉的咖啡贵族与萨尔瓦多相比，范围比较广泛，但也与军事独裁相勾结、统治农村人口，从这两点看，其统治模式大同小异。然而，危地马拉与其他中美洲国家不同的是，一直以来其人口主要为印第安人，而且在文化上也独立于梅斯蒂索人的社会。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所经受的政治动乱比三个咖啡共和国要多得多。除了对教会进行的自由派改革以及为发展采矿业和农产品出口所做的努力之外，它们没有像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那样进行系统的土地和劳动力改革。这两个国家在内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罕见的外部阻力。洪都拉斯允许外国企业控制其矿藏和香蕉生产，结果连政治独立也丢失了。洪都拉斯太穷了，穷到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发展一批贵族阶层。与之相比，尼加拉瓜在独立问题上较为断然，其经济的多样性也保障了一个牢固的贵族阶层，占人口的5%左右，但是内部发展最终还是排在了外国利益的后面。

自由派留下的遗产

185

自由派独裁者改变了中美洲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了咖啡生产

商和商人的手中，而不再是殖民贵族，但是保守派留下的军事化政治结构依然完好无损，除了形同虚设的立法机关以外，独裁统治的专断行为依旧得不到约束。咖啡让中美洲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尤其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没能使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得到发展，比如工业和消费者市场。然而，一个庞大却无权无势的农村工人阶层因此产生，他们在未来的几十年间给地峡带来麻烦。

自由派让中美洲国家达到了前所未及的现代化水平。修缮的道路、铁路和电报线就算不能使国家之间联合起来，也让各个国家内部得到了统一。尽管有着共同的历史、相同的地理位置和类似的经济模式，中美洲国家依然展现出了各自的特征。但是，为了现代化，他们出让了大量土地给外国机构，也欠下了巨额贷款。未来的几十年依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十章　美元“外交”及独裁者（1898—1944）

美国很强大也很了不起。只要它一颤抖，巨大的安第斯山脉都会猛烈震动……　186

——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罗斯福颂》（Ode to Roosevelt）

译自《生命与希望之歌》（Cantos de Viday Esperanza），1905 年

中美洲的独裁统治在 19 世纪上半叶变得越来越专制。现代化和教育项目改变了中美洲社会，即便如此，寡头政治决定了除军队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道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动乱和边境冲突让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他们的政府倍感忧虑，外国政府于是干涉中美洲事务，尼加拉瓜甚至整个国家被占领。

美国企业最终取代了欧洲公司成为债权人，而美国海军也顶替了英国炮舰的地位。1914 年巴拿马运河建成之后，美国认为中美洲成了其经济利益和安全的致命关键，因此需要对该地区加以监督。干涉中美洲事务等情况时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所掌控的中美洲经济比中美洲人掌控的还要多，而且常常连政治家都是受制于美国的居多。

墨西哥革命（1910—1917）给不断壮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穷苦劳动人民带来了希望。劳工运动和在野党对独裁统治提出了挑战，但是

1929 年，经济萧条引起的动乱很快也很彻底地被军队镇压。国际法庭和组织的成立（如泛美联盟，Pan American Union）为中美洲人在炮舰轰鸣中发表看法提供了平台，但是经济与政治改革的燃眉之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到解决。

187

中美洲社会

自由派在统治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没有受到挑战，当他们渐渐习惯这样的统治，其政治制度也就变得越来越专制。他们颁布了独立于宪法权力的戒严令，禁止自由言论、审查出版，反对者一概被流放或者监禁。政治腐败泛滥，特权阶层以及外来投资商（只要有钱付给政府）不断得到政府各种特许。军队和全国警力都进行扩编；军事政变多发。哥斯达黎加崇尚言论自由，对在野党也较为尊重，因此在暴虐的独裁统治中是一个例外。它也是唯一在教育上的支出高于军队支出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美洲社会因为自由派的政策也彻底地改变了。邮政服务得到重整，意味着在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之间寄一封信不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公共卫生服务有所提高，加上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使天花和霍乱等流行病得以有效控制。加勒比地区的外国企业配备了卫生设施体系，使用现代药物，而且建立了公司医院以来控制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人口因此得到增长：1945 年其人口达到 800 万，与 1855 年的 200 万形成对比。中美洲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西班牙征服时期的人口。

1913 年的部分政府开支 *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
市政工程	220 000	287 000	902 000	600 000	695 000
教育	180 000	152 000	159 000	354 000	635 000
军队	520 000	720 000	410 000	1 600 000	627 000
* 以美元计					
* 摘自蒙罗（Munro），1918 年，第 286 页					

鉴于自由派对教育的重视，他们的独裁者其实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到20世纪20年代，中美洲550万人口中（不包括巴拿马和伯利兹）只有15万人能够读写。不过，这也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学校显著增多，尤其是在制定了普及教育法的哥斯达黎加。甚至在贫穷的洪都拉斯，到20世纪初也已经有851所学校，而30年前只有275所。塞拉亚总统的改革又让2万名学生进入了课堂。哥斯达黎加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每个共和国（不再只是危地马拉）都有至少一所大学和一个国家图书馆，有助于城市内知识分子阶层的成长。虽然这些公共机构很有限，但是在他们的反复灌输下，中美洲人民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和更强的社会意识。 188

现代诗歌的奠基人——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

我们的美洲一直拥有诗人

从古老的内特萨瓦科约特尔（Netzahuacoyotl）时代开始就是如此……

从她生命中遥远的时刻开始

就充满着阳光、烈火、香气和爱，

这是伟大的蒙特苏马的美洲，是印卡人的美洲，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美洲，

天主教的美洲！西班牙的美洲！……

——鲁文·达里奥《罗斯福颂》，1905年（译自《生命与希望之歌》，1948年，第49页）

鲁文·达里奥（1867—1916）被认为是美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出生在尼加拉瓜莱昂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早期在一所耶稣教会学校受教育，但14岁的时候，他在马那瓜国家图书馆自学了西班牙文学经典。他杰出的天赋其实很早就得到了认可——13岁创作第一篇诗歌时已引起注意。达里奥被选中陪同外交使节在拉丁美洲四处走动，最后成了

塞拉亚总统驻马德里的大使。他与那个时代大部分见多识广的中美洲人一样，从欧洲吸取文化灵感，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海外。他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在巴黎定居。他通过诗歌，比如《生命与希望之歌》（Cantos de Viday Esperanza）表达了对西班牙美洲未来的忧虑。他是现代主义（Modernismo）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为西班牙诗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诗歌带来了一场文学上的革命。

自由派统治期间，中美洲社会也披上了一层外国特征。德国人拥有危地马拉10%的咖啡庄园。哥斯达黎加的常住外来人口几乎占到了其总人口的10%。大量西印度群岛的工人涌入加勒比沿海的香蕉公司，因此讲英语的非洲与美洲混血种人急剧增加。香蕉种植区和美国控制的港口成了西班牙中美洲境内的外国人聚集区，每个聚集区都配有公司所属的学校、商店和诊所，还有新教教堂和英语报纸。

不仅人口的构成越来越多元化，通过越来越多的报纸、收音机和电影院等媒介，中美洲受其他更加工业化也更加富裕的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香烟比雪茄时髦了；棒球也比斗牛更受欢迎了。骡拉的小车旁常有汽车急驶而过。铺设完好的街道、公园、室内水管以及装饰华丽的公共建筑等，大大改变了诸殖民地首都的外观。然而，这些城市与欧洲和美国的城市相比仍然略显土气。

189

自由派统治时期，政府机构和白领工人的数量都有增加。哥斯达黎加开始出现中产阶级。但是绝大多数中美洲人则越来越贫穷；出口政策导致贫民窟杂乱无序地散布各地，贫民窟里挤满了人。上层阶级大都发迹于咖啡产业，虽然有外国人（经常是社会上最富有也最有影响力的人）加入，但上层阶级的人数一直不多。外国人控制着自然资源；他们拥有一手建设的铁路和电报线，同时船运航线和银行也常常归他们所有；有时候，外国政府还会真正收集关税票据，作为向中美洲国家提供现代化建设以及资金的凭证。这些势力强大的外国人在诸共和国内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对他们负有一定义务的独裁者们。

独裁者之间的交锋

……除非他们能维持国内的秩序，否则不可能幸福和繁荣。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总统，1905 年［费布雷（Le Febre），1993 年，第 38 页］

外来投资商迫切需要的是稳定和廉价的劳动力。20 世纪初，在自由派独裁者的政策之下，廉价劳动力应有尽有，但是和平却很稀罕。尤其是洪都拉斯，遭受了各种政变和革命（仅 1903 年一年就换了三个不同的领导人），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地峡上其他独裁者之间的抗衡。其中最具权势的两位独裁者是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1898—1920）和尼加拉瓜的何塞·桑托斯·塞拉亚（1893—1909）。 190

从地理面积上讲，尼加拉瓜是中美洲最大的一个国家。在塞拉亚的领导下，尼加拉瓜在地峡上的权力位置恰到好处。他放弃长期敌对的莱昂和格拉纳达两大城市，建立了一个中立的首都马那瓜，以此确保国内的和平稳定。1894 年，他与英国的军舰鏖战，把英国永久性赶出了莫斯基蒂亚地区，不仅赢得了自己的人民的爱戴，所有中美洲人都视他为英雄。他干预邻国的统治，之前只有危地马拉才会做出这样的强权举动。甚至当他并没有真正入侵任何国家的时候，他也会资助尼加拉瓜的流亡组织，因为他们能够为他战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塞拉亚越来越担心外来者对中美洲的入侵，于是极力提倡统一，当然，联邦首领得是他自己。

塞拉亚日渐显赫的地位对危地马拉来说是一种冒犯。危地马拉不仅是中美洲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而且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与独立之后危地马拉的许多独裁者一样，有着称雄地峡的野心。正因为如此，墨西哥为了抑制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的势力，选择支持塞拉亚。这些争执演变成政变和武装入侵。1906 年，塞拉亚组织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一起对

抗并入侵了危地马拉。危地马拉顺势反击。洪都拉斯夹在两位大独裁者之间，成了他们的战场。这是中美洲有史以来第一场使用机枪的武装冲突，机枪是塞拉亚带来的。政局的不稳定让美国投资者忧心忡忡。他们现在有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撑腰，他对中美洲政客的这些拜占庭式的争斗可没有忍耐性。

美国：世界强权

就像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有各自的立场，我们也开始有我们自己的立场，而且必须一直坚持下去，实现世界的工业大计。

——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美国国务卿，1906 年［拉费贝尔（La Feber），1993 年，第 36 页］

191

战争中的基切族英雄

示意进攻的号角吹响了，凶猛的莫莫斯特南戈人拔出匕首向前攻去。

——莫莫斯特南戈的一位军官（卡马克，1995 年，第 209 页）

莫莫斯特南戈为中美洲的军事化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视角，尤其是为自由派执政时期的危地马拉。在莫莫斯特南戈，村镇由官方的梅斯蒂索自卫队管理，他们占用了唯一的一座二层小楼。这个自卫队似乎有点神奇，成功地把反抗的基切玛雅人吸收到了本地最大也最具战斗力的组织内。所有印第安人都被迫参军，但是莫莫斯特南戈自卫队的成功依靠的是基切族军官领导的按玛雅血统组织的特殊作战单位。玛雅萨满祭司也被吸收到这一体系中来，作为特殊的精神顾问、负责看守自卫队的守护神——圣地亚哥（即圣詹姆士）。1906 年，在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和托马斯·雷

加拉多（Tomas Regalado）总统的权力对抗中，莫莫斯特南戈德玛雅人因为奋勇抵抗萨尔瓦多军，被奉为民族英雄。基切人把萨尔瓦多的独裁者杀死在了战场上，为危地马拉带来了胜利。打败萨尔瓦多以后，基切族士兵得到了奖章、升官、封地等各种荣誉。其中500名士兵成了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以及暴君乌维科总统（Ubico，1931—1944）备受信赖的宫殿守卫。他们住在危地马拉城的总统皇宫里的时候，得到许可建造祭奠祖先的神庙，能在神庙内举行玛雅宗教仪式庆典、烧香以及杀鸡祭祀。

——摘自罗伯特·卡马克（1995年）和芭芭拉·特德洛克（1982年）。

世纪交迭之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强权和工业巨头。1898年，美国战胜西班牙，把古巴从西班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有效清除了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残余势力。美国还替换上了自己位于加勒比海岛屿以及远在菲律宾（曾经附属于西班牙）的海军基地。

192 美国的影响力范围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太平洋，因此需要一条贯穿中美洲地峡的运河以方便海军活动。但是根据1850年与英国签署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即使有这么一条运河，也不允许美国单方面完全控制。1882年当费迪南·德·雷塞布（Ferdinand de Lesseps）的法国公司开始在巴拿马开凿运河时，美国政府只好四处叫嚣，拿门罗主义说事。1889年，黄热病和工程上的困难让法国公司破产，其所作的努力化为泡影，这就意味着机会又向美国敞开了大门。1901年，英国同意与美国解除条约；同年，美国组成委员会并建议由美国在尼加拉瓜开凿一条运河。随着由美国修建并控制这样一条运河的可能性增加，美国对中美洲地区的干涉进一步加剧，因此引起了当地在如何确保这项投资的安全性方面的顾虑。

在美国这个世界新霸主的扩张主义政策当中，商业利益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在中美洲投入的资金以巨大的比率增长，从1897年的1150万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7690万美元。投资数额超过了该地区的很多长期投资者，比如德国；到1913年，美国已经紧逼由英国创

造的 1.15 亿美元的投资峰值。到此时为止，英国仍然是中美洲地区势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还帮助当地政府筹集资金以应对向欧洲列强欠下的外债，使得中美洲更加依赖于其北方的邻居。

美国在中美洲的直接投资（以百万美元计）

1897	1914	1919	1929	
危地马拉	6	35.8	40	58.8
萨尔瓦多	不详	6.6	12.8	24.8
洪都拉斯	2	9.5	18.4	80.3
尼加拉瓜	不详	3.4	7.8	17.3
哥斯达黎加	3.5	21.6	17.8	20.5
总计	11.5	76.9	96.3	201.7

数据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编写的《拉丁美洲的外部资金》，1964 年 12 月，第 13 页

1913 年的中美洲贸易＊

	出口	进口
与美国	17 500 805	20 519 159
与英国	7 861 577	6 154 025
与德国	11 820 866	5 239 729

＊ 以美元计

数据来源：摘自蒙罗，1918 年（1967 年，第 274—277 页）

193 美国的投资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外来投资，投资性质也常常独具一格。北美人对香蕉公司、矿藏、船运公司和铁路等生产性企业情有独钟，而不像英国那样投资政府证券，因此美国的投资实际上垄断了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经济，同时改变了其余国家。比如，在哥斯达黎加，仅北美热带水果公司的投资就几乎与英国的投资总额相持平。美国投资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到 1913 年，美国已经主导了中美洲的贸易，而且与欧洲的贸易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之后，美国的主导地位得到确保。1913 年到 1929 年之间，尼加拉瓜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 100%，危地马拉增长了 150%，而洪都拉斯的增长率则是令人震惊的 600%。

天然保护者

为了确保美国的资金和市场，干涉是合理的。

——美国总统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12 年［汉迪（Handy），1984 年，第 77 页］

20 世纪开始之际，政治独有的特性、运河以及美国的扩张主义对外政策都与商业利益相勾结，构成了北美在中美洲极具侵略性的存在。美国宣称自己为西半球的“天然保护者”，而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作为吸收美国投资最多的两个国家，首当其冲承受它的压力。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拉丁美洲一直比较轻视，他甚至抱有种族主义的态度，把那里的人民叫做“拉丁佬”（dago）。罗斯福决定终结中美洲那无休止的政治争斗与政变。他跟门罗主义叫板，提出了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门罗主义提倡阻止一切外来势力对中美洲事务的干涉以保护每个国家的主权独立，但罗斯福推论一改往日态度，主张为了维持和平和保障美国的商业利润，有必要干预中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

194 虽然此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从威廉姆·塔夫脱到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都尝试过弱化罗斯福推论的“大棒政策”实质，但是每当他们所推崇的“美元外交”政策失败之时，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军事手段。就连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口口声声宣称门罗主义代表着全世界所有国家不可动摇的自决权，但为了保护美国的石油利益（1918—1920），他不惜干涉哥斯达黎加内政。

洪都拉斯：大棒政策

你是美国，你就是未来的侵略者……

——鲁文·达里奥《罗斯福颂》，1905 年

1907 年，美国认为以洪都拉斯的重要性而论还不需要委派常驻外

交官。但就在同一年，根据泰迪·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解读，美国海军登上了洪都拉斯土地。那年，塞拉亚总统在萨尔瓦多的帮助下试图推翻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波尼利亚（Manuel Bonilla，1903—1907年在位）将军。他是香蕉公司的好朋友。

在此后的武装动乱中，美国军队为了保护商业利益进驻科尔特斯港，其他军队保护波尼利亚，在太平洋的阿马帕拉港口抵御尼加拉瓜的进攻。最后，美国商议了停战协定并选举了一位临时洪都拉斯总统。但和平期非常短暂，军事干预并没有带来稳定。从1911年到1925年，美国的战舰在洪都拉斯湾频繁停靠，美国六度干预洪都拉斯的政治事务。曾经在3年之中，发生了17次政变和革命。

洪都拉斯的不稳定并不只是由中美洲的派系斗争造成。相互竞争的香蕉公司就煽动了其中很多次冲突，包括1907年推翻美国选任的临时总统。所有企业都向中美洲国家的政府行贿以图回报。贿赂失败的时候，他们就为政变和冲突买单，通过这些手段来达到目的；甚至有时候这些行为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直接冲突，他们也在所不惜。

195 为了达到目的，香蕉公司甚至雇佣了美国士兵。李·克里斯特马斯（Lee Christmas）“将军”和他的死党——人称“机关枪”的莫勒尼（Molony）是最有名的雇佣兵，被各大公司争抢。比如，库亚梅尔（Cuyamel）果品公司试图从其种植区所在地洪都拉斯修建一条铁路到危地马拉，但是危地马拉军方在联合果品公司的大力相助之下坚决捍卫领土。直到1929年联合果品公司与库亚梅尔果品公司合并，洪都拉斯才出现了一些政局稳定的迹象。

一次和平的转变

1904年，一群思想进步的中美洲人发动了一场教育运动，旨在宣传统一中美洲的好处。联邦党（Partido Unionista）拥护曾经遭贬的联邦主义者莫拉桑所倡导的民主改革和中央政府。他们在五个共和国都赢得了追随者，而且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对待中美洲普遍存在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虽然他们没能成立联邦，但是他们创造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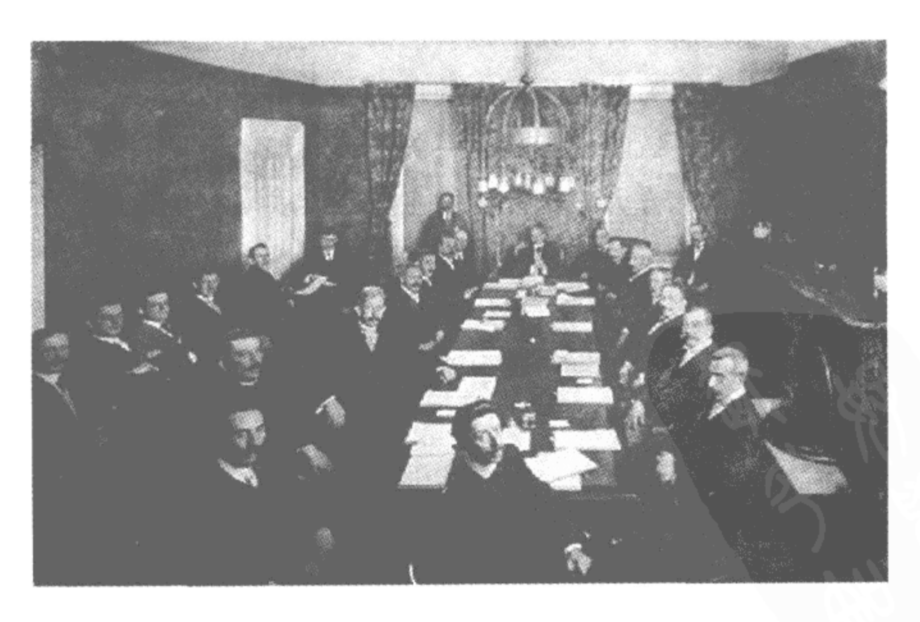
鼓励着人们以更温和的方式共同努力。

为解决争端，当地成立了特别法庭。1906 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申请仲裁解决与莫斯基蒂亚之间的边境问题（不过直到 1960 年才最终达成协议）。1907 年，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资助下，地区性特别法庭扩大为中美洲法院。塞拉亚认为这本该是地峡内部事务，美国不应干预，但尽管他反对，5 个中美洲国家都支持成立法院，而且商讨出法院的操作条款。法院制定了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以及规避冲突的准则，如限制流放、不认可武力缔造政府等。中美洲法院是个绝妙的尝试，切实减少了中美洲国家之间的冲突。然而，法院还是失败了，因为美国拒绝服从其裁决，1912 年武装入侵尼加拉瓜并于 1916 年宣布其为美国的保护国。

尼加拉瓜被美国占领

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 33 年……我是资本主义的勒索者。我帮忙净化了尼加拉瓜……

——巴特勒将军（Darlington Smedley Butler），1931 年［施密特（Schmidt），1931 年，第 231 页］



1907 年中美洲和美国的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此次和会上诞生了中美洲法院。（照片提供：美国国家档案馆）

196 美国已经决定在尼加拉瓜开凿一条跨大洋的运河。在19世纪的进程中，塞拉亚总统为了争取尼加拉瓜对莫斯基蒂亚地区的合法控制，与该地区的美国公司之间冲突不断，而美国政府抱着对运河的憧憬从中斡旋。为了尽量达成开凿运河的协议，美国保持与尼加拉瓜的积极关系，但是对于塞拉亚为了维护尼加拉瓜主权而坚持的诸多保护性限制政策，美国还是颇有怨恨的。1903年，美国选择任其摆布的巴拿马作为运河的开凿地点，与尼加拉瓜之间的纷争由此开始。（见本书原文第1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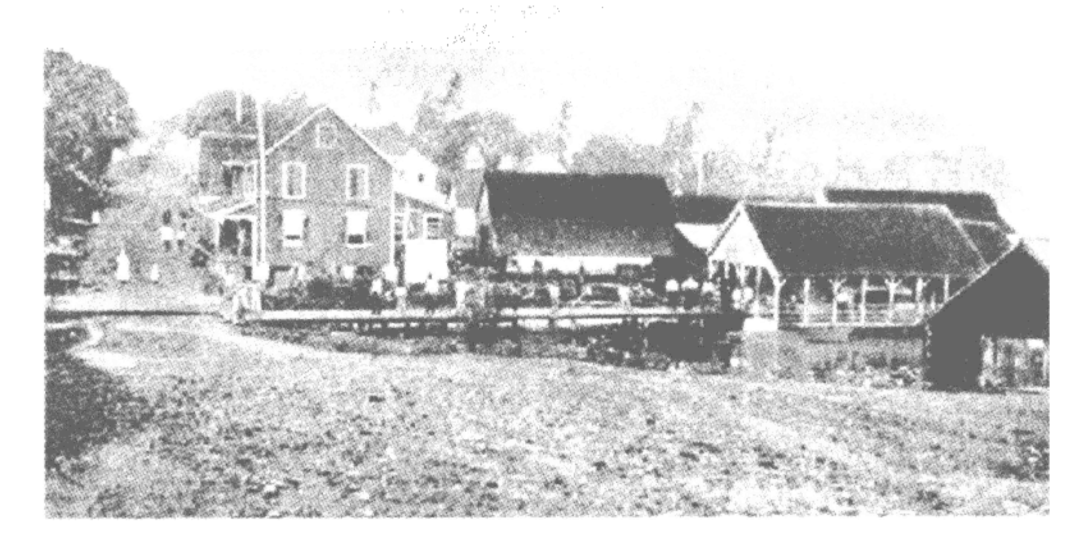
对于这样一条运河能够给国家带来的繁荣，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参与，塞拉亚都志在必得。他邀请其他世界大国商讨运河大计，有英国、德国和日本。对此，美国坚决反对。它把塞拉亚的举动看成是对美国的违抗，将他的民族主义解读成反美。美国当然不希望巴拿马运河有任何竞争，他们相信如果欧洲也拥有一条运河，那么美国在地峡上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197 美国展开了一场针对塞拉亚的大规模运动，理由就是塞拉亚对地峡的民主构成了威胁并且损毁了他自己的人民的幸福。罗斯福总统企图为抵制塞拉亚的行为争取美国人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他还鼓励尼加拉瓜境内的暴动，并试图说服其他中美洲国家加入到冲突中去。哥斯达黎加表示不支持北方大国干涉邻国主权；而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领导下的危地马拉则没有如此的远见。

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与塞拉亚一样专制，但是他更容易使美国利益得到满足。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功在位直到1920年。1909年，莫斯基蒂亚地区的外商资助了一场有美国官员相助的保守党叛乱。此事发生之后，塞拉亚被迫退位。叛乱由布卢菲尔兹开始，在美国总统塔夫脱的支持下蔓延开来，最终导致保守派政府的成立，而且十分依赖塔夫脱政府。美国的所作所为给尼加拉瓜带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塔夫脱不喜欢自由派和保守派反对其傀儡政府，于1912年向尼加

拉瓜派驻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陆战队维护"和平"，保护傀儡总统阿多尔福·迪亚斯（Adolfo Díaz）。美国政府机构接管了海关、全国性银行以及铁路。1916 年，《布莱恩—查莫罗条约》正式规定：尼加拉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埃米利亚诺·查莫罗（Emiliano Chamorro）将军被"选举"为总统，美国具有运河（沿圣胡安河）的永久控制权。中美洲法院的抗议和美国国会的迟疑都于事无补：美国海军陆战队持续占领尼加拉瓜直到 1933 年。到那个时候，美国佬的帝国主义在地峡上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谁敢反抗它谁就是中美洲的英雄。



1893 年位于尼加拉瓜布卢菲尔兹的北美拓殖点。布卢菲尔兹是美国公司的聚集中心。在很多原先由英国统治的地区，美国势力越来越强大，布卢菲尔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城内约有 100 名来自北美的居民，他们是布卢菲尔兹汽船厂和 19 个香蕉种植区的员工（不出几年，所有种植区均归联合果品公司所有）。为了使布卢菲尔兹尽可能地像家乡，他们把它建成"美国小镇"的风格，甚至从美国运回了废旧家具。（照片提供：《科普月刊》1904 年 6 月号）

动乱

198

……美国已经在中美洲激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达纳·G. 门罗（Dana G. Munro），1918 年（1967 年，第 306 页）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当地独裁者的双重支持下，从1919年到1929年的10年中，北美企业在中美洲的投资翻了一番。但是由投资和炮舰得来的“稳定”，实际上破坏了民主体制的发展，而且经济增长所得的利润根本没有分配到工人阶级的手中。中美洲人越来越感觉到被自由派背叛，抵制美国佬的情绪日渐高涨。

独裁者们只有在取悦了美国的情况下才能够继续掌权。1920年，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被推翻下台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没有出手阻止，卡夫雷拉这才认识到了这一点。独裁者迎合外来强权却不关心自己民众的疾苦；选举解决不了问题，政变是改变这种统治方式的唯一途径。当墨西哥革命（1910—1917）成功赶走独裁者并施行进步的社会政策之时，中美洲人面对自己的处境，再也按耐不住了。

最初的罢工发生在1917年，在洪都拉斯的香蕉种植区。但是罢工孤立无援，军队与外国公司相勾结轻易将它们平息了。后来，罢工在中美洲散播开来，各地组织了国家警察部队来维持境内和平。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更容易受到国际劳工运动的影响。先进的思想从城市渐渐传播到全国，为联邦党重新注入了活力，联邦党一直提倡为中美洲创建新的政治秩序。先进的思想也被带入农村地区，那里住着90%的劳动力。劳工动乱开始变得具有组织性。香蕉种植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罢工，香蕉公司迫于压力，以涨工资作为回应。

199
200

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之间隔着达里恩沼泽地，巴拿马曾经受制于哥伦比亚，但是从未真正融入那个国家。19世纪，巴拿马多次尝试脱离哥伦比亚。1902年，法国运河公司破产，希望卖掉其名下的经营权和资产，受此推动，美国在未经哥伦比亚或巴拿马允许的情况驻军巴拿马，并企图强迫哥伦比亚签署运河条约，但盛怒的哥伦

比亚拒绝交出美国提议的运河区域。于是，美国和法国伙同一批巴拿马政治家策划了一次暴动，之后立刻承认了这个新成立的“独立”共和国。不到两个星期，双方就达成了运河协议，规定美国作为巴拿马的保护国并拥有其10%的领土。黄热病和疟疾得到根除，加上工程的别出心裁以及3.53亿美元的投资，开凿运河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过，在建造过程中，5 600名工人牺牲了性命。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完工，挖走的泥土多达4亿立方英尺，是当时（也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建造的工程。巴拿马运河的巨大规模将巴拿马一分为二，20世纪后期以前，一直阻碍着巴拿马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大西洋与太平洋自地峡形成以来一直是分开的，但巴拿马运河将它们连在了一起，改变了它们各自的生态系统。运河的竣工也给巴拿马留下了沉重的社会压力：大量来自中国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成了闲置劳力。



图为1913年建造巴拿马运河米拉弗洛雷斯水闸（Miraflores Locks）的情景。（照片提供：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品与照片部）

201 动乱加上新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等组织的监督，改变了中美洲的领导权格局。危地马拉的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改革政府，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在野党重新组织了起来。在萨尔瓦多，保守派独裁者皮奥·罗梅罗·博斯克（Pío Romero Bosque，1927—1931）使劳工权利和出版自由得到法律的认可。哥斯达黎加政府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甚至没有任何抑制的迹象。新一代领导人计划成立一个中美洲联邦，争取赶上1921年独立一百周年纪念；然而，这样的联邦主义美梦再一次落空，正合美国之意。

在1928年的哈瓦那会议上，改革派领导人与加勒比地区的领导人力克美国的反对，共同决议“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内政”。这一精神在塞萨尔·奥古斯托·桑地诺（César Augusto Sandino）领导的尼加拉瓜民众起义中得以体现。他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军队当中的一名军官，由他领导的起义广受欢迎。从1926年到1933年，桑地诺和他的游击队（由几百名成员组成）成功干扰了美国支持下的政府。桑地诺的目的只有一个：把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尼加拉瓜赶走。他对美国的抵抗被当成是中美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标志，也给美国带来了难堪。1933年，当尼加拉瓜新任自由派总统胡安·鲍蒂斯塔·萨卡萨（Juan Bautista Sacasa）敦促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时，美国就爽快地答应了。

20世纪30年代与经济大萧条

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改革措施初见成效，很快又破灭了。1929年美国经济崩盘对中美洲造成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咖啡出口量减半。在萨尔瓦多，薪酬也减少了一半。洪都拉斯的香蕉出口第一次下降。成千上万名工人失业；有幸保住饭碗的人，酬劳也降低了。

经济大萧条有力地证明了自由派政策的失败。中美洲不但太过依赖其两大出口产品，而且只有一个市场，那就是美国。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也没有国内贸易。贸易收入的急剧下跌导致没有资金进口足够

的粮食。土地都投入了出口作物的种植，这个后果也就成了必然。很多国家因无法偿还外国贷款而被迫违约；大部分国家因筹集资金而背上了更多的债务，通常都是通过美国的银行，但是美国作为中美洲最大的投资者显然不会轻易帮忙。中美洲已然过分依赖美国，而大萧条让他们更加任由美国摆布。

经济的崩溃以及左派政治势力的煽动，在许多中美洲人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恐惧，尤其是寡头政治家族和外来投资者。20 世纪 30 年代，任何社会变化的要求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威胁。1932 年，连哥斯达黎加都暂停了宪法保护。在其他四个国家，新的军事独裁者走马上任，对美国和统治权贵来说甚为宽慰。这些独裁者带来了越来越强大的军队。 202

国民警卫队

桑地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抓住了中美洲人的情感。他发过誓，只要美国军队一撤离，他就会放下武器。美国为撤离做准备，重新创建和训练了一支“政治中立”的尼加拉瓜武装力量，称为国民警卫队，以此代替其海军。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被任命为指挥官，他在美国受教育、英语流利。1934 年，桑地诺根据停战协定去马那



图为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将军（Anastasio Somoza Garcia，1896—1956）与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迪诺（César Augusto Sandino，1895—1934）。（照片来源：尼加拉瓜国家档案馆）

瓜与萨卡萨总统共进晚餐。在这个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大使阿瑟·比利斯·莱恩（Arthur Bliss Lane）向华盛顿报告，称索摩查已经确保桑地诺的人身安全。然而，桑地诺在离开总统宅邸的时候还是被背信弃义的国民警卫队杀害了。索摩查有自己的政治计划，很快就控制了尼加拉瓜，而且得到了美国一如既往的支持。作为总统的查莫罗和萨卡萨在"中立的"国民警卫队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提供过帮助，而现在只能乞求美国终止警卫队对尼加拉瓜政治的控制，但是收效甚微。桑地诺成了传奇英雄，在后来的反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战争中，反抗者们把自己称为"桑地诺解放阵线"(Sandinistas)。

总统候选人——普鲁登西娅·阿亚拉（Prudencia Ayala）



图为普鲁登西娅·阿亚拉（Prudencia Ayala），她是萨尔瓦多女权运动的倡导者。（照片提供：圣萨尔瓦多文字与图像博物馆）

中美洲人民受到许多国际政治运动的鼓舞，包括主张妇女具有参政权的运动。萨尔瓦多的普鲁登西娅·阿亚拉（1890—1946）一直在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经常因为她的主张和参与公共示威游行而被关进监狱。作为联盟党（Partido Unionista）的一员，她因策划推翻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的统治而被囚禁在危地马拉。阿亚拉出生在松索纳特地区的一个印第安人村落，但是成长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城市，叫做圣安娜(Santa Ana)。她在这里成了一名记者，

也是一位激进分子，而且还是两本文学著作的作者。1930年，阿亚拉成为第一位宣布竞选萨尔瓦多总统的女性——或者竞选任何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以此反对禁止女性参政的法律。然而，在此后几乎20年内，妇女选举权在中美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认可。

203

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Tiburcio Carías Andino，1932—1948）将军为洪都拉斯带来了稳定；他是洪都拉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他快速有效地平定罢工，而且当越来越多的洪都拉斯人失业贫穷之时，他竟然把预算投入到军事支出和偿还美国的贷款上去。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1931—1944）将军因为崇拜佛朗哥元帅在西班牙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对美国来说是个尴尬的角色，但是他保住了自己的位置，方法是向外来投资者提供新的特权，同时组织秘密警察恐吓自己的国民。1934年，索摩查（Somoza）将军开始统治尼加拉瓜，其残暴的统治持续了22年。

然而，最激烈的反应发生在萨尔瓦多，当时的领导人是马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蒂内斯将军（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1931—1944）。饥饿已经导致了咖啡庄园内的无数次暴动，许多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加入了由奥古斯汀·法拉本多·马蒂（Agustín Farabundo Martí）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由于不满政府所作的回应，推翻了总统，然后企图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者。1932年，农民起义席卷了萨尔瓦多。军队在三天之内重新控制局面，但这次起义造成30多人死亡。后来，在萨尔瓦多历史上被称为“拉马坦萨”（la matanza）的这次大屠杀中，政府杀死了马蒂和其他起义首领以及多达3万的农民，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在接下来的50年当中，军队的统治可谓毫无阻拦。每当风暴发生，烈士法拉本多·马蒂的名字就是最好的战斗口号。

睦邻友好政策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想终止对中美洲的武装干涉。对共和党总统来说，支出过大是主要问题；对美国国会来说，干涉中美洲让它在国际上尴尬无比。其实凭借美国对地峡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武装干涉完全没有必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美洲独裁者们比海军陆战队更加关心美国利益。

204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是第一位这样的美国总统：向中美洲各国说明不干涉确实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他解除了所有美国的保护关系，而且与每个国家达成军事协议——为他们提供军备以及训练军官。同样重要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克服了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幻想破灭。他开创了一个贸易体系，允许中美洲的出口产品优先占有北美市场。当然，作为回报，来自美国的进口货物的关税降低了。1940年，一个及时的条约确保了美国从中美洲进口咖啡，当时与欧洲之间的战争正好封锁了对欧洲大陆的出口。

罗斯福的睦邻友好政策为整个20世纪30年代创造了一段难得的合作时期。即使是在反美情绪最高涨的尼加拉瓜，索摩查总统也在总统府的空地上建起了美国大使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与中美洲之间的合作仍在继续。1941年美国对德国宣战之后，所有中美洲国家，甚至包括非常依赖德国贸易的危地马拉，也都向德宣战。

遗产

……要说服他们（美国）干涉其内政最终是为他们好，这个会很困难。

——达纳·门罗，1918年，第306页

20世纪上半叶，中美洲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被美国支配，这在拉丁美洲其余地区是罕见的。连英属洪都拉斯都卷入了香蕉贸易，而巴拿马以一条巴拿马运河作为代价获得了独立。美国的军事干预加剧了政

治的不稳定，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件来看尤为如此。军事干预也让本就专制的独裁者势力更加强大。睦邻友好政策平息了一部分由军事干涉引起的反美情绪，但是没有改变地峡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桑地诺的民族主义和法拉本多·马蒂对经济平等的呼吁没有被遗忘。随着世界和平的到来，中美洲人在国内寻求改变。

第十一章　对旧秩序的挑战
(1944—1975)

205 ……我们活在一个陈旧的社会当中，它正在消失。在这个社会里，划分为“统治阶级”与“人民”……

——哥斯达黎加总统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José Figueres Ferrer），1955年（爱德曼和凯南，1989年，第120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反法西斯斗争仍在继续。联合国等全新的国际组织纷纷成立，以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民主价值观以及世界和平。这一次，中美洲境内争取改革的运动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支持，独裁者代表们一个接一个被推翻。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是唯一的例外。然而，冷战让这一切功亏一篑。寡头政治家族和美国企业披着反对共产主义的外衣，坚决抵制新政府的改革。对于那些被认为有左倾迹象的当选官员，美国支持将其推翻。中美洲政治历史上这一短暂的改革时期培养了民族主义意识，也让许多新的社会团体走上了政治舞台。经济也从改革当中受益；出口变得多样化，工业也通过中美洲共同市场开始发展起来。20世纪60年代，为了纠正困扰中美洲地区的诸多社会弊端，美国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带来了政府的直接援助。所有这些努力如同未尽的政治改革一样，都没能改善大多数中美

洲人的生活。

求变的呼声

206

这个国家是外来资本的牺牲品……

——《印痕》，哥斯达黎加的一本杂志，1940 年（爱德曼和凯南，1989 年，第 107 页）

中美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摆脱了 1929 年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美国在战争期间所建立的控制出口价格的机制是经济复苏缓慢的一部分原因。从被战争拖累的美国无法进口到当地发展所需的物品。同时，从 1929 年到 1944 年美国的投资竟然下降了 50%。在这种情况之下，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国家财政收入直到 1944 年才恢复到萧条前的水平，而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则到 50 年代才得以恢复。不过在独裁者们极为保守的财政政策下（迎合外来投资商的喜好），到二战结束时，竟然有盈余。

经济的长时间停滞给绝大多数中美洲人带来的是毁灭性影响。萨尔瓦多的经济几乎完全依靠咖啡收入，因为咖啡收益不高，暂时放弃收割。咖啡庄园内潦倒不堪，很多工人逃生；农民大规模迁徙，最后萨尔瓦多人占到了洪都拉斯劳动力的 10%，这一情形在 20 世纪 60 年代爆发成暴力斗争。失业席卷了乡村与城市。从农民到中产阶级官僚，每个人都受尽折磨。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预算削减，有 40% 的中产阶级官僚失业。甚至在哥斯达黎加，家庭式农场和自力营生者都渐渐消失了。最不受影响的是寡头家族，为了他们，各国政府成立咖啡协会来保护投资，发展这一作物以备日后出口。

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美洲人倡导经济结构的调整。他们要的是让中美洲人受益的经济增长而不只是外来者和权贵受益。国际组织对此表示支持，鼓励农民使用闲置土地、开办工厂以及出口多样化，而不仅仅是提高权贵们在咖啡作物上的收益。这就需要与联合果品公司等外来特许机构签订新的合同，才能够为工人提供更高的酬劳，让

更多的税收贡献国库。

中美洲人笃信挑战政治秩序的时机已经到来。人权和社会公正在自由派的议程上已经消失了太久。包括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军官在内的中产阶级，呼吁以受宪法保护的选举制度代替残暴统治的独裁者；工人们强烈要求出台法律，提供社会保障、8 小时工作日以及罢工的权力。穷苦人民要求土地。知识分子们要求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调整。

207

大范围改革

我们被逼上了绝路，唯有反抗。他们的唯一出路是独裁。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灰色区域。事已成定局。

——哥斯达黎加的记者欧赫尼奥·罗德里格斯·贝加斯（Eugenio Rodríguez Vegas），1948 年（爱德曼和凯南，1989 年，第 114 页）

沮丧的中美洲人支持改革，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和社会背景。鞋匠与学生、小地主与店主、官僚与小说家、年轻军官、农民、知识分子，所有人都迫切需要新的机会。新的政治党派成立：有本地的政党，比如危地马拉的国家革新党（National Renovation Party，PRN）；也有地峡范围的政党，比如提倡建立民主联邦国家的中美洲联合党（Unión Patriótica de Centro – America）。这些政党为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令人厌倦的交替提供了新的选择。但是在独裁者和权贵阶级眼里，任何改革的需求无异于一场革命。除了自身以外，他们无法满足其他任何阶层的需求，因此激起了民众的起义和全国性的罢工，由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领导，由不满的军官们负责行动。美国认为自己的政治角色是全球的，那时为欧洲和亚洲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战后的几年内，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援助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少。

1944 年，危地马拉的乌维科和萨尔瓦多的埃尔南德斯·马蒂内斯被推翻。其他地方也相继变革——其实，除了尼加拉瓜，所有国家都有变化。然而，对旧秩序最大的挑战只发生在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

208

1944—1954 年的危地马拉

除了人道与秩序，我们还要加入公正，因为建立在不公正和屈辱之上的秩序，对什么人都没有好处。

——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的就职演说，1945 年（哈迪 Hardy，1984 年，第 103 页）

1944 年，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在危地马拉历史上第一次自由与诚实的选举中当选为总统。由大学学生组织安排日程并由年轻军官背后支持的一场严肃的中产阶级革命，先是迫使乌维科将军退位，然后带领国家进入了危地马拉历史上最明朗的时期之一。危地马拉政府先后在阿雷瓦洛和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1950—1954 执政）将军的领导下，用了 10 年的时间通过社会立法，让危地马拉人民摆脱一贫如洗的状况。1945 年，新的宪法颁布，由此创建了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开放政府，比如新闻与出版自由以及允许反对派政党并存。这部宪法也合乎当时的理想主义，提出了与其他中美洲国家建立联盟的倡议。

40 岁的阿雷瓦洛因政治流放一直生活在阿根廷，哲学教授出身的他形容自己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资本主义者，而是一个“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派，但是他也相信危地马拉社会只有调整结构才能成为独立发展的现代国家。他对大地主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闲置土地低价出租给农民，而且通过了保障工人权利的法律。虽然在整个改革期间，商业利润出奇得好，但这两个政策对寡头统治集团和外国的商业利益仍然构成了威胁，比如联合果品公司。不过要推行他的计划，阿雷瓦洛必须依靠危地马拉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因为他们控制着中央劳工联合会（Central Labor Federation）。为了试图缓和苏联的影响给美国造成的担忧，他宣布任何隶属于国际的政党皆为非法。

下届选举临近之时，保守党希望取消阿雷瓦洛的社会改革，于

是投票给热门候选人弗兰西斯科·阿拉纳（Francisco Arana），他曾经参与了推翻乌维科的多党联盟。1949 年阿拉纳被暗杀直接导致了一场严重的保守派叛乱，这也是阿雷瓦洛不得不镇压的第 22 次政变企图。尽管麻烦重重的政治暗流依然存在，阿雷瓦洛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自由选举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建立。从 1945 年到 1950 年，城市中的薪酬提高了 80%。医院、学校（为了降低 75% 的文盲率）、电气化以及其他公共建设项目开始提高危地马拉人民的生活质量。

209 但是改革仍需进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以玛雅人为主的农村人口的健康和福利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忽视。1950 年，危地马拉平均每 6 300位居民只有一名医生，是中美洲最糟糕的比例。即使是在贫穷的洪都拉斯，每 4 800 位居民也能有一名医生，而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则不超过 3 000 居民。危地马拉小农的平均年收入为 220 美元，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农民收入的一半。不过危地马拉大型庄园的收入在中美洲是最高的。土地改革迫在眉睫。

1949 年，阿雷瓦洛的国防部长——37 岁的阿本斯获得了 65% 的选票。阿本斯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政府也不是，但是与阿雷瓦洛相比，他对共产党员有更多的理解，在允许共产党员拥有政府职务方面也不像阿雷瓦洛那样小心翼翼。危地马拉很快就因为他的进步政策而遭殃。阿本斯的土地改革虽然受到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推荐，但被美国投资商批评为具有共产主义色彩。

1952 年的土地改革法规定 223 英亩以上的大型庄园需要把闲置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政府迫切想要在危地马拉西部实施这一改革方案，因为那个地区急需维持生计的农作物生产。作为对被征收的那部分土地的回报，土地拥有者能够根据土地的评估价值获得补偿。联合果品公司等大地主们为了少交税，长期以来一直低估其土地的价值。根据新的土地法，阿本斯政府提出以不到 100 万美元的价格向联合果品公司购买它定价近 1600 万美元的土地。联合果品公司请

求美国国务院的介入。不幸的是，美国国务院果真插手此事。当美国训练出来的危地马拉军队在洪都拉斯边境集合时，阿本斯在国内采取了镇压措施。尽管他仍然有足够的支持者不至于下台，但军队已将他抛弃了。

210
211

农场的平均收入（以美元计）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小农场	220	420	445	908
中等规模农场	8 000	7 106	2 247	2 117
大地产	40 000	25 748	18 226	20 473
数据来源：托雷斯·里瓦斯（1993 年，第 7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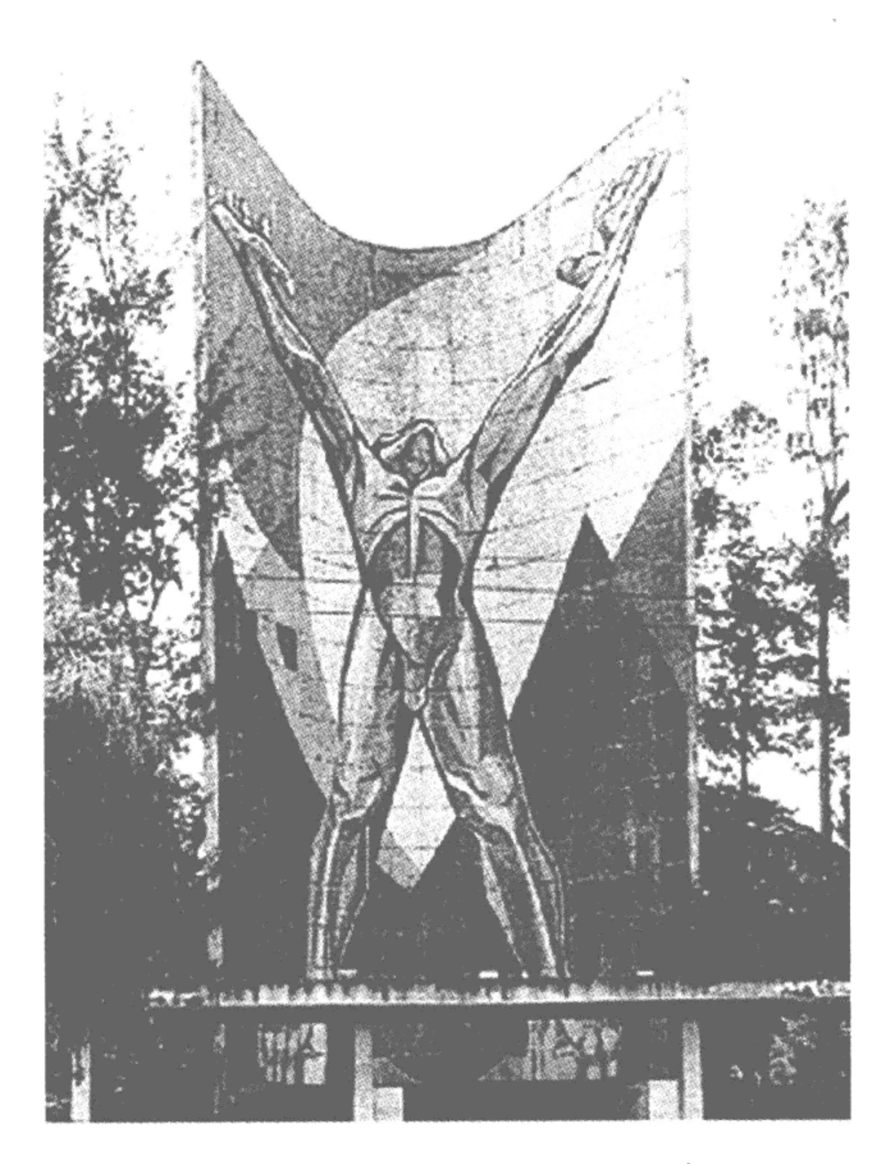
文化复苏

火辣辣的太阳直射着蔗糖种植园，几乎把他给烤熟了：太阳照在他的脑袋上，直到他的头发摸起来不再像头发，而像动物皮毛烧毁后的烟灰；太阳烧焦了他嘴里的舌头，这样他就不能在睡梦中泄露秘密了……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玉米人》，1949 年（马廷，1993 年，第 9 页）

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中美洲带来了一波新的文学艺术热潮，由此成为中美洲的骄傲。萨尔瓦多·萨拉萨尔·阿尔鲁埃（Salvador Salazar Arrúe），也叫“萨拉尔鲁埃”（Salarrúe），早在 1934 年就以他的经典短篇小说集《泥土的故事》（Cuentos de Barro）开始为萨尔瓦

多的文化做出贡献。哥斯达黎加的“卡卢法”（Calufa），也就是卡洛斯·卢伊斯·法利亚斯（Carlos Luis Fallas），在1934年组织了联合果品公司万人大罢工后，写下了以联合果品种植园内的生活为主线的经典小说。音乐家、民族志学者马利亚·德·巴拉塔（María de Baratta，1890—1978是第一个研究当地民间传说的萨尔瓦多人，他重新创作了传统的歌曲和舞蹈。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是位了不起的小说家，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7）的拉美作家。与那个年代的其他作家和艺术家们一样，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是知识分子对民族意识形成所作贡献的典范。学生时代的阿斯图里亚斯作为圣卡洛斯大学的一名中产阶级学生，是当时的政治活跃分子和示威游行者；毕业以后，他与别人一起为那些上不起圣卡洛斯大学的人成立了危地马拉平民大学。他的诺贝尔获奖小说《总统先生》讲述了有关政治独裁的故事，其原型为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及其统治下的专制氛围。由于受到当时另一位专制统治者乌维科的阻挠，该小说直到1946年才得以印刷出版。虽然阿斯图里亚斯在欧洲居住了近10年，但他一直是狂热的美洲主义者。他参与了《波波尔·乌》的西班牙语初译，并且把书内介绍的玛雅创世神话的主题融入到了自己1949年的小说《玉米人》当中。他追随过同为小说家的阿雷瓦洛总统（《鲨鱼和沙丁鱼》，1961年），当过驻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文化专员。在此期间，继续创作有关危地马拉民情的小说，比如《香蕉三部曲》，讲述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在小说当中针砭时弊以外，阿斯图里亚斯不仅是政治方面的写手，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始人。



图为1948年圣萨尔瓦多革命纪念碑。拼镶的壁画表达了20世纪中叶萨尔瓦多民主运动的求变精神。危地马拉在阿雷瓦洛（Arévalo）总统的带领下建造了一整片大楼，作为新危地马拉的地标，命名为市政中心。包括拉美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卡洛斯·梅里达（Carlos Mérida）在内的危地马拉的艺术家们，为建筑群进行了描绘与雕饰，主题鲜明，灵感来自玛雅人的神庙和全新的“梅斯蒂索”文化。（照片提供：萨尔瓦多教育部）

212

红色威胁

在危地马拉社会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没有对其政策公开发表过任何批评。睦邻友好的不干涉政策保持得非常完整。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反共取代反法西斯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由美国的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领导的反共“政治迫害”，认为颠覆活动随处可见。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953—1961）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与联合果品公司交情匪浅，所以当联合果品公司向他抱怨共产主义正在危地马拉扎根并威胁其商业的时候，美国正式向危地马拉提出交涉。在联合国的一次有关朝鲜的投票中，危地马拉选择支持苏联而不是美国，杜勒斯认为此举是对美国政策的公开藐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由苏联控制）向危地马拉运送武器，在杜勒斯看来，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已经遭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美国于是再次干涉危地马拉内政。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中央情报局把流放在洪都拉斯的一群危地马拉人训练成了“恶魔行动”（Operation El Diablo）成员，并从索摩查领导下的尼加拉瓜空运来了美国的武器。1954年，军队抛弃了阿本斯，对危地马拉的武装入侵很快就让宪法选举的政府垮台了。联合国和1948年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OAS）没能及时阻止阿本斯的被迫退位和流放。由入侵的反动领袖所带领的新政府很快就扫清了危地马拉一切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咖啡寡头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再次掌权。这也让其他中美洲国家见识了美国对政治独立的容忍底线。



图为1957年由美国国务院发行的一本反共宣传册的封面。联合果品公司积极推进的公共关系计划让很多北美洲人相信阿本斯（Arbenz）总统是共产党员。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发放宣传册子、个人组织活动（如联合果品公司拍摄了视频《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痛恨香蕉》）等十分常见。（照片提供：美国国家档案馆）

214 ## 哥斯达黎加：菲格雷斯主义

我将赢得更多对抗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斗争，比他们（共产主义者）20年来赢得的数量还要多，理由很简单——这是策略问题。

——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1948年（爱德曼和凯南，1989年，第107页）

哥斯达黎加的情况照旧比较独特。叛乱针对的不是保守派寡头，而是矛头直指拉法埃尔·卡尔德龙·瓜迪亚博士（Rafael Calderón Guardia，1940—1944）的文官政府。他通过了先进的立法，使社会保障福利和最低工资成为可能，这些是其他中美洲国家梦寐以求的改革。然而，卡尔德龙与天主教和共产党的联盟成了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小企业主和知识分子的众矢之的。在何塞·菲格雷斯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ncratic Party）的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这些群体需要的是工业化的深入和国内的发展，而不只是对工人的保护。咖啡权贵们为了击败卡尔德龙对这一派表示支持，从而促使了1948年叛乱的成功。

社会民主党指控平民党的卡尔德龙派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舞弊，并以此为借口让哥斯达黎加陷入了1948年的内战。国家内部的分裂也反映出地峡的分裂：危地马拉支援菲格雷斯，而尼加拉瓜则力挺卡尔德龙政府。在国际层面上，美国一心要铲除任何共产主义政府，阻止索摩查向卡尔德龙提供武器。尽管如此，仍有2 000多名哥斯达黎加人被杀，持续了40天的内战以谈判告终。政治解决让菲格雷斯坐上了专制军政府的龙头宝座。菲格雷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派，取缔了所有支持共产党的联盟，践踏了哥斯达黎加一直以来所享有的诸多宪法保障。同时，尽管尼加拉瓜在美国的帮助下继续支持生活在尼加拉瓜的较保守的流亡者，但菲格雷斯的反共倾向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美国对其社会主义的批评上转移开来。

215 对哥斯达黎加来说，幸运的是，18个月后军政府请辞，当时哥斯达黎加的状况足以确保其民主制度的留存以及未来几十年的国内发展。

1949 年，新的宪法正式生效，使许多改革成为合法，包括卡尔德龙专为工人阶级实行的多项社会保障项目。宪法还将银行国有化，以创立信用合作社等保护中小型土地持有的方式来辅助国内经济的发展。另外，宪法赋予女性参加选举的权利，让非洲与美洲混血种人拥有完全公民身份（在中美洲国家中尚属首次），这些都是哥斯达黎加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之保障。宪法还取消了常备军，这在中美洲也是首例。同时，成立了行政部门和选举法庭，以确保选举的公开公正。

1948 年内战奠定了现代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障型国家的基础。它是唯一能够让二战后的改革持续下去的中美洲国家。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1906—1990）两度成为哥斯达黎加的总统（1953—1957，1970—1974）。他既是工程师、哲学家，也是咖啡农场主和经济学家，被哥斯达黎加人民亲切地称为“唐佩佩”（Don Pepe）①。

广泛的改革

除了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改革运动也席卷了其他中美洲国家，但影响不如前者深远。洪都拉斯的现代化热潮始于 1948 年，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成果：1950 年洪都拉斯国内迎来了首批人工铺设的马路；3 万香蕉工人大罢工不仅为劳动者赢得了更好的薪酬也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范围。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文官总统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Ramón Villeda Morales，1957—1963）是一位儿科医生，在美国“争取进步联盟”的建议下，他推行了社会保障项目以及有限的土地改革。萨尔瓦多的改革时期（1948—1956）之后不久便发生政变，让又一个高压军事政府重新掌权，但是在改革的数年之中，奥斯卡·奥索里奥（Oscar Osorio）上校和他的民主联盟革命党（Revolutionary Party of Demoncratic Union）还是能够凭借咖啡繁荣改善了工人阶级的住房和医疗条件。1950 年通过新的宪法，女性被赋予了选举的权利。

---

① Pepe 是何塞的昵称，Don 西班牙文指先生，“唐佩佩”即“何塞先生”之意。——译者注

甚至在五个传统国家的边境上，改革也成为人们的信念。在英属洪都拉斯，失业和贫穷加速了劳动力的联合；1949 年，由乔治·普赖斯（George Price）组织，展开了一场独立运动。民族主义也激励了巴拿马政治；由学生发起的聚众示威迫使美国于 1948 年放弃了运河区域外的军事基地。虽然何塞·安托尼奥·雷蒙司令（José Antonio Remón，1948—1955）领导下的国民警卫队日渐强大并使巴拿马政治军事化，但是雷蒙毕竟实施了社会和土地改革（虽然称不上民主改革），而且在 1955 年的新运河区条约谈判中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更好的条件。



1950 年，奥斯卡·奥索里奥（Oscar Osorio）上校就任萨尔瓦多总统。奥索里奥总统为他的国家带来了一部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必须受到尊重，享受权利。（照片提供：萨尔瓦多教育部）

216 政治与社会改革让地峡活络了起来，尼加拉瓜是唯一没有加入改革的中美洲国家。事实上，尼加拉瓜积极反对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等国家的进步运动。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是二战后唯一幸存的独裁者，他牢牢控制着国民警卫队，对美国的要求唯

命是从，但是连他也无力控制所有要求改革的力量。1956年索摩查受到枪击，尽管有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医生相救，但也回天无术，于8天之后一命呜呼。可悲的是，索摩查的儿子们接管了尼加拉瓜，以同样的铁腕手段继续统治了近20年。

虽然对权力结构的小小挑战已经结束，但改革并没有完全消失。对独裁者们来说，中美洲人在政治上的活跃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置之不理。世界组织也越来越关注对人权的违背。最低薪资制度和一定程度上的农田再分配披着改革的外衣，其实质是操纵下的选举给新的军事独裁披上了一层民主的假象。迫于中产阶级和外部利益的压力，自由选举不时能够举行。但除了这些细微的变化以外，军队的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无情。

反改革

217

美国能打赢战争，但问题是我们能否战胜革命。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59年［勒弗伯尔（Le Feber），1991年，第15页］

美国在中美洲清剿共产主义威胁的行动不只局限于危地马拉。美国暗示这一行动定会给中美洲发展提供更多援助，1954年以此说服美洲国家组织宣布其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干预。但仅仅几年之后，也就是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共产革命在古巴取得了胜利。美国通过其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代表在中美洲地区越来越活跃。1960年，美国支持的一位萨尔瓦多独裁者受到左派威胁，结果掀起了一场迅速的右翼政变，也终结了美国与古巴的外交纽带。同年，美国训练的军队推翻了洪都拉斯广受欢迎的总统比列达（Villeda）。

美国支持独裁统治而不是民主选举政府这一事实；丝毫没有缓解反美情绪；而对美国商业利益的保护阻碍了中美洲经济的必要调整，拉丁美洲天主教主教们在某次会议上也对此发表了评论。由于强烈地

认同独裁者，美国把每一个对当地政府的攻击视为对自己的攻击，而这样的攻击实在太多。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MR－13等团体的革命运动以游击战术干扰美国支持下的危地马拉政府。20世纪60和70年代，据守在城内的群众革命协调员（Revolutionary Coordinator of the Masses，CRM）组织萨尔瓦多成千上万名教师、学生和工人进行公众集会，就连在索摩查统治的尼加拉瓜，其农村地区也遭到游击战侵扰。从20世纪50到60年代，巴拿马境内接连爆发暴乱，美国不得不围着运河区建造了一个8英尺高的围栏。1958年，在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拉丁美洲友好之旅期间，委内瑞拉游行者向他抛石子吐唾沫；其实，尼克松访问的8个国家中除尼加拉瓜以外，全都爆发了示威游行。

218

发生最严重的骚乱的时候，我刚好穿过运河区。几名学生试图把巴拿马国旗插在运河的两岸，其中一些学生在接下来的枪击中身亡。是巴拿马军队开的枪，他们要保护的是巴拿马与美国之间的条约。

——联合果品公司代表托马斯·P. 麦凯恩（Thomas P. McCann），1957年（1976年，第137页）

危地马拉选举中选民的参与情况

年份	合格选民	获胜者选票	获胜者选票占合格选民的比例
1944（阿雷瓦洛）	310 000	296 200	82.50%
1950（阿本斯）	583 000	266 800	45.70%
1958（伊迪戈拉斯）	736 400	191 000	25.90%
1978（卢卡斯）	1 785 876	269 979	15.10%
数据来源：胡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卡姆夫拉内斯（Julio Castellanos Cambranes）（罗普和莫里斯，1984年，第136页）			

争取进步联盟

1958 年的示威让很多美国人相信，需要的是新的政策而不是中情局策划的政变。尼克松自己认为应当减少对独裁统治的支持，把注意力放到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上去。1960 年，约翰·F·肯尼迪上台，他决定如要打败该地区的共产主义，确实需要新的技巧。肯尼迪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承诺了除私人投资以外的 10 年政府援助计划，以提高中美洲国家的生活水平并推行民主。消除成人文盲计划深入到了农村地区，并成立了农民合作社（通常是在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帮助下），这样的话，农业产品就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推广。

219 “争取进步联盟”计划通过军事和社会经济援助来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在美国看来，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表现得尤为出色，因此美国专门派遣军事顾问到其他国家训练并帮助当地军队和警力有效反暴乱。1969 年，尼克松上台以后，军事援助成了联盟中更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中美洲各个国家的年轻军官被送到巴拿马运河区内美洲学校接受训练。因为很多毕业生的恐怖主义战术和残忍行为，这个学校后来被美国媒体称为“刺客学校”（School of Assassins）。萨尔瓦多敢死队的头目罗伯托·达布松（Roberto D' Aubuisson）少校就是其中一位毕业生（见本书原文第 244 页）。

美国国会禁止使用资金购买土地，因为这有可能造成土地改革。然而，国会却挪用了数百万美元用于直接的军事援助，而且放宽了购买军事装备的贷款条件——危地马拉在一年内仅仅因购买武器就增加了 650 万美元的国债。此时的哥斯达黎加已经解散了常备军，因此对地峡的日渐军事化有所不满。美国对此的回应是给哥斯达黎加施加重压，要求其重新编制军队。1965 年，中美洲防务委员会（Central American Defense Council）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哥斯达黎加再次成为唯一反对的国家。

游击队或是被击毙或是被迫转为地下，经济增长足以（暂时）防止大暴动的发生，从这个程度上来讲，“争取进步联盟”是成功的。

但是它没能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在长达 10 年的联盟期内，中美洲发生了 17 次政变，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

经济多元化

虽然为改变政治结构所作的努力除哥斯达黎加以外全部失败了，但是为中美洲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却继续存在。贷款和新的外来投资推动了化学杀虫剂和肥料的使用，也增加了农作物的品种，比如对病害抵抗力强的香蕉。产业型农业的引入让开发新的出口作物在成本上成为可能。当然，尽管有新的作物引入，咖啡依然是中美洲最有价值的作物。而且，多亏了农业产业化技术，从 1950 年到 1980 年咖啡生产量事实上翻了一番。

220 棉花和牛肉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它们在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两国尤为重要。甘蔗也成为全中美洲十分重要的热带出口作物，但以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为甚。哥斯达黎加重新投资可可的生产。1959 年咖啡价格下降，新的出口产品弥补了差额。联合果品公司考虑到病害问题，开始从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撤离（到 1964 年，厄瓜多尔已经取代洪都拉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蕉生产国），它的理由是，其他农业投资已经对农村地区起到了帮助。比如，洪都拉斯虽然缺乏适于种植咖啡的肥沃火山土壤，但它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咖啡出口国。

1960 年，咖啡、香蕉和棉花作物的出口额几乎占到了总出口额的 76%，但并非所有出口都是农业出口。20 世纪 50 年代，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都特许外国进入其境内勘探并精炼石油。出口的多元化一直在继续。在 60 和 70 年代，除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以外，大部分中美洲国家的太平洋沿岸开始出口虾和龙虾。对巴拿马来说，虾的出口几乎与香蕉出口相持平。在加勒比沿海，多刺龙虾出口则越来越重要。到了 70 年代末期，咖啡、香蕉和棉花的出口额已经下降到了总量的 50% 以下。

中美洲出口的多样化：各类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咖啡	香蕉	棉花	金/银	其他
1938	52.2	24.7	—	9.1	14.0
1960	53.2	14.1	8.5	—	24.1
1972	26.4	14.0	10.9	—	48.7
数据来源：伍德沃德（1985年，第277页）					

经济一体化

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中产阶级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重组，仅仅经济多元化已经不够。他们感觉到，要推动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国内贸易势在必行。很多大众产品，如汽车、轮胎、加工食品、玩具、纺织品和服装等，与其依赖进口，他们更愿意在地峡上自己生产。改革政府执政期间，向农业出口产品征缴新的税收以资助工业化；连萨尔瓦多的咖啡寡头也需要缴纳咖啡税来援助其他经济部门。

对单个国家来说，仅凭自己实现工业化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国内市场过于狭小因而无法吸引必要的投资。而且，5个国家具有相仿的地形特征，生产的产品也是相同的。因此，有人提出，中美洲国家之间迫切需要采取相互协调的方式才能扩大当地市场、增加可贸易商品的种类。即使中美洲在政治上无法形成一个联邦，在经济上也需要更好的整合。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美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寻求经济合作的方式。1960年，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协调5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他们希望根据每个国家各自的需求和资源，发展不同的工业，以此在5个国家之间搭建起商业的平台。共同市场为新工业的发展提供财政刺激，由私人投资商提供资金。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是美国“争取进步联盟”的奠基石，它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公共资金。为启动这两个项目，美国贷出2亿美元。

中美洲创建了自由贸易区，而且，地理上的隔离终于不再阻碍地峡的一体化发展。泛美公路全长1600英里，从墨西哥边境沿地峡一直延伸至巴拿马的达里恩荒野。这条公路得到修缮并完工，主要资金都来自美国。到1964年，除达里恩这一缺口之外，泛美公路从加拿大一直贯穿到了智利，将南北美洲连接了起来。在此之前，整个地峡只有一条所谓的国际公路（泥路）和一条国际铁路连接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除了热带水果种植园附近，铁路运力非常不足；除了城市周边，铺设好的马路也同样稀缺。因此空中旅行比陆地旅行来得简单。仅洪都拉斯一个国家就有75个小型机场。泛美公路改变了地峡的商业贸易。

222 在20世纪60年代，地区间贸易增长了10倍，制造业占中美洲国内生产总值的17%。然而，共同市场被外来投资者的利益边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美国股份公司成功说服了日益为越南战争烦恼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共同市场应该依赖外来投资而不是公共资金，因为公共资金的挪用让中美洲失去了直接发展所需的资金。第二，企业关心的既不是在整个地峡创造均衡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发展对中美洲人最有用的工业。外来投资商，也就是美国股份公司，他们不仅收购了中美洲企业，而且肆意开办工厂，其实就是在有充足廉价劳动力的城市里投资设厂。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工业化进程非常迅速，因为它们的情况符合这种外来利益。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则发展比较缓慢。而仍处于农业社会的洪都拉斯没有人口密集的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受益。

中美洲人对共同市场大失所望。1960年到1971年间，中美洲的年经济增长率在整个美洲大陆都是最高的（尼加拉瓜的平均增长率为7.1%，洪都拉斯为5.1%），尽管如此，对每个国家来说，人均增长率并不是同样令人满意。比如在洪都拉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不足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哥斯达黎加，社会政治发展与工业化同步进行，人均GDP增长达到了33%。经济合作扩大了当地制成品的市场规模，但是仅凭共同市场并不能增加每个国家的国

内消费。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依然出奇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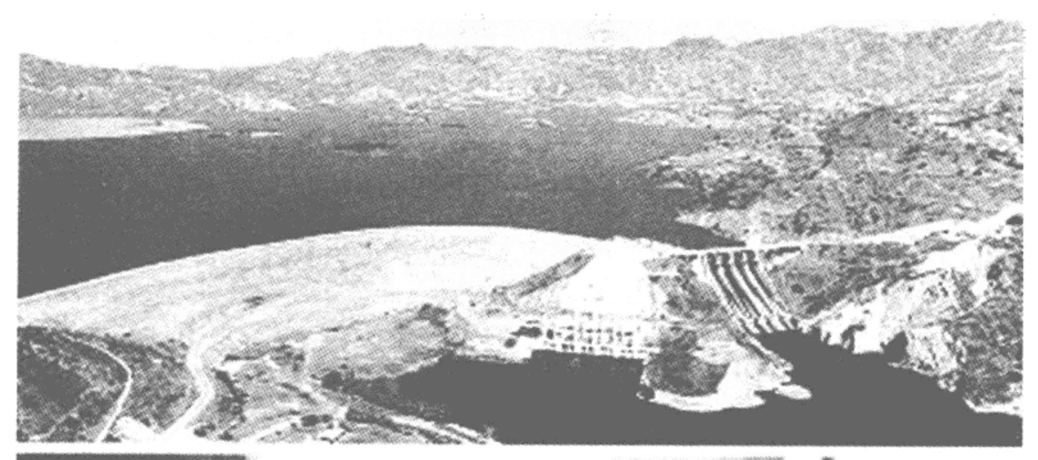
国家之间的争端瓦解了联盟，其实这一点自独立之后从未曾改变。1969 年，洪都拉斯对萨尔瓦多开战，原因是萨尔瓦多的失业工人不断涌入洪都拉斯境内（见本书原文 230 页）。1969 年，所谓的“足球战争”让所有中美洲国家的商业都因此停滞两个星期，最终导致洪都拉斯于 1971 年退出共同市场，重新建立关税。不出几年，内战打响，地峡内部商业成为不可能。

遗产

222
223
224

改革运动破坏了寡头政治的权力垄断，但并不能长期取代它的地位。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迫切需要土地资源的重组，但是只有哥斯达黎加进行了结构上的改变，让改革得以成功。经济确实得到了多样化发展，在私人投资和美国“争取进步联盟”的帮助下，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但是贫穷依然大范围存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尽管 5 个国家的左翼分子被流放、共产党势力被削弱，但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继续为那些被政府抛弃的人提供发泄不满的渠道。学生和工人仍然举行罢工、上街游行示威，但频率有所降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依然较为灵活。他们的呼声对现状是一个挑战，并最终会摧毁现状，只不过这一时刻被美国推迟了。美国第二次干涉并强化了当地政府，通过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政治暴虐，让他们臭名昭著。警察和军队的训练导致政治镇压的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问题将激起一场革命，那是美国所无法控制的。





上图为萨尔瓦多的塞龙格兰德（Cerrón Grande）水电工程。（照片提供：美洲开发银行、美国国会图书馆）

下图为1978年危地马拉城内垃圾回收的场景：现代化与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技术同时存在。（照片提供：罗杰·库珀）

第十二章　内战（1975—1996）

这些人，他们是不会接受让下一代继续这样活着的。我们不会，他们也不会。改变就要发生。所以一场革命正在来临——我们能影响它，但无法阻挡它的发生。 225

——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纽约时报》，1966 年 5 月 10 日

要战斗，你就得放弃你的安定、你的自由、你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是你的生命。

——桑地诺民兵司令埃登·帕斯托拉（Edén Pastora），1976 年（爱德曼和凯南，1989 年，第 252 页）

我赶上了一个时代，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相信革命……

——萨尔瓦多知识分子诺尔马·巴斯克斯（Norma Vásquez），1996 年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一度低迷。中美洲发展政策的失败再一次惨痛地浮出水面。改革的不彻底让大部分人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却没有合法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人口日益增长，新的出口作物和牧

场的牛一旦占用了边境的土地，人们就找不到可以维持生计的闲置土地了。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的人们、中产阶级、农村的农民，甚至包括部分贵族成员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越来越发现革命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

226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经济政策让人们变得更加贫穷；独裁者们有强大的军队撑腰，阻止了每一次民主化的尝试，也阻挡了中产阶级走向上层社会的去路。在某个历史时刻，当广大尼加拉瓜人民、萨尔瓦多人民和危地马拉人民希望破灭反而诉诸武力之时，美国发现只有保留寡头统治才可维护自己的利益。1976 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问中美洲地区时，发生了抗议美国的反对变革的暴动。在美国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看来，游行示威和静坐已经升级为势不可挡的革命。以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1—1989）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必定会是武力解决，并会以反共的冷战说辞为自己辩解。由于战争笼罩着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美国把洪都拉斯作为其军事指挥基地，并挑衅哥斯达黎加的中立立场。整个中美洲都卷入了毁灭性的战争漩涡，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政策失败

“争取进步联盟”给中产阶级带来了希望的假象。援助的增加的确建起了新的水坝和泛美公路，但是所谓的援助从未改变整个地峡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尽管发展确实让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但除哥斯达黎加以外，中美洲的收入水平与拉丁美洲整体相比，依然大大落后。1980 年，危地马拉的收入仅次于哥斯达黎加，但是其人均收入比拉丁美洲低了 40%；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与它们的邻居相比，情况就更差了，两国的人均收入都只有拉丁美洲人均收入的 1/3。财富的不均衡分配让收入增长对绝大多数中美洲人来说只是一种虚幻：比如在危地马拉，只有不到 2% 的经济增长流向了 20% 的最贫困人口。事实上，独裁者们和军队里职权最高的那批人把大部分援助资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族王朝，甚至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索摩查家族拥有尼加拉瓜总资产的 1/4；据说危地马拉总统的薪水为 65 万美元，更不用提他从各种商业“机会”中获得的收入了。然而，住在危地马拉的一个玛雅族印第安人每年只能挣 82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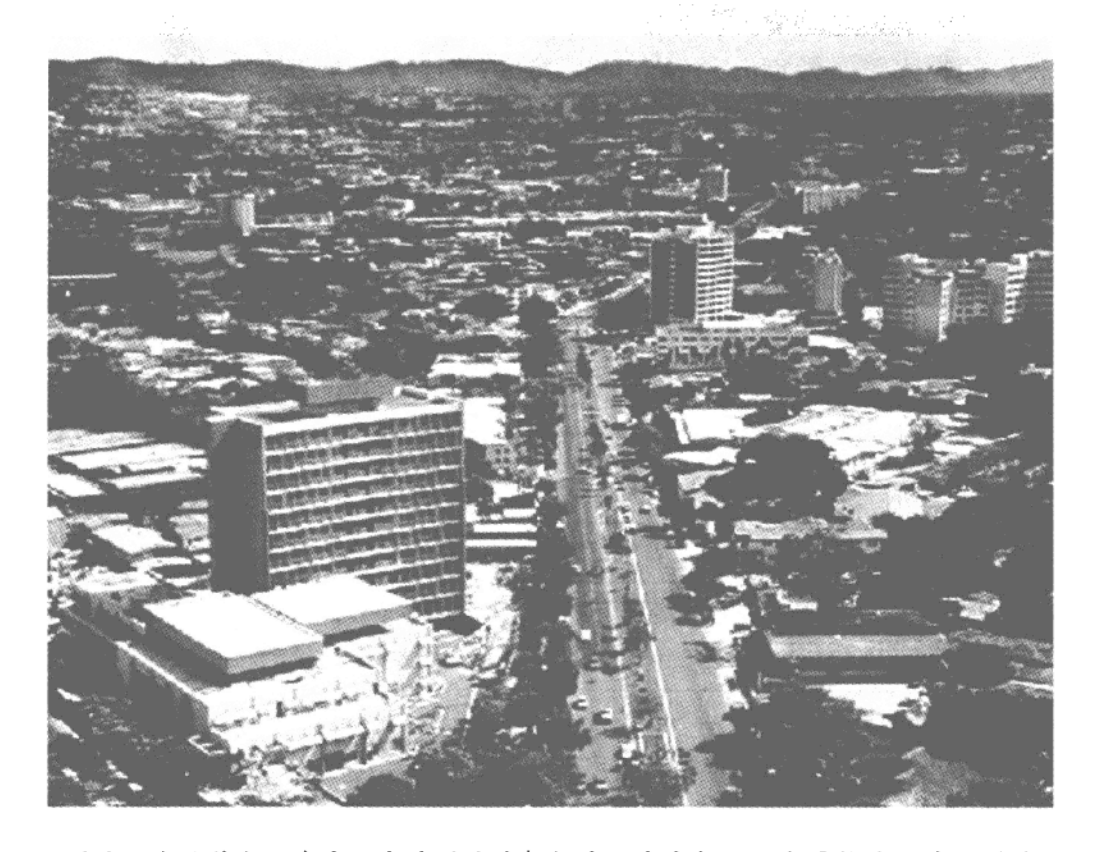
人均收入（以固定美元计，单位：元）

	1950	1960	1970	1980
危地马拉	293	322	417	521
萨尔瓦多	265	319	397	399
洪都拉斯	232	250	289	317
尼加拉瓜	215	271	354	309
哥斯达黎加	347	474	656	858

数据来源：佩雷斯—布里格诺利（1989 年，第 31 页）；《拉丁美洲统计摘要》，第 21 卷（1981 年）。

只要经济有所增长，属于中产阶级的那些中美洲人就还有希望。227 生活质量上有限的提高从电气化、教育机会和公共医疗项目等方面体现出来。但是在 1973 年，中美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因世界石油危机戛然而止。石油进口的费用从 1.89 亿美元升至 1980 年的 15 亿美元，对这些由于军费开支已经深陷债务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1979 年到 1981 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又导致了高利率，可谓雪上加霜，中美洲经济就此崩溃。很快，社会问题就不再被关注；用于进口食物和工业零件的经费越来越紧缺。当很多国家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时，他们实施的是控制工资而不是控制物价；在萨尔瓦多，一名本已穷困不堪的工人，其实际薪水收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又降低了 1/3，而尼加拉瓜 80 年代的平均人均收入跌至低于 70 年代的水平。失业率已经因为农业的机械化而走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停滞和 1978 年咖啡价格的直落，又进一步恶化。1981 年，就连哥斯达黎加也被迫拖欠债务。1982 年，5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全部下降。中美洲长期未解决

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显得更加严峻了。



图为现代圣萨尔瓦多城。中美洲的首都与其他城市相比，发展较为迅速。制造商偏向于在有大量劳动力供应的地方运营其产业，大城市于是就成了发展目标。随着新的政府中心的建立，政府收到的援助基金充足，也为首都城市的发展和财富贡献了一份力量。哥斯达黎加的卡塔戈、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和莱昂等省级城市，被圣何塞和马那瓜抢了风头。中美洲最大的城市危地马拉城和圣萨尔瓦多城，1985 年时的人口就超过了 100 万。不过农村地区一直被忽视：在接受美国直接援助 10 年之后，危地马拉 80% 的农村儿童仍没有学校可上。[照片提供：帕特里夏·马萨—皮兹福德（Patricia Maza - Pittsford）]

228

土地和食物

早在 1960 年，86% 的农业劳动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土地。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寡头手中。洪都拉斯的权贵阶级势力最为薄弱，但仍然是

仅5%的人口拥有50%的土地；超过一半的洪都拉斯农场只占用了9%的土地。而那些大地产中，用于耕种的土地不到10%，而且种的是出口作物。由于“争取进步联盟”没有重新分配闲置土地，中美洲的大部分土地仍归大地主所有，他们几乎没有种植任何本土作物。在尼加拉瓜，有收成的土地中只有11%用于种植本土作物；在哥斯达黎加只有9%。中美洲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维持生计的作物，但是很多人根本负担不起进口商品。

出口和现代化建设项目的多样化进一步加剧了种植本土作物的土地短缺问题。出口牛肉需要新的草地来饲养牛，因此用于种植玉米和大豆等维持生计的作物的农场经常被改成牧场。到1980年，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这几个国家近1/3的土地都投入了养牛业。在出口量增加的同时，国内的牛肉消费却由于价格上涨而下降了。牛的放牧和新增的出口作物，如棉花，使得无地农民的问题恶化了。这中间也有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一部分原因。比如，萨尔瓦多建造水电站大坝的时候，几千农民被迫迁徙，周边的农村也被破坏了。 229

人口与城市化

中美洲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屈指可数——1966年是令人吃惊的3.5%，这就导致了土地和食物的短缺以及薪水的下降和失业率的增高。尽管中美洲的经济在增长，但是由此产生的工作岗位的数量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在危地马拉，30多位新工人争抢1个新的工作岗位。即使哥斯达黎加的工业发展迅速，仍然承受着严重的失业问题。萨尔瓦多的问题最为严峻，1965年的时候，有40%的人口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

从1950年到1980年，中美洲人口翻番，到1985年，人口总数达到了近2 700万。与之相应的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给这些狭小国家的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在危地马拉的中心基切玛雅地区，1974年时人口增长至每平方英里有10万人，是征服时期人口的两倍，已经超过了该地区所能承受的范围。按英亩数来说，萨尔瓦多是最小

的国家，其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每平方英里400人增加到1985年的近700人。自30年代起，萨尔瓦多人就向北逃亡、在洪都拉斯农村寻求避难；到1969年，已经有30万人这样做。洪都拉斯的人口原先每平方英里平均只有55人，萨尔瓦多的移民加速了“足球战争”的爆发，在美洲国家组织成功让两国停火之前，有几千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边界虽然通过协商定了下来，但是仍有领土争端遗留，近40年都未得到彻底解决。

230

1985年的人口估计

	总计 （百万）	人口密度 （每平方英里）	最大城市
危地马拉	8.4	201	1 500 000 （危地马拉城）
萨尔瓦多	5.7	701	1 117 850 （圣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4.4	102	890 420 （特古西加尔帕）
尼加拉瓜	5.7	53	792 000（马那瓜）
哥斯达黎加	2.5	128	660 000（圣何塞）
数据来源：伍德沃德（1985年，第363页）			

不一样的伯利兹

当人口过多和社会不平等在中美洲大多数地区都激起反抗的时候，英属洪都拉斯却并非如此。英属洪都拉斯与中美洲其他地区不同，人口不多。这个国家比萨尔瓦多大2 000平方英里，是从圣乔治岛的单个英国拓殖点发展起来的，但一直是美洲大陆上人口最少的国家。国内没有工业，也没有能够吸引新定居者的自然资源，只有一些热带商品，如香蕉和其他水果、桃花心木以及做口香糖用的树胶。人口有所增

长，但十分缓慢，就像这个国家从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转变到英式的代议制自治政府，再到1981年成为独立的民主国家，整个过程也很缓慢。各种民族加入到克里奥尔人（英国伐木者和他们的黑人奴隶的后代）与玛雅人的人口之中。19世纪中叶，来自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玛雅人搬进了佩滕森林，加利福纳人从动荡的洪都拉斯重新定居到了沿海地区，如丹格里加，也就是斯坦港。来自大英帝国的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以商人的身份在伯利兹城定居。信奉孟诺派（Mennonites）的美国农场主在政府的鼓励下，成了该国的食物供应商。在20世纪80年代，几千名难民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美洲来到这里。到了1985年，所有这些不同的种族和主要的克里奥尔人群体加起来，伯利兹的人口到达了165 000人，相当于每平方英里16.3人的人口密度。其土地以热带雨林为主，20世纪90年代生态旅游的概念推广之后，雨林成了一大自然资源。除了天赐的富饶土地之外，英国军事上在这里的持续存在也保护了伯利兹免受美国的军事操纵，野心勃勃的危地马拉也无机可乘（1975年危地马拉差一点就对伯利兹发起武装侵略）。伯利兹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政局稳定、民主制度健全，多亏于此。但是缺乏经济发展机会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随着中美洲难民不断涌入伯利兹，伯利兹人则向北美移民，希望在那里寻求工作机会，虽然在伯利兹当地也有联合果品和箭牌等国际公司。



图为 1914 年的伯利兹城。这张照片拍摄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伯利兹城在大小和规模上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如今的伯利兹城看上去远不如从前那样优雅，变得乌烟瘴气。1961 年的哈蒂龙卷风摧毁了伯利兹沿海城镇。飓风过后，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了内陆的一个现代化城市——贝尔莫潘（Belmopan），但是伯利兹城依然是全国最大的定居点，其 1985 年的人口为 56 000 人。[照片来自弗兰克·E. 里德（Frank E. Read），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品与照片部]

231 就连哥斯达黎加都不再有公共土地可以分配给农民；到 1973 年为止，有 10% 的农业用地被非法占用。边境在 19 世纪自由派的土地“改革”中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但是随着边界的关闭、新的出口作物和与日俱增的牛牧场对处女地的占用，中美洲连边地都失去了。

没有土地的农民到处找工作，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当起了四处迁徙的工人；仅棉花产业就雇佣了 100 万季节性工人。还有一些人走投无路在城市里做起了日工，他们在那儿加入了更有组织性的制造业工人队伍。这些曾经主要来自农村而且守旧的无土地者，在社会中创造了一个无家可归也不能充分就业的饥饿阶级。20 世纪 60 年代，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在尼加拉瓜（32%）和洪都拉斯（20%）都翻了一番。到 1980 年，只剩下一半中美洲人生活在农村。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洲变成了一个人口过多、贫穷却越来越城市化的地区。新的无地阶级和城市贫民人口与幻想破灭的中产阶级聚到一起，证实了是一个不安的组合。

教会：解放神学

我给穷人们送面包，他们把我叫做圣人。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贫穷，他们说我是个共产主义者。

——巴西累西腓大主教埃尔德·佩斯索亚·卡马拉（Helder Pessoa Camara）《伦敦时报》，1999年8月28日

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展开了一场自16世纪以来规模空前的福音传道运动。根据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教宗通谕的指示，教会公开声明了人权和每个人都过上高质量生活的重要性。教皇说，只有完成这些目标，全世界的社会动荡和暴力才会结束。1968年，新的教皇保罗六世在麦德林（Medellín）就这些主题向拉丁美洲的主教们做了演讲；很多神父、修女和民众受此启发，去到农村地区生活和教书，为实现这些宗教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宗教个人所遭遇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也因此呼吁教会更加直接地参与社会问题。在拉丁美洲，这场运动被称为解放神学。在1979年的一次会议上，一群主教发誓他们既不站在共产主义一边也不站在资本主义一边，他们提出，只凭民主权利来解决印第安人、农民和城市中无产阶级的基本基督教需求是不够的。随着游击队受到这些队伍的支持，解放派神父们也经常表示出同情，他们相信必须对社会进行结构重组才能消除针对穷人的制度化暴力行为。尽管主教们坚持社会正义应该和平取得，有些神父坚信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达到的。尤其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有些神父自己都成了游击队员，如诗人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1978年上任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有意回避解放神学，但是他对世界事务的这种保守主义立场不能阻止中美洲革命事件的发生。

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对教会、对他们布道的国家、对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从大城市到大部分农村地区到处都有教区，神父们影

响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激醒了很多人心中那份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主教们成为国家的道德良知，许多人被他们唤起进行政治改革和反抗，甚至暴力活动。当然，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触怒了其他人，比如萨尔瓦多的那群寡头，他们摇身一变成了福音派新教教徒。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都写着：萨尔瓦多人“要爱国，杀神父”。仅在70年代，就有850名拉丁美洲神职人员被虐待、驱逐或者谋杀。

233 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的呼声激起了全世界的人权和宗教组织都来呼吁——中美洲需要更大的正义与和平。非政府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强大，以至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77—1981）企图对有侵犯人权纪录证明的国家终止军事援助。这一政策的确让索摩查领导的尼加拉瓜减少了虐待和暴力，但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宁可暂时拒绝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愿服从。

卡特的继任者美国总统里根支持军事上的胜利，当里根以军事政策取代人权政策之时，世界的关注依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随着美国公民在萨尔瓦多遭到暗杀或者在危地马拉失踪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担心也在美国传播开来。当美国资助的轰炸部队袭击尼加拉瓜时，北美洲人和其他关心此事的世界公民专门来到受此影响的地区，以“和平见证者”的身份来阻止轰炸。在20世纪80年代内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政府战略中，天主教会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与其他宗教和人权组织是核心参与者。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中美洲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才最终得以通过谈判取得和平。

尼加拉瓜

这是被解放以后的土地面貌……那么美，不仅土地美，住在里面的人也一样……

——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选自《蓝色机窗外的视野》，1985年

（摘自科恩，1986年，第15页）

巴拿马：新的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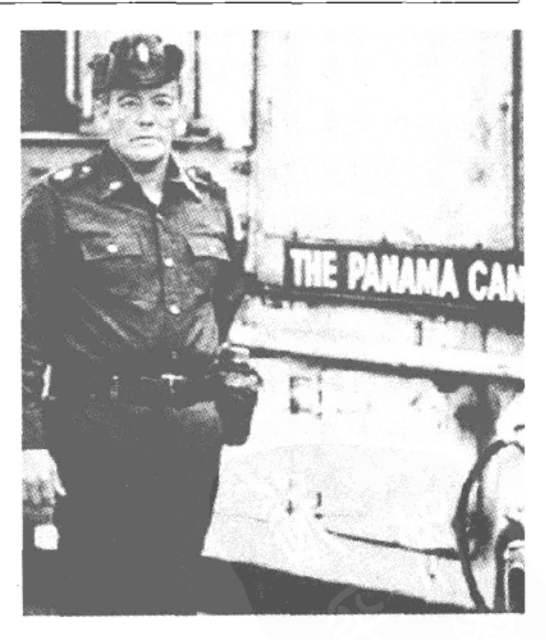
结束了寡头政治以后，巴拿马人就有了自己的价值，他的出身如何、他的家乡在何处，都不重要。

——奥马尔·托里霍斯总统，1970 年（伊万—史密斯，1981 年，第 44 页）

奥马尔·托里霍斯毕业于美洲学校，是国民警卫队的司令。在经历了一系列政变之后，1969 年，他成为了巴拿马的独裁者。尽管他也是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开始掌权的，但是很快就把权力从寡头统治集团那里转移出去。最后他因为裙带关系和腐败受到抨击，但他毕竟把巴拿马带上了世界舞台，有史以来第一次让巴拿马在中美洲事务中有了自己独立的呼声。他的国内政策集中在民众主义的农村项目上，与中美洲其他地区相比，这样的政策对巴拿马寡头的威胁少了一些，因为这里的权贵阶级的权力是构筑在商业收入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土地。1972 年，他批准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农村学校的扩建以及医疗项目。但他同时也鼓励私有企业，制订了让巴拿马城成为国际银行业中心的政策。民族主义情绪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巴拿马领土之内由美国控制的运河区，托里霍斯的前任们却对之无可奈何，但托里霍斯在其新的拉丁美洲盟国和联合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改变了这一点。1977 年，他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签订了新的运河条约，承认巴拿马对其领土的主权并于 1979 年之前取消运河区。另外，到 2000 年，整条运河以及必须要通过运河水闸那 5% 的世界贸易都归属于巴拿马。1981 年，托里霍斯在一场意外空难中丧生。其后，巴拿马历经了一系列总统更换，他们全都来自国民警卫队，而且一个比一个专制和腐败。到 1984 年，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将军已经明显大权在握，他也是美洲学校

的毕业生，但不如托里霍斯那么出类拔萃。他开始了与美国之间的僵硬关系，尽管美洲国家组织企图在两个政府之间斡旋，但紧张的局势有增无减。1989 年 12 月 20 日，美国军队入侵巴拿马，占领了国家宫殿，而且在能够进行民主选举之前任命了一位临时总统。这场入侵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称为“正义事业行动”；入侵一个星期就结束了，但是对巴拿马的民族自豪感所造成的伤害没有停止。诺列加将军被指控贩毒而囚禁在美国，尽管他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了多年的有偿线人，仍被判入狱 40 年。他所在的政党，即由托里霍斯成立的民主革命党，于 1994 年再次接管巴拿马。但这一次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且新政府把国民警卫队改造成了由文官控制的警察队伍和海岸警卫队。随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军队。

235 1979 年 7 月 17 日那天，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将军的小儿子、也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儿子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Anastasio Somoza Debayle）逃生而去，带上了所有他可以带走的东西：尼加拉瓜国库里的 1 亿美元、他的情妇以及他父兄的遗体。据说，如果可以的话，连土地他都会带走。不出几个月，他在巴拉圭驾驶一辆装甲梅赛德斯奔驰时被两个阿根廷人暗杀了。



图为巴拿马总统（1969—1981），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Torrijos Herrera）将军。（照片提供：美国国家档案馆）

236 将索摩查长达 43 年的家族

王朝推上如此一个不光彩结局的诱因始于 1961 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形成（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简称桑解阵 FSLN，也就是常说的桑地诺主义者，the Sandinistas）。在介入政局的头几年当中，桑地诺解放阵线发起了小规模的游击战和罢工，并捣毁了发电站。他们偶尔也会在首都做出一些大胆的行为。比如有一次，他们要求以 500 万美元交换几个达官贵族人质，而且收到了这笔钱。突击队离开时，欢呼的人群站满了马路两边。国民警卫队在农村搞了几次行动以示报复，包括对民众的暴行以及多次在不同场合宣布对桑解阵杀无赦。但桑地诺解放阵线很顽强：他们藏起武器，在邻国哥斯达黎加的庇护下策划推翻索摩查，哥斯达黎加一直以来反对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为其他不满的派系提供了一个富有感召力的榜样。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样的团体已经有很多。

索摩查家族

索摩查家族通过国民警卫队来维持他们的权势。它对美国如此彻底的忠诚，以至于索摩查政府曾经被认为是美国的分支（拉费贝尔，1991 年，第 238 页）。安纳斯塔西奥也被人叫做“塔乔”（Tacho）。22 岁那年，父亲被杀之后，他接管了国民警卫队。1967 年兄长路易斯死后，他就任总统。此时的国民警卫队已经彻底腐败，臭名昭著，成了一个依靠操纵卖淫和赌博谋利的黑帮组织——也是一个暴力组织，对于无辜的居民被谋杀、被折磨，视同草芥。

索摩查也破坏了经济。从棉花到甘蔗每一个发展项目到头来只充盈了他们的家庭财库。甚至连自然灾害都成了他们赚更多钱的契机。1972 年的一场地震将马那瓜的 80% 都摧毁了，而此时从国际救援组织收到的医药物品却被变卖了。国民警卫队忙于洗劫商店，不得不从运河区调来 600 名美国士兵维持治安。曾经的马那瓜市中心仍是一片废墟，而塔乔和他的朋友们却在首都以外的索摩查地产上建商场和办公楼。被损的马路重新铺设所用的砖块也来自他们家族的工厂。

当权 43 年之后，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最实实在在的影响是其财富，索摩查财产对其他所有人都绝无好处。到了 20 世纪 70 年

代，触怒的就不只是穷苦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了。咖啡权贵们和传统的牧场权贵们也十分愤怒。来自格拉纳达和莱昂的那些最好的家族对马那瓜的重要地位痛恨不已，因为那是以他们曾经高贵的城市为代价的。所有批评都可归结于不断增加的专制和暴力。天主教的主教们也对独裁者提出批评，而且拒绝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就职典礼。1978 年，在桑解阵第一次主要进攻后不久，反对派报纸《新闻报》（La Prensa）的编辑佩德罗·霍亚金·查莫罗（Pedro Joaquín Chamorro）被暗杀。在部分地区，国民警卫队有计划地杀害了所有 14 岁以上的男性。这一事件当时被美洲国家组织的一次事实调查行动记录了下来。

桑解阵的胜利

237 桑地诺解放阵线在一个温和的政治派系的保护下进行了重组，该派系不但有保守派生意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的支持。似乎除了美国以外，每个人都想让索摩查下台。1978 年，桑解阵引领了一股反抗索摩查的风潮；城市贫民窟内首次爆发大规模起义，零号司令［Commandante Zero，即埃登·帕斯托拉（Edén Pastora）的昵称］把立法机关的人质暂时扣押在了马那瓜。国民警卫队尽管花了 1400 万美元从美国进口武器，但是面对革命势力他们似乎立刻就瓦解了。他们向几乎只剩下女人和小孩的贫民窟投掷火箭弹，还对着镜头谋杀了一名美国电视记者。

美国终于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首先想到的是让美洲国家组织派遣维和部队，但是遭到了该组织的拒绝。美国尝试着与桑解阵谈判让索摩查做完任期，他们也拒绝了。当索摩查必须下台这一点毋庸置疑的时候，美国又立刻要求保留国民警卫队，这让所有人都愤慨不已。然而，桑解阵确实也作出了一些让步以安抚美国人，他们的做法是任命一个 18 名成员组成的内阁，包括商业领袖、专业人士、教会成员和仅一名桑解阵成员。

革命政府

1979 年由桑解阵组建的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由 5 个成员组成，它

代表了将他们推向胜利的各个不同的利益团体，包括代表地主权贵阶级的比奥莱塔·查莫罗和棉花菜籽油农业工业家阿尔丰索·罗维洛（Alfonso Robelo）；也包括丹尼尔·奥特加·萨维德拉（Daniel Ortega Saavedra）司令，他原先是一名反索摩查的街头战斗员，自封为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成长为领袖中的领导者。左翼政治的标签给美国拉响了警钟，而革命政府给出明确的信号：他们欢迎私有企业也愿意与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一些劳工领袖试图组织罢工抵抗可口可乐和联合果品公司（那时已经改名为联合商标公司），政府将他们驱逐了。另一方面，执政委员会一心想要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它有绝对的左倾倾向：其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将索摩查的财产国有化，然后分配给贫困人民。

238

革命派作家

只有歌声能让我们美好，不是战争。

——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20世纪60年代（比尔霍斯特，1990年，第198页）

中美洲人民在革命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贫穷而落后，但在诗歌上，他们对自己的描述极富感染力。受伟大的诗人鲁文·达里奥的启发，尼加拉瓜人用诗歌和歌曲来描述他们的挣扎与希望，数量多得惊人，以至于诗歌成了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诗人希亚孔达·贝利亚（Giaconda Bella）所说的：“根本不是写小说的时代。”（拉什迪 Rushdie，1987年，第159页）桑地诺的支持者、文化部长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1925—　）就是诗歌大师。卡德纳尔虽然是格拉纳达一个保守家庭的儿子，但他成了一位主张解放的神父，并写下了农民弥撒（Misa Campesina），并由卡洛斯·梅希亚·戈达伊（Carlos Mejía Goday）作曲。由于他拒绝放弃政治，反对解放的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禁止他主持弥撒。然而，就算他不能再做弥撒，卡德纳尔通过“人民的教堂”继续坚持他的宗教工作，而且他的诗歌依然把精神与政治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其他尼加拉瓜作家包括副总统塞希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írez），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就连桑解阵的总统丹尼尔·奥特加（Daniel Ortega）也会时而提笔写诗。政治反对派也写诗，帕夫洛·安托尼奥·夸德拉（Pablo Antonio Cuadra）还通过革命政府运营的新出版社发表了他的诗作。萨尔瓦多的革命也激发了很多诗人。最著名的当属罗克·达尔通（Roque Dalton，1935—1975），很多人都相信他是萨尔瓦多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诗人。达尔通是一个地主的私生子，他写的是爱和死亡等传统主题，但也描述国家的惨痛现实。达尔通是位多产的作家，到他 40 岁的时候，已经创作了几百首诗篇、几部小说、一些小品文、一部萨尔瓦多历史以及一部戏剧。作为一个革命派，他两度被右翼政府囚禁，常常迫于无奈转为地下，但最后是他的左派游击队同伴们因意识形态的不同于 1975 年将他处决了。达尔通的作品被政府封杀多年，但是 1998 年，萨尔瓦多立法机关一致同意把他列入了民族英雄的圣坛，宣布他为“一位具有伟大功绩的诗人”。

239 在桑地诺派执政的头几年内，尼加拉瓜不得不克服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根据联合国的估算，重建经济需要 10 年。结果，桑解阵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实施其社会与经济大计。然而，国际贷款让他们能够开始重建国内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服务取得了一定进展；甚至艺术领域也有所成就，诗人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组织了文化中心，因此书写、绘画和音乐等讲习班进入了社会的每个层面。出口和本土作物的产量也有所增长。新的宪法认可公民和社会权利，地方组织机构也想方设法实现这些权利；比如，到了 1986 年，超过一半的劳动大军都加入了工会组织，而且尼加拉瓜妇女协会（Nicaraguan Women's Association）让女性在政治上也有了发言权。

同时，尼加拉瓜迫不及待想要摆脱索摩查式的对美国的依赖。执政委员会宣布其不结盟政策，接受古巴的技术援助以建造农村学校和医疗诊所，接受任何国家（包括苏联）的贷款。这些政策促使美国怀疑尼加拉瓜正与共产主义有所关联。但是在1981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之前，美国及其公司还是与新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孔特拉斯（The Contras）[①]

有人在小教堂纵火，还有小校舍，医疗中心。秃鹫在上空不停地盘旋、盘旋……

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选自《美国国会批准对反政府人员的援助》，1986年（摘自科恩，1986年，第22页）

240
241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1981—1989）

对今天的美国来说，中美洲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1981年［拉弗伯尔（LaFeber），1993年，第5页］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采取了好战的解决方式，这种对外政策自西奥多·罗斯福之后就不曾出现过。他对中美洲复杂的社会问题所做出的这一军事回应，没能带来预期的和平和政治稳定，就像当年的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失败了。里根与罗斯福一样相信中美洲是对美国最具战略要义的地方，必须消除地峡上的共产主义和其他任何外来势力。里根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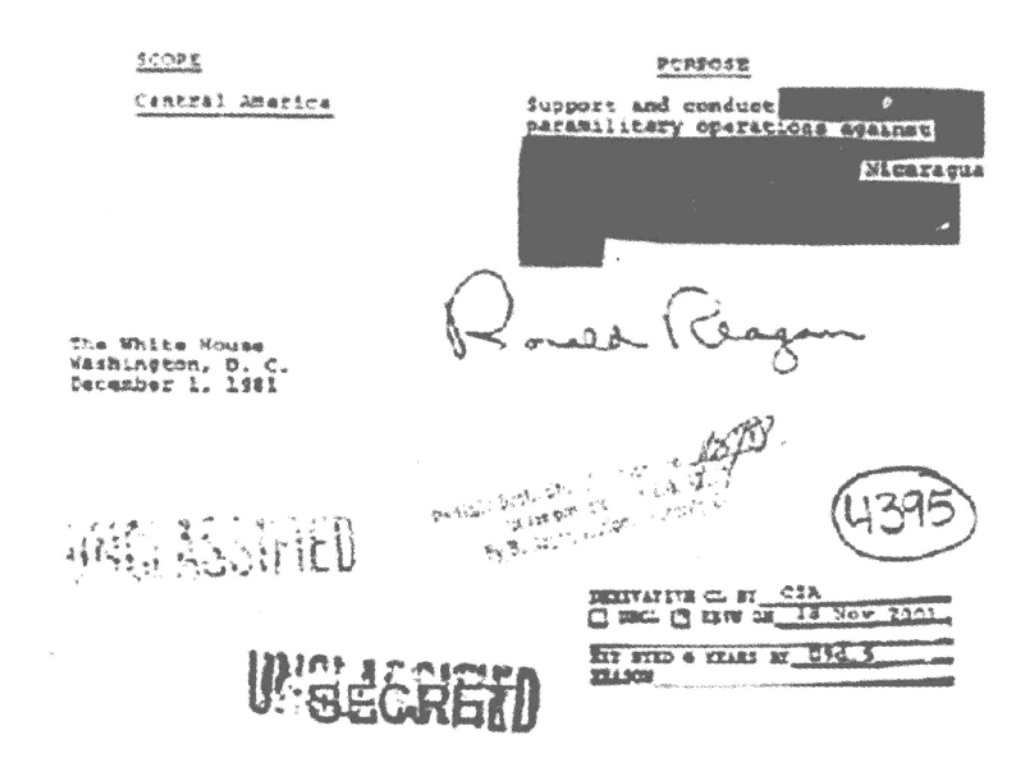
① The Contras，即西班牙文中“反革命分子”（contrarevolucionario）的意思，指尼加拉瓜国内反对桑解阵政府的武装组织及其人员。——译者注

不仅在尼加拉瓜制造了战争、让萨尔瓦多的战争持续，也把不稳定因素传播到了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直到 1990 年，冷战以苏联解体趋于平息，中美洲才取得了和平。



图为洪都拉斯军队。（照片提供：美国国家档案馆）

桑解阵上台时曾发誓不会有大屠杀，也确实没有发生。他们允许很多国民警卫队成员迁移至美国和洪都拉斯。索摩查离职才两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重组洪都拉斯领土上的警卫队成员并把他们转变成了一支反革命军队，称为孔特拉斯。1981 年，里根加强美国的政策投入以期动摇桑解阵政府。他们发起了一场给桑地诺主义贴上“共产主义”标签的运动，中情局还收到了 1 900 万美元的秘密款项来展开后续工作。次年，又有 2 400 万美元通过批准。不断增加的数目还不包括对洪都拉斯的直接军事支持，这笔费用 1984 年是 7 750 万美元，而 1987 年和 1989 年就成了 1.4 亿美元。



SCOPE

Central America

PURPOSE

Support and conduct paramilitary operations against Nicaragua

Ronald Reagan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 C.
December 1, 1981

UNCLASSIFIED

4395

DERIVATIVE CL BY CIA

DECL REVW ON 18 Nov 2001

EXT BYND 6 YEARS BY USG 5

REASON

UNCLASSIFIED SECRET

授权孔特拉斯进攻尼加拉瓜的解密文件

美国在洪都拉斯建起了军事基地，目的是为了训练孔特拉斯，为他们“出谋划策”，同时也确保他们有充足的武器供给，甚至包括红眼导弹等高端武器。1982 年，有限的民主改革引领了洪都拉斯新政府的诞生，但是关于洪都拉斯卷入尼加拉瓜战争一事，通常情况下没人会去征询那些选举出来的官员们的意见。美国建造军事基地的时候，12 000 洪都拉斯人民被迫搬离自己的土地，同样也没有人征求过他们的同意。美国的做法是只依赖军事独裁者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马蒂内斯（Gustavo Álvarez Martinez）将军，他在孔特拉斯一事上全力配合。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洪都拉斯与美国共同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给中美洲的革命者发送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美国海军陆战队回来了。1985 年在最大的一次演习中，7 000 名美国士兵和 5 000 名洪都拉斯士兵模拟进攻尼加拉瓜，在 39 艘美国军舰的掩护下登陆加勒比海岸；这些演习不仅侵犯了桑解阵政府，而且还妨碍了洪都拉斯人民，他们生怕失去国家自主权，抗议政府对孔特拉斯一如既往的支

持。但是洪都拉斯基本上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民众的不满未能演化成起义。

242 到1982年底，孔特拉斯发起了重大进攻，尼加拉瓜被迫要求其民众再次加入战争，到最后宣布戒严。孔特拉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战役的胜利，也没有赢得尼加拉瓜的任何领土。他们在尼加拉瓜找到的唯一支持者来自偏远的加勒比沿海，那里的米斯基托印第安人讲英语，拒绝桑解阵将他们并入更大的尼加拉瓜社会。眼看无法在尼加拉瓜大部分地区取得进展，美国调整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农村地区的游击式进攻以及对经济生产的破坏上去。

在美国资金和政策的刺激下，战争继续着。在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尼加拉瓜的港口被炸，甚至在1984年国际法庭命令停止轰炸受阻以后，军事侵略行为仍在继续。美国又实行贸易禁运，进一步切断了尼加拉瓜的货物供应。当尼加拉瓜进行了有史以来最自由的一次选举——桑地诺派的丹尼尔·奥特加以67%的选票当选——可是即使是这样，里根还是拒绝承认该结果，称他们作弊。在这一点上，尼加拉瓜内部的矛盾反而对里根有所帮助。执政委员会成员辞职以示抗议：比奥莱塔·查莫罗在她家族发行的反对派报纸《新闻报》上表示她将投身于更保守的政治；阿尔丰索·罗维洛成了驻扎在哥斯达黎加的一支孔特拉斯军队的政治领袖。传统的教阶制度与天主教内部的解放运动之间的分歧也瓦解了桑解阵在国际上的声誉。

由于封锁中断了贸易，而里根的政策又阻断了国际贷款，尼加拉瓜的情况越来越混乱。其经济原本未从桑解阵起义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如今更加恶化了。允诺的社会进步措施没有落实，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又在民气沮丧和大面积破坏的基础上火上浇油。更糟糕的是，奥特加总统勒令在战争期间停止公民自由，惹怒了很多尼加拉瓜人。然而，哪怕是在美国国会切断了军事援助之后，孔特拉斯仍然资金充裕。孔特拉斯收到稳定的“人道主义”援助——仅1986年就有1亿美元——里根政府以迂回的方式运送购买武器的资金，引发了后来所谓的“伊朗门丑闻”。内部政策上的不合开始削弱桑地诺解放阵线，越

来越多的公民开始相信奥特加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和平——或者说，永远也不可能为尼加拉瓜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和平谈判

243

由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组成并得到其他很多拉美国家支持的孔塔多拉集团（Contadora Group），为争取地区和平作出了重大的外交努力。尼加拉瓜政府同意了和平计划，但是其他国家却没有，尤其是萨尔瓦多和美国。和平进程除直接参与的国家以外，还牵扯了太多的政府，所以非常缓慢，到1986年已经势头全无。不过孔塔多拉集团创造了一个谈判的氛围，而且中美洲国家开始在他们内部商讨和平问题。到1987年，中美洲谈判者们已经搞出了一个新的和平计划，称为“阿里亚斯计划”（见本书原文第248页）。尼加拉瓜在该计划上了签字，但是在计划的实施上有所拖延。1988年，桑解阵政府同意暂时停火，孔特拉斯却中断了谈判。最后在1989年，中美洲各国总统在哥斯达黎加的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Oscar Arias Sanchez）的带领下再次介入并商讨了科斯塔德尔索尔（Costa del Sol）和平协定，该协定要求孔特拉斯解散。而美国国会却在此时又批准了5000万美元来保留孔特拉斯，美国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这不是什么“致命”的援助。

但和平已经指日可待。里根的任期快要结束，而且尼加拉瓜也同意进行新一轮的选举，这一次由国际组织监控以便说服美国相信这一次选举的公平性。比奥莱塔·查莫罗代表新成立的尼加拉瓜反对派联盟（Nicaraguan Opposition Union，UNO）竞选总统，美国资助了她的竞选活动。不过，1990年2月当她以六成选票击败奥特加之时，整个世界都大为震惊。尼加拉瓜人再也承受不住更多的贫穷和战争，他们终于相信了只要桑解阵执政，美国就不会让战争停止。桑解阵和平地将政府移交给了反对党。到此时为止，已有3万尼加拉瓜人在孔特拉斯的战争中丧生。

萨尔瓦多

……悲伤的人们，世界上最悲伤的人们，我的同胞，我的兄弟。

——萨尔瓦多诗人罗克·达尔通（Roque Dalton），选自《家乡的面貌》（Cara de Patria），1968 年

244 萨尔瓦多被美国评为“争取进步联盟”的一个很好很成功的故事。萨尔瓦多工人勤勉，而寡头统治集团对新的经济机会的反应也很快。像其他国家那样由于负债而依附于外来势力的情况萨尔瓦多是拒绝的，但是在“争取进步联盟”之下，萨尔瓦多为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以及军队的建立，背上了越来越多的债务。萨尔瓦多从援助中受益，而且中美洲共同市场让它保持了可观的工业增长。尽管从地理角度来讲，萨尔瓦多是中美洲最小的国家，但是其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危地马拉。

然而，其他国家都不像萨尔瓦多那样，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的问题如此吻合，把它弄得一团糟。寡头统治集团的“14 个家族”（据估计，此时实际上已经扩大到由 254 个家族构成的王朝网络）长期把最有价值的土地紧握在自己手里，拥有全国 95% 的土地却无一用来种植维持生计的作物。同时，萨尔瓦多是中美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70 年代的经济泥沼最终伤害了萨尔瓦多，原因便是沉重的外债，主要由军事扩张造成。一位萨尔瓦多将军试图在纽约贩卖 1 万支机枪给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因而被判有罪，这一事例很好地反映了军事支出的过度。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中产阶级与专制军事独裁统治之间斗争的展开，萨尔瓦多的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1972 年，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José Napoleón Duarte）为基督教民主党竞选总统，这是一个新的而且略显激进的政党，关注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增多的顾虑，其反共产主义精神满足了美国的喜好。当备受欢迎的候选人在军事独裁的选举中失利时，暴动在全国范围内弥漫开来，遭遇了愈演愈烈的

政府暴力。杜阿尔特自己也被囚禁、殴打，最后被驱逐出境了。

敢死队和游击队

谋杀、酷刑、致残，这些事情如果由我们来做，而受害者是共产党的话，是无所谓的。

——美国国务院解密的备忘录，196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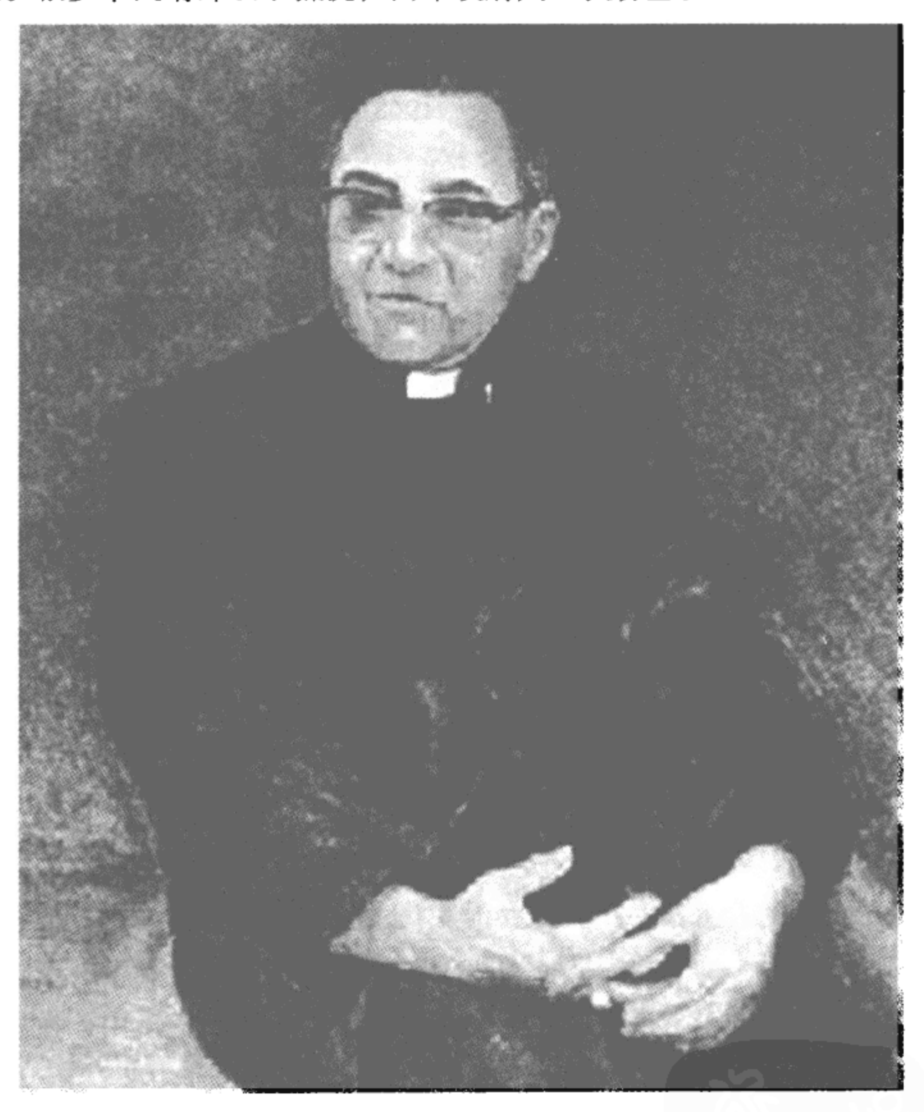
245 因为独裁政府想要消灭所有反对派的意见，对平民百姓镇压与暴力的模式也随之升级。政治左派和自由派人士组成了人民联合行动阵线（United Popular Action Front，FAPU），作为公共对话的平台。其他人则因为希望渺茫而放弃了选举政治。1977 年，在洪都拉斯边境首次出现了游击队运动。游击队遭到了名为“白色战士联盟”和“革命反共灭绝行动”（Revolutionary Anti-Communist Extermination Action）等恐怖主义敢死队的抵抗，但是不管他们把自己叫成什么，这些敢死队属于军队的一部分，背后有寡头统治集团撑腰。他们不分武装游击队还是平民百姓，都进行同样的攻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样的团体迅速增加；直到 1972 年美洲学校的一名毕业生罗伯托·达布松少校组建了秘密反共军队，这才让他们的恐怖活动有了更好的组织协调。

奥斯卡·阿尔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阁下[①]是一位温和派解放神学家。天主教为了安抚权贵阶级，1977 年罗梅罗就任萨尔瓦多的大主教。然而，罗梅罗并没有向寡头集团妥协：他在每周的广播节目中播出敢死队的数目，并且呼吁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停止对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在国际人权组织的一片谴责声中，在游击队的进攻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之时，一批军政府官员于 1979 年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在天主教、部分新的农业产业代表以及中间派政党的合作下，组建了一个军政府，既包括杜阿尔特这样的平民，也有吉列尔莫·乌恩加（Guillermo Unga）这样更具进步思想的政治家。

军政府中的平民成员意识到他们几乎无法控制军事背景的同僚，

① Monsignor 英文系大人、阁下之意。罗马天主教会对高级圣职人员的尊称。——译者注

其中一些人还成了敢死队的目标。萨尔瓦多的神父、学生和工会会员等要么“消失”、要么当场被杀，尸体被肢解以后扔在街上以警示公众。很多平民请辞以示抵抗，而军政府则三次易主。



图为萨尔瓦多的大主教奥斯卡·阿尔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照片提供：萨尔瓦多教育部）

246 1980 年，军政府变得更为中立；杜阿尔特和一些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士与原来的军官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府。尽管很多基督教民主党人士和左翼分子此前攻击政府，认为它无药可救，但杜阿尔特相

信他能够从政府内部有效地影响事件的发展。杜尔阿特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进行土地与经济改革，但是随着投资者从萨尔瓦多抽身，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而寡头集团和敢死队的阻挠也让经济发展化为乌有。1980 年 3 月，罗梅罗主教对恢复美国军事援助一事表示抗议。此后不久，他在做弥撒时被暗杀。罗伯托·达布松与此有牵连，但是司法系统受寡头集团控制，拒绝展开调查。

就在桑解阵在尼加拉瓜组建政府之时，萨尔瓦多的暴力活动加剧。1980 年，右翼敢死队每月杀害约 500 人；1981 年，他们的进攻升级，每月杀害 1 000 人。更多的萨尔瓦多人屈服于政府及其被操纵的选举和敢死队。反对派和游击队形成革命民主阵线（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FDR），作为他们的政治武器；该阵线的领袖包括吉列尔莫·乌恩加和鲁文·萨莫拉（Rubén Zamora）这两位是基督教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10 月份，各路游击队伍联合成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í Front for National liberation，FMLN），它以 1932 年被杀的一位社会主义烈士命名。

内战

萨尔瓦多处于战争之中。所有反对派团体都遭到镇压，很多革命民主阵线的领导人不是被绑架就是被暗杀；乌恩加和萨莫拉等一些人想办法安全流亡。1981 年 12 月 10 日，军队在一个叫莫索特（El Mozote）的村庄里对 200 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进行折磨与杀戮。然而，被杀害者不限于萨尔瓦多人。在首都，两位美国来的农业顾问被谋杀，另有 4 名美国女教徒被强奸并杀害。温和派和左翼分子寻找别的出路，但选举政治基本上只有右翼分子才会考虑。由罗伯托·达布松新成立的国家共和联盟（National Republican Alliance，ARENA）在 1982 年主持了一次制宪议会，让美国很是尴尬。他们在这次议会上正式批准了新的宪法，让国家共和联盟的政府合法化。

美国总统里根面对萨尔瓦多反革命政府的暴力绝不灰心丧气。他恢复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以证明消灭美洲大陆上任何共产主义因素的决心。他不顾美国国会的反对，把大量资金投向萨尔瓦多——到 80 年代 247

末，共40亿美元。为了抵抗桑解阵政府，在洪都拉斯已经建立起了孔特拉斯的军事基地，他利用这些军事基地训练萨尔瓦多的地面部队，并且企图阻止武器从革命中的尼加拉瓜流向萨尔瓦多的游击队。而事实上，从萨尔瓦多军队里偷出来的美国武器就足以维持战争。

1984年，在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下，杜阿尔特就任总统。尽管他无法控制军队，但是他确实尝试着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说服军队以前，是不可能赢得谈判的——尽管里根已经不在位了。战争继续着，充斥着双方的暗杀和绑架，1986年首都发生大地震才中断了战争，那场地震让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人无家可归。要求和平的压力越来越大。孔塔多拉集团带来了相关拉丁美洲国家的呼吁，当这一努力失败以后，1987年中美洲各国总统都投身于阿里亚斯计划。但是连这一努力也曾一度停滞不前，直到1988年在天主教资助的全国和平论坛（National Debate for Peace）的带领下，新的呼声越来越高。

1989年对萨尔瓦多来说是关键时期。尼加拉瓜正在为国际监督的选举做准备，这场选举会结束尼加拉瓜的内战。要求解决的呼声在陷入军事僵局的萨尔瓦多也越来越多。尽管军队从美国获得了1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但仍然无法打败装备简陋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由于国际组织和中美洲各种组织试图安排和平协议，出现了一阵密集的谈判。直接的谈判在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Alfredo Cristiani，1989—1994）总统领导的新共和联盟政府之间开始。克里斯蒂亚尼总统代表了国家共和联盟中较为温和的一翼，对和平感兴趣。他的家族是萨尔瓦多第十大咖啡加工商，也是第六大棉花生产商。尽管克里斯蒂亚尼家族是咖啡寡头的成员——身为其政府成员的姐夫是第五大咖啡加工商，但是他们属于新兴的农工业权贵，认为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军国主义色彩不那么浓重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够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农业家成为了中美洲一股重要的调节力量。

阿里亚斯和平计划

（中美洲）各政府致力于推动一套真正的、民主的、多元的且有参与性的进程，包括对社会正义的促进，对人权、（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尊重，以及所有国家在不受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决定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的权力……

——阿里亚斯和平计划，1987 年（爱德曼和凯南，1989 年，第 364 页）

1986 年，阿里亚斯在支持地区和平以及持众所周知的中立立场这样的平台上，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此时的哥斯达黎加已经成了孔特拉斯和美国阴谋的临时集结地，供应充足的武器流入了正在兴起的哥斯达黎加右翼非法军事组织，给这个国家拉响了警钟。地区战争也吸引着外国雇佣兵，其中一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一波又一波的尼加拉瓜难民也正涌入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想要终结中美洲的内战，于是阿里亚斯开始公开批评美国总统里根的政策。尽管美国决心打败桑解阵的政府军队，阿里亚斯还是启动了和平谈判的步骤，并且在 1987 年起草了一份和平计划初稿。这份和平计划成了 5 个中美洲国家之间谈判的基础。在喧嚷的反共言论中，阿里亚斯的主张比较合理。他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作为几大显赫的咖啡生产家族之一的成员以及新生代农工业权贵，他的贵族资格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计划对中美洲所有的政党都具有相应的吸引力，除了孔特拉斯和支持他们的美国人。作为回应，美国减少了对哥斯达黎加的经济援助。阿里亚斯的计划规定大赦和停火的并存，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敌对势力之间的直接谈判，并为民主化进程作准备。该计划当中有关键的一环，除政府以外任何叛乱组织不许接受国际军事援助。

1987 年 8 月 2 日，在危地马拉的埃斯基普拉斯（Esquipulas）中美洲 5 国总统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在计划书上签了字，并商定了计划实施的时间表。此次协商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伊朗门丑闻让里根的政策在美国失去了根基。然而，计划实施的时间表没能实现，总统们不得不要求联合国为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继续谈判。“阿里亚斯计划”也被称为“埃斯基普拉斯二号计划”，它开启了各国的和平进程：尼加拉瓜 1990 年、萨尔瓦多 1992 年、危地马拉 1996 年。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单方面停火，其用意是好的，但战争还没有结束。政府利用这次机会，做了最后一次争取胜利的尝试。爆炸和暗杀加剧，谈判终止。作为回应，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包括对在首都的军事人员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能想到的唯一回应就是轰炸城内的贫困街区。他们大规模地逮捕和暗杀居民，以军队杀害中美洲大学的 6 位耶稣会神父、他们的管家和儿女告终——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厌恶。联合国对萨尔瓦多表示严厉谴责。美国国会违背总统里根的想法，投票决定停止军事援助。和平谈判终于在 1990 年 4 月开始了。

停火

1991 年 4 月，在联合国的调解下，萨尔瓦多总统克里斯蒂亚尼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墨西哥城签署了和平协定，但是该协定一直到 1992 年才最终定稿。和平条约承诺将警察置于文官部门的控制下，并且将军队的规模缩减一半。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同意解除武装并转型成为一个政党。和平条约还承诺进行司法、选举、土地以及劳工改革。另外，保证成立一个“真相委员会”来调查各宗人员失踪和暗杀案件。1992 年 12 月 15 日，内战正式结束。1993 年，由条约授权成立的联合国事实调查委员会发现，在所有侵犯人权的案件中有 85% 是政府及其敢死队犯下的。虽然如此，和平还是持续下去。在 1994 年的选举中，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鲁文·萨莫

拉与国家共和联盟的阿尔曼多·卡尔德龙·索尔（Armando Calderón Sol）展开了总统选举决胜局的较量：卡尔德龙赢得了68%的选票，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取得了立法机关的第二大席位。

萨尔瓦多已经筋疲力尽：8万公民被杀，超过50万人逃到国外寻求安全；曾经繁荣的经济缩减到1967年的规模。内战持续了12年。

危地马拉

250

最后那几天……就像一只生病的驴子，一步都不愿意挪动。城郊不断出现更多的尸体，每晚机枪的扫射声都会打破宁静。

——维克托·蒙特霍（Victor Montejo），哈卡尔特克（Jacaltec）族玛雅作家及1982年大屠杀目击者（佩雷拉，1987年，第470页）

危地马拉的内战持续了36年。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敢死队与军队反叛乱袭击杀害了5万危地马拉人——而这只是内战的开始。这个国家所受到的伤害仍在继续，1976年的一场地震毁坏了处于高地的首都周边的农村，25 000人丧生，1/4人口无家可归。恐怖主义的影响加上人员的移动增加了参与游击队活动的危地马拉人数。到1996年停战协定最终带来和平为止，已经有15万人丧生、5万人“消失”，更不用提那成千上万的难民了。

危地马拉政治局势的演变与萨尔瓦多类似。军事独裁阻挠选举政治，并且拒绝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谈判。反对党开始上街活动，游击队到农村和偏远的佩滕地区，政府则一心铲除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威胁。任何批评都会遭致政府的暴虐，这让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长期隐居的玛雅人联合到了一起。政府对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尤其是对玛雅农民甚至连游击队都没有支持过的人并没有区别对待。

恐怖主义加剧

在罗梅奥·卢卡斯·加尔西亚（Romeo Lucas García）将军以及他一手提拔的继任者执政期间（1978—1982），军队恐怖主义变为常态。焦土政策摧毁了农村。有一个乡村，玛雅人在保护他们的土地不被牛

侵占时要求政府协助，结果被屠杀了；在奇马尔特南戈（Chimaltenango）省，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有 1 500 个玛雅人被杀。在城市里，劳工领袖、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是被暗杀就是“消失”；有玛雅农民在西班牙大使馆寻求庇护，结果士兵袭击大使馆，用机枪扫射致 38 人死亡。如此的残暴行为导致卢卡斯的副总统辞职以示抗议。游击队也对此作出了回应；1982 年，各路游击队将他们的势力联合组成了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Guatemalan National Revolutionary Unity，URNG）。与此同时，当卢卡斯将军拒绝改善自己的人权纪录时，美国不得不停止向他出售武器。

251 军队中的领导人因战利品分配问题开始互相争斗。由退休了的埃弗瑞恩·里奥斯·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将军领导的一个主张军事“改革”的军政府试图通过实施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方案让政府显得合法一些。他在追捕游击队时也表现出了格外旺盛的精力，当他怀疑有玛雅村民可能成为游击队支持者时，屠杀了几千人。据估计没有被杀的玛雅人有 90 万人，他们被迫组成了特殊的巡逻队来协助军队——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那些想办法逃进墨西哥难民营的玛雅人遭到了直升机的扫射。

身为福音派新教徒的里奥斯·蒙特对那些有可能反击的人采取疏远的态度，不是因为暴力，更多的是因为他属于少数派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其他军队派系在内的主要权力集团策划推翻他。然而，他通过对“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等美国团体的游说，说服了美国重新开始对危地马拉的援助。

国际舆论对危地马拉政府的抗议升级。1982 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报道军队和非军事势力仅在过去的 5 个月中就杀害了 9 000 名危地马拉人；同年，美国以经济援助的名义送来 1 550 万美元。1984 年，世界土著人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指控军队有计划地灭绝印第安人口；几个月后，美国恢复了军事援助。1985 年，专门关注“消失”的危地马拉人的一个组织——双边互助小组（Mutual Support Group，GAM）的创始人被杀，再次激起国际社会的同情。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共有 75 000 多公民

被杀，20%的人口被迫离开家园。50万玛雅人因土地被烧被抢而成为内部难民；大约有40万玛雅人逃到了别的国家。

252

基切玛雅人

许多基切玛雅村庄坐落在基切贝拉帕斯（Verapaz，El Quiché）的大山里和其他地区。正因为其地域偏远，所以一直以来保护着玛雅文化免受外界影响。在内战期间，这里也为许多游击队员提供了安全的避免场所。为了确保玛雅人不为游击队提供帮助，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玛雅群体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灭绝活动；内战中被杀的人数有83%是玛雅人。幸存者中，很多人因为受到如此的暴力而激进化了。里戈维塔·门楚·图姆（Rigoberta Menchú Tum）是一位基切族玛雅人，出生于1959年，她从暴力中生存下来，亲眼目睹亲人和其他人民被折磨、被杀害。1979年她参加了农民团结委员会（Committee of Peasant Unity），在受到迫害以后，她加入了一支游击队伍。随后在1981年，她逃到了墨西哥难民营。她继续组织针对危地马拉政府的反抗活动，其自传《我，里戈维塔·门楚》引起了世界对玛雅人困境的关注。1992年，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仍然为危地马拉的和平而工作：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在危地马拉城的主广场上领导了一次紧张但和平的饥饿罢工。和平协定之后，她的自传被批评，说它包含了一些反映玛雅人民的战争体验而不是她个人生活的细节。内战期间，并不是所有玛雅人都受到同等程度的折磨：莫莫斯特南戈不在暴力中心之列，也从来不是军队攻击的目标，不过有几个基切人被非正规军杀害，包括一名为美国某个援助项目工作的玛雅工人。与很多危地马拉土著人一样，莫莫斯特南戈的基切玛雅人几乎一直支持保守派政府。这一点在内战中可没有帮到他们。



图为里戈维塔·门楚·图姆（Rigoberta Menchú Tum），她是基切玛雅人中的激进主义者，也是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照片提供：诺贝尔基金会）

文官总统

253
254

尽管政府把绑架、暗杀和恐怖活动统统推到独立的非军事团体头上（但联合国1999年的一次调查表明，政府才是这些残暴行为的罪魁祸首），军队还是意识到，如果要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改变国

际舆论。1985 年，在军队支持的新宪法下，宾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Vincio Cerezo Arévalo）当选为第一任文官总统。不仅此次选举没有任何欺诈行为，而且塞雷索属于中立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DCG），得到了 70% 选民的支持。塞雷索签署了阿里亚斯和平计划，但是他无法控制军队或者寡头集团。他既不辞职也不抗议，而是在和平协定被取消、广泛的经济改革被破坏之时，以任命和契约的方式让他的党内成员升官发财。

即使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改变了政策，不再与军队直接对抗，而是寻求政治对话和谈判，但是军队还是展开了新一轮的屠杀，而且表示将进行大规模进攻，以此作为对阿里亚斯和平计划的回应。然后，在几次战役中尽管军队明显败落，但他们对外宣布叛军被打败，战争结束。塞雷索经受住了军队的两次政变图谋，但是到他离任之时，他已经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与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重启直接和平谈判的任务留给了下一任文官总统——保守派的豪尔赫·塞拉诺（Jorge Serrano，1991—1993）。没有人能够赢得内战，这一点很清楚。这种僵持的局面使得其他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平共识成为可能，如天主教资助的全国和平对话（National Dialogue for Peace），尽管军队和寡头集团对此阻挠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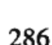
由于试图推翻立宪政府（其中一次由塞拉诺自己发起，被称为“自动政变”），和平进程进一步推延。但是 1993 年，调查危地马拉人权问题的官员拉米罗·德·莱昂·卡尔皮奥（Ramiro De León Carpio）成为总统，他又重新开始和平进程，这让联合国能够以中间人的身份安排和平协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出台并签署了各种协定：其中一条规定缩减军队规模并解除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的武装；其他协定关注土地改革和人权，包括土著人的权利。1996 年 12 月 29 日，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阿尔瓦罗·阿尔苏·伊里戈延（Álvaro Arzú Irigoyen）在最终版和平协定上签了字。

内战的恶果

大约有 30 万中美洲人在战争中丧生。分布在墨西哥、伯利兹、哥

斯达黎加、巴拿马和美国的 200 万中美洲人变为难民；经济被毁。在萨尔瓦多，仅 1989 年，内战造成 3 000 万美元的基础设施损坏以及 9 000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尼加拉瓜前后经历了两次内战，一次是对抗索摩查，另一次对抗孔特拉斯，再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破坏更为严重。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也受尽磨难。洪都拉斯脆弱的选举系统在美国军队的干预下被严重破坏，而关于孔特拉斯是否存在的全国性辩论导致了敢死队和暴力的产生。哥斯达黎加的经济遭受重创；其独立和政治中立遭到威胁。

因此，地区和平可谓众望所归。有在野党参与的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文官政府。至于人们从内战中学会了什么，和平又能维持多长时间，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第十三章　和平与民主的挑战

民主是革命留下的最主要遗产……

——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前副总统塞尔希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írez）（1999 年，第 17 页）

255
256
257

战后的萨尔瓦多正在重新创造自我，但始终像在泥路上开法拉利。

——萨尔瓦多总统弗兰西斯科·弗洛雷斯（Francisco Flores），1999 年

[盖尔（Geyer），1999 年，第 13 页]

1997 年，离中美洲被战争摧残才刚刚 10 年时间，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阿尔苏（Álvaro Arzú）就十分确信地宣布一个好消息：中美洲地区获得了和平与民主。在可怕的内战当中曾经互相残杀的各个派系如今同坐在立法机关为国家政策而激辩。在民主与公民权利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让很多之前被压制的团体在政治上取得了自主权。选举和游行、报纸和政治集会取代战场成为求变的平台。政治上的变化也带动了地峡上很多种族群体的文化复苏，从加利福纳族艺术家和玛雅族作家，一直到库纳族的工匠。

到了 2006 年，在进一步推动这些显著成就上所遇到的困难已经十

分明显。地峡的民主化没有消灭腐败或是政治恶习等现象——尤其在危地马拉，还有暴力存在。由和平带来的非军事化进程还是颇让人印象深刻，但是非军事化还不能确保公民的安全，因为恶势力帮派和国际贩毒依然威胁着公共秩序。贫穷或社会平等问题也未见好转，更不用说彻底消除了：在取得和平的这头几年中，一半中美洲人的生活一贫如洗。新的经济事业以及为纠正过去的弊病而付出的新的努力也许最后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强大的中美洲，但在2006年的中美洲，很多事情都有待实现。

泛玛雅运动

我认得出祖先的声音……

——基切玛雅族当代诗人乌姆维尔托·阿卡瓦尔·阿赫尤（Humberto Ak’abal Ajyuq’）

很多玛雅人在内战的种族大屠杀中逃过了一劫，那些代表着他们的民族、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宗教仪式，仍然被他们延续着。祖先的祭坛标识了族群当中神圣的天涯海角与大山的方位，从征服前时代流传下来的神圣占卜日历标记着庆祝仪式的日子。尽管这些传统遭到新教传教士和天主教神父的破坏，但它们依旧延续。与此同时，内战带来了暴力与流离失所，加上人们对前哥伦布时期的玛雅文明有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知识，一场更世俗化的泛玛雅运动被唤醒了。现在，一个玛雅人的身份不再局限于他的出生地和语言，比如马姆语（Mam）、卡克奇克尔语或者基切语。有100万人操基切语，在单个玛雅语言中，属基切语最为流行。年轻的玛雅人学习用前人的象形文字（如今已被破解）来书写自己的名字。危地马拉玛雅人在难民营岁月里帮助墨西哥玛雅人重建了被毁的古城埃德斯纳（Edzna）。玛雅萨满祭司从危地马拉四面八方来到莫莫斯特南戈朝圣，学习在那儿保存了

500 年神圣的 260 天历法。这场泛玛雅运动也让玛雅族群以外的人听到了当代玛雅人的声音，比如维克托·蒙特霍等作家、诺贝尔奖得主里戈维塔·门楚等政治活跃分子以及乌姆维尔托·阿卡瓦尔·阿赫尤邓诗人。阿卡瓦尔的基切语诗歌 1997 年赢得了瑞士布莱斯·桑德拉尔国际诗歌大奖（Swiss Premio Internacional de Poesía Blaise Cendrars）。



图为 1997 年在莫莫斯特南戈，戴面具的基切玛雅人在 8 巴兹日（8 Batz´Festival）上表演。（照片提供：纳奥米·史密斯）

民主

这些在专制统治下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能够在和平协定之后快速转型成为民主共和国，让人刮目相看。自 20 世纪中叶开始普选就已经被列入宪法条款，但是只有极少数中美洲人有真正实施该权利的机会，仅伯利兹和哥斯达黎加的情况除外。各种和平协定不仅要求选举（以及要求国际组织的监督），而且得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的农工权贵们的支持。新的权贵阶级明白民主是取得政治稳定和获得经济进展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们与老牌土地寡头支持下的军事独裁保持距

离。农业企业家们帮助为民主建设铺平道路，但是危地马拉除外。截至本书写作时，像这样的现代化力量还未传播到危地马拉的权贵阶级。

在创建更开放社会的过程中，中美洲的很多其他利益团体起到了重要作用。内战期间，自治已经成为必然。农民团体和难民组织、女性团体、工会以及非专业的教会团体的政治需求得到了充分发展和明确。一旦取得了和平，这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草根组织成了追求民主和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在尼加拉瓜，米斯基托印第安人赢得了更大的政治自治权；在危地马拉，泛玛雅运动为加利福纳和其他种族以及 24 个操不同玛雅语言的群体争取多文化、多语言的教育模式开展了斗争；在洪都拉斯，1998 年米奇飓风之后救灾工作让政府机构忙得无法招架，草根组织借此机会证明了自己能够承担起重建工作，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利。

258

必要的改革

尽管民主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转型期间还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偶尔也会使用暴力来对付那些被认定的政治威胁。比如，就在最近的 2006 年，洪都拉斯的伦卡族（Lenca）印第安人领袖就被毫无根据地指控谋杀，而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一些劳工和人权领袖被莫名其妙地杀害。不过社会团体仍在努力组织并向这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施压，以促成司法改革和政府决策的更大透明度，这两点都有助于终止暴力。

为了创造基础更广泛的代议制民主，选举改革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改革措施还没有完全实施。传统的种族团体和农村团体仍然很少有机会参与选举。社区的无线电接线员在几个国家的农村地区用当地语言播放仅有的一些新闻，以此来帮助这些传统的团体融入国家政治。但是这些广播站要么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要么因为法律上的一些技术性细则被关闭了。想要把穷困人口也包括到选举过程当中，就必须扩大登记范围而且分散设置投票点。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已经证实这些改革并不难实现。然而，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仍然坚持以前的做

法：为了行使选举权，大部分公民需要舟车劳顿至少一整天。1999年危地马拉的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投显示，他们的这种虚与委蛇的选举是如何破坏民主进程的。只有1/3的合格公民参与了这次由和平协定带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公投。其中一条修正案赋予了玛雅人和其他种族群体新的权利，然而，尽管玛雅人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修正案还是被废除了。

国家政治

259

这些新的民主国家在形成之初，有各式各样的政党代表出现在立法机关，对中美洲政坛来说，他们几乎全是新的面孔，在民众当中也鲜有知名度。单在尼加拉瓜就有35个政党。到2004年，政党的数目已经大大减少（只有5位有赞助的候选人角逐2006年的尼加拉瓜总统选举），这样就容许对几个重要政党的选民及其政治职位进行更好的身份确认。只有危地马拉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政党，也只有危地马拉的革命反对派没能在选举政治中占得一席之地。然而，从前的革命团体在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或叫桑地诺党）却是最重要的政党；他们在市政选举和立法选举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自2005年至今还没有赢得过总统大选。虽说萨尔瓦多的国家共和联盟党于1999年把一位宣传非暴力运动的印第安古鲁族（guru）的侍僧弗兰西斯科·弗洛雷斯·佩雷斯推选为他们的领袖，希望以此摆脱其创始者罗伯托·达布松的敢死队形象，但他们还是输了，输给了富有的保守派政党联盟，那批人曾在内战中与他们作战，而且在第一次民主形式的选举中也曾将他们打败。

中美洲人的选举继续受到国际组织的监督，如美洲国家组织。就算选举没有作弊行为，其政治辩论也仿佛经常陷入过去的泥沼，把注意力聚焦在过去的仇恨上。通常情况下，候选人本身也来自过去：内战期间的总统、诺贝尔奖得主奥斯卡·阿里亚斯2006年第二次当选哥斯达黎加总统；斯查菲克·安达尔（Schafik Handal）2004年在萨尔瓦多总统竞选中失败，他以前是萨尔瓦多的一名革命者，2006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

反对党的长期领袖。而尼加拉瓜2006年的总统选举几乎是1990年的重演，竞选的派系都是一样的。丹尼尔·奥尔特加第四次代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竞选。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代表尼加拉瓜自由联盟（Nicaraguan Liberal Alliance，ALN）的埃杜阿尔多·蒙特阿莱格雷（Eduardo Montealegre），他是从前的孔特拉斯成员、农业企业家们以及美国的共同选择。美国大使保罗·特里韦利（Paul Trivelli）为了确保保守派在选举中获胜，公开提供资金赞助。然而，变化也是有的。一名前桑解阵成员上了桑地诺革新运动（Sandinista Renewal Party，MRS）的候选人名单，对奥尔特加构成了挑战，而一名前孔特拉斯成员则接受了作为奥尔特加竞选搭档的提名，他说"本人宁愿当不可思议者，不当藉藉无名之辈"（《迈阿密先驱报》，2006年5月29日）。

260



图为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左）与桑解阵的丹尼尔·奥尔特加在一起。在能源危机时期，查韦斯向桑解阵控制下的城市运输低成本石油，以此作为对奥尔特加总统竞选的支持。（照片提供：美联社，米拉弗洛雷斯新闻办公室）

民意调查显示很多投票人并不相信任何政党可以为他们带来所需的

社会和政治变化：2000年危地马拉发生丑闻之后，没有一个民众的政党受到欢迎。不过，直到2006年为止，保守派政党在这些新的民主国家中连续赢得总统竞选。每个国家的原因都有些许不同。在洪都拉斯，尽管2006年曼努埃尔·塞拉亚这位听起来非常平民化的候选人打着“公民的权力”的旗号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洪都拉斯的两大支配性政党都属于中右，在候选人方面几乎没有挑选的余地。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革命性政党由于派系斗争严重苦不堪言，而保守派政党就不同了，他们主导着总统选举，政治争论因此也就少一些。并不是每一次保守派的成功都是中美洲本地政治造成的：美国在这些大选中的角色不能被忽略。由于美国一贯支持保守派候选人，他们在内战期间也是这样；加上（中美洲政府）急需发展资金，美国的支持就经常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在尼加拉瓜2006年的选举①中，尽管美国大力反对，昔日的革命政党还是赢了。可能是因为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承诺提供财政支持抵消了美国终止援助的威胁。更重要的是，盟约事件首次把保守派分成两个政党，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两位保守派候选人和桑地诺革新运动的候选人把不支持奥尔特加的选票分散了，丹尼尔·奥尔特加虽然只拿到了38%的选票却成了赢家。

盟约事件（El Pacto）：不知不觉的政变

桑地诺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保持诚实与革命性的桑地诺主义。至于其他的，那属于腐败的富翁和窃贼，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尼加拉瓜人民。

——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罗杰斯，2006年7月）

尼加拉瓜前总统阿诺尔多·阿莱曼（Arnoldo Aléman，

① 2006年尼加拉瓜总统选举中，形成了左翼的桑解阵和桑地诺革新运动、右翼的立宪自由党和自由保守联盟四雄竞争的局面。按照新的规定，总统候选人当选得票率的门槛降低至35%，同时要求得胜者领先第二名5个百分点。是年7月3日桑地诺革新运动总统候选人赫蒂·莱维特斯因心脏病猝死，导致一些原先支持桑地诺革新运动的选民转而将选票投给奥尔特加，使他以高出最低标准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当选获胜。——译者注

1998—2002）的腐败行径可谓登峰造极。他被判从这个贫穷的国家贪污近1亿美元。在1999年的尼加拉瓜盟约事件中，丹尼尔·奥尔特加提议与阿莱曼总统及其保守派执政党立宪自由党（Liberal Constitutional Party，PLC）权力分享，用奥尔特加对国会和司法的影响力与总统的行政权做交易。这么一来，更多的丑闻浮出水面。2003年，奥尔特加（通过他在司法系统有影响力的职位）安排阿莱曼出狱。在媒体所称"不知不觉的政变"中，两大党的领袖合并了他们在国会的投票（占总数的90%）并企图把行政部门也接管过来。他们尝试着弹劾恩里克·博拉尼奥斯（Enrique Bolaños，2002—2006）总统。总统虽然是立宪自由党成员，但是一直在负责给阿莱曼定罪，而且通过了剥夺总统权力的法律。与奥尔特加的联盟让阿莱曼的保守派执政党丑闻不绝如缕，为了参加2006年的总统竞选，他们成立了新的尼加拉瓜自由联盟（ALN）。奥尔特加政党中有许多人包括诗人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和作家、前副总统塞尔希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írez），很久之前就已经厌倦他的独裁。他们于1999年另外创造了一个桑地诺革新运动。中美洲法庭裁定盟约事件的立法有违宪法，而来自中美洲国家组织的压力让他们把这一罪名转嫁到尼加拉瓜民主身上。讽刺的是，由盟约事件通过的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让丹尼尔·奥尔特加在自己的执政期间饱受拖累。

262
263

腐败

旧的说辞与老生常谈的仇恨问题对整个新生代的选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染力，他们没有经历过内战，他们认为该用新的方式来解决旧的问题。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每个国家的大问题，不仅腐蚀了政府制度也损害了公众的信任。腐败问题甚至对哥斯达黎加成熟的民主制度也造成了影响。在前三任总统被指图谋以公共开支为自己谋利之后，

在上两届总统选举中，选民的弃选率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超过30%）。不过，当这些国家开始检举昔日领袖，尼加拉瓜还从国外银行贷款来填补被挪用的资金，公众的信心有所回升。《纽约时报》2005年（7月30日）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美洲人相信在减少腐败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危地马拉的民主

我们这个民族被胁迫了很多年，遭受腐败势力的虐杀。

——危地马拉商人罗伯托·拉米雷斯（Roberto Ramírez）［韦纳（Weiner），2003年，A9］

危地马拉是最后一个获得和平的国家，其发展民主制度的时间才10年。但是它成为中美洲最脆弱的民主国家，时间并不是唯一的因素。1999年，根据和平协定第一届总统选举即将召开，而左翼反对党的其中一位领导人就在选举前几个月被暗杀。这种敢死队伎俩反复出现，破坏了之后的每一次选举。1999年的选举随后任命阿方索·波尔蒂略（Alfonso Portillo）为总统。他承认自己杀过人（他说是出于自我防卫），是里奥斯·蒙特（Ríos Montt）将军的右翼政党危地马拉共和阵线（Guatemalan Republican Front，FRG）的成员。立法议会则由将军自己掌管。鉴于将军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总统期间所犯下的暴行，依据联合国历史澄清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的报告，他可能因反人类罪而被审判。就因为这一点，危地马拉的很多人权组织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开始。波尔蒂略在丑闻中结束了任期，逃窜出国以避免被逮捕，而且传闻他所在的政党参与贩毒。在下一届选举中，里奥斯·蒙特因为之前以发动军事政变的方式夺取过政权，所以没有参选资格，而他还是参与了竞选活动。但是他的拥护者在危地马拉城发起了可怕的暴动，现在称为“黑色星期四”。随后，最高法庭经进一步考虑裁定他可以合法当选总统。在危地马拉这个国家，选民的冷漠太正常不过，但在2003年的总统选举

中有80%的注册选民参与了投票，结果奥斯卡·贝尔赫（Oscar Berger）战胜里奥斯·蒙特将军当选总统，他承诺对和平协定中的民主原则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重申。里奥斯·蒙特被疑参与“黑色星期四”，遭到了临时软禁。虽然他后来被释放了，但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危地马拉共和阵线已经降格为少数党。

尽管民主在2003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危地马拉的政治和法律系统非常脆弱，只要强大的军队和经济权贵发起威胁和采取单边行动便不堪一击。这些势力团体无所不为：把穷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出去、用暴力对付政治对手；他们在危地马拉国内暗箱操作，司法起诉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他们破坏了合法的代议制政府的稳定。关于这些隐形势力不受惩罚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1998年谋杀主教胡安·赫拉尔迪·科内德拉（Juan Gerardi Conedera）。科内德拉是危地马拉教区人权办公室的主任，他被人用重器锤死于家中。事发前两天，他发表了一篇报告，指出内战期间死亡和消失的20万危地马拉人中有80%是军队所为。在调查其死因过程中，数位检察官辞职，其中一位在收到死亡威胁后逃离了危地马拉。虽然迫于国际压力有3位军官受到起诉，但是在他们上诉之后定罪立刻被推翻，而他们的长官从来没有受到任何指控。2006年这起谋杀案仍然悬而未决。意识到危地马拉的民主需要国际协助才能成功，2005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受命在危地马拉重开办事处。监督和平协定实施情况的办事处一年前才刚刚关闭。

264

去军事化

联合国历史澄清委员会1999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危地马拉军队对玛雅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报告还指责美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中央情报局的军事项目对如此的人权侵犯案件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支持。这些调查结果让去军事化成了和平协议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所幸新的文官政府努力从军队手中取得控制权。原先军事化的洪都拉斯虽然没有签署任何和平协定，但是在去军事化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就。卡洛斯·罗伯托·雷伊纳（Carlos Roberto Reina，1993—1997）总统就职期间，洪都拉斯积极控诉军队官员在20世纪80年代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中美洲唯一这样做的国家）。1999年还委任了洪都拉斯第一位文人国防部长。虽然不是每个中美洲国家都像洪都拉斯这样让军队接受民众的绝对监督，但是在萨尔瓦多或者尼加拉瓜，军队已经不再是一大政治因素；甚至在危地马拉，虽然军队对国内事务的干预依然不容乐观，但已经不再控制政府。

所有国家都已经大幅度削减军队规模和军事支出：尼加拉瓜原先的军事支出是最多的（1990年为1.77亿美元），后来削减到最少（2004年为3280万美元），当然比它小得多的国家伯利兹除外。2004年，所有中美洲国家在军事上的支出都没有超过GDP的2%，但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军队通过各式各样军队运营的商业补充了政府预算，比如银行、农用土地这些不受公众监视的产业。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宪法则取缔了常备军。

2003/2004年的军事支出

	美元（百万）	占GDP的比重（%）
危地马拉	201.9	0.8
萨尔瓦多	157.0	1.1
洪都拉斯	100.6	1.4
尼加拉瓜	32.8	0.7
哥斯达黎加	64.2	0.4
巴拿马	147.0	1.1
伯利兹	18.0	2.0
数据来源：《2005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		

犯罪

265
266

去军事化的一个关键目的是要发展警力以控制国内的犯罪，这样军队就能够合理地有限制地用于边境安全和国防。警察队伍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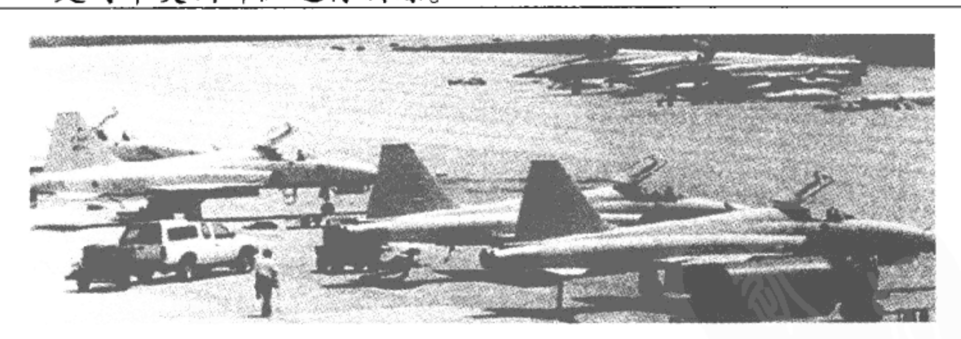
了，但是警察的数量远远跟不上内战结束后急剧上升的犯罪率。最初的犯罪潮形成的原因部分归结于已经遣散但仍携带武器的老兵。后来的犯罪潮就更难控制了，因为有组织的罪犯团体越来越多地利用地峡的便利把可卡因和海洛因运往美国；他们把快艇藏在没有人烟的加勒比海湾内，把飞机停在偏僻的丛林空地上，还利用不发达的金融系统来洗钱。如此有组织的犯罪不断增多，就连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的安全部队都为此大伤脑筋。

到了2006年，美国国务院报道称，进入美国的可卡因中有90%都是经由中美洲入境的，尤其是通过危地马拉无人看守的边界和尼加拉瓜较为落后的米斯基托沿岸。这不仅是因为执法不彻底（洪都拉斯有200多个自治市没有警察），也因为警察收入过低所以很容易成为贿赂的对象。尼加拉瓜一名警官每月能挣200美元；一名法官挣500美元。危地马拉军队中的上层也被指参与毒品走私，禁毒的权威领导人也是如此，他在访问美国时被捕。危地马拉总统贝尔赫以本国资源有限为由，2006年要求美国军队在遥远的佩滕丛林边界巡逻。

街头的帮派增加了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暴力。从1998年到2004年，有34 000个操西班牙语的帮派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街头帮派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让这3个国家本就不足的执法能力几乎无法招架。据保守估计，目前有6—8万帮派成员。以残忍而臭名昭著的MS－13（Mara Salvatrucha）和Mara 18等犯罪团伙，让这3个小国家的凶杀率高居世界之首。以萨尔瓦多为例，其人口数量与纽约市基本持平，但2005年其暴力死亡事件几乎是纽约市的7倍。危地马拉城人口为200万，2004年发生5 000起凶杀案，是拉丁美洲最危险的城市。尽管警方对帮派实行强硬政策，比如年轻人只要有纹身就被抓捕，但是骇人听闻的犯罪率却有增无减。然而，对谋杀的逮捕却极为罕见：危地马拉城的5 000个谋杀案中只有15起最终被定罪。暴力让人们非常沮丧，治安小组和准军事组织决定靠自己来解决，加剧了敢死队和社会大清洗带来的恐慌。洪都拉斯政府曾经有过他们自己的警察暗杀青年人的报道。

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

美国在中美洲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洪都拉斯的索托卡诺（Soto Cano）空军基地。内战期间，该军事基地拥有地峡上最精良的小型战斗机机队和技术最先进的机场之一。这些超音速飞机能够装载的武器包括20毫米机炮、2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最多3 000千克的炸弹、火箭弹和空对地导弹。1999年，随着与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其他美国空军基地的关闭，索托卡诺空军基地在美国的地区防务中变得十分关键，不过美国在该基地的活动重心也发生了变化。黑鹰直升机与奇奴克人直升机更适用于打毒品战争和救灾，已取代喷气式飞机。1998年，飓风米奇导致约9 000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丧生，索托卡诺空军基地首次用于阶段性救灾工作。这是1949年柏林空运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队救灾行动，共有5 600名美军士兵参与其中。自那以后，常驻该基地的美国士兵已经减少至560人。目前出于联合作战的需要，比如缉毒，该基地的重点是对中美洲部队进行训练。



图为1993年的洪都拉斯恩里克·索托·卡诺（Enrique Soto Cano）空军基地，停放着F－5战斗机对地攻击机。（照片提供：美国国防部）

267

重新军事化

法律的缺失让人十分气馁。很多国际组织认为，只有在拥有了一套更彻底也更专业、既能真正解决犯罪问题又能惩治凶手和腐败官员的执法体系之后，这一现状才能结束。很多教会和民间社会团体提出了扩大社会服务范围的方案，为贫困年轻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等要求。2006年，洪都拉斯的帮派主动提出了与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进行停战谈判这样一个更为直接的解决方案，但是没有成功。他们得到的回应反而是政府部署军队助警方一臂之力。不幸的是，军队与警方的联合巡逻不仅对嫌疑罪犯使用暴力，对政治示威者也同样使用了暴力。美国一直鼓励军事解决的途径，他们的做法是任其南方司令部提供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和训练，甚至对危地马拉也不例外，这自1990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经济增长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5年中进行了大改革——降低通货膨胀率，尝试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果能有更多的投资和出口，他们会做得更好。这也是与美国合作尤其重要的原因。

——美洲开发银行（Inter –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行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Enrique Iglesias）（《纽约时报》，1999年3月7日）

中美洲国家必须解决20世纪80年代留下的战争债务以及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问题。尼加拉瓜在80年代经济负增长，而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增长不到1个百分点。洪都拉斯虽然没有正式参战，却积累了41亿美元的债务，在整个中美洲仅次于尼加拉瓜的60亿美元债务。内战结束后，外来援助减少。不过和平协定后的10年，除洪都拉斯以外每个国家的平均年增长率都在4%左右。此外，那些在美国（尼加拉瓜人则是在哥斯达黎加）过上了好日子的移民和战争难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外来援助方式：汇款。2005年，从移民的家人那里，萨尔瓦多人收到了超过

28.3 亿美元的汇款，危地马拉人 29.9 亿美元，洪都拉斯人 17.6 亿美元，尼加拉瓜人 8.5 亿美元。这些汇款的金额远远超过了这几个国家外来投资和援助的总和，而且占到了他们国内生产总值很大的比例：洪都拉斯的数值为 21%，地区最高。汇款也刺激了个人消费。

自然灾害对中美洲地区的经济一直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刚从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国家。1998 年的飓风米奇（Mitch）摧毁了洪都拉斯 80% 的香蕉种植园，也毁坏了尼加拉瓜的其他作物和灌溉系统、桥梁、马路、医院和学校。90 年代末期频发严重的森林火灾，再加上火山喷发，不断让萨尔瓦多人流离失所。2005 年，飓风再次严重毁坏地峡西部，造成 150 多万中美洲人无家可归，其中绝大多数是遭飓风斯坦（Stan）袭击的危地马拉灾民。飓风斯坦造成山体滑坡，很多村庄整个被冲走，其中一个叫帕纳瓦赫（Panabaj）的危地马拉村庄成了万人冢。尽管这些灾难唤来了一些重建援助，但是地峡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飓风米奇过后几乎 10 年，洪都拉斯的食品生产和基础设施依然落后；飓风斯坦过后的第一年，危地马拉报道称 80% 的重建项目没有完成或者由于资源稀缺而从未开始。 268

2005 年经济概览

	GDP（PPP）①（以亿美元计）	增长率	工业占 GDP 的比重（%）	农业占 GDP 的比重（%）	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
危地马拉	569	3.2	19	23	58
萨尔瓦多	312	2.8	30	10	60
洪都拉斯	206	4.2	13	13	56
尼加拉瓜	160	4.0	27	18	55
哥斯达黎加	447	4.0	28	9	63
巴拿马	228	6.4	18	8	74
伯利兹	18	3.8	23	22.5	54.5
数据来源：《2006 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					

① GDP（PPP）系指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译者注

269　中美洲国家非常依赖自由市场原则来振兴经济。萨尔瓦多和其他几个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吸引了更多投资，比如电信和医疗。外来投资的涌入使中美洲地区能够快速地让其出口和经济多元化。没有一个国家只依赖于一到两种出口作物，而且每个国家都发展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见本书原文第 268 页图表）。萨尔瓦多现在制造化工产品和纺织品；危地马拉则制造器械和建筑材料。哥斯达黎加除咖啡和香蕉以外，还出口油梨、无花果以及电子零配件。洪都拉斯在其农产品基础上，也进行锌和铅的精矿贸易；与一个世纪前相比，香蕉和咖啡在所有出口收入中所占不到 1/3。2006 年伯利兹钻探到石油，对其木材和蔗糖的出口是一个小小的增补。

只限于出口又免税的客户工业（maquila）让中美洲国家有机会出口各式各样的加工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和服装。毫无疑问，对人口过多的国家来说，这些产业让他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只能依赖农业。然而，很多经济学家都担心这类产业看中的是用尽可能低的劳动成本来生产出口产品，并不能发展国内市场。而且，中国过去 5 年在这方面崭露头角，让中美洲感到沮丧，竞争很可能马上会让中美洲客户工业加工组装的热潮偃旗息鼓。

不过，并不是所有工业化都走加工模式。哥斯达黎加凭借其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成为拉丁美洲一个繁荣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心，如惠普和因特尔等。其劳动大军不仅包括拿最低工资的工人，也包括专业的软件设计师；其产品不仅出口也内销：哥斯达黎加的人均电脑普及率在拉丁美洲是最高的，达到 24%。在国际发展机构提供的小额贷款的推动下，整个中美洲的小型企业正在发展壮大。

旅游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已经在中美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旅游业为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带来了的外币收入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出口产品；在洪都拉斯，旅游业带来的收入仅次于咖啡。伯利兹一直以来可以说罕为人知，但生态旅游让它成了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一些国际组织希望让其他中美洲国家也发展生态旅游。萨

尔瓦多与其他国家相比，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相对欠缺了一些，但是萨尔瓦多能够抓住地区航空服务需求增多这个机会，通过发展其国家航空公司塔卡国际航空（TACA）来从中受益。塔卡航空新增了北美和加勒比的航班，已经把很多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对手航空公司收入旗下。巴拿马科帕航空公司（Copa Airlines）也强调地区服务，而且发展迅速。

270
271

环境问题与生态旅游

他们剥去了一层土地，诅咒了河流。几乎看不到鬣蜥蜴出来晒太阳，也看不到犰狳了。

——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新生态》（摘自科恩，1986 年，第 17 页）

由于肥料、农药以及土壤的耗尽，中美洲遭受了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超过 35% 的土壤退化或者侵蚀。商业捕虾和捕鱼使得至少 40% 的中美洲红树林遭到毁坏。为了牧牛和种植经济作物，森林被砍伐；由于人口过多，人们不得不尝试在雨林里农耕，而雨林里的土壤太过贫瘠，承受不起这样的行为。中美洲平均每年有 1.3% 的原始森林消失——导致萨尔瓦多的农业只有 6% 的土地有森林和林地，再也没有多余的森林可供消失。由于之前茂密的森林被砍伐光，干旱情况越来越严重，火灾越来越多。1998 年的夏天，单在尼加拉瓜就有 200 万英亩的森林被野火烧毁。令人痛彻心肺的是，在佩滕定居点，无地的玛雅农民任由前哥伦布时期祖先的遗址暴露在风雨侵蚀之中，更别提为了农田和柴火随意砍伐森林这样的事了。毒贩在荒野地区开辟机场、修路，这也加重了破坏程度。

中美洲和各大世界组织明白经济需求是一切环境破坏的诱因，于是他们开发了生态旅游项目来保护森林、礁石和海

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植被与动物，以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被选定参与这些项目保护的土地大多为中美洲最古老的民族所占领，包括玛雅人、加利福纳和米斯基托印第安人、塔拉曼卡山脉的瓜伊米（Guaymi）和其他印第安人，还有巴拿马的库纳人。伯利兹和哥斯达黎加是最先积极推出这些项目的国家，他们发现生态旅游为他们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好处。比如在伯利兹，山峦俱乐部（Sierra Club）和其他环保团体建议该国保护啸猴与美洲虎的栖息地；考古发掘把恢复后的玛雅遗址加入到雨林保护区。伯利兹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比如导游、酒店和饭店的经理或工人，从这些工作中挣到的工资成了他们保护周围自然环境的动力。举例来说，萨尔斯通特马斯国家公园（Sarstoon Temash National Park）现在由玛雅人和加利福纳人管理，2006年他们采取法律手段阻止美国一个石油公司在此进行地震波测试。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加入了墨西哥和伯利兹的一个生态旅游项目，叫做“玛雅世界”（Mundo Maya）；从预留大面积的雨林作为自然保护区到协调航班时间，这些国家可谓尽其所能来实现这个项目。另外一个有多个国家参与的项目是“中部美洲生态走廊”（Mesoamerican Biological Corridor），目的是希望在中美洲内部保留一条持续性的野生生物走廊。这一类项目不仅得到了参与国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组织的支持，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欧盟、国家地理协会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图为巴拿马圣布拉斯（San Blas）岛上的科尔蒂村（Corti Village）。圣布拉斯岛上的库纳族印第安人利用当地未开发的海滩和森林欢迎游客。但是当巴拿马政府批准在其中一个岛上建造大型连锁酒店时，他们就意识到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局限性。库纳人从1925年开始就获得了半自治地位，他们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大型项目，因为他们坚信这不仅会破坏环境，也会阻碍他们自身对当地旅游业的控制。（照片提供：玛丽·艾利斯·雷蒙德，1999年）

中美洲国家在贸易伙伴和投资商方面也有了多样化的发展。在地区协调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扩大了与其他拉美国家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复苏也让它们彼此之间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巴拿马和伯利兹由于各自的传统利益截然不同，不断订立单独的协定：伯利兹与加勒比地区签订协议，而巴拿马与中转船运产业签订协议。由此产生的中美洲地区的贸易伙伴很具有多样性——有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也有韩国、法国和日本——就算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么多贸易伙伴，但总体来说成就是显著的。巴拿马从亚洲国家的进口几乎是从 272

美国进口量的两倍。中美洲国家是为数不多的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同时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国家；这两个对手在中美洲地区经常互相竞争，让这些地峡小国很是受益。最近洪都拉斯分别收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来此修建几个水电站的提议。

经济上的这些新动向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尽管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公共债务居高不下，腐败和犯罪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取得内战和平后的头几年内，中美洲的经济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不仅实现了多元化也得到了增长。然而，经济形势的一片大好很大程度上是由移民汇款推动的，而这笔资金有一天很可能会消失。尽管人口的增长（约为2%）不再超过经济的增长，但是假设流向美国的移民不再提供安全阀，新的压力还会出现。以萨尔瓦多为例，据估计有超过15%的人住在美国。

2005 年美国与中美洲的贸易

	从美国进口%	出口至美国%	出口至其他国家 * %
危地马拉	34.3	58.6	8.6（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	50.0	67.8	11.5（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54.0	66.1	2.6（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24.8	35.9	17.3（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	23.2	14.2	4.7（危地马拉）
巴拿马	11.3	13.2	33.0（日本）
伯利兹	41.4	38.9	24.9（英国）
* 除美国外最活跃的进口国			
数据来源：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006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			

273 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

美国仍然是中美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一旦实施，美国对该地区的主导作用就更大了。该协定由美国、5 个中美洲国家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共同协商

决定，但不包括巴拿马和伯利兹。该协定的灵感来自于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是又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很多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等保护措施，在每个中美洲国家都已经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国国会仅以一票优势勉强通过。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的小农和中型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以后，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也带来了工作岗位流失、贫穷加剧等方面的顾虑。由于电力私有化带来的后果，国家对公共服务业的干预范围不断压缩，这导致价格上涨，但穷人得不到补贴。这种情况萨尔瓦多已经发生，2006 年价格猛涨 14%。美国在协定签署以后，又增加了附加条款作为“说明”，使顾虑进一步加重。那些附加条款基本上取代了在版权、电信、海关检查标准等方面有关的当地法律。美国提出的要求已经超出了让人吃惊的程度，在中美洲人眼里，无异于对他们国家主权的侵犯。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讲，附加条款所带来的影响对很多经济领域的破坏都可能是致命的。比如，新的知识产权法能强制清除市场上的非专利药品以支持更昂贵的品牌。对于连购买非专利药品都经常资金不足的医疗系统来说，健康标准造成的影响是惨痛的。

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于 2004 年签署，但是两年以后仍然没有完全批准和实施。只有萨尔瓦多快速批准了该协定。还没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答应，批准的截止日期就到了；就算到了这个时候，这 3 个国家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同意协定生效的。在哥斯达黎加，关于协定要求的私有化是否会破坏他们独特的社会计划这一问题，国内意见有分歧，因此哥斯达黎加是唯一没有批准该协定的国家。

274
275

巴拿马

此刻，一个世纪走进尾声，外国人离开了，我们的国家结束了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一个新的千年，我们的主权被完整地夺了回来……

——米蕾娅·莫斯科索（Mireya Moscoso）总统的就职演说，1999年9月1日



在古巴拿马遗址上建成的现代巴拿马城。（照片提供：玛丽·艾利斯·雷蒙德，1999年）

美国管辖下的巴拿马运河为中美洲吸引来的国际银行业、商业，当然还有船运业，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巴拿马虽然也出口一些香蕉，但其经济以服务业和商业为主而不是出口作物。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运河区附近，也就是在巴尔沃亚（Balboa）与科隆（Colón）之间；巴拿马城里高档的写字楼林立，是地峡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科隆是仅次于香港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不过，巴拿马绝大多数地区依然落后，包括运河区本身的大部分地区。从运河让

一个独立的巴拿马诞生那一刻起，它就成为了国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但是直到最近运河才真正归属巴拿马。1999年12月31日，美国将巴拿马运河的一切控制权让与巴拿马。就在那一年，巴拿马还发生了另外两件“史上首次”：米蕾娅·莫斯科索当选巴拿马首位女总统；库纳族印第安人恩里克·基基·加里多（Enrique Quiqui Garrido）成为立法议会的首位原住民议长。莫斯科索总统打败马廷·托里霍斯（Martín Torrijos）成为热门人选，她承诺运河的交接高效、和平。马廷·托里霍斯是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的儿子，很多人怀疑他会利用运河为政治密友们谋求好处，而不是造福国家。讽刺的是，在莫斯科索因收受贿赂而遭贬之后，2004年托里霍斯当选为总统。巴拿马运河在两届总统的统治下都运营得很顺畅，为经济做出了贡献。每年征收的通行费有14亿美元，几乎都用于运河的维护，但2004年的政府收入中约有5亿美元来自运河通行费。生态旅游项目在232 278英亩的运河区内发展起来，比如在原美洲学校所在地建了一家酒店，撤了军事雷达塔盖起了生态度假屋。2005年，这些生态旅游项目又创造了近8亿美元的收入。以前的机场现在用于该地区的商务和休闲旅行。运河业务正繁荣发展，不过人们也担心运河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新型的大货船无法通过水闸。巴拿马担心其他国家可能会通过在地峡上建造新路线的方法把运河的一部分交通转移过去——通过尼加拉瓜的高速铁路或者墨西哥的高速公路。托里霍斯为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提出拓宽运河以适应大型船只，这一浩大的工程需耗资超过50亿美元。2006年，该提议得到一致赞同。



图为米雷娅·莫斯科索（Mireya Moscoso）总统，于1999年当选。（照片提供：安东尼奥·罗伯托·摩根律师，1999年）

贫穷持续存在

276
277

靠侥幸是不可能减轻贫困的。

——尼加拉瓜政治家路易斯·乌姆贝托·古斯曼（Luis Humberto Guzmán），1998年［巴克斯特（Baxter），1998年，第21页］

尽管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大多数中美洲人仍然深陷贫穷之中。自由市场的尝试和国有控股私有化完全没能解决一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汇款有可能防止了贫困的加剧，在萨尔瓦多甚至使贫困率有所降低（降至36.1%），但是2004年尼加拉瓜（50%）和洪都拉斯（53%）一半的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虽然危地马拉的官方数据无法提供，但是从所有其他社会指标来看，其人口的贫困普遍性与其他国家类似，而且就土著人口来说，贫困率几乎高达75%。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激烈争夺除海地以外美洲最穷的国家这个不光彩的名号，要改变这一现状并不容易。尼加拉瓜不再是革命国家，其贫穷程度又沦落到索摩查政权时期的水平。失业率和未充分就业率加在一起达到了52%。据一些鼓吹性团体估计，80%的人以每天不到2美元在维持生计。过去3年，又有50多万洪都拉斯人加入到贫困队伍。

和平协定要求提高税收来资助社会事业，危地马拉因未能充分履行这一要求而饱受诟病。难民在联合国的帮助下被遣送回国，士兵也在去军事化之后返回家乡，社会状况因此更加不堪入目。人们回家后发现土地已经被农业和新的矿业公司占领——目前2%的人口占有70%的可耕种土地。很多人想重新在这里定居，却被新的企业主赶了出去，有时候甚至使用暴力——2004年，在努埃瓦林达（Nueva Linda）的一次迫迁事件中至少有3名警察和7名擅自占有房屋者被杀。2005年的飓风斯坦让流离失所的状况更为恶化，那场飓风又造成了几千穷苦村民无家可归。对这个60%的人口都以农业为生的国家来说，农用土地的欠缺所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强行驱逐仍在继续，而身

为大地主的总统贝尔赫却没能实施起一套分配土地和裁决争端的办法。不过，他承诺强制执行缴收税款以增加社会开支。

哥斯达黎加的发展程度虽然领先了邻国几十年，但是目前有21.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值。哥斯达黎加最初因收容了100万尼加拉瓜战争难民而受到拖累，此时的哥斯达黎加正挣扎着以新的政治举措改革福利制度。1999年，哥斯达黎加开始驱逐难民，与尼加拉瓜的关系也一度紧张。然而，到了2006年，尼加拉瓜居民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大约有50万移民——超过人口的10%在哥斯达黎加找工作。不过，能够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在意识形态和财政两方面真正致力于改善经济困境的国家，仍然只有哥斯达黎加。社会福利制度带来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和经济指标上。而且，哥斯达黎加长期以来在教育上的投入，让他们的劳动大军能够吸引来高科技投资。

2005年的社会指标

	人均GDP（PPP）（美元）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年）	婴儿死亡率（每一千例产婴的比率）
危地马拉	5 200	69.38	30.94
萨尔瓦多	5 100	71.49	24.39
洪都拉斯	2 800	69.33	25.82
尼加拉瓜	2 400	70.63	28.11
哥斯达黎加	10 100	77.0	9.7
巴拿马	7 100	75.22	16.37
伯利兹	6 800	68.3	24.89
拉丁美洲	8 105	71.0	33.0
欧盟	26 900	78.3	5.1

数据来源：《2006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05年

中美洲国家已经着手几项学校和诊所的建设项目。毫无疑问整个

地峡的医疗和教育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事实上，在整个拉丁美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接种疫苗和产前护理等计划的实施，预期寿命有所增加而婴儿死亡率有所降低。在教育方面，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识字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很多中美洲人来说小学和中学教育依然难以达到。以危地马拉为例，在符合上学条件的学生中只有 41% 读了小学。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15 岁及以上成年人中近 30% 的人根本没上过学。事实上，绝大多数中美洲成年人从未上过中学，中学之后的教育对他们来说就更加遥不可及了。虽然在哥斯达黎加（19%）和巴拿马（19%）25 岁及以上成年人中上过大专院校的比例还算鼓舞人心，但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教育机会仍然只留给少数人：危地马拉 6%、伯利兹和洪都拉斯 7%、尼加拉瓜 9%。

2005 年中美洲的教育情况

	受教育比例	义务教育	在校生比例	公共投资 *
危地马拉	71.0%	1—6 年级	41%	4.7%
萨尔瓦多	80.2%	1—9 年级	85%	9.4%
洪都拉斯	76.2%	1—6 年级	88%	无
尼加拉瓜	67.5%	无	80%	9.1%
哥斯达黎加	96.0%	1—9 年级	99%	17.1%
巴拿马	92.6%	1—6 年级	95%	9.9%
伯利兹	94.1%	1—9 年级	60%	15.7%
加勒比和拉丁美洲	90.2%	无	无	无
欧盟	90.7%	无	无	无
数据来源：美国国务院，《背景知识手册》，2005 年；《2006 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06 年				
* 占 GDP 的比重				

279

民众主义

事实是贸易自由并没有减少贫困，也没有消灭不平等。

——美洲开发银行（2006年，第1页）

极度贫困的民主不是我们当初寻找的解决途径。

——洪都拉斯总统卡洛斯·罗伯托·雷伊纳（《洪都拉斯周报》，1997年9月29日）

在美国的鼓励下，中美洲国家欣然接受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国有服务业的私有化，他们相信这样就能最快实现繁荣。他们不顾对社会甚至是国家主权带来的风险，实施自由贸易协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政府的预算限制。萨尔瓦多和巴拿马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代之以美元；加入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更改了他们的法律；预算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观管理的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找不到教育和医疗资金。

就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讲，中美洲国家确实比以前富裕了。可惜，那些财富主要的受益者是权贵阶层的少数人。萨尔瓦多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与100年前没有差别，只不过现在拥有土地的寡头是商业权贵，他们也通过私有制银行和公用事业来赚钱。哥斯达黎加在财政紧缩型政府的压力下，减少了公共服务业的资金，收入差距更为悬殊：从1988年到2004年，最富裕的那批人的收入翻番，而最穷的人收入只提高了7%。中美洲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全世界也是最糟糕的。涓滴理论并没有起作用。

280

中美洲人越来越失去耐心，也越来越感到沮丧。他们发现向外国企业的让步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好处，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两国愤怒的居民试图关闭污染河流的采矿营运公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预算协定让尼加拉瓜的医师得不到工资增长，他们因此罢工，使得公共医疗体系中断了几个月。基切玛雅人为了阻止自己土地上的水资源

被私有化，不断进行示威游行；加利福纳人也用类似的方法阻止在传统的加勒比土地上开发度假村。哥斯达黎加的联合示威者拖延了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生效。这种反对开放市场体系的抗议行为在整个拉丁美洲已经十分普遍。其中一些在警方的暴力反击中结束，而另一些则迫使跨国公司撤出该市场或者以对东道国更有利为前提重新拟定政府合同。拉美晴雨计（Latinobarómetro）2005年对中美洲人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0%的人对开放市场经济不满意；近70%的人对私有化不满意。

收入分配

	收入百分比			
	最低的10%	最低的20%	最高的20%	最高的10%
中美洲				
哥斯达黎加	1.3	3.9	54.8	38.4
萨尔瓦多	0.7	2.7	55.9	38.8
危地马拉	0.9	2.9	59.5	43.4
洪都拉斯	1.2	3.4	58.3	42.2
尼加拉瓜	2.2	5.6	49.3	33.8
巴拿马	0.8	2.5	60.3	43.6
其他国家				
美国	1.9	5.4	45.8	29.9
德国	2.2	8.5	36.9	22.1
孟加拉国	3.9	9.0	41.3	26.7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06年				

281 政治家们通过推广民众主义的议程嗅到了人们的厌恶和失望，有时候还有一定程度的反美情绪。在这些人中，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最为著名。查韦斯提供打折的石油、资助扫盲和医疗计划，联合了古巴的力量，在中美洲赢得青睐。民众主义政治家在中美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没有查韦斯那样强有力的说辞。巴拿马总统马廷·

托里霍斯平衡了自由市场改革和对社会计划的需求。在2006年的哥斯达黎加总统选举中，反对中美洲—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但有些保守的候选人奥通·索利斯（Ottón Solís），几乎打败了民族英雄也是自由市场倡导者的奥斯卡·阿里亚斯。在尼加拉瓜，随着美国一次又一次企图破坏左翼候选人丹尼尔·奥尔特加的总统候选人资格，他反而越来越受欢迎。

美国与民众主义

美国把中美洲的新趋势、民众主义、中国和欧盟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等看成是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霸权的威胁。从对查韦斯总统的政治攻击来判断，在美国眼里，民众主义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布朗兹·克拉多克（Brantz Craddock）将军向国会报告时称“反对自由贸易的煽动者”（克拉多克，2005年，第7页）对安全构成隐患；战争学院的战略家们建议务必对民众主义使用武力，先下手为强。此外，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等多名美国官员争辩称，如果当地政府不顾及美国利益，那么美国干预政府选举就不算触犯民主原则。然而，这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中美洲的可信度，让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更温和的手段。2006年，美国为了实施一项顾及中美洲人利益的政策，专门派遣了职业外交官而不是政客。而且，当丹尼尔·奥尔特加当选尼加拉瓜总统之后，美国采取了观望政策，而不是立刻中止援助。

关于统一的疑问

在取得和平和民主之后，中美洲地区沉浸在乐观主义情绪当中，中美洲国家在联合国的鼓励下着手在政治和经济上统一地峡。结果统一没有实现，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正式组织来进行相互协调，比如中美洲议会和中美洲法院，但是它们没有任何权威可言，而且单个国家（尤其是哥斯达黎加）可以自主选择退出。



282
283

图为2006年3月就区域一体化问题召开的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峰会。从左至右依次为：巴拿马总统马廷·托里霍斯（Martín Torrijos）、哥斯达黎加总统阿维尔·帕切科（Abel Pacheco）、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尼加拉瓜总统恩里克·博拉尼奥斯（Enrique Bolaños）、危地马拉总统奥斯卡·贝尔赫（Oscar Berger）以及萨尔瓦多副总统安娜·维尔玛·德·艾丝柯芭（Ana Vilma de Escobar）。（美联社图片/巴拿马总统府）

最有可能实现地峡一体化发展的机构是中美洲一体化体系①（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ystem，SICA）。该机构协调的事务从医疗和能源到救灾和安保，而且7个中美洲国家都有参与。它同时也是签署贸易协定和发展地区基础设施的主要平台。说到贸易，中美洲一

① SICA，即El Sistema de la Integración Centroamericana。1991年12月31日中美洲国家组织（ODECA）成员国签署了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重申为本地区的和平、政治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做出进一步的努力。1993年2月1日，6个中美洲国家正式成立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总部设于萨尔瓦多。2000年伯利兹成为正式成员。2004年多米尼加成为联系成员。近几年，墨西哥、巴西和智利已成为其“地区观察员”，西班牙、德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已成为其“地区外观察员”。——译者注

体化体系恢复了共同市场，而且成功创造了更开放的边界，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四国共同的关税。虽然每个国家继续开展双边贸易协定而不是统一行动，但是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与刚提议的同欧盟之间的协议是两个重要的例外。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最大的影响可能在能源领域。互联电力系统计划于2008年完成。根据坎昆宣言（Declaration of Cancun），2006年启动了一项更为震撼人心的项目。是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一个联合项目，目标是为中美洲地区发展低成本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项目也称为《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Plan Puebla-Panama），规划在墨西哥南部与哥伦比亚之间搭建起一条输油管道，在危地马拉或者巴拿马建造一个炼油厂，以低的成本生产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石油来供给中美洲地区。假设该项目真的能够实施，那就是自巴拿马运河开凿以来最重大的工程项目。

要求地峡一体化的压力很大，但与此同时，反对一体化的压力也不小。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担心与邻国较弱的经济相联合以后，会对他们自己的繁荣造成伤害。伯利兹的文化传统与加勒比地区一脉相承，而不是那些讲西班牙语的中美洲邻国；伯利兹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了很多中美洲的行动，但是其发展重点与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CARICOM）是一致的。边境冲突持续存在，显现了民族主义的重要而不是谋求统一。2006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完全开放其共有边境，彻底结束了两国自1969年足球战争以来的争端，而此时的伯利兹和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居民涌入伯利兹领土这一问题上仍然需要美洲国家组织出面调解。另外，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就圣胡安河上的航行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因而陷入竞争，地区组织插手才得以维护了和平。

未来

如果我们回头看过去的25年，会看到巨大的飞跃；如果我们向前

看，看到的则是不确定性。这个实行民主的落后国家，她能够得到巩固或者打破贫穷的怪圈吗？这是对未来提出的问题……

——萨尔瓦多记者罗伯托·图尔西奥斯（Roberto Turcios）（1999年，第118页）

事实证明，中美洲的和平是持久的，其选举制民主具有令人惊讶的适应力。新的民主国家有可能不完美，但是当选民看到该体系遭受威胁之时纷纷涌入投票站；而且人权专员和社会组织敢于同敢死队、腐败政客以及军官们正面对抗。被压迫、被剥削的土著民族和其他族群现在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玛雅人以前对危地马拉政府非常畏惧，现在也已经参与其中，而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里戈维塔·门楚有意参选总统。对于这些几个世纪以来受寡头家族和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来说，这些是真正的成就。

中美洲的经济仍然让绝大多数居民处于美洲大陆最糟糕的贫困之中，而贫穷又引起了困扰该地区的其他社会问题，帮派和贩毒便是其中之一。新近的一些经济举措未能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但是有可能为正确的社会和教育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健康的平台。中美洲在婴儿死亡率和其他社会指标上的改善，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是位于前列的。然而，财富的剧烈悬殊很难根除。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能源倡议与巴拿马运河的拓宽能够带来的也许不仅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更便宜的能源，还有急需的工作机会。联合国千年减贫计划（Millennium Poverty Reduction）等国际项目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保护自耕农免受自由贸易协定影响的补偿项目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需要更多小额贷款来发展小型企业。 284

2006年夏天，一位西班牙法官发出了国际逮捕令追捕危地马拉的两名军事独裁者：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将军和奥斯卡·乌姆贝托·梅迪亚（Óscar Humberto Medía）将军，他们被判在内战期间犯下了种族大屠杀、严刑拷打和恐怖主义等国际罪行。针对这样的司法行动，肯定有人会对国际法的原则提出呼吁和争论，但尽管如此，这样

的行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固有的想法，那就是触犯人权是不能逍遥法外的。已经有证据可以证明，新一代的军官很想翻过战争年代那耻辱的一页。就凭这一点，也充满了希望。

各种团体和运动培育了一种信念，那就是改变是可能的，我们拥有权利，而且能够活得有尊严……

——埃基波·马伊斯（Equipo Maíz）（2001 年，第 14 页）



附录 1　危地马拉概况

正式名称

危地马拉共和国

自然地理

国土面积：4.2 万平方英里（10.878 万平方千米），约为美国田纳西州大小

边境接壤：墨西哥、伯利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

海拔：最高处位于塔胡穆尔科火山（Tajumulco），高 13 896 英尺（4 211 米）

地形：以山地为主，沿海有狭窄但富饶的平原，佩滕地区有石灰岩高地。森林和林地覆盖率为 36%。

政府

根据 1985 年宪法，于 1993 年修订，危地马拉为民主制共和国，政府包括 3 个部门。行政部门由总统领导，总统也是最高统帅，选举产生，任期 4 年。立法部门由 158 名单议院制国会成员组成；每位成员都由选举产生，任期 4 年。宪法法院由 5 名法官组成，法官由选举

产生，任期 5 年，是全国最高法院。司法系统还包括一个由 13 人组成的最高法院，每位法官由国会选举产生，任期 5 年。18 岁及以上成年人享有普选权。

政治区划

首都：危地马拉城（2005 年中心城区人口为 250 万）

主要城市：危地马拉城、克萨尔特南戈、埃斯昆特拉（Escuintla）

下设：22 个省，由省长管理，省长由总统任命

人民

人口：12 293 545 人（2006 年 7 月估计）

增长率：2.27%（2006 年估计）

民族：印第安人（以玛雅人为主）占 51% *；梅斯蒂索人和欧洲人占 49%

语言：60% 人口讲西班牙语，40% 人口讲玛雅语言

宗教：罗马天主教，新教，传统玛雅宗教

识字率：71%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 *：569 亿美元（2005 年估计）

自然资源：石油、镍、鱼、稀有木材、水电

经济领域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23%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19%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58%

农业出口：咖啡、蔗糖、香蕉

工业：蔗糖加工、纺织品及服装、家具、化学制品、石油、金属、橡胶

服务业：政府、交通运输业、旅游业

主要出口产品：咖啡、蔗糖、豆蔻干籽、香蕉、水果、石油、蔬菜

劳动力

农业：50%

服务业：35%

工业：15%

数据来源：《2006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知识手册》（美国国务院，2005年）

＊该估计数值从41%到60%不等

＊＊购买力平价

附录2　萨尔瓦多概况

正式名称

萨尔瓦多共和国

自然地理

国土面积：8 260 平方英里（21 476 平方千米），是中美洲最小的国家，约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小

边境接壤：紧靠太平洋，位于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之间

海拔：最高处位于埃尔皮塔尔山（Cerro El Pital），高 9 009 英尺（2 730 米）

地形：以山地为主，太平洋沿海有狭窄但富饶的平原及高地。森林和林地覆盖率为 14%。萨尔瓦多是中美洲唯一没有加勒比海岸线的国家。

政府

根据 1983 年宪法，萨尔瓦多民主共和国由政府的 3 个部门管理。行政部门由总统支配，总统选举产生，任期 5 年；立法部门由单议院制立法议会组成，共 84 名成员，每位成员由选举产生，任期 3 年。司

法部门最高法院的法官由立法议会挑选。18 岁及以上成年人享有普选权。

政治区划

首都：圣萨尔瓦多（2005 年人口为 220 万）

其他城市：阿瓦查潘（Ahuachapan）、圣米格尔（San Miguel）、圣安娜（Santa Ana）、松索纳特

下设：14 个省

人民

人口：6 822 378（2006 年 7 月估计）；中美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增长率：1.7%（2006 年估计）

民族：梅斯蒂索人占 90%，印第安人占 1%，白人占 9%

语言：西班牙语；部分皮比尔族印第安人讲纳瓦语（Nahua）

宗教：罗马天主教占 83%；新教及其他占 17%

识字率：80%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312 亿美元（2005 年估计）

自然资源：水电、地热发电、石油

经济领域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10%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30%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60%

农产品：咖啡、蔗糖、玉米、家禽、高粱

工业：食品加工、饮料、石油产品、化学制品、肥料、纺织品、家具、轻金属

主要出口产品：咖啡、蔗糖、虾、纺织品

劳动力

农业：17%

工业：17%

服务业：66%

数据来源：《2006 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知识手册》（美国国务院，2005 年）

＊购买力平价



附录 3　洪都拉斯概况

正式名称

洪都拉斯共和国

自然地理

国土面积：43 270 平方英里（112 100 平方千米），约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小

边境接壤：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

海拔：最高处位于拉斯米纳斯山（Cerro Las Minas），高 9 471 英尺（2 870 米）

地形：内陆为山地，沿海有狭窄的平原。加勒比海一侧海岸线绵长，拥有中美洲的大型港口科尔特斯港。森林和林地覆盖率为 42%。

政府

根据 1982 年宪法，洪都拉斯为民主共和国，政府由 3 个部门组成。行政部门包括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 4 年；立法部门由单议院制国会组成，每位成员都由选举产生，任期 4 年，共 128 位成员；司法部门包括一个最高法院，每位法官由国会任命、总统批准。18 岁及

以上成年人享有普选权且强制执行。

政治区划

首都：特古西加尔帕（2006 年估计，中心城区人口约为 120 万）

主要城市：特古西加尔帕、圣佩德罗苏拉（San Pedro Sula）

下设：18 个省

人民

人口：7 326 496（2006 年估计）

增长率：2. 1% （2006 年估计）

民族：梅斯蒂索人占 90%，印第安人占 7%，黑人占 2%，白人占 1%

语言：西班牙语，加勒比沿海讲英语和加利福纳语，另有乔尔蒂（Chortí）玛雅语、帕亚语（Paya）和伦卡语（Lenca）等印第安语言

宗教：罗马天主教占 97%，新教及其他占 3%

识字率：76%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206 亿美元（2005 年估计）

自然资源：木材、金、银、铜、铅、锌、铁矿石、锑、煤、鱼

经济领域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13%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31%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56%

农业：咖啡、香蕉、虾、牛肉、木材、龙虾、蔗糖、水果

工业：糖厂、纺织品和服装、水泥、木制产品、雪茄

服务业：政府、旅游业

主要出口产品：咖啡、香蕉、虾、龙虾、柑橘类水果、铅/锌精矿、肉类、木材、金

劳动力

农业：34%

服务业：45%

工业：21%

数据来源：《2006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知识手册》（美国国务院，2005年）

*购买力平价

附录4　尼加拉瓜概况

正式名称

尼加拉瓜共和国

自然地理

国土面积：50 446 平方英里（103 688 平方千米），是中美洲最大的国家，约为美国纽约州大小

边境接壤：南北与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接壤，东西两侧临海

海拔：最高处位于莫戈通峰（Mogoton），高 8 045 英尺（2 438 米）

地形：内陆为山地，加勒比海沿岸有广阔的平原，太平洋沿岸平原狭窄且火山四处分布。尼加拉瓜湖是北美五大湖与（南美）的的喀喀湖之间最大的淡水湖泊。森林和林地覆盖率为43%。

政府

根据1987年制订、1995年修订的宪法，尼加拉瓜为民主共和国，政府分为4个部门。行政部门包括选举产生的总统，任期5年；立法部门由单议院制的国民议会组成，共92个席位：其中90人选举产生，

但是由于盟约事件，一位成员是前任总统，另一位是上届总统选举中最后落选的候选人；所有成员在 5 年任期内免予起诉。司法部门包括最高法院，16 名法官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 5 年。选举部门包括最高选举委员会，负责组织竞选。16 岁及以上成年人享有普选权。

政治区划

首都：马那瓜（2005 年估计人口为 140 万）

其他城市：莱昂、格拉纳达、希诺特加（Jinotega）、马塔加尔帕（Matagalpa）、奇南德加（Chinandega）、马萨亚（Masaya）

下设：15 个省

人民

人口：5 570 129（2006 年估计）

增长率：1.9%（2006 年估计）

民族：梅斯蒂索人占 69%，白人占 17%，黑人占 9%，印第安人占 5%

语言：西班牙语，加勒比沿海讲英语以及苏穆（Sumu）和拉马（Rama）印第安语

宗教：罗马天主教占 73%，福音教会占 15%，其他占 3.5%，无宗教信仰占 8.5%

识字率：68%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132 亿美元（2005 年估计）

自然资源：金、银、铜、钨、铅、锌、木材、鱼

经济领域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18%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27%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55%

农业：咖啡、香蕉、甘蔗、棉花、大米、玉米、豆类、牛肉、牛犊肉、猪肉、家禽、乳制品、虾、龙虾

工业：食品加工、化学制品、金属产品、纺织品和服装、石油炼制、饮料、鞋类、木材

服务业：商业、建筑业、政府、银行业、交通运输业、能源

主要出口产品：咖啡、海产品、肉类、蔗糖、金、香蕉、花生

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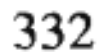
农业：31%

服务业：52%

工业：17%

数据来源：《2006 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知识手册》（美国国务院，2005 年）

*购买力平价



附录 5　哥斯达黎加概况

正式名称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

自然地理

国土面积：19 652 平方英里（51 032 平方千米），约为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大小

边境接壤：夹在尼加拉瓜与巴拿马之间，两侧临海

海拔：最高处位于奇里波山（Cerro Chirripo），高 12 573 英尺（3 810米）

地形：崎岖的中央高地把加勒比沿海平原与太平洋沿海平原分隔开来。森林和林地覆盖率为 47%。

政府

根据 1949 年宪法，哥斯达黎加为民主共和国，政府分为 3 个部门。行政部门包括总统，选举产生，任期 4 年；立法部门是单议院制的立法议会，57 名成员由选举产生，任期 4 年。司法部门包括最高法院，22 位法官由立法议会选举产生，任期 8 年，可连任。哥斯达黎加

的民主传统可追溯至19世纪，是中美洲两个废除军队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巴拿马）。18岁及以上成年人享有普选权且强制执行。

政治区划

首都：圣何塞（2004年估计，中心城区人口为150万）

主要城市：圣何塞、阿拉胡埃拉（Alajuela）、彭塔雷纳斯（Puntarenas）、利蒙、卡塔戈

下设：7个省

人民

人口：4 075 261（2006年估计）

增长率：1.5%（2006年估计）

民族：白人（包括梅斯蒂索人）占94%，黑人占3%，印第安人（主要是布里布里人和其他塔拉曼卡地区的族群）占1%，华人占1%，其他占1%

语言：西班牙语；加勒比海的利蒙港附近讲英语

宗教：罗马天主教占76%，福音教会占14%，耶和华见证人会占1%，其他新教徒占1%，其他宗教占5%，无宗教信仰占3%

识字率：96%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447亿美元（2005年估计）

自然资源：水电

经济领域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9%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28%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63%

农业：咖啡、香蕉、蔗糖、玉米、大米、豆类、土豆、牛肉、木材、乳制品、景观植物、其他水果

工业：食品加工、纺织品和服装、建筑材料、肥料、塑料制品、电子器件

商业：旅游业（餐厅和酒店）、银行、保险业

主要出口产品：香蕉、咖啡、纺织品和服装、水果、蔗糖

劳动力

农业：20%

服务业：58%

工业：22%

数据来源：《2006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知识手册》（美国国务院，2005年）

＊购买力平价



附录6　巴拿马概况

正式名称

巴拿马共和国

自然地理

国土面积：29 762 平方英里（77 381 平方千米），约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小

边境接壤：太平洋、加勒比海、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是地峡东南端连接南北美洲的战略要塞

海拔：最高处位于奇里基火山（Chiriqui），高 11 468 英尺（3 475 米）

地形：沿海平原广阔（海岸线长 1 786 英里/2 857 千米），有起伏的山丘和崎岖的内陆，中间以峭壁和平原相隔。境内有狭窄且地势低洼的地峡，便于巴拿马运河及其他跨大洋贸易路线的建造。森林和林地覆盖率为 58%。

政府

根据 1972 年制订、2004 年修订的宪法，巴拿马是民主国家，由

政府的3个部门管理。行政部门由总统领导，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5年；立法部门由单议院制的国民议会组成，共78名成员，选举产生，任期5年；司法部门包括最高法院，9名法官任期10年。18岁及以上成年人享有普选权且强制执行。

政治区划

首都：巴拿马城（2005年估计人口为1 436 025）

其他城市：科隆、达维德（David）

下设：9个省以及雅拉库纳（Kuna Yala）自治区

人民

人口：3 191 319（2006年估计）

增长率：1.6%（2006年估计）

民族：梅斯蒂索人占70%，西印度人占14%，白人占10%，印第安人（包括库纳族、埃姆维拉族和塔拉曼卡特里维族）占6%

语言：西班牙语，14%的人以英语为正式母语（很多巴拿马人讲双语）

宗教：罗马天主教占85%，新教占15%

识字率：93%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228亿美元（2005年估计）

自然资源：铜、桃花心木和其他森林产品、海产品、水电

经济领域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8%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8%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74%

农业：香蕉、大米、玉米、咖啡、甘蔗、蔬菜、家禽、虾

工业：建筑业、石油提炼、酿酒、水泥、蔗糖加工、纸、印刷、

矿业、家具、化学制品

服务业：金融、保险、旅游业、与运河相关的服务行业

主要出口产品：香蕉、虾、蔗糖、服装、咖啡

劳动力

农业：21%

服务业：61%

工业：18%

数据来源：《2006 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知识手册》（美国国务院，2005 年）

* 购买力平价



附录 7　伯利兹概况

正式名称

伯利兹，即前英属洪都拉斯

自然地理

国土面积：8 867 平方英里（22 923 平方千米），略大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边境接壤：墨西哥、危地马拉、加勒比海

海拔：最高处位于维多利亚峰，高 3 828 英尺（1 160 米）

地形：沿海为平坦的沼泽平原，南部有低山。森林和林地覆盖率为 73%。近海有部分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

政府

根据 1981 年宪法，伯利兹议会制政府分为 3 个独立的部门。行政部门由英王和总理构成，英王即国家元首（由伯利兹总督代表），总理为多数党领袖，选举产生，任期 5 年。立法部门由两院制国民议会组成：众议院 29 名成员，参议员 12 名成员；任期均为 5 年。虽然众议院议员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参议院议员则通过任命产生：其中 6

名由总理推荐，3 名由反对党推荐，剩余名额由不同利益团体向总督推荐。司法部门包括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在总理的建议下由总督任命。18 岁及以上成年人享有普选权。

政治区划

首都：贝尔莫潘（Belmopan）（2004 年估计人口为 12 300 人）

其他城市：伯利兹市（5.9 万人）、奥兰治沃克（1.5 万人）、圣伊格纳西奥（1.6 万人）

下设：6 个区

人口

人口：287 730（2006 年估计）

增长率：2.3%（2006 年估计）

民族：梅斯蒂索人占 49%，克里奥尔人（非洲裔和欧非混血种人）占 25%，玛雅人占 11%，加利福纳人（黑加勒比印第安人）占 6%，其他（包括白人、东印度人、华人）占 9%

语言：英语（官方语言）、西班牙语、莫潘语和其他玛雅语、加利福纳语、克里奥尔语

宗教：罗马天主教占 50%，新教占 27%（包括五旬节教会的 7%、圣公会的 5%、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 5%、孟诺派的 4%），其他宗教占 14%，无宗教信仰占 9%

识字率：94%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18 亿美元（2004 年估计）

自然资源：可耕地、木材、鱼

经济领域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22.5%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23%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4.5%（2004年估计）

农业：香蕉、可可、甘蔗、柑橘类水果、木材、鱼、养殖虾

工业：服装、食品加工、建筑业

服务业：旅游业、政府

主要出口产品：蔗糖、香蕉、浓缩柑橘汁、服装、鱼产品、木材

劳动力

农业：27%

服务业：55%

工业：18%

数据来源：《2006年世界概况》（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知识手册》（美国国务院，2005年）

*购买力平价

附录 8　大事年表

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

公元前 1 万年以前：亚洲人迁徙至美洲，美洲人起源

约公元前 2000 年：定居的村民出现

约公元前 1500 年：奥可斯文化和奥尔梅克文明的崛起

公元前 800—前 400 年：早期玛雅定居点及文化的出现

公元前 250 年：玛雅和其他中部美洲城市中心

250—900 年：古典时期的玛雅文明

900—1200 年：古典时期结束及后古典时期的早期玛雅文明；酋邦在地峡南部迅速涌现

1200—1521 年：危地马拉高地上玛雅城邦国家的繁荣；阿兹特克族逐渐统治大部分中部美洲

西班牙征服

1492 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登陆

1501 年：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探索巴拿马海岸

1502 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探索地峡海岸

1510 年：第一个西班牙殖民点安提瓜的圣马利亚在巴拿马成功建立

1513 年：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抵达了太平洋

1519 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在墨西哥沿海抛锚停靠。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建立巴拿马城

1521 年：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的首都

1522 年：希尔・贡萨莱斯・达维拉探索中美洲的太平洋沿岸

1524 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征服了危地马拉的基切玛雅人。弗兰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兴建了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和莱昂；佩德拉里亚斯很快接手

1524—1526 年：科尔特斯与洪都拉斯其他征服者。特鲁希略和科尔特斯港在洪都拉斯和圣萨尔瓦多建成

1532 年：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为秘鲁而战

1536 年：第一批奴隶从尼加拉瓜运抵秘鲁

1537 年：第一位主教委派到了危地马拉

1541 年：征服时期结束

1542 年：由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起草的《新法》颁布

1543 年：贯穿地峡的陆上路线在巴拿马建立

危地马拉王国

1548 年：王室检审庭在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成立，由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管辖

1560 年：第一个西班牙殖民地在哥斯达黎加成功建立

1567 年：危地马拉王国从恰帕斯一直延伸到哥斯达黎加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打败，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扩张

1638 年：英国在伯利兹的伐木业和海盗业

1697 年：玛雅人最后一个据点的领袖卡内克（Canek）被打败

1700 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波旁王朝统治

1712—1714 年：特塞尔塔尔玛雅人在恰帕斯起义

1746 年：贝略港沦陷；西班牙放弃巴拿马的跨地峡路线

1763 年：英国同意结束在西班牙领地内的海盗袭击，以此换得伐木权

1773 年：危地马拉发生地震；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安提瓜）遭废弃，移至危地马拉城

1779 年：英国与西班牙开战。马蒂亚斯·德·加尔维斯限制英国人在危地马拉王国内的活动

1798 年：西班牙在伯利兹的圣乔治岛战役中败给英国

独立与中美洲联邦

1808 年：法国入侵西班牙；殖民地支持在卡迪斯（Cadiz）的流亡政府

1810 年：独立运动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包括巴拿马）开始；支持独立的运动在王国内陆续爆发

1812 年：卡迪斯流亡政府颁布自由的宪法

1814 年：费迪南德七世恢复西班牙王位

1821 年：墨西哥赢得独立；危地马拉王国宣布独立并加入了奥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的墨西哥帝国

1823 年：中美洲脱离墨西哥

1824 年：中美洲联合省建立

1827—1829 年：内战

1829—1839 年：在弗兰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带领下，自由派领导联邦

1831—1838 年：马里亚诺·加尔维斯省督在危地马拉实施自由改革

1837—1840 年：拉法埃尔·卡雷拉在危地马拉领导起义

1839 年：联邦瓦解

1840 年：卡雷拉打败了莫拉桑

保守派与外来投机商

1839—1865 年：杰出的考迪罗卡雷拉掌控危地马拉并且主导中美

洲大部分地区

1840 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达成联盟协议以抵抗英国占领中美洲领土

1841 年：英国封锁加勒比沿海

1847 年：尼加拉瓜给予美国穿越地峡的权利

1848 年：中美洲国家各自宣布主权独立

1850 年：美国与英国签署《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1852—1868 年：柯尼勒斯·范德比尔特的大西洋与太平洋船舶运河公司在尼加拉瓜全境运营

1855 年：巴拿马铁路完工

1855 年：威廉姆·沃克及其煽动分子来到尼加拉瓜

1856—1857 年：反抗沃克的“民族战争”把煽动分子赶出了地峡

1859 年：危地马拉承认英国对伯利兹的控制权，以此交换一条通往加勒比沿海的道路

咖啡共和国的形成

1870 年：自由主义时代开始，注重外来投资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为新的出口作物进行“土地改革”：咖啡和香蕉

1870—1882 年：托马斯·瓜迪亚将军统治哥斯达黎加；施行宪法改革并终止了军事独裁

1878 年：法国人获得在现在的巴拿马境内修建运河的权利

1885 年：危地马拉独裁者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为争取中美洲联合在萨尔瓦多被杀

1893—1909 年：何塞·桑托斯·塞拉亚在尼加拉瓜组建自由政府并夺回莫斯基蒂亚

1898—1920 年：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建立了中美洲最持久的独裁统治

1899 年：联合果品公司成立

美元“外交”与独裁者

1903 年：巴拿马从哥伦比亚获得独立；第一个美国—巴拿马运河条约签订

1907 年：中美洲和平会议以及中美洲法院的成立

1907—1931 年：梅伦德斯家族和寡头集团控制萨尔瓦多

1910—1917 年：墨西哥革命带来了联邦主义和改革运动

1912—1933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尼加拉瓜

1914 年：巴拿马运河通航

1916 年：中美洲法院解散

1917 年：中美洲统一尝试失败

1920 年：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被推翻；其他独裁者也很快落马

1928—1934 年：奥古斯托·桑地诺领导游击战抵抗美国侵占尼加拉瓜

1931—1944 年：豪尔赫·乌维科将军（危地马拉）和马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蒂内斯将军（萨尔瓦多）的独裁统治镇压劳工和共产主义者以及所有改革运动

1932 年：共产主义者奥古斯汀·法拉本多·马蒂组织起义之后，萨尔瓦多发生了拉马坦萨农民大屠杀

1933—1948 年：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将军控制了洪都拉斯

1934 年：在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命令下桑地诺被谋杀

1934—1956 年：尼加拉瓜被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统治

对旧秩序的挑战

1944 年：反对势力逼迫乌维科和马蒂内斯下台

1944—1954 年：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和哈科沃·阿本斯在危地马拉开创了自由选举和改革

1948 年：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领导哥斯达黎加内战

1948—1956 年：奥斯卡·奥索里奥上校的改革党统治萨尔瓦多

1950 年：哥斯达黎加废除军队；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允许公民普选

1954 年：美国政府协助推翻阿本斯；乔治·普赖斯的进步党主张英属洪都拉斯独立，赢得了伯利兹大选

1956 年：索摩查被暗杀；他的儿子们接管尼加拉瓜

1957—1963 年：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在洪都拉斯推行文官政府和改革；1963 年的军事政变使改革结束

50 年代至 60 年代：巴拿马暴乱

1958 年：理查德·尼克松在拉丁美洲遭到抗议

1959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获胜

1960 年：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游击运动开始

1961 年：争取进步联盟成立

1964 年：泛美公路穿越中美洲直到达里恩地区

1969 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爆发足球战争

内战

1968 年：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麦德林召开

1969—1981 年：奥马尔·托里霍斯统治巴拿马

1971 年：萨尔瓦多的游击运动开始

1973 年：英属洪都拉斯殖民地成为一个国家——伯利兹

1975 年：危地马拉的游击战争在玛雅高地上爆发

1977 年：联合国承认伯利兹独立；巴拿马与美国签署新的运河条约

1978—1982 年：罗梅奥·卢卡斯·加尔西亚将军在危地马拉实施焦土政策

1979 年：桑地诺主义者在尼加拉瓜取得胜利；萨尔瓦多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

1980 年：奥斯卡·阿尔努尔福·罗梅罗阁下被暗杀于圣萨尔瓦多

1981 年：美国和孔特拉斯在洪都拉斯军事基地的活动加剧

1982 年：埃弗瑞恩·里奥斯·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接管危地马拉；暴力活动受到国际谴责；罗伯托·达布松少校就任萨尔瓦多总统

1983 年：孔塔多拉和平谈判启动

1987 年：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发起召开中美洲和平会议

1990 年：尼加拉瓜在国际监督下进行选举；桑地诺主义者失败

1991—1992 年：在联合国帮助下协商萨尔瓦多和平条约

1996 年：在联合国帮助下签署危地马拉和平条约

和平与民主的挑战

1996—1999 年：所有中美洲国家都进行了和平和民主的总统选举

1997 年：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先于联合国的统一尝试

1998 年：飓风米奇摧毁了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1999 年 12 月 31 日：巴拿马获得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

1999—2006 年：尼加拉瓜的前桑地诺派总统丹尼尔·奥特加与保守派总统阿诺尔多·阿莱曼签订盟约

2003 年：奥斯卡·贝尔赫在危地马拉的总统选举中战胜里奥斯·蒙特将军

2004 年：签订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

2005 年：飓风斯坦摧毁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

2006 年：巴拿马通过巴拿马运河拓宽计划；由丹尼尔·奥尔特加获胜的尼加拉瓜总统竞选象征着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趋势

附录9　参考文献

Alvarado, Pedro de. *An Account of the Conquest of Guatemala in 1524*. Edited by Sedley J. Mackie. Boston: Milford Houses, 1972.

Anderson, Charles L. G. *Life and Letters of Vasco Núnez de Balboa*. Repri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0.

Angulo, Pedro de. Archivo General de Sevilla (Audiencia de Guatemala), Leg. 168.

Asturias, Miguel ángel. *Men of Maize*. Translated by Gerald Marti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 *El Senor Presidente*. Translated by Frances Partridge. New York: Atheneum, 1964.

Barber, Willard F., and C. Neal Ronning. *Inter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Power: Counterinsurgency and Civic Action in Latin America*.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Barry, Tom. *Central America Inside Ou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Baxter, Kevin. "Under the Volcano: Neoliberalism Finds Nicaragua." *The Nation*, April 6, 1998.

Belt, Thomas. *The Naturalist in Nicaragua*. 1874. Repri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Bierhorst, John. *The Mythology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umgartner, Louise. *José del Valle of Central America.*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3.

Burgess, Paul. *Justo Rufino Barrios: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Dorrance& Company, 1926.

Burkhart, Louise E. , and Janine Gasco. "Mesoamerica and Spain: TheConquest." In *The Legacy of Mesoamerica*, edited by Robert M. Carmacket al. Upper Saddle River, N. J. : Prentice Hall, 1996.

Calderón, Manuel Torres, Thelma Mejia, et al. *Deciphering Honduras: Four Views of Post – Mitch Political Reality.* Cambridge, Mass. : Hemisphere Initiatives, 2002.

Cambranes, Julio Castellanos. "Origins of the Crisis of the EstablishedOrder in Guatemala." In *Central America: Crisis and Adaptation*, edited by Steve C. Ropp and J. A. Morri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New Mexico Press, 1984.

Cardenal, Ernesto. *From Nicaragua with Love: Poems 1979—1986.* Translated by Jonathan Cohen.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7.

Carlsen, Robert S. *The War for the Heart & Soul of a Highland MayaTow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Carmack, Robert M. *Quichean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73.

Chavero, Alfredo. *Antiguedades Mexicanos.* 1892.

Chinchilla, Oswaldo Mazariegos.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Guatemala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Antiquity* 72, no. 276 (1998): 376—86.

Chonay, Dionisio José, and Delia Goetz, trans. *Title of the Lords*

ofTotonicapán. Second printing.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Press, 1967.

Cortés, Hernán. *Letters from Mexic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thonyPagde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raddock, Bantz J. General. "Testimony before 109th Congress, House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ciponline.org/colombia/050309crad/htm. Posted March 9, 2005.

Crowe, Frederick. *The Gospel in Central America.* London: CharlesGilpin, 1850.

Darío, Rubén. *Cantos de Vida y Esperanza.* Buenos Aires: Espasa-CalpaArgentina, SA, 1948.

Day, Jane Stevenson, and Alice Chiles Tillett. "The Nicoya Shaman." In*Paths to Central American Prehistory*, edited by Frederick W. Lange.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6.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oward a Citizen's Democrac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pril 2004.

Denevan, William M., ed.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6.

Dunlop, Robert G. *Travels in Central America: Being A Journal ofNearly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the Country: Together with a Sketch of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and an Account of Its Climate, Productions, Commerce, etc.*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 1847.

Duran, Diego. *Book of the Gods and Rites and the Ancient Calenda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Fernando Hercasitos and Doris Heyde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Edmonson, Munro S., trans. *Heaven Born Mérida and Its Destiny: TheBook of the Chilam Balam of Chumaye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Press, 1986.

Elhinny, Vincent. "U.S.-Central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Leaping Without Looking?" In *Americas Program*. Silver City, NewMexico: 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 2003.

Equipo Maíz. *El Salvador, 10 anos después.* San Salvador: AsociaciónEquipo Maíz, 2001.

Franck, Harry A. *Tramping Through Mexico, Guatemala and Hondura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16.

Fuentes, Patricia de, ed. and trans. *The Conquistadors.*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Gage, Thomas.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1648.*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5.

Gerla, Marisa P. "Toward a Deeper Union?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of 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Unpublished paper, 2005.

Geyer, Georgia Ann. "The Amazing New 'Center' in Central America." In *Washington Quarterly* 22, no. 3 (summer 1999): 10—13.

Graham, Mark Miller. "Merchants and Metalwork in Middle America." In *Paths to Central American Prehistory*. Edited by Frederick W. Lange.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6.

Graham, Mark Miller, ed. *Reinterpreting Pre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3.

Handy, Jim. *Gift of the Devil.*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Haugaard, Lisa, Adam Isacson, and Joy Olson. *Erasing the Lines: Trendsin U. S. Military Programs withLatin Americ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Policy.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ciponline. org. Posted December2005.

Henderson, Captain George. *An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of-Honduras.* London, 1809.

Heritage Foundation.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2006.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heritage. org/research/features/index/country. DownloadedJune 15, 2006.

Inter –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The Poverty Impact of TradeIntegration."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iadb. org/news/articledetail. cfm? . Posted June 27, 2006.

Jones, Grant D., ed. *El Manuscrito de Canek.* Mexico: Instituto Nacional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91.

——. "The Last Maya Frontiers of Colonial Yucatán." In *Spaniards andIndians in Southeastern Mesoamerica*, edited by Murdo J. MacLeod andRobert Wasserstro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Jones, Oakah L., Jr. *Guatemala in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Joyce, Thomas A. *Central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Archaeology.* 1916. Reprint. New York: Hacker Art Books, 1974.

Kincaid, Douglas. "Demilitarization and Security in El Salvador and-Guatemala: Convergences of Success and Crisis." In *Journal ofInteramerican Studies & World Affairs*, 52, no. 4 (winter 2000).

Kinzer, Stephen. "Country Without Heroes."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Books*, July 19, 2001, 31—33.

——. "The Trouble with Costa Rica."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Books*, June 8, 2006, 56—59.

LaFeber, Walt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Americ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Landívar, Rafael. *Rusticatio mexicano.* Facsimile edition, 1782. Guate – mala: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50.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Nigel Griff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Latinobarómetro, Latin American Poll 2005.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latinobarometro. org. Posted October 2005.

Lehner, Ernst, and Johanna Ernst, compilers. *How They Saw the New-World.*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León – Portilla, Miguel, ed. *Broken Spears: The Aztec Account of the Conquestof Mexico.* Translated by Lysander Kemp.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 *Pre – Columbian Literatures of Mexico.* Translated by GraceLobanov and the author.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Press, 1986.

Lutz, Christopher H. *Santiago de Guatemala 1541—1773: City, Caste, and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MacLeod, Murdo J. *Spanish Central America: A Socioeconomic History1520—17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Marure, Alejandro. *Bosquejo histórico de las revoluciones de CentroAmerica desde 1811 hasta 1834.* Guatemala: 1837.

Maudslay, Alfred P. *Biologia Centrali – Americana. Archaeology.* 1889—1902. Facsimile edition. New York: Milpatron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McCann, Thomas P. *An American Company: The Tragedy of United Fruit.*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76.

Ministry of Education, El Salvador.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s 1 y 2. El Salvador: Comisión Nacional de los Libros de Textos Gratuitos, 1994.

Mongabay. World Deforestation Rates 2000—2005.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news. mongabay. com Posted November 17, 2005.

Montejo, Victor. *Testimony: Death of a Guatemalan Village.* Translated byVictor Perera. Willimantic, Conn.: Curbstone Press, 1987.

Morison, Samuel Eliot, ed. and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the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Heritage, 1963.

Munro, Dana G. *The Five Republics of Central America.* 1918. Reprin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March 29, 1968.

Newson, Linda. *The Cost of Conquest: Indian Decline in Honduras underSpanish Rul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Nyrop, Richard F., ed. *Panam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Paige, Jeffrey M. *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endergast, David M., and Grant D. Jones. "Poor Beds of Sticks andRings of Pure Gold." *Ancient Mesoamerica* 3 (1992): 281—90.

Ramírez, Sergio. *Adiós Muchachos: Una memoria de la revolución sandin – ista.* Mexico D. F.: Aguilar, 1999.

Recinos, Adrián, and Delia Goetz, trans. *The Annals of the Cackchiquels.* Third printing.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4.

Reents – Budet, Dorie. *Painting the Maya Universe.* Durham, N. C.: DukeUniversity Press, 1994.

Restall, Matthew. *Maya Conquistador.* Boston: Beacon Press, 1998.

Rogers, Tim. "In Nicaragua, Old US Foe Rises Again." *Christian ScienceMonitor*, July 7, 2006.

Rohter, Larry. "Unending Graft Threatens the Democracies of LatinAmerica as Frustrations Grow." *The New YorkTimes*, July 30, 2005.

Roys, Ralph L., trans. *The Book of the Chilam Balam of Chumayel.*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7.

Rushdie, Salman. *The Jaguar Smile: A Nicaraguan Journey.* Reprint, NewYork: Picador, 2003.

Sahagun, Bernardino d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Florentine Codex (c. 1583).* Translated by Arthur J. O. Anderson andCharles E. Dibble. 13 vols. Santa Fe, N. Mex.: School of AmericanResearch and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51—82.

Sherman, William L. *Forced Native Labor in Sixteenth – Century Central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 "Some Aspects of Change in Guatemalan Society, 1470—1620." In *Spaniards and Indians in Southeastern Mesoamerica*, edited by-Murdo J. MacLeod and Robert Wasserstrom. Lincoln: University ofNebraska Press, 1983.

Sieder, Rachel, Megan Thomas, et al. *Who Governs? Guatemala Five-Years After the Peace Accords.* Cambridge, Mass.: HemisphereInitiatives, 2002.

"Small, Vulnerable—and Disunited." *Economist*, 360, no. 8234, August11, 2001, 28—29.

Spence, Jack. *War and Peace in Central America.* Brookline, Mass.: Hemisphere Initiatives, 2004.

Spence, Jack, Mike Lanchin, et al. *From Elections to Earthquakes: Reformand Participation in Post – War El Salvador.* Cambridge, Mass.: Hemisphere Initiatives, 2001.

Squier, E. G. *Notes on Central America, Particularly the States ofHonduras and San Salvado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5.

Stein, Stanley J., and Barbara H.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ephens, John Lloyd. *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 Chiapas, and Yucatá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9.

Tedlock, Barbara. *Time and the Highland Maya.* Rev.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2.

Tedlock, Dennis, ed. and trans. *Popol Vuh: The Mayan Book of the Dawnof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Tozzer, Alfred M., ed. and trans. *Landa's Realción de las Cosas deYucatán.* Cambridge, Mass.,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vol. xviii, 1941.

Turcios, Roberto. " El Salvador: Una Transición histórica y fundacional. " In *Nueva Sociedad* 90 (July - August 1997): 112—118.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6 Annual Report: Global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 //undp. 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2006/index. shtml. Downloaded March 2, 2006.

——.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2005. "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 //hdr. undp. org. Posted September8, 2005.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Caribbean.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 In *Preliminary Overview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5.* Availableonline: www. eclac. org/publications. Posted December 200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ackground Notes.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 //www. state. gov/r/pa/ei/bgn/. Updated 2005—2006.

Vasconcelos, Pedro de. *Remittances 2005: Promoting Financial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 Inter -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March 2006.

Vásquez, Norma. " Revolution, War and Women in El Salvador. " Monograph 5. Montevideo, Uruguay: LOLA Press, 1996.

Weiner, Tim. " Guatemalan Voters Reject a Former Dictator. " *The NewYork Times*, November 10, 2003.

Wikipedia. " Latin America. "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 //en. wikipedia. org/ wiki/Latin_ america. Updated July 12, 2006.

Woodward, Ralph Lee, Jr. *Central America: A Nation Divided.* 2nd ed.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Rafael Carrer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 1821—71.*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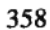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Data & Statistics. "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 //www. worldbank. org. DownloadedSeptember 10, 2005.

World Factbook. U. 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ublications.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cia. 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2006. Updated June 6, 2006.

World' s Coffee, The. no. 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Rome: FAO Bureau, Villa Borghese, 1947.

Wortman, Miles 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merica, 1680—184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Zorita, Alonso de. *Life and Labor in Ancient Mexico.* Edited and translatedby Benjamin Kee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附录 10　建议阅读书目

本书讲述的简史虽然旨在面向大众读者，但是有很多深入的著作可供参考。以下英文著作不仅包含了历史和政治，也涉及文学、艺术、人类学以及人种历史学。

涵盖主要历史时期的书

Bolland, O. Nigel. *The Formation of Colonial Society: Belize fromConquest to Crown Colon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77.

Bulmer - Thomas, Vict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America Since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armack, Robert M. *Rebels of Highland Guatemala: The Quiché - Mayas ofMomostenango*.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Edelman, Marc, and Joanne Kenen, eds. *The Costa Rica Reader*. NewYork: Grove Weidenfeld, 1989.

Grant, C. H. *The Making of Modern Belize: Politics, Society and BritishColonialism 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76.

Haggerty, Richard A., ed. *El Salvador: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90.

Hall, Carolyn, Hector Pérez Brignoli.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merica.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3.

Helms, Mary. *Middle America: A Culture History of Heartland and-Frontier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75.

Karnes, Thomas L. *The Failure of the Union: Central America, 1824—1975.* Revised edition. 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LaFeber, Walt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Americ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Langley, Lester 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

Lindsay – Poland, John. *Emperors in the Jungle: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U. S. in Panama.*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orris, James A. *Honduras: Caudillo Politics and Military Ruler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Nelson, Harold D. *Costa Rica: A Country Study.* 2nd ed.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Nyrop, Richard F., ed. *Guatemala: A Country Study.* 2nd ed.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Nyrop, Richard F., ed. *Panam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Paige, Jeffrey M. *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érez – Brignoli, Hector. *A Brief 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Translated byRicardo B. Sawrey and Susana Strettridi Sawrey.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Ropp, Steve C. *Panamanian Politics: From Guarded Nation to NationalGuard.* New York: Praeger, 1982.

Rudolph, James D., ed. *Honduras: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Rudolph, James D., ed. *Nicaragua: A Country Study*. 2nd ed.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Smith, Carol A. *Guatemalan Indians and the State 1540—198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Stone, Samuel Z. *The Heritage of the Conquistadors: Ruling Classes in Central America from Conquest to Sandinistas*. Lincoln: University ofNebraska Press, 1992.

Torres Rivas, Edelberto. *History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merica*. Translatedby Douglass Sullivan - Gonzólez.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3.

Woodward, Ralph Lee, Jr. *Central America: A Nation Divided*.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ashar, Deborah. *Demanding Democracy: Reform and Reaction in CostaRica and Guatemala, 1870s—195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7.

土地和第一批移民

Bierhorst, John. *The Mythology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oone, Elizabeth, H., ed. *Ritual Human Sacrifice in Mesoamerica*.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1984.

Christenson, Allen J., trans. and ed. *Popol Vuh: The Sacred Book of theMaya*. New York: O Books, 2003.

Coates, Anthony G., ed. *Central America: A Natural and Cultural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oe, Michael D. *Mexico: The Maya*. 7th ed.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5.

Davies, Nigel. *Voyagers to the New World.* Reprint editio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6.

Grove, David C., ed.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Olme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Olmec World: Ritual and Rulership, The. Princeton, N. J.: The Art-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6.

Recinos, Adrián, and Delia Goetz, trans. *The Annals of the Cakchiquels.* Second printing.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7.

Sheets, Payson D. *The Ceren Site.* 2n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Publishing, 2005.

Sheets, Payson D., ed. *Archeology and Volcanism in Central Americ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

Stone, Doris. *Pre – Columbian Man Finds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Peabody Museum Press, 1972.

Tedlock, Dennis, ed. and trans. *The Popol Vuh: The Mayan Book ofthe Dawn of Life.* Rev.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West, Robert C., and John P. Augelli. *Middle America: Its Land and-People.*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89.

玛雅人及其邻居

Aveni, Anthony F. *Skywatchers of Ancient Mexico.* Rev. e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1.

Carmack, Robert M. *The Quiché Mayas of Utatlán: The Evolution of aHighland Guatemala Kingdo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Press, 1981.

Graham, Mark Miller, ed. *Reinterpreting Pre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3.

Lange, Frederick W., ed. *Paths to Central American Prehistory.* Ni-

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6.

Lange, Frederick W., ed. *Wealth and Hierarchy in the Intermediate Area*.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1992.

León – Portilla, Miguel, ed. *Broken Spears: The Aztec Account of the-Conquest of Mexico*. Translated by Lysander Kemp. Rev.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León – Portilla, Miguel. *Pre – Columbian Literatures of Mexico*.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9.

Miller, Mary Ellen. *The Art of Mesoamerica from Olmec to Aztec*. 4th ed.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6.

Quilter, Jeffrey, and John Hoopes, eds. *Gold and Power in Ancient CostaRica, Panama, and Colombia*.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2003.

Schele, Linda, and David Freidel. *A Forest of Kings: The Untold Story ofthe Ancient Maya*. Reprint editio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2.

Schele, Linda, and Peter Mathews. *The Code of Kings: The Language ofSeven Sacred Mayan Temples and Tombs*. New York: Scribners, 1998.

Sharer, Robert J. with Loa P. Traxler. *The Ancient Maya*. Sixth edi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one, Doris. *Pre – Columbian Man Finds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Peabody Museum Press, 1972.

Urban, Patricia A., and Edward M. Schortman. *The Southeast Maya-Periphe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西班牙征服

Alvarado, Pedro de. *An Account of the Conquest of Guatemala in 1524*. Edited by Sedley J. Mackie. Boston: Milford House, 1972.

Anderson, Charles L. G. *Life and Letters of Vasco Núnez de Balboa*. London: Fleming H. Revell & Company, 1941.

Carmack, Robert M. *The Quiché Mayas of Utatlán: The Evolution of aHighland Guatemala Kingdo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Press, 1981.

Cortés, Hernán. *Letters from Mexic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thonyPagde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lliot, J. H.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1970. Reprint,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3.

Fuentes, Patricia de, ed. and trans. *The Conquistadors*.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Kelly, John E. *Pedro de Alvarado, Conquistador*. 1932. Reprint, PortWashington, N. Y.: Kennikat Press, 1988.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Ed. and trans. by Nigel Griff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Recinos, Adrián, and Delia Goetz, trans. *The Annals of the Cakchiquels*. Second printing.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4.

Ricard, Robert. *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Mexico. An Essay on theApostolate and Evangelizing Methods of the Mendicant Orders in New-Spain, 1523—1572*. Translated by Lesley Byrd Simp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Sale, Kirkpatrick.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2nd ed. London: Tauris Parke, 2006.

危地马拉王国的建立

Friede, Juan, and Benjamin Keen, ed.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n Histor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 and His Work*. De Kalb: Northern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Gibson, Charles, *Spai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Jones, Oakah L. Jr. *Guatemala in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Lutz, Christopher H. *Santiago de Guatemala, 1541—1773: City, Caste,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MacLeod, Murdo J., *Spanish Central America: A Socioeconomic History1520—17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eprint, 1985.

MacLeod, Murdo J., and Robert Wasserstrom, eds. *Spaniards andIndians in Southeastern Meso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Press, 1983.

Newson, Linda A. *The Cost of Conquest: Indian Decline in HondurasUnder Spanish Rul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 *Indian Survival in Colonial Nicaragua*. Norman: University ofOklahoma Press, 1987.

Sherman, William L. *Forced Native Labor in Sixteenth – Century Central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Zorita, Alonso de. *Life and Labor in Ancient Mexico*. Translated and editedby Benjamin Kee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殖民地的生活

Crouch, Dora P., Daniel J. Garr, and Axel I. Mundigo. *Spanish City-Planning in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2.

Floyd, Troy S. *The Anglo – Spanish Struggle for Mosquití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67.

Gage, Thomas.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1648*.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5.

Haring, Clarence Henry. *Buccaneers in the West Indies in the XVIICen-*

tury.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66.

Hoberman, Louisa Schell, and Susan Migden Socalow, eds. *TheCountryside in Colonial Latin Americ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New Mexico Press, 1996.

Jones, Oakah L., Jr. *Guatemala in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Lovell, George, and Christopher H. Lutz. *Geography and Empire: AGuide to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Spanish Central America, 1500—1821.* Boulder, Conn.: Westview Press, 1995.

Lutz, Christopher H. *Santiago de Guatemala, 1541—1773: City, Caste,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MacLeod, Murdo, J. *Spanish Central America: A Socioeconomic History1520—17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eprint, 1985.

MacLeod, Murdo J., and Robert Wasserstrom, eds. *Spaniards andIndians in Southeastern Meso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Press, 1983.

Stein, Stanley J., and Barbara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Wortman, Miles 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merica, 1680—184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波旁王朝与独立

Anna, Timothy B. *Spain and the Loss of the Americas.* Lincoln: Universityof Nebraska Press, 1983.

Bumgartner, Louise. *José del Valle of Central America.*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3.

Floyd, Troy S., ed. and trans. *The Bourbon Reformers and Spanish-*

Civilization: Builders or Destroyers? Boston: D. C. Heath, 1966.

Fisher, Lillian Estelle. *The Background of Revolution for MexicanIndependenc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6.

Gonzalez, Nancie L. *Sojourners of the Caribbean: Ethnogenesis andEthnohistory of the Garifu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Humboldt, Alexander von.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Ed. by Mary Maples Dun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Lanning, John Tat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nlightenment in the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Ithaca*, N. Y.: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56.

Moerner, Magnus, e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suits from Lati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Wortman, Miles 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merica, 1680—184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中美洲联邦

Anna, Timothy E. *The Mexican Empire of Iturbide.* Lincoln: University ofNebraska Press, 1990.

Bumgartner, Louise. *José del Valle of Central America.*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amberlain, Robert S. *Francisco Morazán: Champion of CentralAmerican Federation.* 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50.

Karns, Thomas L. *The Failure of the Union: Central America, 1824—1975.* Revised edition. 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tephens, John Lloyd. *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 Chiapasand Yucatá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9.

Woodward, Ralph Lee, Jr. *Rafael Carrer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Republic of Guatemala, 1821—1871.*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Press, 1993.

保守派与外来投机商

Bard, Samuel A. [E. G. Squier] *Waikna; or, Adventures on the MosquitoShor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5. Reprint, Gain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5.

Dunlop, Robert G. *Travels in Central America, etc*.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 1847.

Folkman, David. *The Nicaragua Route*.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Utah Press, 1972.

Gudmundson, Lowell. *Costa Rica Before Coffee: Society and Economy onthe Eve of the Export Boo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Press, 1986.

Langley, Lester D.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Mediterranean: United-States - European Rivalry in the Gulf - Caribbean, 1777—1904*.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6.

Scroggs, William O. *Filibusterers and Financiers: The Story of William-Walker*. 1916. Reprin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9.

Squier, E. G. *Notes on Central America, Particularly the States ofHonduras and San Salvado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5. Repri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5.

Woodward, Ralph Lee, Jr. *Rafael Carrera an the Emergence of theRepublic of Guatemala, 1821—1871*.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Press, 1993.

咖啡共和国的形成

Belt, Thomas. *The Naturalist in Nicaragua*. 1874. Reprint, New York: Cosimo, 2005.

Burgess, Paul. *Justo Rufino Barrios: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Dorrance& Company, 1926.

Karnes, Thomas L. *Tropical Enterprise: The Standard Fruit and SteamshipCompan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Langley, Lester D.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Mediterranean: United-States - European Rivalry in the Gulf - Caribbean, 1777—1904.*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6.

——, and Thomas Schoonover. *The Banana Men: AmericanMercenaries and Entrepreneurs in Central America 1880—1930.* Reprint.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McCullough, David.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 The Creation of thePanama Canal, 1870—191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Schoonover, Thoma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1860—1911.*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eligson, Mitchell A. *Peasants of Costa Rica and the Development ofAgrarian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Stewart, Watt. *Keith and Costa Rica: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Minor-Cooper Keith.*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64.

Williams, Robert G. *States and Social Evolution; Coffee and the Rise ofNational Governments in Central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美元“外交”及独裁者

Anderson, Thomas P. *Matanza: El Salvador's Communist Revolt of 193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1.

Conzemius, Eduard. *Ethn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Miskito and SumuIndians of Honduras and Nicaragu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Dozier, Craig, L. *Nicaragua's Mosquito Shore: The Years of British-hand American Presenc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5.

Grieb, Kenneth J. *Guatemalan Caudillo: The Regime of Jorge Ubico*,

Guatemala *1931—1944*.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9.

LaFeber, Walter. *The Panama Canal: The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pdate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Langley, Lester D. *The Banana Wars: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the-Caribbean 1898—1934*. 2nd rev. ed. Lanham, Md.: SR Books, 2002.

McCann, Thomas P. *An American Company: The Tragedy of United Fruit*.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76.

McCullough, David.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 The Creation of thePanama Canal, 1870—191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Macaulay, Neill. *The Sandino Affair*. 1967. Reprint, Micanopy, Fla.: Wachoota Press, 1998.

Morris, James A. *Honduras: Caudillo Politics and Military Ruler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Munro, Dana. *Intervention and Dollar Diplomacy, 1900—1921*.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Repri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

Salisbury, Richard V. *Anti –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Central America*. 1920—1929. Lanham, Md.: SR Books, 1989.

Schmidt, Hans. *Maverick Marine: General Smedley D. Butler*.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Schoonover, Thoma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1860—1911*.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Walker, J. W. G. *Ocean to Ocean: An Account,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ofNicaragua and Its People*. Chicago: A. C. McClurg & Company, 1902.

Walter, Knut. *The Regime of Anastasio Somoza 1936—195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Watland, C. D. *Poet – errant: A Biography of Rubén Darío*.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5.

对旧秩序的挑战

Ameringer, Charles D. *Democracy in Costa Rica*. New York: Praeger, 1982.

——. *Don Pep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José Figuer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8.

Arévalo, Juan José. *The Shark and the Sardines*. Translated by June Cobband Paul Osegueda. New York: Lyle Stuart, 1961.

Asturias, Miguel ángel. *Men of Maize*. Translated by Gerald Martin. Pittsburg,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 *El Senor Presidente*. Trans. by Frances Partridge. New York: Atheneum, 1978.

Barber, William F., and C. Neale Ronning. *Inter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Power in Latin America*.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Bell, John Patrick. *Crisis in Costa Rica: The 1948 Revolu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1.

Cullather, Nick. *Secret History: The CIA' 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Operation in Guatemala 1952—195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9.

Dunkerley, James. *Power in the Isthmus*. London: Verso, 1988.

Durham, William H. *Scarcity and Survival in Central America: EcologicalOrigins of the Soccer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Etchison, Don L.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ism in Central America*. NewYork: Praeger, 1975.

Fagen, Richard R. *Forging Peace: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America*. NewYork: B. Blackwell, 1987.

Immerman, Richard. *The CIA in Guatemal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Press, 1983.

Leonard, Thomas 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merica, 1944—49*.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4.

Rodríguez, Mario. *Central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5.

Schlesinger, Stephen, and Stephen Kinzer. *Bitter Fruit: The Untold Story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alter, Knut. *The Regime of Anastasio Somoza 1936—195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Williams, Robert G. *Export Agriculture and the Crisis in Central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内战

Aldaraca, Bridget, ed. *Nicaragua in Revolution: The Poets Speak*. 1981. Reprint, Minneapolis, Minn.: Marxist Education Press, 1991.

Alegría, Claribel, and Darwin J. Flakoll, eds. and trans. *On the Front Line: Guerrilla Poems of El Salvador*. Willimantic, Conn.: Curbstone, 1989.

Anderson, Thomas P. *Politics in Central America: Guatemala, ElSalvador, Honduras, and Nicaragua* 1982. Rev. ed. New York: Praeger, 1988.

Barry, Tom. *Central America Inside Ou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Bolland, O. Nigel. *Belize: A New N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6.

Brockett, Charles D.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Violence in Central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armack, Robert M. ed. *Harvest of Violence: The Maya Indians and theGuatemalan Crisis*.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Dunkerley, James. *The Long War: Dictatorship and Revolution in El-Salvador*. London: Verso, 1983.

Eich, Dieter, and Carl Rincón. *The Contras: Interviews with Anti – Sandinistas*. Reprint, Westport, Conn.: Bergin & Garvey, 1987.

Flora, Jan L., and Edelberto Torres Rivas, eds. *Central America: Sociologyof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Gettleman, Marvin E., et al. *El Salvador: Central America in the new ColdWar*.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7.

Herrick, Bruce, and Barclay Hudson. *Urban Poverty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osta 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LaFeber, Walt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America*.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 *The Panama Canal: The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vised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Lernoux, Penny. *Cry of the People: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Latin America—The Catholic Church in Conflict with U. S. Policy*. Reprint. New York: Penguin, 1991.

Menchú, Rigoberta. *I, Rigoberta Menchú: An Indian Woman inGuatemala*. London: Verso, 1984.

Montgomery, Tommie Sue.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From Civil Strife toCivil Peace*. Second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Randall, Margaret, ed. *Risking a Somersault in the Air: Conversationswith Nicaraguan Writers*. 1981. Reprint, Willimantic, Conn.: Curbstone Press, 1990.

Ropp, Steve. C., and J. Morris, eds. *Central America, Crisis andAdaptatio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4.

Rosenberg, Mark B., and Philip L. Shepherd, eds. *Honduras Confro-*

nts itsFuture.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Publications, 1986.

Vilas, Carlos M. *The Sandinista Revolution: National Liberation and-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86.

Walker, Thomas W. *Nicaragua: The Land of Sandino*. 3rd ed.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1.

——, ed.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Nicaragua*.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1.

Wickham – Crowley, Timothy. *Guer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ison Study of Insurgents and Regimes Since 1956*.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lliams, Robert G. *Export Agriculture and the Crisis in Central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和平与民主的挑战

Dunkerley, James. *The Pacification of Central America*. London: Verso, 1994.

Dye, David R. *Contesting Everything, Winning Nothing: The Search forConsensus in Nicaragua, 1990—1996*. Cambridge, Mass. : Hemisphere-Initiatives, 1995.

Dye, David R. , with Jack Spence and George Vickers. *PatchworkDemocracy: Nicaraguan Politics Ten Years after the Fall*. Cambridge, Mass. : Hemisphere Initiatives, 2000.

Montejo, Victor D. *Maya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Leadership*.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aige, Jeffrey M. *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us, Eva. *Foreig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Can-*

Costa Rica Become Ire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Robinson, William I. "Latin America in an Age of Inequality." In*Egalitarian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Craig N. Murph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Spence, Jack. *War and Peace in Central America*. Brookline, Mass.: Hemisphere Initiatives, 2004.

Spence, Jack, et al. *Promise and Reali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atemalanPeace Accords*. Cambridge, Mass.: Hemisphere Initiatives, 1998.

——. *Chapúltepec: Five Years Later; El Salvador' s Political Reality andUncertain Future*. Cambridge, Mass.: Hemisphere Initiatives, 1997.

Tice, Karin E. *Kuna Crafts, Gender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5.

Vickers, George and Jack Spence. *Endgame: A Progress Report onImplementation of the Salvadoran Peace Accords*. Cambridge, Mass.: Hemisphere Initiatives, 1992.

Walker, Thomas W., and Ariel C. Armony, eds. *Repression, Resista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merica*.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2002.

Warren, Kay B. *Indigenous Movements and their Critics: Pan – Maya Activismin Guatemal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索　引

粗体页码表示对某一主题的主要阐述。斜体页码表示插图。页码后加 m 表示地图，加 t 表示图表，加 c 表示大事年表。

B

C

D

F

G

H

I

J

M

O

P

Q

R

S

V

W

X

Y

Z